崇祯往事

明帝国的最后图景

陈梧桐 著

故宫出版社



非外借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崇祯往事

明帝国的最后图景

陈梧桐　著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陈梧桐著．—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134-0961-2

Ⅰ．①崇… Ⅱ．①陈… Ⅲ．①崇祯帝（1611-1644）—传记 Ⅳ．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4335号

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

著　　者：陈梧桐

出 版 人：王亚民

责任编辑：王志伟　邓曼兰

装帧设计：王　梓

出版发行：故宫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网址：www.culturefc.cn

邮箱：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33

字　　数：340千字

版　　次：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978-7-5134-0961-2

定　　价：46.00元

目录

第一章　临危受命继大统 / 001
　第一节　降生于多事之秋 / 003
　第二节　魏阉阴影下的信王生涯 / 020
　第三节　临危受命就帝位 / 037
第二章　不动声色除阉党 / 045
　第一节　潜移默夺，严惩元凶 / 047
　第二节　清查阉党余孽，销毁《三朝要典》 / 062
　第三节　钦定逆案，平反冤狱 / 071
第三章　忧勤惕厉求中兴 / 085
　第一节　组建东林内阁，平定奢安之乱 / 087
　第二节　整肃吏治，唯才是举 / 101
　第三节　引进西方科技文化 / 111
　第四节　夙夜焦劳，急功近利 / 128

第四章　袁崇焕与孙承宗督师蓟辽 / 145
第一节　重起袁崇焕督师蓟辽 / 147
第二节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 / 162
第三节　己巳之变与袁崇焕被冤杀 / 174
第四节　孙承宗再镇关门 / 188
第五章　温体仁的得宠与垮台 / 203
第一节　会推阁臣事件与党争的复起 / 205
第二节　周延儒和温体仁的得宠及互相倾轧 / 216
第三节　温体仁的走红与垮台 / 229
第六章　屡扑不灭的起义烈火 / 243
第一节　剿与抚的两难抉择 / 245
第二节　农民军的千里转战 / 260
第三节　卢象昇与洪承畴的东西夹剿 / 270
第四节　杨嗣昌“十面张网”与起义的暂时沉寂 / 277
第七章　周延儒的复出与赐死 / 287
第一节　传承温体仁衣钵的张至发和薛国观 / 289
第二节　复社的崛起与周延儒的复出 / 297
第三节　周延儒的短暂布新与败亡 / 304
第八章　清军夺占辽西与明清议和的失败 / 323
第一节　皇太极迂回入犯内地 / 325
第二节　松锦之战与洪承畴降清 / 344
第三节　明清议和的失败与陈新甲被杀 / 360

第九章　起义高潮的再起与明王朝的覆灭 / 371

第一节　起义高潮的再起 / 373

第二节　频换主帅，难挽狂澜 / 385

第三节　李建泰代帝出征与调吴三桂入晋之议 / 400

第四节　“大数已终”，魂断煤山 / 413

第十章　尾声：清军入关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 433

第一节　李自成进京与清军入关 / 435

第二节　弘光朝廷“联虏平寇”酿恶果 / 448

第三节　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 465

附录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 485

后记 / 517

第一章
临危受命继大统

第一节 降生于多事之秋

明朝晚期，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农历的年末，在都城北京，正当人们忙于洒扫庭除、备办年货、送旧迎新之际，却连续不断地刮起了北风。阵阵凶猛的朔风，挟带着西伯利亚凛冽的寒流和漠北高原滚滚的黄沙，刮过大街小巷，把整座京城变成一个灰蒙蒙的冰冷世界。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卯时（相当于现今的 5 至 7 时），天未大亮，透过北风的怒吼声，从昏暗沉闷的东宫里，隐隐约约地传出一阵婴儿稚嫩的啼哭声，又一个朱家宗室的子孙降生了，他就是未来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

朱由检诞生时天气的恶劣严寒，不知是否是他未来坎坷凶险命运的预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生不逢时！

本来，在明朝前期奠定的基础上，明代的社会生产在中后期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更是明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白银实现货币化，农业和手工业部门出现新的经济因素，经济结构开始缓慢地由较为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变。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也由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发展，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隆庆元年（1567 年）福建漳州月港的开放，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与隆庆三年广东、澳门的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迅速兴起，中国的生丝、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大批销往海外，世界各地的白银，主要是产自日本的白银和墨西哥的银元，源

源不断流入中国，中国已开始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经济领域的变化，又引起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在阶级关系方面，官绅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空前膨胀，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在社会生活方面，追求财富、崇尚奢华、逾礼越制、厌旧喜新成为时代风尚，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在思想观念方面，阳明心学的勃兴与实学思潮的涌动，使人的个性和欲望得到大胆的肯定，伦理观、财富观、价值观、政治观等也开始发生转变，贯穿着批判与求实的精神，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在文学艺术方面，传统正宗诗文等雅文学日趋衰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悄然勃兴，突出了主体个性的张扬与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对传统科技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有创新，强调实验手段与数学语言的运用，以及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吸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层政治领域出现了改革潮流。先是明武宗去世后，杨廷和与张聪相继实行革故鼎新，抑制宦官势力，裁减大批冗员，查勘庄田，革除皇店。隆庆与万历初年，张居正更是把改革推向高潮。他针对嘉靖末年以来明朝社稷“几倾覆矣”的危局，创立考成法，全面改革政治，裁减冗员，起用廉洁干练的官员，整肃吏治，严明法纪，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为了改变赋役不均、贫富悬殊的现象，并增加国库收入，在全国普遍清丈土地，促使嘉靖以来某些地区试行的一条鞭法得以推向全国。一条鞭法贯穿着简化税制、公平负担的原则，把以往名目繁多的差役归并为一则，取消力役，改为征收银两；全国的田赋，除苏、松、杭、嘉、湖等交纳供应宫廷食用的漕粮外，其他地方一般也都折收银

两。这项改革，实行部分摊丁入亩，废除直接对人身的征役，适应了广大农民摆脱封建人身束缚的要求。赋役的货币化，又使中国传统的实物财政转变为货币财政，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中国财政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改革收到显著的效果，有力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扭转嘉靖、隆庆时期财政年年亏空的状况，变得绰绰有余，太仓积存的粮食可支十年，太仆寺的积银也多达400多万两，成为正德以来国家财政最好的时期。清代官修的《明史》称："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经济领域与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变化，使晚明社会呈现新旧因素杂陈的多元色彩。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至此进入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并开始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晚明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明朝的最高统治阶层眼界狭窄，消息闭塞，没有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主义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渐连为一体，世界市场的雏形已初具规模，全球化的趋势已初露端倪，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此，未能抓住这个机遇，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大力推动社会的转型，使中国尽快走向世界，快速向前发展。相反，晚明的几个皇帝都极其昏庸腐朽，他们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都死死抱住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重农抑商、独尊儒术的政策不放。这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导致吏治的高度腐败、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从而造成社会的大动乱，使社会转型遭受严重挫折，丧失了走向世界并

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由检的祖父明神宗，就是一个昏庸腐朽的君主。他自小在糜烂的王府和皇宫里浸泡长大，深受祖父明世宗和父亲明穆宗腐朽生活的影响。虚龄十岁继承皇位后，内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内阁首辅高拱为首。不久，次辅张居正结纳宫中太监冯保，排斥高拱，当上首辅兼帝师。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厉行改革，同时严格管教小皇帝，力图把他培养成像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但张居正的严格管教，未能敌过随侍小皇帝左右的宦官们的潜移默化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潮流的负面影响，反而使他产生出逆反和报复心理。随着年龄的增大，明神宗逐渐滋长了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大恶习。

万历十年（1582 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掌握封建专制国家的统治大权，立即对冯保和张居正进行清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由此遭到否定或篡改。建立在清丈田亩，限制贵族地主、官绅地主优免特权基础上的一条鞭法，虽然延续下来，但贵族地主、官绅地主却仍然肆行无忌地欺隐田产、滥免粮差，使一条鞭法变味走形，未能发挥其均平负担、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明神宗亲政后，大权在握，曾力图改变过去凡事皆由张居正和李太后决断的状况，开头几年还能勤理政务。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在一个奏疏中，曾忆及明神宗刚亲政时的情景："皇上临御以来，日视朝讲，万几亲总，五夜夙兴，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对辅臣，咨访部院，开诚纳谏，虚己受言。"无奈明神宗是个酒色之徒，宫中嫔妃、宫女云集，还有号称"十

俊”的男色。他每夜必饮，每饮必醉。在酩酊大醉之后，就拽过身边的嫔妃、宫女进行房事。由于过度酗酒纵欲，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从万历十四年下半年起，便长期怠政，既不视朝，也不见大臣，就连臣下的奏疏也多被留置禁中不作批复。许多军国大事因而不能及时处理，官员的选拔与任免机制不能正常运转，在职官员无法升迁，空缺的职位无法补充，形成“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这不仅极大地挫伤官员的积极性，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且助长官场的因循守旧之风，为各级官吏的贪污受贿、鱼肉百姓洞开了方便之门。于是，职业尽弛，上下解体，明朝的政治也益趋腐败。

明神宗还是个贪财好货的角色。他对饮食、衣装、器用非常讲究，极尽奢靡挥霍之能事。明代宫廷的饮食，由礼部下属的光禄寺开支，万历初年每年支出白银十三四万两，万历中年增至近 30 万两，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底，光禄寺已无银可支。明神宗于是下令向户部借支 3 万两，向兵部所属的太仆寺借支 2 万两。后来，宫廷的伙食开支越来越大，光禄寺无法支付，常常拖欠供货商家的货款。宫廷所用的器物，如折扇、袍服、丝绸、瓷器等，不断增加，明神宗便经常下令向各地加派。宫廷举办婚丧、册封、祭祀等各种典礼，耗费更是惊人。万历六年明神宗大婚，当时张居正当国，不让他随便花钱，用银不过 7 万两。张居正一死，费用便大幅飙升。册立皇太子，仅采买珍宝就用银约 30 多万两。为筹办太子婚礼，先后几次采买珠玉等物，至万历二十七年已用银 70 多万两。福王结婚，费用也超过 30 万两。土木工程建设，是明神宗亲政期

间耗资最多的一项开销。他除在北京昌平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还在京城内外修建许多祠庙宫观和离宫别院，其中仅修建陵墓就花掉 800 万两。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宫、坤宁宫发生火灾，翌年皇极殿、中极殿与建极殿又被大火焚毁，后来修复重建，耗资尤巨。万历三十一年开始筹建三大殿，仅用于湖广、贵州、四川采办楠杉大木的大工、钱粮，就耗银 930 多万两。

明神宗毫无节制地大肆挥霍，必然导致对金钱的无穷渴求，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来搜刮钱财。明神宗认为："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根据这个理论，他不时伸手向国库要钱，称作"传索帑金"，将国家的钱财变为宫廷的钱财。明初的财政收入，以米、麦等实物为主，在户部设有内库等十库，它既是中央政府的国库，也是皇帝的私库，公私不分。到明中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田赋、徭役、盐课、茶课、关税等逐渐折收银两，财政体制也随之进行相应地调整。朝廷于正统七年（1442 年）在北京中央户部下设太仓，用以贮银，也称银库。弘治八年（1495 年）又在南京户部下设银库。从此，太仓银库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内府则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政府收支与皇室收支基本分开。内府除存贮三宫（即乾清宫、慈庆宫、慈宁宫）皇庄征收的"子粒银"，还有太仓每年拨付的 100 万两"金花银"。明神宗花钱如流水，很快使内府支出见绌，只能不断向户部要钱。在明神宗亲政后，从万历二十年（1592 年）到二十八年发生的"三大征"（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援朝抗倭战争与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叛）共耗费边饷银 1170.3 万两，已使国库不堪

重负。而明神宗却置此于不顾，仍然不断地向国库伸手。早在万历六年，明神宗就以大婚置办珠宝为由，令太仓库在每年支付 100 万两金花银之外，再向内府增进 20 万两。后来以此为准，每年均需增进 20 万两，直到万历三十七年因“部帑已竭”才告终。除了令户部每年增进的银两，明神宗还不时向户部传索帑金，使户部呈现巨额的财政亏空而不得不动用国库历年的积蓄。户部的太仓，自建立后长期实行“征三贮一”的原则，将征收的田赋，七分存放外库，用于当年的正常开支，三分存放老库、窖房，以备战争和灾荒之用。张居正刚死、明神宗亲政之时，有老库存银 200 万两，窖房存银 400 万两，外库存银 300 多万两，共计 900 多万两。到万历十五年，外库存银已基本用光，只剩 9 万两；到二十七年，窖房存银也被动用一空；到三十六年，老库存银只剩 8 万两。南京户部的银库，万历十三年还有 150 万两，到二十八年也已告罄。国库的亏空，不仅影响到国家正常的各项开支，而且因常常无法按时发放军饷，导致兵变频发，边防废弛。

随着国家财政的日渐吃紧和国库储积的日渐枯竭，明神宗不是采取措施支持和扶植工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并实行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制向多种税制的转变，以扩大税源，相反却对工商者进行直接的搜刮，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起，明神宗就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开矿征税，将搜刮来的钱财直接上缴内府。矿监名义上是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实际往往借开矿为名，肆意对百姓敲诈勒索，如妄指百姓的良田、民宅之下有矿脉，迫使主人交出大笔钱

财，否则就强行掘毁田地、拆掉宅院。税使则在重要城镇、关津、路口设置重重关卡，盘剥过往的车船、商旅。矿监税使的残暴搜刮，使广大民众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商业和手工业更是遭受严重的破坏，呈现萧条萎缩的状态，从而导致了民变的频发。

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不仅导致朝政腐败，贪风炽盛，赋役沉重，土地集中，兵变与民变频频爆发，内政危机四伏，而且导致边防的废弛，为建州女真的崛起与坐大提供了条件。

女真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元代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流域直至库页岛地区。元末明初陆续南迁，分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大部。他们原先都以渔猎为生，后来南迁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逐渐过渡到以农耕为生，并跨进了奴隶社会。明朝建立后，大力招抚女真三部，建立众多的羁縻卫所，隶属奴儿干都司管辖。明廷准许各部的首领、酋长入京朝贡与互市，令其为明廷守边，以抑制蒙古势力，同时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令其彼此争雄，无法统一，借以维护东北局势的稳定。在明朝统辖的两百多年间，女真各部通过贡赐与边市贸易等和平方式，加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到万历年间，各部蜂起，称王争长，互相征战，彼此残杀。就在各部的混战之中，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逐渐崛起。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奴隶主家庭，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都在明朝的羁縻卫所担任过官职，他本人也曾在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当过兵。万历十一年（1583 年），李成梁在建州右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率兵镇压建州右卫古勒寨主阿台的叛乱，误杀了随同前往劝降的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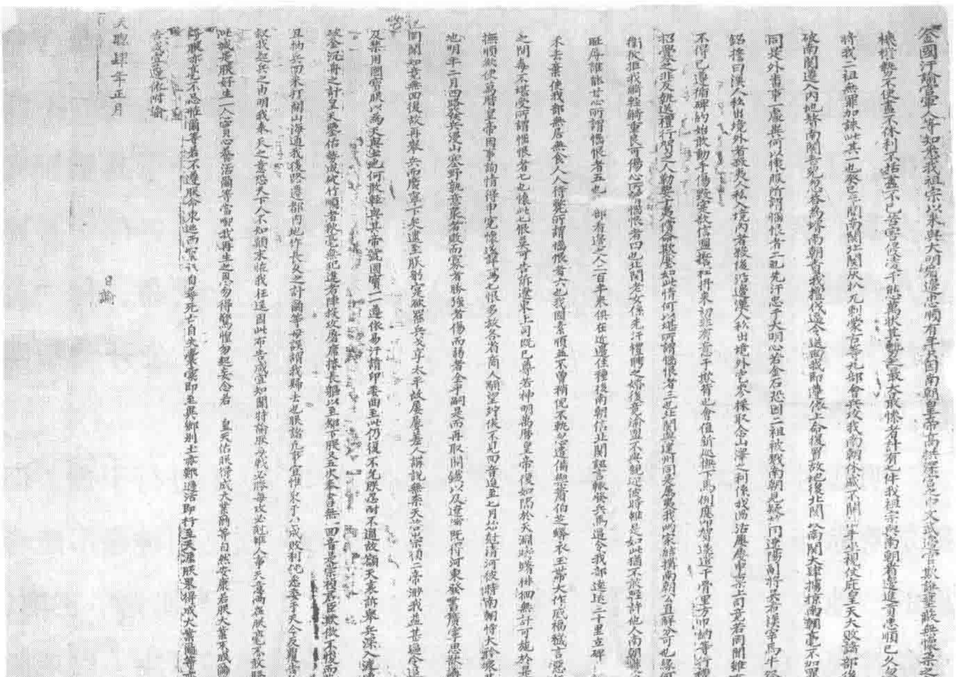
《明神宗朱翊钧朝服像》轴



清太祖努尔哈赤盔甲

昌安和塔克世。明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给他30道敕书、30匹马作为赔偿，并让他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便以报父祖之仇为名，以父亲的13副遗甲起兵，攻占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战争。万历二十七年三月，明神宗命尚膳监监丞高淮为辽东矿监。高淮在辽东10年，不仅从当地汉、蒙、女真民众身上搜刮了大量白银、黄金、马匹、人参、貂皮，而且克扣辽东军饷，干预边防事务，导致民变、兵变的不断发生。辽东人心大乱，边防废弛，一些汉民和辽东守军甚至投向了女真。努尔哈赤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并建立八旗制度，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称“英明汗”。过了两年，努尔哈赤即以“七大恨”告天，公开背叛明朝，一举攻占抚顺。

明廷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甚至建国称汗，从未进行干预。但努尔哈赤却公然背叛明朝，并对明朝发动进攻，这是明神宗不能容忍的。他决定给予有力的反击，以振国威。当时，明朝党争正酣，浙党首领、内阁首辅方从哲支持他的主张，希望速战速决，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他推荐与浙党关系密切的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要打仗，就需要大笔军饷。此时，国库空虚，而宫廷的内帑充盈，一些大臣请发内帑，却遭到明神宗的拒绝。户部无计可施，只得援引嘉靖年间平定东南沿海倭寇与万历年间几次征战时一度实行的田赋加派办法，建议除贵州之外，各省田赋每亩增派白银3厘5毫。明神宗不顾百姓的死活，立即予以批准，共得白银200万两。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杨



“七大恨”木刻揭榜



女真骑马武士雕刻

镐遂率 10 万兵马，分四路向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进发。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于三月初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南）集中八旗兵力，歼灭西路、北路和东南路的明军，击杀 45000 余人。杨镐见三路丧师，急令南路明军退师。明军从此丧失了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已无力再发动进攻，不得不改取守势，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后金军则乘胜进攻，先后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进而谋取沈、辽两城，成为明朝的一大劲敌。

明神宗不仅对国事的处理屡屡失误，而且对家事的处理也多乖张荒唐之举。他在万历六年（1578 年）大婚，娶了王皇后。王皇后迟迟未能生育，为广子嗣，李太后让张居正为明神宗册选九嫔。就在册选九嫔之际，明神宗与李太后所居住的慈宁宫的一名王姓宫女偷偷发生关系，使之怀孕。经李太后追问，他承认了此事，遂册封王宫女为恭妃。万历十年八月，王恭妃为他生下皇长子，取名“常洛”，就是朱由检的父亲。然而，明神宗既不喜欢王皇后，也嫌王恭妃出身卑微，他钟爱的是九嫔之一的郑贵妃，因为她出身大兴（今北京大兴区）一个颇为富有的人家，早年读书识字，人也漂亮聪明，能同他一起读书聊天。万历十四年正月，郑贵妃为明神宗生下皇三子（皇次子早殇，生母不详），取名“常洵”。明神宗格外高兴，立即册封她为皇贵妃。此举引起了朝臣的注意，因为王恭妃生下皇长子，迟迟没能加封，而郑贵妃刚生下皇三子便立即加封，显然是专宠，将来爱屋及乌，是否会发生废长立幼的事？立谁为太子，这可是涉及国家根本和未来的“国本”问题，含糊不得。当年

二月，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就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绝后患。明神宗不允，言官于是纷纷上疏，与明神宗展开一场长达 15 年的国本之争。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经李太后的干预，明神宗才被迫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册封朱常洵为福王。

明神宗的一系列乖张举措，引起一些正直官员（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不满。他们大多以气节自负，要求明神宗御朝亲政，抑制贪欲，改良政治，体恤民情民瘼，属于政治上的清流派。而另一些官员（主要是当权者），则不问是非曲直，一味阿顺明神宗和内阁的旨意，属于政治上的浊流派。双方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上面提到的争国本，就是双方争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被罢官回到无锡老家的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顾允成（顾宪成弟）、薛敷教等正直的士大夫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时政，裁量人物。士大夫抱道忤时者闻风响应，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与之对立的浊流派官僚则形成齐、楚、浙、昆、宣诸党，他们将朝廷内外的正直士大夫官僚称为东林党。对立的双方，围绕着中央政府官员的人选和皇储人选等问题继续展开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都一味媚上擅权，他们指责东林党不以庙堂之是非为是非，东林党则指责内阁不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激烈的党争，导致思想的涣散，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明神宗为了防止臣下权力过大，确保自己大权独揽，虽然有时也给浊流派找点麻烦，但总体上是支持浊流派而打击清流派的，结果是加剧了朝政的腐败。

由于明神宗专宠郑贵妃，不喜欢王恭妃，因而也就不喜欢皇长

子朱常洛，既迟迟不让他出阁读书，也迟迟不立他为皇太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但明神宗对他仍然不冷不热，而福王朱常洵在成年之后也迟迟未按祖制的规定离开京城，就藩封国，对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朱常洛整天谨小慎微，愁眉深锁，惶恐不安，为自己未来的地位和前途担忧。于是，他便在近侍的诱导之下，不分昼夜地纵情酒色，既借酒色消愁，又切盼能早生贵子，以博得明神宗的欢心。明神宗在政治上压制朱常洛，在生活上则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在选太子妃时，明神宗下令为太子多选淑女，供其玩乐。因此，在朱常洛身边，除太子妃之外，还有成群的妃嫔和选侍（即没有封号的侍女）。这群妃嫔、选侍果然为他生了一大群子女，其中包括未来的明朝最后两位君主朱由校与朱由检。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当王选侍为他生下长子朱由校时，他立即命年老的宫人连夜赶赴仁德门外向明神宗报喜。孰料，明神宗并未因为皇长孙的出世而改变对朱常洛的态度，就是迟迟不立朱由校为皇太孙，也未让他出阁读书，更未让福王离京就藩。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勉强就藩洛阳。但第二年五月，就发生了梃击事件。五月初四日，有一名叫张差的中年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大门，击伤守门太监，又蹿至前殿檐下，最终被几名太监抓获。浙党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说他是个疯子。东林党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再加审问，发现他并不疯癫。经刑部等三法司会审，张差供出，他的闯宫梃击系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刘成、庞保的指使。为保郑

贵妃，明神宗二十几年来第一次破天荒地在慈宁宫门外召见文武大臣，并让朱常洛和朱由校及其弟朱由楫、朱由检一起参加接见。他下令将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涉及。明神宗还说:“朕思皇太子乃国家根本，素称仁孝，今年已三十四岁，如此长大，朕岂有不爱之理！且诸皇孙振振众多，尤朕所深喜，奈何外廷纷纷疑我有他意。且福王既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彼岂能插翅飞至？”但召见之后，仅处决了张差一人，而将庞、刘二人在内廷秘密击毙，以免牵涉到郑贵妃。想加害朱常洛的郑贵妃没有受到惩处，这对皇太子仍然是个很大的威胁。

由于明神宗不喜欢朱常洛及其子，朱由检自然得不到明神宗的疼爱。除了五岁那年，随父亲朱常洛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明神宗对大臣的召见，见到过祖父那副病恹恹的仪容之外，平时根本见不到祖父的身影，祖父对他也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朱由检的生母刘氏，是初入太子宫的淑女，为人贤惠忠厚，对朱由检自然疼爱有加，悉心呵护，期盼来日能母以子贵。但朱常洛宠爱的却是号称“西李”的李选侍，她常在朱常洛面前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致使朱常洛对刘氏逐渐疏远，进而寻隙斥责。刘氏谨守妇道，从不辩解，将冤屈和悲愤深埋心中，但仍不时遭受西李的凌辱殴打，终于积愤成疾，在朱由检五岁那年含恨而逝。刘氏死后，朱常洛将朱由检交给他宠爱的西李抚养。但仅过四年，朱常洛长子朱由校之生母王才人病死，朱常洛又将朱由校交给西李抚养。西李见朱由校是皇长孙，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朱由校身上，而冷落朱由检。后来，她又生下一个女儿，朱常洛便把朱由检交给另一个选侍李氏抚养。两个李选侍，

以居室的方位而分别称为“东李”“西李”。东李位居西李之前，却不及西李受宠，但她为人仁慈正直而寡笑，行事小心谨慎，从不与之计较。由于膝下没有子女，她把所有的爱心都倾注到朱由检身上，视如己出，百般呵护，尽心调教。朱由检重新获得一份母爱的温暖，并在她的调教之下，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起床后，他先拜天，随即向东李请安，尊如生母。他还喜欢读书，逐渐形成静坐颐养的习惯。他阅读儒家经典，常常长久不动，有时口中念念有词，有时静思默想。同时，由于东李的过分溺爱，也养成了他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特点。

第二节　魏阉阴影下的信王生涯

朱由检虚龄十岁那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疾病缠身的明神宗去世。俗话说，鸟之将亡也，其鸣也哀；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弥留之际，他宣布传位于皇太子朱常洛，并按照传统惯例留下遗诏，总结自己在位48年的政治生涯说：“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之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惟，不胜追悔。”为此，遗诏还提出了简补内阁辅臣及卿贰大僚、起用因建言获罪诸臣、罢除矿监税使、发内帑犒赏辽东边军等一些补救措施。

八月初一日，朱由检的父亲朱常洛，按照皇祖父明神宗的遗

言，继位为明光宗，从八月起改元泰昌。他按照明神宗的遗诏，发放内帑银 100 万两，犒赏边防将士；罢除矿监税使；起用建言获罪诸臣，受到广大臣民的欢迎。他还起用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㴶、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璟、韩爌、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等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同时召还此前曾辅助过自己的致仕大学士叶向高。这些人中，当时只有刘一璟和韩爌两人在京，都是东林党。他们的入阁，改变了此前浙党首领方从哲把持内阁的局面，为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一度参政创造了条件。

但是，明光宗并不是一个有为之君。他自小生长于深宫，出阁读书很晚，文化修养不高，既不了解宫外的社会，也不懂得如何治国。明神宗去世的第二天，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分析全国的形势，亟言“今天下之兵未可恃”“天下之食未足恃”“天下之民心不可恃”，要求“宜先民力之舒”，减少征敛，宽舒民力，但却寝而不报，石沉大海。明光宗继位后，仍然不顾国库空虚、百姓贫苦的困境，继续大兴土木，催征税粮。大臣奏请减省宫廷开支，他一概拒绝。

明光宗同明神宗一样，也是个酒色之徒。富于心计的郑贵妃抓住他这个弱点，进献八名美姬，供其享用。明光宗的体质本来就差，被立为皇太子后仍然供奉淡薄，却又沉湎酒色，身体越发羸弱，登基之后日理万机，更是感到极度疲惫。他见这八名美姬个个婀娜多姿、能歌善舞，不觉心旌摇动，欣然收纳。八月初九日退朝，在宫中宴饮，便将这几名美姬叫来陪伴，边饮边唱，一直玩到深更半夜，尽兴就寝。当夜明光宗连幸数人，疲惫不堪，

第二天就一病不起了。十四日，郑贵妃又指使自己的亲信崔文昇给明光宗进通利药大黄。崔文昇原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明光宗继位后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大黄是一种寒性的泻药，明光宗服后大泻不止，一晚上起来数十次，支离床褥间，更是耗尽了元气。

郑贵妃之所以给明光宗进献美姬，叫崔文昇进通利药，是有其明确意图的。她深得明神宗的宠爱，但因遭到清流派大臣的反对，其子朱常洵未能被立为太子，也未能长留京师，只得就藩河南洛阳，心中十分不快，也不甘心。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初，明神宗的皇后王氏病逝，郑贵妃即以侍奉皇上为名，住进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她暗自盘算，王皇后已死，皇太子朱常洛的生母王贵妃死得更早，自己如能晋封为皇后，一旦明神宗驾崩，皇太子继位，她不就变成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左右一切了吗？于是，趁着明神宗病入膏肓，不断向他提出晋封皇后的要求。明神宗弥留之际，给朱常洛留下晋封郑贵妃为皇后的遗言。礼部左侍郎孙如游坚决抵制，说查考历代典故，无此先例。再说皇太子生母王贵妃并未晋封为后，而将郑贵妃晋封为后，先帝之心必然不安。此事只好搁下不办。明光宗继位后，和皇后郭氏、他宠爱的西李选侍及长子朱由校、五子朱由检（次子、二子、四子、六子、七子皆早殇）搬进乾清宫。但郑贵妃仍留居乾清宫，不仅趁机向明光宗进献美姬，还极力笼络西李，妄图实现她晋封皇太后的政治野心。西李同样极具野心，希望能晋封皇后，以图身体虚弱的明光宗驾崩后，她能垂帘听政。郑贵妃和西李意气相投，一拍即合，于是便互相吹捧、互相利

用。郑贵妃请封西李为皇后，西李则请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她们还力图控制皇长子朱由校，以便在明光宗死后、朱由校继位之时，以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郑贵妃和西李选侍的图谋，引起朝野内外的高度警惕。明光宗的皇后郭氏和朱由校生母王氏两家戚畹，遍访朝中大臣，说郑、李互相勾搭，包藏祸心。朝臣听后，忧心忡忡。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和御史左光斗倡言，应当将郑贵妃迁出“惟皇帝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的乾清宫。东林党人、吏部尚书周嘉谟于是召集众勋戚与文武大臣，一起去见郑贵妃的内侄郑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说郑贵妃移宫，并撤回封皇太后的请求。接着，杨涟又上疏弹劾崔文昇，要求将他拘捕审讯。郑贵妃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得在八月二十日搬出帝后居住的乾清宫，移往妃嫔居住的慈宁宫。

郑贵妃请封皇太后的图谋宣告失败，但西李请封皇后的活动仍在继续。明光宗宠爱西李，当然愿意满足她的要求。但西李当时只是一名选侍，要封皇后，就得先封为贵妃。所以此前明光宗曾多次宣谕册封西李为皇贵妃，但都没有办成。八月二十六日，召见大臣时，他又催促有关部门尽快办理此事。已升任礼部尚书的孙如游回答说，为皇上嫡母、生母上尊谥以及为郭元妃、王才人加封皇后的事还未办理，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的事，应等办完这四件事再办。二十九日，明光宗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乾清宫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及韩炉、刘一璟、周嘉谟、孙如游等大臣，再次催促晋封西李为贵妃之事。话未说完，西李竟掀开帷幔，把朱由校推搡到明

光宗和众大臣面前，让他说："要封皇后！"弄得众大臣相顾错愕，明光宗也为之色变。孙如游只好敷衍说："皇上要封选侍为皇贵妃，我们当即拟出晋封的典礼仪式，呈报皇上审批。"西李看出这是一种拖延的计策，虽然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奈何。

就在二十九日召见方从哲等大臣时，大臣问及册立东宫（也就是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明光宗望着朱由校说："卿等辅之为尧舜。"意即由皇长子继位。随即问起自己的寿宫（即陵墓）的事，大臣慌忙劝说："圣寿无疆，不必着急。"他仍再三强调：此事要紧，不可怠慢。沉默片刻后，明光宗又问起鸿胪寺丞李可灼进药的事。原来，李可灼曾在八月二十三日说要给皇上进献"仙丹"，遭到内阁大学士们的拒绝。二十九日明光宗召见众大臣之前，他又进宫向太监提出向皇上进药的事，太监告知内阁，又遭到拒绝。既然明光宗问起这事，方从哲只得回答，李可灼说有仙丹可治陛下的病，我们未敢轻信。明光宗坚持要李可灼给他治病。李可灼入宫诊视后，说了病因和治疗方法，明光宗要他从速进药。方从哲出宫与御医和几位大臣商量，犹豫不决。刘一璟说他老家有两个人用过这种药，一个病愈，一个反而加重病情，可见它并非万全之药。但明光宗急不可待，派人来催，李可灼便将仙丹呈进。这种所谓仙丹是用红铅、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的一种红色药丸，也叫"三元丹"，是种热性药。明光宗服下一丸，觉得体内暖润舒畅，思进饮食，传旨赐给李可灼银币。傍晚，又要一丸服下。谁知到第二天（即九月初一日）清晨五更，明光宗却一命呜呼，在位 40 多天就龙驭上宾，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

明光宗的去世，使西李晋封皇后的愿望落了空。但她并未就此罢休，经与身边的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等人密谋，决定挟持皇长子以自重，进而实现其晋封皇太后、垂帘听政的野心。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对西李过去凌辱、毒打朱由校生母的行为本就十分不满，明光宗去世当天，他得知西李的密谋，即出具揭贴投送外廷诸大臣，揭露西李“欲立东朝（即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在给事中杨涟的带领与王安的协助之下，众大臣将朱由校强行移出乾清宫，至文华殿举行就东宫位的典礼，然后入住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以摆脱西李的控制。接着，又逼迫西李搬出乾清宫，移住供宫妃养老的哕鸾宫。

九月初六日，虚龄 16 的朱由校登基即帝位，改明年为天启，是为明熹宗。

一年之中，相隔仅一个多月，朱由检的祖父明神宗和父亲明光宗就相继去世，这对他的心灵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使他感到无比的哀痛。但是，皇长兄朱由校能顺利摆脱西李的控制，继承皇位，又让他感到些许的欣慰。朱由校只比他大 6 岁，过去都曾由西李抚养，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一起嬉戏玩耍，亲密无间。朱由校登基后，想诸弟相继夭亡，只剩五弟朱由检一人存世，对他更是关心和呵护。继位刚半年，朱由校即于天启元年（1621 年）二月晋封东李为庄妃，让她能更好地怜爱和照顾自己年幼的弟弟。一有闲暇，他也经常到勖勤宫来看望弟弟，嘘寒问暖，无话不说，两人的关系越发亲密。有一次，年幼无知的朱由检竟仰起头，问兄长道：“你这个官儿，我能不能做？”朱由校扑哧一声笑了，回答说：“当然可以，

我先做几年，就让你来做!”据说，朱由检夜里睡觉常常梦见乌龙蟠殿柱的情景，醒来后告诉庄妃，庄妃颇觉惊异。勖勤宫后面有个不小的花园，有次他叫上小侍从遛到那里玩耍，见到一口井，就提起井边的水桶到井里打水，不想竟跳上来一尾金鱼；再到相距较远的另一口井打水，竟又跳上来一尾金鱼。左右侍从觉得这是一种吉兆，也都感到十分惊异，但想到当今皇上毕竟登基不久，说这种事显然犯忌，于是便都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了。

朱由检居住在勖勤宫里，接触的世界很小，但是进出勖勤宫的太监仍不时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他看到庄妃听到这些消息时，脸上都会露出些微的笑容，隐隐约约地感到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什么可喜的变化。

朱由检的猜测果然不错，外面的世界确实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朱由校能顺利继位，是东林党人和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积极斗争的结果。因此，许多在万历时期被逐出朝廷的清流派官员陆续被召回朝廷。不少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出任内阁大学士及七卿之职，有的还当上内阁首辅或吏部尚书、左都御史之职，王安则以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掌管内廷事务，形成“东林势盛，众正盈朝”的局面。

掌握部分权力的东林党人，积极整顿内政，规划辽东战事。内政方面，东林党人大力整顿吏治，斥逐奸佞，留用贤能，惩治贪官，提拔廉吏。他们还奏请明熹宗发放内帑，以充军饷。从泰昌元年（1620 年）十月至天启元年（1621 年）十月，共发放内帑 520 万两，并设法减轻百姓的一些负担。辽东战事方面，自萨尔浒战败

后，明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汉武昌）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举乡试第一，翌年成进士。他有胆知兵，实行以守为战、筑城以守的积极持久的防御策略，使后金不敢轻举妄动。但因红丸、移宫之案而失势的首辅方从哲，仍坚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想尽快扭转辽东战局，借以稳定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于是指使浙党的言官弹劾熊廷弼。不明是非的明熹宗下令免去熊廷弼之职，而以"用兵非所长"的袁应泰代之。结果，明廷很快就丢掉了沈阳和辽阳，袁应泰也自缢而亡。东林党人参政后，力主再度起用熊廷弼，内阁大学士刘一璟说："使廷弼在，当不至此！"天启元年五月，明熹宗下令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一个基于积极防守、积蓄力量、再伺机反攻的三方布置之策：在广宁（今辽宁北镇）用马步军列垒辽河之上，阻止后金的正面进攻；在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和天津并设巡抚，督舟师袭扰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伺机收复辽阳；在山海关设置经略，以节制三方。但是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一味主张进攻，收复辽沈，于是便出现"经抚不和"的局面。后金八旗兵乘机于天启二年正月渡河攻克西平堡（在今辽宁盘山东北），再克广宁，熊廷弼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关进刑部大牢。为了挽救辽东危局，东林党人又推荐了孙承宗。二月，孙承宗被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六月，阅视辽东。孙承宗是东林党人，阅视辽东后，自请出关督师，八月遂受命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上任之后，大力整顿防务，依靠袁崇焕、满桂等将领筑城练兵，以辽人守辽土，收复失地 400 里，构建起一道坚固的宁锦防线，



《明熹宗朱由校朝服像》轴



熊廷弼像

使努尔哈赤不敢率兵西进。东林党人在内政及辽东战事方面的这些举措，使天启初年一度形成“天下欣欣望治”的新气象。

然而，东林党人在整顿内政、筹划辽东战争的同时，又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去辩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是非曲直，追究浊流派官员在其中的罪责。结果虽然迫使浙党首领方从哲辞去内阁首辅之职，并将崔文昇贬谪南京，将李可灼遣戍边地，但却加剧了长期存在的门户之见，为腐朽的宦官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股腐朽的宦官势力就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魏忠贤出生于北直隶河间肃宁（今属河北）的一户魏姓农家，十几岁结婚，生有一女。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仅变卖了家产，而且欠下一屁股债，遂自行阉割，改名李进忠（有人也叫他魏进忠），入宫当上一名低级宦官。他先是投靠西李选侍，西李失势后，又勾结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与之结为“对食”。明熹宗虽是明神宗的长孙，但因其父不得宠，自己也受到明神宗的冷落，迟迟不被立为皇太孙，不让出阁读书，成了一个文盲。为了消磨时光，他在宫中整天就是爬树、掏鸟窝、养猫、斗鸡、斗蟋蟀、听戏、骑马、射箭，或者做木匠、泥水匠、油漆匠的活。魏忠贤和客氏就利用朱由校年幼无知、生性好动的特点，极力诱导他嬉戏玩乐，讨其欢心。明熹宗继位后，一字不识的魏忠贤竟自惜薪司擢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窃取了替皇帝对内阁的票拟（对大臣奏章所拟的批答）批红的大权。东林党人追论三案的责任，敌对诸党惶恐不安，于是纷纷投靠魏忠贤。魏忠贤势力迅速壮大，开始主动出击。他先逐杀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逐步掌控内廷的实权，再将东林党人刘一璟逐出内

阁，在内阁安插自己的亲信。天启三年（1623 年）底，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进一步掌握镇压异己的生杀大权，权势更加显赫。正如时人夏允彝所说："（皇）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惟忠贤与客氏为政。"

东林党人对魏忠贤势力的崛起满怀疑忌，极力进行反击。天启四年（1624 年）六月，东林党的干将、副都御史杨涟上疏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要求明熹宗将魏忠贤就地正法，把客氏驱逐出宫。群臣纷起响应，交章论劾魏忠贤不法。明熹宗懵然不别忠奸，下旨切责杨涟，并对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工部郎中万燝施行廷杖，将他活活打死在殿廷之上。一批东林党人随即被罢斥，失去在朝中的权力优势。阉党集团有恃无恐，公然炮制《东林点将录》等黑名单，按名单罢斥、捕杀东林党人。魏忠贤自领东厂，又以义子田尔耕、许显纯掌锦衣卫，利用厂卫迭兴大狱，捕杀杨涟等六君子及高攀龙等七君子，并编制《三朝要典》，公开为三案翻案。

到天启末年，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内竖之中除王体乾外，还有李朝钦、王朝辅等三十余名骨干；外廷的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有田尔耕等"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亲信爪牙。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并派遣大批宦官到各要地充当镇守太监。魏忠贤本人更是威势显赫，位进三公，加恩三等，并通过冒功请奖、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捞取大量钱财。他的远近亲属及义子干孙，亦位列要津。举朝的官员竞相拜魏忠贤为干父，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为之建造生祠。东林党人杨涟

曾在奏疏中悲愤地指出:“掖庭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魏忠贤的专权统治，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魏阉的黑暗统治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和土地的兼并，加以水利连年失修，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天启二年（1622年），山东及北直隶等地爆发了徐鸿儒、于弘志领导的白莲教起义，震动畿辅。天启七年二月，陕西澄城县又发生了农民起义，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辽东地区的民族矛盾也在日益激化。就在孙承宗着力加强宁锦防线之际，已完全把持朝政的魏阉集团残酷打击和迫害东林党人。孙承宗在天启初年入阁，侍经筵，算是明熹宗的老师。他自以为与皇上有师生之谊，便于天启五年十一月轻车就道，想返京参加明熹宗的万寿庆节活动，借机面见皇上，弹劾魏忠贤。阉党十分恐慌，散布“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的谣言，迫使明熹宗将孙承宗革职，改派已投靠魏忠贤的兵部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乘机率八旗兵西渡辽河，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高第龟缩于山海关，拥兵不出。袁崇焕等中级将领坚守宁远，最后用西洋火炮击退后金兵，取得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被迫退兵，不久染病而亡。继位的天聪汗皇太极，于次年（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年）二月派兵攻打同明朝合作的朝鲜，与之签订“江都和约”，约为“兄弟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便在五月间亲自率兵再攻宁远，进围锦州，又被打退。明军取得了宁锦大捷，但功劳却都算到阉党分子的头上。他们竞相增秩赐荫，袁崇焕反而遭到无端的猜忌与弹劾，被迫引病辞职。孙



《孙承宗像》册页



《袁崇焕像》轴

承宗经营辽东四年的成果又面临着被断送的危险。就在东北战事日趋危急之时，由于民族矛盾等原因，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翌年二月贵州水西宣慰使安位之叔安邦彦挟安位起兵应之。明廷出动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军队进剿，但终天启朝一直未能将其平定。

魏忠贤的专权乱政，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朱由检的生活。抚育朱由检的庄妃，由于持正不阿，引起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忌恨，他们便多次裁减她的待遇和礼数。庄妃的日子过得很不如意，后竟郁愤而死。庄妃的死，不仅给朱由检精神上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对魏、客产生了警惕。

明熹宗凡事昏愦，但却极重兄弟之间的亲情。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下旨封年刚 12 的五弟朱由检为信王，并追封其生母刘氏为贤妃。朱由检虽然仍住在勖勤宫里，但各种待遇大为改善。同他最亲近的庄妃死后，使他更加想念自己的生母刘氏。刘氏在他五岁那年去世，他的父亲明光宗唯恐明神宗知道会加以责怪，悄悄将她埋葬于西山申懿王坟的旁边，严令身边的近侍不得泄漏消息。朱由检从小太监那里打听到生母的葬身之处，便偷偷交给小太监一些银两，让他代替自己前往西山祭祀其生母。为了防范魏、客的加害，朱由检常在书案前静坐读书，很少与外界接触。后来，为迷惑魏、客的耳目，有段时间还故意不修边幅，既不正衣冠，也不见内侍，一人独坐在椅子上，两眼呆滞地注视着前方，不疾言，不苟笑，装出与世无争的样子。有时心血来潮，还带着宫中太监到宫外微服私访，考察民情。但不管在宫外见到什么景象，听到什么有关

魏、客恶行的反映，回宫后都守口如瓶，绝不轻易言讲。魏忠贤为了试探朱由检对自己的态度，曾暗中派人到朱由检的住地侦察动静，故意说些魏忠贤的坏话。朱由检立即严加驳斥，说魏公公有辅佐君主的才能，皇上很看重他，信任他。我是亲王，不久要就藩封地，还得借重于他。你可别来多事，让他知道了，有你的好果子吃。有时，魏忠贤还将各地进献的时鲜花木果蔬派小太监给朱由检送来，他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一一收下，并厚赏小太监。

转眼到了天启六年（1626年），朱由检已是虚龄16，魏忠贤想让他尽快离开京城就藩封地，以免妨碍自己专权，便劝明熹宗为他完婚。明熹宗于是决定为其完婚。当年五月，礼部从五城两县选出77名民间淑女。一个月后，由明熹宗的张皇后主持，从中选中了大兴县生员周奎15岁的女儿周氏。经钦天监选择吉日，婚期定在第二年的二月初三日。考虑到婚后的开支比婚前的独身生活要大，天启七年正月，明熹宗下令拨给信王岁米3000石、钞1万贯。接着，又将景王府的地租银6300万两赐给他。朱由检想到国家财政困难，上疏请辞。明熹宗于是又命以汝、福二王遗留的地租转赐给他，以表其亲亲之意。二月初三日，朱由检与周氏正式完婚。三月，皇叔瑞、惠、桂三王离京就藩汉中、荆州（治今湖北江陵）、衡州（今湖南衡阳），留下三座王府的空宅。四月，明熹宗下令将惠王府翻修一新，让朱由检携周妃从勖勤宫搬到那里去住。朱由检和周妃在那里过着新婚的甜蜜生活，暂时放下了对生母和庄妃的思念。

第三节　临危受命就帝位

天启五年（1625 年）五月十八日，明熹宗到安定门外的方泽坛祭祀地祇后，返宫途中，和张皇后一起，率领一批随行的宦官、宫女到西苑游玩。张皇后对游玩兴致不高，申时（相当于现今午后 3 至 5 时）过后即返回宫中。朱由校和一些宦官、宫女继续在西苑游玩，客氏和魏忠贤上了一条停泊在桥北浅水处的大船饮酒作乐。明熹宗好玩，便带着几名宫女，和高永寿、刘思源两个小太监上了一条小船。他亲自划桨，把船驶到桥北湖水最深的地方泛舟荡漾。不一会儿，皎洁的月亮升上天空，洒下一片清辉，湖面上泛起闪闪银光，好不爽朗惬意。他们正玩得高兴之时，水面上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小船摇晃几下便被掀翻了，船上的金壶酒具都掉落湖中，明熹宗和两个小太监也都落入水里。宫女们大声呼救，魏忠贤和众随从纷纷跃入水中救援。管事太监谈敬最先游到明熹宗身边，把他救上了岸。两名小太监因抢救不及时，皆溺水身亡。魏忠贤和客氏慌忙招呼众随从，护送明熹宗返回乾清宫。

明熹宗自幼身体虚弱，经过落水的惊吓，回到乾清宫便得了病。此后，经过御医的诊治，服过药，虽然略有起色，但始终未能彻底治愈。到了天启七年（1627 年）五月，随着天气的转热，他的病情突然加剧，到六月间已经下不了床。躺在病床上，想到自己身边虽然美女众多，曾经生育三子二女，不料皇长子和次子幼年即已夭折。天启五年十月，容妃任氏生下皇三子。次年五月初六日，京

师王恭厂火药局发生大爆炸，声响震天，烟焰蔽空，白昼晦冥，小孩受到惊吓，过了一个月也夭折了。如今，膝下仅剩两个女儿而无子嗣，不觉黯然神伤。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只有男子才有继承权，这个“后”指的是男性继承人。一想到这里，明熹宗不禁潸然泪下，慨叹苍天无眼。

其实，明熹宗之所以绝后，除了皇三子是由于天灾而导致早殇外，主要是由于人祸造成的。只是明熹宗被蒙在鼓里，不明真相罢了。

造成两个皇子夭折的罪魁祸首就是客氏和魏忠贤。客氏原名客印月，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农民侯二的妻子。她生下儿子侯国兴后，在 18 岁那年被送入宫中给明熹宗当乳母。过了两年，侯二死去，她成为寡妇，便悉心照料明熹宗，尽其所能哄他嬉戏玩耍，还精心为他烹饪各种美食，讨其欢心。按照明朝宫廷的惯例，当抚育的小孩长到六七岁时，保姆就应出宫。但明熹宗却离不开客氏，明光宗对他又格外溺爱，便让客氏继续留在宫中。明熹宗大婚后，有皇后和妃嫔在身旁侍候，客氏实在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宫中。天启二年（1622 年），迫于外廷官员的强大舆论压力，明熹宗只好下旨让客氏出宫。但第二天他又反悔，说客氏一出宫，他没有心思吃饭，从黄昏思念到晚上，痛心不已，又派人将她召回宫中，不许外廷官员再说三道四。就是在明熹宗登基之后，客氏仍然天不亮就入宫来到他的住处，形影不离地陪伴在他的身边。明熹宗大婚之前，妖艳貌美、放荡不羁的客氏甚至以姿色加以引诱，与之发生不

正当的性关系。懵懂昏聩的明熹宗为其所惑，即位不久，即加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荫封其子侯国兴为锦衣卫指挥使，并任命与客氏结为“对食”的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客得势之后，极力把明熹宗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把持宫廷的大权。

泰昌元年（1620 年）十二月，明熹宗下谕选取民间淑女，为实行大婚、册立皇后和妃嫔作准备。在选出的女子中，负责选婚的司礼监太监刘克敬、杨舜臣相中河南祥符县诸生张国纪 15 岁的女儿张嫣，因为她长得端庄秀丽，又知书达理，主张立她为皇后。客氏和魏忠贤看中的却是他们一名亲信的女儿，因而极力反对。无奈明熹宗相中的也是张氏，他们不好坚持。天启元年（1621 年）四月正式举办大婚，明熹宗册立张氏为皇后，封其父张国纪为太康伯。同时，立冯氏、张氏、范氏、李氏、任氏等为妃。

张皇后为人正派，性格刚强。她看到魏忠贤和客氏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多次向明熹宗揭发，但明熹宗对魏、客十分宠信，未予理睬。张皇后非常气愤，有次竟将客氏找来，当面指斥她的恶行，说要将她绳之以法。客、魏对她更是恨之入骨，便造谣说她不是张国纪之女，而是死囚强盗孙官哥（一作孙止孝）之女，并扬言要派人到河南调查皇后的家世。此事遭到正直大臣的驳斥，连明熹宗也不相信。有一天，明熹宗来到坤宁宫，见书案上摊开了一本书，问张皇后是什么书。张皇后回答说：“《赵高传》也。”赵高是秦二世时的权宦，秦二世因宠信赵高而导致国破家亡。张皇后此语显然是借赵高来影射魏忠贤。这话传到魏忠贤的耳朵里，他便想出一个狠毒的计划，欲置张皇后于死地。第二天，他在便殿埋伏数名甲士，

然后引导明熹宗升殿，将甲士们搜出，移交东厂和锦衣卫审讯。魏忠贤让这些甲士一口咬定，是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命其行刺，谋立信王朱由检为帝。魏忠贤的心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得知消息，对魏忠贤说，皇上凡事昏愦，唯独重视兄弟、夫妇情谊，谁也无法离间。一旦情况有变，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魏忠贤只好偷偷把这几名甲士杀掉灭口。然而，魏忠贤和客氏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待张皇后怀孕，他们便把张皇后身边的侍从全部赶走，换上自己的心腹。这些女侍从在给张皇后捶背时，故意加重手力，导致她早产，生下的皇长子不久就夭折了。

皇长子出生后十天，慧妃范氏又为明熹宗生下皇次子，但仅仅过了八个月也惊悸而死。史籍对皇次子之死因没有明载，给事中刘懋推测是由于内操放炮受到惊吓所致。原来，魏忠贤为了训练一支自己操控的军队，在天启三年（1623年）重新恢复万历后期已经停办的内操，在宫廷之内设置教场，由其亲信刘朝负责操练。操练之时，金鼓齐鸣，旌旗蔽日，士兵挥刀舞剑，放炮发石，呼噪声、追逐声、火炮声此伏彼起，连绵不绝。推测皇次子因惊悸而死，不是没有道理的。皇次子死后，范慧妃因未再生育而失宠。后来，李成妃侍寝，代范慧妃向明熹宗求情。客氏和魏忠贤侦知后，竟将李成妃幽禁别宫，断绝饮食。李成妃预先藏匿饮食，挨过半个月仍未饿死，后被放出，斥为宫人。

裕妃张氏正直刚烈，看不惯客氏、魏忠贤的骄横暴虐。她怀孕后，明熹宗准备为她加封，但她到预产期却未能生下孩子。魏忠贤便诬称她得罪神灵，须在宫中祈祷祭祀，求神灵宽恕。于是将她关

进一间空殿堂，断绝饮食。饥渴难耐的裕妃，在大雨天爬到屋檐下啜饮檐溜而死，腹中的胎儿也随之夭折了。

所以，明熹宗之断子绝孙，并非苍天无眼，主要是他有眼无珠，不辨忠奸善恶，宠信客、魏的结果。

到了八月，明熹宗病情加重，不时陷入昏迷状态。他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须尽快安排后事。他躺在病榻上辗转反侧，再三思考，觉得如今既然膝下无子，只剩两个女儿，无法继承皇位，只能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凡朝廷无子，必兄终弟及”，由他仅存的五弟朱由检来继位。八月十一日，他下令召见朱由检。

自明熹宗生病以来，朱由检就时刻挂念着皇长兄的身体，企盼他能早日康复。但此时正是魏忠贤和客氏气焰最为嚣张之时，为了避免魏、客的猜忌，他只好时常装病，不入宫去看望皇长兄。接到皇长兄的召见谕旨，他独自来到乾清宫，跪在御榻前，两眼痴痴地注视着这位重病缠身的长兄，不知说什么好。明熹宗抬眼端详了他一会儿，问道：“弟弟怎么这样瘦？要善自珍重。”朱由检只是呜咽垂泪。明熹宗又说：“吾弟当为尧舜。”意思是将由他继承皇位。朱由检大吃一惊，赶忙回答说：“陛下为此语，臣应万死！”明熹宗未予理会，又对他交代了两件事：一是要“善视中宫”，即善待张皇后；二是“忠贤宜委用”，即继续重用魏忠贤。朱由检越听越害怕，慌忙叩头辞出。

第二天，明熹宗又强撑病体，在乾清宫召见内阁大学士及九卿、科道等官员，对大臣们宣布：“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说与卿等每（们）知道。”暗示来日将由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明熹宗病重之后，魏忠贤及其亲信爪牙就想尽各种办法给他治疗。因为他们知道，宦官手中的权势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他们倚靠的皇上一旦撒手人寰，不要说“九千岁”，就连“一岁”也难保障。因此，保住皇上的命，是保住他们权势的关键所在。但是，无论他们找来何种偏方，或是使用什么迷信手段，明熹宗的病情还是不断加重，总不见好。明熹宗召见信王后，阉党的骨干、兵部尚书霍维华又进献一个“仙方灵露饮”的偏方，说用金制锅甑蒸煮淘洗过的上等粳米或糯米、老米、小米，上盖一口银锅，银锅上有一小孔正对着一个银瓶，银瓶外面有一夹层放置冷水，经过一番蒸煮，金甑里的热气通过银锅进入银瓶，冷却后就形成“灵露”，有益寿延年之功效。明熹宗服用几天，病没见好，却出现了浮肿，难以进食，只得停止。

在为明熹宗治病的同时，魏忠贤和客氏也在暗中谋划，设计明熹宗去世后他们继续掌控朝政的各种方案。他们起初想到的是，仿效战国时吕不韦的做法，由客氏豢养八名宫女，让他们怀孕生子，冒充皇子，在其登基之后由魏忠贤在幕后操纵，使之成为傀儡。但此计的实施需要较长时间，远水救不了近火，只得放弃。明熹宗召见信王后，魏忠贤又差人召集几位内阁大学士，说现今皇上龙体欠安，不能临朝理政。当前女真压境，贵州、延绥等处兵荒马乱，军情紧急，必须及时处理。可否由张皇后垂帘听政，由她学那汉唐故事居摄。等皇上病好了，再由皇上自行裁夺。但内阁次辅施凤来站出来反对，说：“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魏忠贤见一计未成，又想发动宫廷政变。但当他找手下的干将、手握宫廷禁卫大权的锦

衣卫都督田尔耕商量时，田尔耕却未敢表态。再找另一干将、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商议，崔呈秀也不搭腔，经再三追问，才回答说："恐外有义兵。"意即担心遭到朝野的反对，若各地纷纷起兵勤王，不好对付。魏忠贤听罢，气得脸红脖子粗，拂袖而去。魏忠贤的手下又献计，令宫妃假装怀孕，暗中将魏忠贤之侄魏良卿的幼子抱进宫里，狸猫换太子，由魏忠贤辅佐，仿效王莽辅佐孺子婴的方式，进而篡位。据说魏忠贤听后怦然心动，曾派人向张皇后吹风。早已恨透魏忠贤的张皇后断然拒绝，对来人说，我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反正是个死。不从而死，还有面目去见二祖（明太祖、明成祖）的在天之灵！魏忠贤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

八月二十二日夜里，明熹宗的病情急剧恶化，不久便死去。张皇后立即下达懿旨："奉大行皇帝遗命，速召信王入宫。"魏忠贤为讨好新主子，亲至信王府递交懿旨。朱由检查看懿旨上盖的玉宝，见是真的，但又担心魏忠贤借他入宫之机将他杀害，就推说天未大亮，大臣都未入直，他不好随便入宫；再说自己德望不高，也不敢嗣皇帝之位。他要魏忠贤宣布张皇后旨意，打开禁门，召诸勋戚、大臣、卿贰入宫，商议大行皇帝的丧礼，并共同推举一位贤德的亲王来继承皇位。魏忠贤只得先回宫去。走到皇极殿前，几位大臣询问皇上有没有遗诏，他只好宣布："皇上遗命信王嗣位。"此时，张皇后也已下旨速召信王入宫，并暗中嘱咐他不要吃宫中的食物。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和英国公张惟贤等，即到信王府具笺劝进。朱由检按照惯例推辞了两次，到第三笺才答应继位。魏忠贤随

即派忠勇营提督太监涂文辅到信王府，迎接朱由检入宫。

朱由检牢记皇嫂张皇后不食用宫中食物的嘱咐，怀揣岳父周家为他制作的麦饼，忐忑不安地跟着涂文辅进宫。当晚，他未敢入睡，独自秉烛静坐，警惕地听着室外的动静。有个巡视的宦官佩剑进来，他要过剑观赏一番，留在几案上，说是留着把玩，实是用以防身，而许诺给这个巡视宦官以重赏。接着，他又叫近侍太监从光禄寺取来酒食，犒赏巡逻的禁卫人员，同他们搞好关系。住在信王府的周妃也是一夜未眠，战战兢兢地为朱由检进行祈祷，求神灵保佑他免遭不测。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遭火焚毁、四天前刚刚修复完毕的皇极殿，登基就位。两天后，他颁布即位诏书，宣布把年号改为崇祯，以明年为崇祯元年。因为年号为崇祯，人们又称他为崇祯皇帝；他死后，南明的弘光朝追谥他为思宗烈皇帝，后改谥毅宗；清朝又追谥他为怀宗端皇帝。所以，史书又称他为思宗、毅宗、怀宗或烈皇帝。

第二章

不动声色除阉党

第一节　潜移默夺，严惩元凶

明思宗在即位诏中宣布："朕以冲人（幼童）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求宜于通变。"意即他将遵循祖制，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整顿吏治，缓解民艰，以图实现广大臣民所期盼的"中兴"之治。不过，这毕竟不是朝夕之间可一蹴而就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如何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整顿吏治、缓解民艰的设想无从实现，就连自己的宝座都有倾覆的危险。因此，他登基之后，首先考虑的是采取何种策略、从何处下手来铲除魏忠贤势力的问题。明思宗虽然年纪很轻，但他深知魏忠贤经过多年的经营，亲信党羽遍布宫廷内外，上下呼应，盘根错节，自己稍有不慎就会招来灭顶之灾。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采取静以待变的策略，先不动声色地稳住魏忠贤，然后暗中加紧策划，潜移默夺，稳扎稳打，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一举铲除。

即位之初，明思宗便以大智若愚的姿态，依照往昔新君登极的惯例，集中精力处理后妃册封之事和先帝的丧事。即位的次日，他命礼部详议为自己的生母贤妃刘氏追加谥号之事，以尽其多年思念母亲的一份孝心。过了几天，他又要礼部选择吉日册封他的元妃周氏为皇后。九月二十一日，礼部议定追谥圣母贤妃为孝纯皇太后，并择定当月二十七日由英国公张惟贤持节、大学士黄立极捧册、大学士施凤来捧宝，为原来的信王妃周氏举行册封皇后的典礼。与此

同时，明思宗又命大学士施凤来会同司礼监太监、工部尚书侍郎、礼工二部郎中、钦天监监正等官员，为大行皇帝选择陵址。经过几番勘查，不久便选中昌平的潭峪岭作为陵址，择日动工建陵。到了十月十五日，明思宗又来到文华殿，开始接受作为皇帝的传统教育日讲，听礼部侍郎孟绍虞、翰林院侍讲徐时泰等官员讲解《大学》、《尚书·尧典》首章和《帝鉴图说》一则。三天后，他决定将《帝鉴图说》换成《皇明祖训》和《资治通鉴》。

对魏忠贤，明思宗也按照皇兄“忠贤宜委用”的遗嘱，让他和他的心腹、亲信继续留任原职，该赏赐的赏赐，该荫官的荫官，不让他们感到有什么异样。

魏忠贤自然不愿失去手中的权势，他又像当年巴结、讨好明熹宗那样，给明思宗送去四名绝色美女，借以试探其态度。明思宗看透魏忠贤的心思，但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照单全收，悉数收入宫中。不过，进宫之后，即命人对这四名女子进行搜身，结果在她们裙带末端佩带的香囊里各搜出一粒黍子大小的“迷魂香”。据说男子只要一接触此物，即刻心旌摇动，亟思淫欲。明思宗原本不好声色，即命将迷魂香全部毁弃。魏忠贤仍不死心，又命小太监在明思宗批阅奏章、召见大臣的便殿复壁里，偷偷点燃另一种迷魂的香。有天晚上，明思宗正与大臣议论朝政，忽然隐隐约约地闻到一股奇异的幽香，不觉怦然心动，赶忙站立起来，命近侍太监手持蜡烛，绕便殿巡视一遍，并仔细检查几个墙角，但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过一会儿，望见远端墙角有微弱的火星闪烁，他便命太监挖开墙角，发现一名小太监持香端坐在复壁之内。经审问，说是魏忠贤



《崇祯帝像》摹本



崇祯帝押印

派他来的。明思宗不由得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下令以后不许点燃此香。

魏忠贤见明思宗软的不吃，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浑身感到不自在。魏忠贤忽然想起，原信王府的太监徐应元，过去是他赌场上的朋友，颇受明思宗信任，何不找他套套近乎，打探消息，讨教点计策呢？于是便屈尊找到徐应元，先送上一大堆奇珍异宝，假惺惺地与之结为兄弟，然后向他讨教自保之策。徐应元告诉魏忠贤，树大招风，要他辞掉东厂提督的职务，暂避锋芒。魏忠贤心想，以退为进，不失为一个好计策，反正我交出东厂提督的大印，手里还攥着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印把子，掌握着替皇帝批红的大权，将来有机会再翻盘也不难。于是，就在九月初一日上书请辞东厂提督之职。谁知明思宗不仅没有批准，反而好言慰留，魏忠贤还是无法猜透他的心思。

魏忠贤仍不死心，继续放出试探气球。九月初三日，他的亲密伴侣客氏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第二天，他的亲信王体乾又请辞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魏忠贤自勾搭上客氏，结为"对食"后，两人沆瀣一气，严密控制着内廷，如有一人告假外出，另一人必留宫中，监视宫廷的一切活动。客氏是以明熹宗乳母的身份进入宫中的，如今明熹宗已死，就完全失去留下的理由。她既然主动请求迁回私宅，明思宗便顺水推舟地予以批准，借此将她与魏忠贤分隔开来，难以再形成合力。魏忠贤虽然心中不悦，但也觉得明思宗此举合情合理，因而没起太大的疑心。王体乾原是尚膳监太监，魏忠贤侵害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时，他急谋于客、

魏，置王安于死地，从而夺得掌印太监之职。此后，王体乾一意阿附魏忠贤，为之出谋划策。他虽位居秉笔太监之上，但一切按魏忠贤之意行事，连署名也自愿置于魏忠贤之后，所以魏忠贤敢于放手专权乱政，无所顾忌。魏忠贤虽任秉笔太监，但目不识丁，靠的是王体乾和随堂秉笔李永贞等人做他的谋主。所有内外章奏，均由李永贞等人先行阅览，摘出要点，通报魏忠贤，由他决定是否施行。所有的票红文书和改票之事，则由王体乾替他操办。一动王体乾，马上就会惊动魏忠贤。因此，对王体乾的请辞，明思宗则坚决予以回绝。

九月十四日，右副都御史、署南京通政司事的阉党分子杨所修，由于阉党内部的矛盾，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亲信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等，说他们的父母过世后，都因先帝的命令夺情留任，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准则，请求皇上准许他们回籍守制。明思宗没有采纳，下旨斥其“轻诋”。崔呈秀与陈殷因为心虚，两天后上疏请求辞官，回乡守制。明思宗批准了陈殷的请求，而崔呈秀之请则不许。因为崔呈秀是魏忠贤的重要谋主，他若一动，必会引起魏忠贤的怀疑。

九月二十四日，国子监司业朱之俊又上疏弹劾监生曹代何、陆万龄、储寓奇，揭发他们首倡在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以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之父配孔子之父，应当治罪。明思宗下令把曹代何、陆万龄、储寓奇等监生逮捕下狱。魏忠贤发现苗头不对，赶忙奏请将建造生祠的钱粮解送辽东充当军饷，明思宗立即批准。

二十五日，江西巡抚杨宪邦、巡按御史刘述祖不知好歹，上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请求为之建立隆德祠。魏忠贤慌忙请人代为起草一份《久抱建祠之愧疏》，上呈明思宗，请求停止建祠。明思宗觉得清除魏忠贤的时机尚未成熟，批复说："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行者，概行停止。"魏忠贤一看，未建的生祠不再建造，已建的似乎仍可存在，并未深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崔呈秀更是呼朋引类，大搞贪污，同明熹宗在位时毫无两样。

为了稳住魏忠贤一伙，明思宗在九月二十七日，分别赐给魏忠贤侄子太师宁国公魏良卿、侄孙少师安平伯魏鹏翼铁券。接着，又给魏忠贤的一批亲信、党羽荫官晋爵。十月初四日，荫司礼监徐应元弟侄一人锦衣卫都指挥同知，荫王文政、王国泰、王永祥各弟侄一人指挥使，又荫徐应元、刁之礼、周世治、高辅明各弟侄一人正千户，曾文学等七人各弟侄一人副千户，王文政等四人各弟侄一人百户，旧御前太监王佐等五人各弟侄一人百户，皆世袭。初六日，再赠故大学士魏广微太师头衔，又进大学士黄立极为太保，进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槽为右柱国兼支尚书俸，各荫弟侄一人中书舍人。初八日，进御史李蕃、贾继春为太仆寺少卿。初九日，以赞导典礼事，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各荫弟侄一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十一日，录辽东战功，王体乾、徐应元等五人各荫弟侄一人锦衣卫指挥同知，苗成弟侄一人指挥佥事，郭尚礼弟侄一人千户，边进朝等二十一人各弟侄一人百户，崔呈秀等各荫弟侄一人锦衣卫指挥同知。

在表面不动声色的背后，明思宗暗地却在加紧进行铲除魏阉集

团的准备。他即位后，就将原在信王府侍奉自己的太监都换上新的头衔，调入宫中供事。原在宫中供职的魏忠贤心腹李朝钦、裴有声、王秉躬、吴光承、谈敬、裴芳等太监陆续要求退休，明思宗全都批准，接着又遣散其家丁，从而将魏忠贤的羽翼剪除一空。举行周皇后的册封典礼后，明思宗将皇后的父亲周奎由南城兵马司副指挥提升为右军都督同知，又将皇后的兄长周文炳、周文耀擢为兵马司副指挥，以加强京城的巡捕。十月，明思宗又亲至内教场阅操。明代的内操是在宫廷之内设立教场，主要用以操练宦官，始设于明武宗之时，明武宗死后废除。明世宗、神宗曾经恢复，万历后期又告停止。天启时，在魏忠贤的倡导与支持下，重新恢复内操，由魏忠贤的心腹刘朝主持，规模与声势达到空前的程度。其中，既有从各地招募来的材官、勇士，又有魏忠贤的亲军"忠勇营"，还有由净身男子组成的"净军"。军士操练时，操刀舞剑，鸣炮发石，金鼓齐鸣，旌旗蔽日。他们衮甲出入，恣为威福，随时可把京城变成战场。明思宗阅操完毕，令诸武阉都到兵部领赏，待他们出了宫门，即传谕内丁："着各散归私宅，不许复入！"从而消除了宫廷的一大隐患。

尽管明思宗采取了一些优容魏忠贤一伙的措施，但不少人还是从他惩处陆万龄等监生、不准再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以及停止内操等举措中，捕捉到魏阉集团终将遭到清算而毁灭的信息。一些阉党分子为了另谋生路，便站出来揭发阉党骨干的罪行。十月十四日，继杨所修弹劾崔呈秀、李养德、陈殷之后，阉党分子、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上疏，指责崔呈秀大搞贪污受贿，"立志卑污，居身秽浊"，卖

官鬻爵，“指缺议价，悬秤卖官”。并提到大行皇帝驾崩次日，百官入宫朝谒新皇上时，隆道阁前有几名宦官招呼说去兵部尚书崔家，闻者莫不惊愕：“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私语耶？”不过，奏疏还是为魏忠贤评功摆好，说先帝信任“厂臣”甚专，而“厂臣”亦孜孜竭力，任劳任怨，以图报称，此其所长也，但他误听崔呈秀一节，乃其所短。明思宗看过奏疏，仍然斥其“率意轻诋”，未作处理。十九日，杨维垣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恃权纳贿”，并说“不知者谓呈秀于厂臣为功首，于名教为罪魁，臣谓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明思宗下旨，“令静听处分”。直到二十一日，崔呈秀再三请辞，乃下令免去他的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之职，让他回乡守制。

魏忠贤的谋主，掌握最高军事和监察大权的崔呈秀的免职，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如雪片似地纷至沓来。工部都水司主事陆澄源的上疏，指责魏忠贤“宠逾开国，爵列三等，蟒衣遍宗亲，京堂滥乳臭也。外廷奏疏，不敢明书忠贤姓名，尽废君前臣名之礼，至祝厘遍于海内，奔走狂于域中，士习渐降，莫此为甚”。兵部武选司主事钱元悫上疏说：“呈秀之敢于贪横无忌者，皆借忠贤之权势，呈秀虽去，忠贤犹在，臣窃以为根株未净也。”奏疏还援引外廷的议论，“谓皇上念先帝付托之恩，欲曲全其所信者”，借以刺激明思宗从速惩处魏忠贤及魏良卿、张体乾、杨寰、张凌云、陈大同、田尔耕、白太始、龚翼明等心腹爪牙。刑部员外郎史躬盛也上疏，亟论魏忠贤“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举天下之

物力消耗尽”。明思宗对这些奏疏均未明确表态，魏忠贤如坠五里雾中，惶惶不可终日。

十月二十七日，浙江海盐贡生钱嘉徵揭发魏忠贤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朘民、通同关节十大罪状。行文纵横恣睢，鞭辟入里，句句击中要害，明思宗读后击节赞赏。魏忠贤闻讯，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跑去向明思宗哭诉。明思宗令内侍将这个奏疏读给他听。魏忠贤跪在地上，只听内侍用尖细的嗓音读道：

> 一曰并帝。夫天无二日，而阿附诸臣凡有封章，必先关白忠贤；至颂美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俞（谕）旨，必曰“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否？滔天之罪一也。
>
> 二曰蔑后。夫中宫，天下臣民之母后也。皇亲张国纪，未罹不赦之条。先帝令忠贤宣皇后，而忠贤灭旨不传，致皇后当先帝御前面折逆奸。遂罗织皇亲，多方欲致之死，几危中宫，滔天之罪二也。
>
> 三曰弄兵。祖宗朝不闻有内操之制。忠贤外胁臣民，内逼宫闱，操刀剸刃，炮石雷击，谋图不轨，滔天之罪三也。
>
> ……

魏忠贤浑身筛糠，直冒冷汗。他告别皇上，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愁眉紧锁，无计可施。第二天，只好借口有病，请求辞职。明思宗当即准其“私家调理”，也就是辞职回家，调理身体。同时下

令将魏忠贤之侄、宁国公魏良卿改为锦衣卫指挥使，东安侯魏良栋改为指挥同知，侄孙安平伯魏鹏翼改为指挥佥事。

许多大臣继续上疏，揭发、弹劾魏忠贤及其心腹爪牙的罪行。十一月初一日，明思宗以除恶务尽的坚决态度发布谕旨，历数魏忠贤的罪状，宣布将其安置凤阳，看守明太祖父母的皇陵，魏、客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发烟瘴之地永戍。明思宗还下令拆毁各地的魏忠贤生祠，折价变卖，资助边饷。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思宗身边的太监徐应元却跳出来为魏忠贤辩解。明思宗非常生气，下令严查他和魏忠贤的关系。很快查明，魏忠贤当初请辞东厂提督之职，是徐应元出的点子，明思宗骂道："奴才们与奸臣相通，笞一百棍，发南京去！"后又将徐应元贬谪湖广显陵，后再改戍凤阳。

魏忠贤接到将他贬谪凤阳、没收家产的御旨之后，很不甘心。他想，官职虽然丢了，但性命还是保住了，只要设法隐匿偌大的家财，晚年还是可以过得舒舒坦坦的。于是，魏忠贤便叫他的心腹爪牙赶在官府前来查抄之前，将多年搜刮的金银财宝、稀世古玩转移藏匿，其他财物装满40辆大车，准备随身运往凤阳。他命亲信李朝钦和家丁六十儿跟随自己前往凤阳，并令自己私养的800家丁，携带近千匹好马，全副武装护送。他还暗中叮嘱心腹李永贞、王朝用等，让他们随时将朝中大事快马飞报于他。十一月初一日，一切准备停当后，魏忠贤便与押送太监刘应选、郑康昇等一同起程，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出城，向南而去。不少市民沿途驻足围观，议论纷纷，义愤填膺。

明思宗很快从通政使司杨绍云的奏疏中，得知魏忠贤离京时得意扬扬的情景，非常恼怒，立即传谕兵部："岂巨恶不思自改，辄敢将素蓄亡命，身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纵容贻患。"兵部接旨，即派遣千户吴国安率众，兼程前往扭解。

魏忠贤一行，经良乡、涿州、新城、雄县、任丘、河间、献县南下，于十一月初七日抵达距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城 20 里的新店。李永贞派快马飞报，告知皇上的逮捕令。魏忠贤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瘫软无力，好不容易才在随从的护送下抵达阜城，住进一家尤氏旅店。夜晚，他僵卧床上，辗转反侧，长吁短叹，自忖率众抵抗，必败无疑；但若束手就擒，被押回京师，必将遭受惨酷的刑罚，还不如自行了断。据说，正当他想得入神之时，房外的阵阵朔风，传来外厢一位京师来的白书生吟唱的《挂枝儿》小曲：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顷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北方小县城的旅馆，冬天并不生火炉。房外凛冽的朔风，透过门窗的缝隙直往里灌。再听着这凄凉的小曲，魏忠贤心里直发冷，便吩咐随从尽早歇息，明早好赶路。到夜深人静时，他左思右想，确实“真个不如死”，便解下腰带，悬梁自尽了。李朝钦从梦中惊醒，见主子已死，也自缢而亡。天亮后，负责押送的太监刘应选，发现魏忠贤已死，担心明思宗追究他的责任，遂与心腹一起进入魏忠贤歇息的房间搜掠珠宝，然后假惺惺地高呼：“魏忠贤跑了，我去追他！”乘马往南飞驰而去。随行的家丁、仆从，纷纷乘乱抢夺金银珠宝，四散逃窜。负责押运的另一名太监郑唐昇，急忙赶往县衙报告，远近为之震动。人们纷纷涌至这座小县城，围观这个不可一世的九千九百岁的下场。

随后赶到阜城县城的锦衣千户吴国安，查明魏忠贤和李朝钦自缢的情况后，立即上报朝廷。明思宗批示：“逆恶魏忠贤及李朝钦缢死既真，该县相视明白，姑与掩埋。其行李解河间府，同籍没家产一并具奏。随押内官唐昇，着解来司礼监究问。家人六十儿、店

主、骡夫审无别情，即与释放。”

魏忠贤一死，明思宗决定趁热打铁，惩处阉党集团的另外两个首恶分子客氏和崔呈秀。

崔呈秀是北直隶蓟州（今天津蓟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授行人。天启初年擢为御史，巡按淮、扬。他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赃私狼藉。他见东林势盛，遂力荐淮抚李三才入阁，希望加入东林党，为东林党人所拒。天启四年（1624年），左都御史高攀龙揭发他的贪污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拟谪戍之，明熹宗下诏将其革职，听候查处。崔呈秀连夜赶往魏忠贤的邸宅，叩头涕泣，求为养子。当时魏忠贤遭受廷臣的交章弹劾，正在寻找外廷的支援，遂假传圣旨恢复他的官职，用为心腹。崔呈秀从此死心塌地为魏忠贤卖命，极力摒斥清流派官员，镇压东林党人，后累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权倾朝野，威势煊赫，成为“五虎”之首和阉党集团的重要骨干。十月二十一日，他被免职，回蓟州守制。十一月初九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又揭发其招权纳贿的罪行，明思宗下旨将其“先行削了籍为民，追夺诰命，余会勘定夺”。崔呈秀得到魏忠贤离京前往凤阳的消息，知道自己的主子已经倒台，再接到皇上将他削职为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对他会勘定夺的消息，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家中摆下一席豪华的送终宴，将搜刮来的奇异珍宝陈列于前，与宠妾萧灵犀等人一起举杯痛饮，饮下一杯即摔碎一件宝器，然后悬梁自尽。明思宗闻讯，下令籍没其家产，但崔呈秀事先已将大部分财产转移藏匿，查抄结果，共得银 7 万余两、金 300 余两、箱柜 300 余件、书箱 17

只、房26所计700余间、田地300余顷，不及原有财产的十分之一。十二月初一日，廷议崔呈秀罪状，明思宗传旨说:“呈秀负国忘亲，通同擅权，虽死尚有余辜，法司其按律暴其罪。”

客氏也难逃厄运。在崔呈秀自杀后的6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明思宗命太监王文政将她从私宅押赴宫内浣衣局，严加审讯。她供认，八名怀孕的宫女，都是她私自带入宫中的奴婢。她和魏忠贤原拟仿效古代吕不韦的做法，利用她们以假乱真，窃取皇位。明思宗大怒，下令将其笞死。其子侯国兴被逮，下锦衣卫诏狱，几天后与魏良卿一并处死。客氏之兄客光先、侄客璠等俱被谪戍边地。

十二月二十一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呈报魏忠贤与客氏罪状，明思宗明确指示:“忠贤串通客氏，恣威擅权，逼死裕妃、冯贵人，矫旨革夺成妃名号，惨毒异常，神人共愤。其戕害缙绅，盗匿珍宝，未易枚举，皆由崔呈秀表里为奸，包藏祸心，谋为不轨。”要求三法司尽快拿出魏、客、崔三个元凶的审查结论，依律定罪，以伸国法。但当时各个行政机构尚未进行调整和改组，内阁和部、院、卿、寺的主要成员多为魏忠贤所安置的心腹、亲信，他们千方百计袒护自己的主子及同党，使审查工作遭遇重重的阻力。主持三法司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左少卿潘士良，都故意敷衍拖拉，直至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二十六日，才拿出魏、客的审查结论，而崔呈秀的审查结论尚未整理成文。明思宗认为此事不能久拖不决，果断下令:“魏忠贤于河间戮尸凌迟，崔呈秀于蓟州斩首，其客氏尸亦着查出斩首示众。仍将爰书（审查结论）刊布中外，以为奸恶乱政之戒!”

第二节 清查阉党余孽，销毁《三朝要典》

在严惩魏忠贤、客氏、崔呈秀三个阉党集团的元凶之后，清查阉党余孽的工作随之逐步展开。

早在天启七年（1627 年）十月崔呈秀倒台还乡后，魏忠贤的一些心腹、党羽即遭到奏疏的弹劾而被免职，如南京守备太监杨朝、浙直织造太监李实、承天守备太监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监冯玉、天寿山太监李进、河南道御史倪文焕、吏部郎中周良材、主事张元芳、工部尚书吴淳夫、太仆寺卿白太始、尚宝司卿魏抚民等，皆被迫辞官或被免职。太监涂文辅也辞去监视仓库之职，东厂太监王体乾也因罪被免官。

十一月，揭发弹劾阉党分子的奏疏不断增加，又有漕运太监李明道、崔文昇，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张凌云、陈大同，兵部尚书田吉，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孙云鹤，巡抚延绥右都副御史朱童蒙，右都御史署顺天府尹李春茂，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黄宪卿，户部尚书张我续，刑部左侍郎陈九畴，刑部尚书薛贞，总督蓟辽兵部尚书刘诏，工部尚书梁梦衮、孙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龙等，先后被免官。

魏忠贤的心腹李永贞，在明熹宗死后已预感到前途不妙，在明思宗即位后 4 天便上疏告病辞职，于九月初七日获得批准。十月初，他干脆将外宅小院砌死，仅留一个小洞让家人给他送水送饭，自己躲在里面读书，静观形势的发展。到月底，得知魏忠贤请求辞

职得到批准的消息，认为风波即将平息，便拆墙而出。本来他想找明思宗的近侍徐应元联络，不料徐应元却在十一月初遭到明思宗的斥逐，这才慌了手脚，急忙暗中派人去找太监王体乾、王永祚、王本政，各送 5 万两银子，希望他们在皇上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但这三个太监怕受到连累，把这些银两献给了皇上。李永贞吓得魂飞魄散，便连夜和他的外甥孙良济化装外逃。十一月二十六日，明思宗下令将其降为净军，谪戍湖广显陵。十二月初九日，李永贞被捉获，押赴显陵。崇祯元年（1628 年）二月，李永贞又与徐应元一起被调发凤阳。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许多阉党骨干和亲信遭到免职和惩处，受到广大百姓的欢迎和拥护。但明思宗清醒地认识到，仍有不少阉党党羽盘踞要职，整个阉党集团的罪行也未受到彻底的清算，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从谈论扭转国家的危局。于是，他在天启七年（1627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内阁及部院大臣"定阉党逆案"，即对阉党集团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根据每个阉党分子罪行的大小，依照明朝的法律，作出判刑的审查结论。

议定逆案的工作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至中央的各部、院、卿、寺，下至地方的各个部门，究竟将哪些人列入逆案，列入逆案者又如何判刑，是一项十分严肃复杂的工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不能让阉党分子漏网，也不能冤枉无辜的官吏。但是，由于明思宗就位后，担心打草惊蛇，并未对各个行政、司法、监察机构进行调整或改组，内阁和各部、院、卿、寺充斥着魏忠贤的亲信、党羽。清查逆案的工作，牵涉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甚至身家性命。他们不甘束手待毙，必然要进行阻挠和破坏，正如御史张三谟所指出的:“今日群下非他，即多半事魏忠贤媚崔呈秀之流。昼伏之鼠忌明，灵场之鬼宜夜，其心固不欲世界光明也。此辈反复布置，必欲使杨（涟）、左（光斗）不为忠臣，邹（维琏）、赵（南星）尽为邪党。”这些阉党余孽往往故意颠倒黑白，把水搅混，继续将勇于同阉党作斗争而遭受打压、迫害的杨涟、左光斗、邹维琏、赵南星等东林党人诬陷为“邪党”；同时又极力袒护自己的同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清查工作显得十分艰难而曲折。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户科给事中李觉斯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五虎”“五彪”“十孩儿”，说:“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冒滥弟姪亲属俱已远戍，中外咸歌舞之矣。然其‘十孙（孩）儿’‘五虎’造恶较弟姪尤甚，不尽置于重典，尚令扬扬而归。内官李实下手杀人，涂文辅奸欺横索，宜一体究遣。”明思宗下旨:“令法司一并议奏。”但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署印少卿姚士慎却曲加护持。他们审议了一番，竟然提出这样的处理意见:“吴淳夫、倪文焕当削秩、夺诰命；田吉、李夔龙褫职；田尔耕、许显纯当逮论；杨寰、孙云鹤、崔应元等当削夺。”明思宗看出这是重罪轻判，很不满意，下令再议。他们仍阳奉阴违，重新拟出一个处理方案：依照“职官受财枉法”的律条，将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改判发配边疆卫所充军，并由各自原籍的抚按官员对他们进行追赃，其中倪文焕5000两，吴淳夫3000两，李夔龙、田吉各1000两；依照“职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的律条，改

判田尔耕、许显纯监候处斩；依照“同僚知情共勘”的律条，改判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充军边卫。这个方案一公布，舆论愤忿不平，一片哗然。给事中曹师稷上疏说，“五虎”“五彪”为逆党之腹心，同恶相济，按照《大明律》的“交结近侍官员”的律条，他们哪有什么首从之分？三法司不按此律判刑，却引用一般的贪酷职官律例判刑，避重就轻，巧为奸臣开脱罪责；况且，还规定田尔耕、许显纯须在原籍监候处斩，崔应元、杨寰、孙云鹤须在附近的边卫充军，舆论沸腾岂是无因？如今刘志选、梁梦环、李永贞一并奉旨审讯，我担心三法司会仿而效之，用袒护“五虎”“五彪”的办法来袒护这些奸臣。御史吴焕也上疏说，历史上被惩处的奸臣，都是朝闻而夕就惩，甚至不敢回家与妻子诀别。现今“五虎”“五彪”诸奸臣，虽屡屡接到惩处的明旨，却都把诏书往墙上一挂，照样若无其事地优游饮宴。如刘志选、梁梦环、曹钦程都是大恶巨奸，他们或燕处于园亭，或潜藏于京邸，因为有得力的靠山为之奥援，朝廷也无可奈何。刑部尚书薛贞身为朝廷的执法官员，是对阉党行刑的刀斧手，却公然上疏为阉党抗疏辩解！

为了推动清查工作的开展，明思宗决定对内阁大臣进行调整。他刚就皇帝位时，内阁首辅是黄立极，次辅是施凤来，阁臣有张瑞图、李国楷，他们都依附和听命于魏忠贤，当然不能指望他们为清查阉党工作出力。起初为了集中精力扳倒魏忠贤，明思宗并未对内阁有所动作，相反，当有人弹劾内阁辅臣时，他反而指责其“逞臆轻诋”，而对被弹劾的阁臣多加安抚。随着清查工作的深入，改组内阁的时机逐渐成熟。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中旬，首辅黄立

极及阁臣等四人联名上疏请求增补阁臣，明思宗便令按旧例，由九卿及科道官员廷推，结果推举孟绍虞、钱龙锡等 12 人，报请明思宗点用。当月下旬，黄立极致仕还乡。十二月，明思宗为了破除“阿党”，命以枚卜法选用，结果选出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 6 人。至崇祯元年（1628 年）五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榰相继致仕，来宗道、杨景辰、李标、刘鸿训、周道登、钱龙锡也相继入阁任事。来宗道一度出任首辅，杨景辰为次辅，两人都是《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廷臣纷纷请毁《三朝要典》，他们难辞其咎，于六月致仕。李标继任为首辅，钱龙锡与刘鸿训协力辅助，三人都是东林党人。刘鸿训曾在天启元年任少詹事，后因得罪魏忠贤而被罢斥。崇祯元年四月，被召回任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当时魏忠贤虽已被诛，但其党羽势力犹盛，其他阁臣皆畏首畏尾，他却挺身而出，冲破重重阻力，罢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阉党分子，获得广泛称誉。但他也因此遭到阉党余孽的合谋攻击，于当年十月被罢官。不过，当年十二月，曾遭魏忠贤迫害的原天启首辅、东林党人韩炉还朝复职，与李标、钱龙锡一起主持阁务，清查阉党的工作仍继续向更深程度发展。

清查阉党集团的工作，不仅遭到阉党余孽的种种阻挠和顽强抵抗，而且还碰到一个如何对待魏忠贤一伙所炮制的带有明熹宗“钦定”假象的《三朝要典》的问题。

《三朝要典》一书，主要是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文献汇编。三案是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最高统

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关系到由谁来执掌最高统治权力的重大问题。三案不仅同东林党人和大太监王安有直接关系，而且涉及齐、楚、浙、宣、昆诸党的大批官员，魏忠贤本人也卷入了移宫案。如何对待三案，便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一度执掌国家的重要权力，他们对三案的看法也就成为当时官方的论断，即认为东林党在三案中是主持正义，有功于国家社稷的，他们主持修纂的《光宗实录》也是按照这种观点来编写的。到天启五年(1625年)，当魏忠贤的势力占据优势后，他们便力图对三案进行翻案，以便为杀害王安及东林"六君子"等倒行逆施的行为提供依据。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当年二月，阉党分子、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为梃击案翻案，说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的东林党人王之寀不但无功，而且有罪，因为他"诬皇祖(明神宗)""负先帝(明光宗)"，"即碎之寀之首，其罪岂足赎乎？"结果导致王之寀被革职为民。四月，魏忠贤的谋主、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又上疏，洋洋数千言，全面否定三案，大肆攻击刘一璟、韩炉、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与三案有关的东林党人，并赞扬与东林党人对立的范济世、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岳骏声等浊流派官员。当时人说："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受魏忠贤摆布的明熹宗，竟下旨说："这本条议，一字不差。"韩炉等人被削夺，而范济世等人则分别被起用。天启五年五月，礼科给事中杨所修进一步建议："三案宜仿《明伦大典》，命史臣成书，以示天下。"《明伦大典》是明世宗命史馆编纂的，采用《资治通鉴》之例，以年、月、日为纲，

汇集议礼派的有关奏疏和张聪所写的记述大礼议发展过程的纂要。书前有明世宗所作的序，成为一部有关议礼的钦定著作。杨所修的建议，就是要求仿照《明伦大典》的编纂方法，将浊流派官员有关三案的章奏汇编成书，后面再附以史臣的论断，以统一天下的舆论。明熹宗表示同意，于是以内阁首辅顾秉谦等人为总裁的一帮纂修官，正式开馆编纂。到六月，编纂完成，名曰“三朝要典”。全书共二十四卷，按照阉党的观点，全面否定此前有关三案的结论，极力诋毁东林党人。书前冠以顾秉谦代拟的明熹宗“御制序”，试图用“钦定”的大棒来钳制舆论。天启六年十月，阉党集团又着手改修《光宗实录》，凡是涉及三案的史事，一律根据《三朝要典》进行改写。

由于《三朝要典》前头冠有顾秉谦代拟的“御制序”，带有明熹宗“钦定”的假象，否定此书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在清查工作刚开始时，没有人敢于触及这个问题。随着清查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三朝要典》必须彻底否定，否则，东林党人和清流派官员在三案中保护明光宗、明熹宗的行为就是违法的，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魏忠贤以及后来投靠他的浊流派官员的行为反倒是合法的，清查阉党的工作也就变成非法的行为。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新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大胆上疏，请求对《三朝要典》重新进行评判。奏疏说，皇上登基之后，霾雾全消，但是非未定，其中急须商榷的就是《三朝要典》。《三朝要典》中指为奸邪而遭斥逐、诛窜者，哪个不是今日济济在位与淳淳启事之人，哪个不是皇上许恤许谥为理学节气之人？如果仍然把它当做

信史看待，那还有是非可言吗？许显纯之流当年奉魏忠贤指使，罗织罪名，诬陷杨涟、左光斗的文字，全都载入《三朝要典》之中，难道还要作为确论传之后人吗？刘志选、梁梦环献媚阉党，动摇中宫，神人共愤；刘志选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辈为元恶大憝，难道还要将他们的奏疏作为正面的议论予以保存吗？崔呈秀已被抄家戮尸，其奸恶大罪已大白于天下，《三朝要典》结尾收录的一篇崔呈秀奏疏难道还要保存而与皇上的圣意相背吗？皇上如果不以臣言为非，请将此疏下之九卿、科道，宣付史馆，博采群议，令就《三朝要典》的论断孰是孰非各自注明意见。集此众论以揽天下之公议，议论自一，是非自定，起废恤谥诸大典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而已决未决之大狱也就可依据法律作出判决了。明思宗阅后，因担心重新引发党争，说他是“生事妄言”，未予采纳。

过了一个月，翰林院侍读倪元璐再次上疏，进一步奏请销毁《三朝要典》。早在崇祯元年（1628 年）正月，当魏忠贤及崔呈秀已死并被抄没家产，阉党分子杨维垣曾上疏，将东林党人和魏忠贤、崔呈秀一并称为邪党，企图把水搅混。倪元璐就上疏为东林党人辩白，力辟东林为“邪党”之说，谓：“臣顷阅章奏，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他还力荐原先的内阁辅臣韩炉、钱谦益及姚希孟参政。四月，他再上《公议自存私书当毁疏》，一针见血地指出：“臣观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开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不可兼行，而其言不可不速毁……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曾炮制

《缙绅便览》，分别开列魏党与东林党人名单）门户之见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又借三案。经此二借，则三案之面目全非。”话中点出了阉党集团借总结三案的历史，以歪曲史实的手法来镇压东林党人的实质，因此它对三案的总结是违背天下之公议，以行一己之私，必须彻底销毁。明思宗读过奏疏，觉得言之有理，且切中要害，令内阁辅臣来宗道代为票拟谕旨。来宗道多年取媚于魏忠贤，对倪元璐的奏疏心存不满，讥笑倪元璐说:“渠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意思是说，翰林院的词臣不过是喝茶清议的闲职，你又何必多管闲事呢？但既然是皇上要他代为拟旨，他只好拟出这样一道谕旨:“这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明思宗在后面加上一句:“听朕独断行。”即对《三朝要典》如何处理，请礼部和史馆诸臣详议之后提出意见，最后由皇帝定夺。

明思宗的谕旨一下，大臣议论纷纷，大多数支持倪元璐的奏疏，主张销毁《三朝要典》。魏忠贤的党羽、翰林院侍讲孙之獬觉得事情不妙，跑到内阁哭诉，力主《三朝要典》不可毁。接着，又上疏陈述不可毁的理由，说什么《三朝要典》有明熹宗的“御制序”，岂可投之于火？皇上是先皇的兄弟，属同枝继立，何必如此忍心狠手？这样做，对祖考（明光宗）是“失孝”，对明熹宗是“失友”。他还以生病为由，提出辞职。御史吴焕随即上疏，予以痛斥，指出孙之獬所谓《三朝要典》有明熹宗“御制序”不能烧毁，是以“御制”来压皇上，使之不敢动；至于“忍心狠手”之说，更是功罪不明，邪正颠倒。因此，他请求皇上立刻将孙之獬革职，“以

为无礼于君者戒”。来宗道接到此疏，极力庇护孙之獬，他代明思宗拟旨，说孙已回到原籍老家，翰林院词臣不过是个闲职，不必过于苛求。当年翻三案的急先锋、协理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此时也跳出来，力持《三朝要典》不可毁之说，主张对它稍作修改而存之。

经过反复的辩论，明思宗终于明白，《三朝要典》如不彻底否定、销毁，清查阉党集团的斗争就难以继续展开，阉党余孽也难以彻底清除，势必留下无穷的后患。五月初十日，他颁布谕旨："朕惟皇祖考洎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载之《实录》，自足光昭盛美，乃复增《三朝要典》一书，不能于已明之纲常复加扬阐，徒尔刻深傅会，偏驳不伦，朕无取焉。"下令将皇史晟收藏的《三朝要典》取出，用火焚毁，并传示全国各处官府、学宫，将所有《三朝要典》书籍及刻版一概销毁，规定此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臧否，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三朝要典》的销毁，为阉党的清查扫除一大障碍，清查工作的步伐逐渐加快了。

第三节　钦定逆案，平反冤狱

自从天启七年（1627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思宗下令全面清查阉党逆案以来，一重重障碍被清除，一个个阉党重要成员被曝光，将阉党集团的名单及其罪状查清、坐实，公布于众的时机日趋成熟。

崇祯二年（1629 年）正月二十一日，明思宗下达“定逆案”的诏书，规定将阉党集团“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按等级开列名单。

二十四日，又在文华殿召见内阁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要他们确定逆案的名单。他强调："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欲分附逆，又须有据。"他将各地乞请建造生祠、称颂魏忠贤的奏疏交给他们，供确定逆案名单参考，并要求他们在内阁秘密查阅，以免受到外界干扰。他还特别叮嘱，确定逆案名单，既要做到除恶务尽，又要区别对待，"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然后提出一个初步名单，再同刑部尚书乔允升一道，按照律例作进一步的斟酌。

负责议定逆案的这些官员，有的是魏忠贤或其心腹安插的，本身就是阉党分子，根本不可能认真清查阉党。如吏部尚书王永光，长期依附阉党，仇视东林，在清查逆案时，处处庇护阉党分子。其他参加议定逆案的官员，有的虽然是明思宗即位后刚任命的，与阉党没有瓜葛甚至曾遭受过阉党的迫害，但他们面对阉党余孽的强大势力，也显得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如新任内阁大学士、东林党人韩爌为人宽厚，钱龙锡为人谦和，都不想打击面过大，以免树敌过多。结果，他们只开列一个四五十人的逆案名单上报。明思宗很不高兴，要求扩大范围，并加重刑罚，最轻的也应当削籍。韩爌等内阁辅臣只好增加数十人的名单，明思宗还是不满意，要求按"称颂""导赞""速化"等几种类型分别开列名单上报。明思宗指出，魏忠贤一个人在内廷，如果没有外廷诸臣的逢迎巴结，助纣为

虐，哪能干得了那么多坏事？他的那些心腹、亲信都应当列入逆案名单。他在内廷的同党，也应当列入名单之中。韩炉等人又说："我们身居外廷，不清楚内廷的事。"明思宗一针见血地点破："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指出他们不过是怕得罪人罢了。明思宗于是命人将司礼监的"红本"通通收缴上来，装在一个黄色包袱里，再召见韩炉等阁臣，对他们说："此皆红本，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原来，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大臣的奏疏都要抄写两份，先将包着红色封皮的一份交给刘瑾，称为"红本"，另一份包着白色封皮的递交通政司，称为"白本"。魏忠贤专权时，虽任秉笔太监之职，但他是个白丁，掌印太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等为其谋主，便仿效这种做法，由李永贞等人将大臣送上来的奏疏先摘出要点，告知魏忠贤，再由他议决施行。明思宗收缴的红本，就是这些先由李永贞等人摘出要点告知魏忠贤的奏疏。他认为这些所谓红本，都是魏忠贤一伙阉宦结党营私的罪证，要求韩炉等人逐一按核，据以增补逆案的名单。韩炉等人又推脱说，臣下的职务是专司票拟，不熟悉法律条文，无法给他们定罪。明思宗又召见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也推脱说，吏部官员只谙熟官员的考功法，不熟悉刑名之事。明思宗不得已，遂召见刑部尚书乔允升，要他据律定罪。

内阁辅臣韩炉与刑部尚书乔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经过反复审核，呈上了第三份逆案名单。明思宗看后，仍然觉得遗漏太多。二月二十六日，他再次召见韩炉等辅臣及乔允升、曹于汴，责问道："张问达、来宗道何不在逆案？"阁臣回答："无事实。"明思宗说："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母文，称

‘在天之灵’，其罪著矣。”接着，又责问：“贾继春何以不处？”阁臣答道：“其请善待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改口觉反覆，其持论亦多可取。”明思宗说：“惟反覆，故为小人。”于是退回这份名单，并列出红本中有名而未被列入名单的69人，让他们重新审查酌定。

内阁辅臣韩圹、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等，见明思宗决心彻查逆案，便进一步扩大逆案范围，于三月十五日呈上第四份名单。明思宗亲加裁定，于三月十九日正式向全国公布。这份名单共开列261名阉党分子，分为8等定罪，名曰“钦定逆案”。

（一）首逆2人：魏忠贤、客氏，皆凌迟处死，已正法。

（二）首逆同谋6人：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都指挥使侯国兴，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拟斩。

（三）结交近侍19人：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卿署御史梁梦环、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总督蓟辽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刘诏，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右副都御史李夔龙，监生陆万龄，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张体乾，右都督孙云鹤、杨寰等，俱谄附当斩，秋后处决。

（四）结交近侍次等11人：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徐大化，吏部尚书周应秋，兵部尚书霍维华，总督尚书阎鸣泰，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右副都御史杨维垣等，俱遣戍。

（五）逆孽军犯35人：东平侯魏志德，东安侯魏良栋，安平伯魏鹏翼，尚宝司卿魏抚民，锦衣卫都督魏希礼，都督同知魏希舜、

魏希尧，都督魏希孟、魏鹏程、傅应星、杨六奇，都督同知客光先，锦衣卫指挥客璠，太监徐应元、刘应坤、王朝辅、涂文辅、孙进、王国泰、石元雅等，俱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六）谄附拥戴军犯16人：内监李实、李希哲、胡良辅、崔文昇、李明道、王体乾等，俱放回原籍，革去冠带，为民当差。

（七）结交近侍又次等128人：大学士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工部尚书孙杰、刘廷元、杨梦衮，户部尚书张我续、黄运泰，巡抚延绥右都御史朱童蒙，吏部尚书王绍徽，兵部尚书吕纯如，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翰林侍讲孙之獬，通政使岳骏声等，俱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八）祠颂44人：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吏部尚书房壮丽，督师辽东兵部尚书王之臣，太仆寺少卿徐景濂，江宁知县工部主事夏之鼎，顺天推官谭谦益等，俱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

这次钦定逆案，网罗甚广。综观整个逆案名单，有个别不该列入逆案而被列入者，如阮大铖。据顾炎武好友归庄的记载，阮大铖“本清流”，属东林一派，因乡里关系同东林党人左光斗关系密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举进士，天启初年由行人擢为给事中，丁忧归里，后曾任吏科给事中、太常少卿之职。他有一定的才干，但为人机敏奸猾，后因争吏科给事中之职而与东林党人魏大中发生矛盾，转而奉迎、巴结阉党，但又担心因此遭到东林党人的抨击，未敢死心塌地投靠阉党，担任吏科给事中不足月即遽请急归怀宁（今安徽安庆）老家，召为太常少卿也仅几个月便自请归里。明思

宗即位后下令诛杀魏忠贤和崔呈秀之时，阮大铖在家乡不了解京城情况，无法预测将来时局的走向，又急于入朝做官，便怀抱投机心理，写了两份奏疏，一份专门弹劾魏、崔，另一份既弹劾魏、崔又攻击东林。然后，派人送给杨维垣代为呈递，叮嘱如时局大变，则呈上第一份奏疏；如时局变幻不定，则呈上第二份奏疏。杨维垣按照自己的需要，替他呈上第二份奏疏，他因此便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列入逆案名单，坐徒三年，纳赎为民。终崇祯朝，他被废斥17年，郁郁不得志。其实，综观阮大铖在魏忠贤得势时的表现，他虽然算不上一个忠节之士，但也没有干过多少坏事，被列入逆案显然有点冤枉。另外，也有个别应该列入逆案而被遗漏的，如王永光。他在天启初年累官户部尚书，居官清廉，但为人强悍阴鸷，仇视东林，后遭言官弹劾，自引归里。魏忠贤得势后，他极尽献媚之能事，被起用为南京兵部尚书，日以排击东林为事。崇祯元年（1628年）擢为吏部尚书，参与定逆案的工作，他便因此而漏网。右庶子杨世芳也是阉党分子，因是韩爌的姻亲，得其庇护而未遭清算。由阉党杨维垣引荐的御史史䇮、高捷等，也都是漏网的阉党余孽。

不过，总的来看，这次的钦定逆案大体上做到了实事求是，受到正直官员和广大民众的欢迎，而对阉党集团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南明弘光政权的大理寺丞房兆恒评述此案时，即赞誉道：“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政。”

宦官专政是君主制的产物，是皇权的一种异化现象。不过，明代的宦官专政，从王振、汪直、刘瑾直到魏忠贤，尽管曾权倾一时，气焰嚣张，最后都难逃覆灭的命运。这同汉唐时期的宦官专权

大不相同。汉唐时期，宦官势力极度膨胀，进而独揽军权，可以将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玩偶，甚至径自立君、弑君、废君。明代的君主专制高度发展，不仅行政、司法，而且连军权也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明中期以后，虽在各省、各边设置镇守太监，在京设置提督、坐营、监枪太监，让宦官染指军事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完整。因为同他们一起掌握兵权的还有武将（总兵官、提督）和文官(巡抚)，彼此互相牵制，最后均听命于皇帝。因此，明代的权阉尽管权势熏天，但他们不过是皇帝掌控之下的家奴，受宠信而代行皇权。一旦皇帝觉察到他们对皇权构成威胁，一翻脸即可将他们从权位的顶峰推下去，使之跌个粉身碎骨。正如王世贞所指出的："夫（王）振、（刘）瑾至狼虎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亿兆至鱼烂也。然而，在为汉、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鞶而忧，再鞶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

明思宗在钦定逆案的同时，为受阉党迫害的志士仁人平反昭雪的工作，也在逐步展开。

天启年间，魏忠贤为了排斥异己，独揽朝政，曾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杀害一批东林党人和倾向于东林党的清流派官员。为此，魏忠贤的心腹爪牙先后炮制了一系列黑名单，作为黜陟的依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于天启四年（1624 年）冬呈进的《缙绅便览》。这份《缙绅便览》将投靠阉党的黄克缵、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五六十人列为正人，名下各加两圈或三圈；而将拒绝依附阉党的叶向高、韩炉、何如

宠、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乔允升、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杨涟、左光斗、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等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在名下加三点，次者加两点，让魏忠贤据以进行黜陟。天启五年，崔呈秀又向魏忠贤进《天鉴录》和《东林同志录》两份名单。前一份名单首列“东林渠魁”叶向高、韩爌、孙承宗、刘一燝、赵南星、杨涟、惠世扬、高攀龙、左光斗、乔允升、曹于汴、钱谦益等；次列“东林协从”孙鼎相、徐良彦、熊明遇等；后面又列出不依附东林的顾秉谦、魏广微、王绍徽、冯铨、王永光、霍维华、徐大化、周应秋、薛贞、崔呈秀、阎鸣泰、王在晋、杨维垣等若干人。后一份名单在录题之下注明是“补点将录”，首列辅臣叶向高以下 6 人，词林孙慎行以下 19 人，部院李三才以下 57 人，诸臣卿寺顾宪成以下 73 人，台省黄尊素以下 41 人，还有常博、藩臬郡邑、任子赀郎武弁等各若干人。天启五年八月，王绍徽还仿照《水浒传》108 将之例，编写了一个《东林点将录》，开列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玉麒麟赵南星、智多星缪昌期、入云龙高攀龙、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神机军师顾大章等 36 天罡星、72 地煞星，让魏忠贤按名黜汰。后来，御史严承钦还嫌 108 人的名单未能网罗所有的东林党人，又仿效宋朝的《元祐党人榜》，炮制一份所谓东林党 309 人的大名单，交给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一日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刊布全国，称为“东林党人榜”。魏忠贤拿到这份名单后规定，凡是被列入此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或逮问追赃。此外，魏忠贤及其亲信，还按籍贯、职务、已处未处以及时期，编造了《东林籍贯录》《东林同

志录》《东林朋党录》等黑名单。这些黑名单，把凡是不依附阉党的人，都扣上东林的大帽子，进而迭兴大狱，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

阉党兴起的大狱，以“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最为惨烈。天启五年（1625 年）三月底，魏忠贤以“受贿”的罪名，将东林党的重要骨干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逮入诏狱，严刑拷打。这六位东林党人誓死不屈，表现出高尚的气节。杨涟先被铜锤打得肋骨寸断，后又被压上土囊，用铁钉贯耳，仍不屈服，最后被用铁钉钉入脑壳而亡。临终前，他犹写下血书，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的一身正气：“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左、袁、魏、周、顾五人，也都英勇不屈，惨死狱中。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又矫诏以“欺君蔑旨”的罪名，逮捕著名的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高攀龙、黄尊素。三月十五日，锦衣卫官旗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全体市民罢市。十八日，锦衣卫官旗在县衙开读逮捕令，数十万市民集结衙门之外，最后冲入衙署，痛打锦衣卫的官旗。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事变之时，周顺昌一直在场，独自吟诵于谦的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三月十七日，锦衣卫官旗前去无锡逮捕高攀龙的前一天，高攀龙在家中已得到消息，但仍谈笑自若。第二天一大早，他先离家拜谒宋代大儒杨时的祠堂，再回家到后园，和两个门生、一个弟弟一起饮酒。周顺昌被捕的消息传来，他平静地笑道：“吾视死如归尔，今果然矣。”然后起身回房中与夫

人说了一会儿话，出来后书写遗表并封好，交给两个孙子说："明天交给锦衣卫的官校。"当晚，他整好衣冠，自沉于后园池中。家人打开他的遗表，上面写道："臣虽削夺（高攀龙原任左都御史，后被阉党削籍），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屈原名平）之遗则。"除高攀龙外，其他六位东林党人均惨死于诏狱之中。

除了"六君子"和"七君子"，其他许多东林党和正直的清流派官员，也都惨遭阉党的迫害，或被杀，或自尽，或遭禁锢，或被放逐。据《明史·阉党传》的记载，"自（天启）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

随着魏忠贤的倒台，人们自然想到那些站在魏阉对立面而遭受迫害的东林党人和清流派官员，认为必须予以平反昭雪，以伸张正义。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初五日，翰林院编修倪元璐即上疏，指出当时的邸报将魏、崔和东林并称为邪党，是自相矛盾的说法。阉党分子杨维垣上疏反击，责难倪元璐盛赞东林，说什么当今判断忠直不应以是否反对崔、魏为标准，况且东林亦有许多不足之处。二十四日，倪元璐再次上疏，驳斥杨维垣说，东林中有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杨涟和提审崔呈秀的高攀龙，而时至今日，杨维垣在奏疏中却仍称赞魏忠贤"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东林已故及被难诸贤，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外，如顾宪成、冯从吾、陈大绶、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等之真理学、真气节、真清操、真吏治，赵南星之真骨力、真担当，令人钦

佩。东林在今日，应当曲原其高明之概，不应当毛举其纤芥之瑕，而代逆珰分谤。当时魏忠贤、客氏和阉党的首恶分子尚未受到严惩，明思宗批示："朕总览人才，一秉虚公，诸臣亦且消融意见，不得互相诋訾。"直到二十六日，明思宗下令将魏、客、崔三犯戮尸于市，并严惩"五虎""五彪"，这才决心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

崇祯元年（1628 年）二月，明思宗宣布废除杨涟等人在狱中被强加、诬陷的罪名。接着，给事中陈尧言上疏，要求为遭受阉党削夺官职的官员平反，重新起用。吏部拟出一个包括内阁大学士刘一璟、韩爌，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曹于汴，通政使刘宗周，詹事钱谦益，翰林文震孟、陈子壮等人在内的 90 多人的名单，请求"先准复原官，致仕仍给与应得诰命，俟各衙门从公酌议妥确，分别起用"。明思宗批复："朕此番昭雪，非徒弘旷荡之恩，正欲考其进退始末，以衡人品。"要求吏部将这 90 多名官员的削逐情节"分别项款，细开具奏"。到四月，他正式宣布恢复刘一璟、韩爌、周嘉谟等 90 多名官员的原有官职，到年龄应致仕者补给诰命，其中品望、年力可用者可以酌情再度起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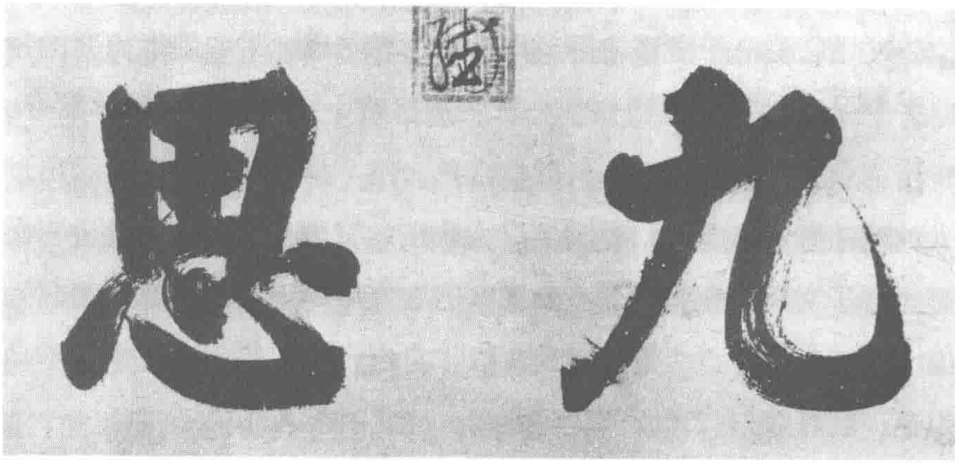
崇祯元年（1628 年）二月，在给事中陈尧言上疏五天之后，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也上疏，请求为被阉党迫害致死的万璟、周起元、周顺昌、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缪昌期、丁乾学赠荫，以示平反。明思宗令下部议。经部议后，明思宗于三月正式宣布，为原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工部尚书冯从吾，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周起元，给事中吴国

华、魏大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御史吴裕中、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夏之令、袁化中，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工部郎中万璟，吏部郎中苏继欧，左谕德缪昌期，翰林检讨丁乾学，陕西按察副使顾大章，扬州知府刘铎，刑部员外郎张汶等恢复名誉，各赠荫有差。崇祯二年九月，明思宗又下旨，为已故诸君子追赠官衔、谥号。其中，故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赵南星，谥“忠毅”；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冯从吾，谥“恭定”；故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太保高攀龙，谥“忠宪”；故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杨涟，谥“忠烈”；故光禄寺卿赠吏部右侍郎顾宪成，谥“端文”；故吏科都给事中赠太常寺卿魏大中，谥“忠节”；故吏部员外郎赠太常寺卿周顺昌，谥“忠介”；故国子祭酒赠礼部右侍郎刘应秋，谥“文节”。这一系列平反昭雪的举措，大大打击了邪气，鼓舞了正气。

明思宗还注意从魏忠贤的专权乱政中吸取教训。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为皇陵司香，并命查抄客、魏的家产之后，即下令撤回魏忠贤派往各镇的内臣，谕曰：“刭宦官观兵，古来有戒。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略）、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籍其口。”后来，又重申永乐以来所制定的《自宫禁例》，禁止民间私自阉割入宫为宦。他告谕礼部：“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宦阉割，有司（指行政机构）造册送部、院收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家不举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严明。近来无知小民，希

图财利，私行阉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选。尔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又规定所有宦官都必须值班，除非有特殊的命令，一律不许走出宫门。二月，又戒谕外廷大臣，不许他们结交宦官。

明思宗受命于危难之际，即位后深思熟虑，采取静以待变的策略，先是不动声色地稳住魏忠贤，然后暗中加紧策划，潜移默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一旦时机成熟，便一举将其铲除，显示出过人的政治眼光和智慧，受到了广大臣民的赞誉。明思宗的日讲官文震孟之子文秉，在其《烈皇小识》的序言中即说：“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满地，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真所谓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者耶！”



崇祯帝手迹“九思”

第三章

忧勤惕厉求中兴

第一节 组建东林内阁，平定奢安之乱

明思宗刚就帝位时，内阁首辅是黄立极，次辅是施凤来，阁臣有张瑞图、李国槽。自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引其心腹魏广微、顾秉谦入阁，至天启五年顾秉谦升任首辅，内阁便为魏忠贤所控制。黄立极是魏忠贤的同乡，一切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施凤来与张瑞图是万历时同年进士，施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世；张瑞图与之秉性相近，在会试策中竟然提出“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小人、君子之名，分别起于仲尼”的谬论，遭到士林的耻笑。四人之中，只有李国槽稍微干净一点。魏忠贤被贬自缢后，户部主事刘鼎卿上疏弹劾内阁首辅黄立极，要求将他立即罢斥。明思宗对内阁的状况当然是不满意的，但考虑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清除阉党集团的势力，继而清查阉党逆案，不宜扩大打击面，影响政局的稳定，对刘鼎卿的上疏未予理睬。不久，客氏被笞死，崔呈秀被抄家，“五彪”“五虎”连遭弹劾，国子监生胡焕猷又上疏弹劾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槽，请求绳之以法。明思宗不仅没有采纳，反而降旨痛斥其“逞臆妄言，轻诋大臣”，下令着大小九卿、科道从公会审，依律定罪，并抚慰黄立极等四位辅臣。

黄立极等四位辅臣眼看魏忠贤及其骨干、爪牙纷纷遭到清算，自己又遭弹劾，心怀忐忑，各自请求辞职。明思宗仍然优旨慰留。他们求罢不成，便于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中旬联名请求增补

阁臣。明思宗觉得改组内阁的时机渐趋成熟，下旨依照廷推旧例，由九卿、科道从公博议。结果，推出孟昭虞、钱龙锡等 12 人，供皇上点用。由于外廷许多部门多在阉党把持之下，这次廷推出来的候选名单鱼龙混杂，明思宗觉得很难圈点。当月下旬，黄立极致仕。十二月，明思宗命以枚卜法选用，于是选出了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 6 人。钱龙锡等新任阁臣与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槽等原有阁臣，共同组成新的内阁班子，总算实现了内阁的更替。

新组建的内阁班子，以施凤来为首辅，张瑞图为次辅，继续遭到言官的弹劾。崇祯元年（1628 年）正月与三月，河南道御史罗元宾两次上疏，指责施、张之流阴阳闪烁，彼此弥缝，养痈不顾。施、张只好辞官而去。李国槽接替施凤来出任首辅，五月以母亲年老乞请退休，推荐天启前期的首辅韩爌和孙承宗来顶替自己的职位。明思宗乃下旨召还韩爌，准许李国槽致仕，令来宗道代为首辅，杨景辰为次辅。来宗道为黄立极同年进士，也是谄媚成性。他在天启年间担任礼部尚书时，为崔呈秀母亲请求恤典，奏疏中有“在天之灵”的谥美词句，后又反对焚毁《三朝要典》。杨景辰系张瑞图同乡，在翰林院时曾三次上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来、杨两人，都是《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当廷臣纷纷请求毁掉《三朝要典》之际，他们自然受到言官的交章弹劾，崇祯元年六月被罢归。接着，由李标继任首辅，阁臣有周道登、钱龙锡、刘鸿训等，而周道登不学无术。有一次明思宗御经筵，问几位辅臣，宰相须用读书人，当做何解。周道登竟然答不上来，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

明会奏。明思宗脸上略显愠色，继而又露微笑，问道，近来诸臣的奏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又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弄得左右同僚窃笑不已。加上他为人贪鄙，庇护私交，于崇祯二年正月被罢归家居。好在钱龙锡与刘鸿训协力辅佐李标，朝政因而稍清。

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韩爌应召返京。韩爌，字象云，山西平阳府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市西）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历任编修、少詹事、东宫讲官。万历四十五年升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明光宗继位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明光宗病危时，他与方从哲、刘一燝同受顾命，全力支持明熹宗继位，反对李选侍垂帘听政，后又尽心协助前后两任首辅方从哲与叶向高的工作。明熹宗大婚后，他援引祖制劝皇上令乳母客氏出宫。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魏忠贤请韩爌出面为之求情，他又断然拒绝。后来叶向高去位，韩爌继为首辅。他为官廉正，老成持重，得到广大正直官员的尊敬和信赖，但却为魏忠贤和客氏所不容。东林党人赵南星、高攀龙被逐，他即和阁臣朱国祯上疏，指出皇帝的命令未经内阁而直接宣布，内阁对高攀龙奏疏所拟的处理意见被无缘无故地改动，违背了国家的制度。魏忠贤极为恼火，就借口韩爌代拟的诏令不恰当，假传圣旨对其进行谴责，并假传圣旨将原先由首辅一人拟定诏书的制度改为由阁臣共同负责，以削弱韩爌的权柄。韩爌遂上疏乞休，并在疏中揭露魏忠贤的种种罪状。不久，阉党爪牙又上疏大加弹劾，将其削籍除名，并把其家人毙死狱中，还假造事端逼其交出所

谓的“赃银”2000两。韩炉卖光田宅抵偿，最后只得住到祖先坟地的破屋里。

韩炉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其资历与声望皆在李标之上。他还京后，李标将首辅的位子让给他，自己与钱龙锡等人悉心协理，辅佐朝政，当时人称这届内阁为“东林内阁”。东林内阁秉政虽只一年时间，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辅佐年轻的明思宗，沉稳地处理各种繁重的政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参定逆案，颁布中外。定阉党逆案是铲除魏忠贤集团的最后一步，不走完这一步，对阉党集团的斗争就无法结束，必将留下无穷的遗患。而这项工作就是由韩炉、李标、钱龙锡负责主持的。尽管韩炉、钱龙锡最初不想广搜树怨，但他们最后还是按照明思宗的意旨，开列261人的阉党名单，分8等定罪，交由皇上亲自裁定，颁布中外。这对阉党无疑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实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其次，辅佐皇帝，期于至当。韩炉再任首辅之后，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在文华后殿阅览章奏，召见韩炉等辅臣，谕示他们票拟时几位辅臣应该坦诚商议，消除分歧，务使拟旨期于至当。韩炉等顿首致谢。退朝后，韩炉针对魏忠贤专权时内阁首辅不在朝房而在私邸处理百司章奏，并与次辅甚至众辅分头拟票，以行其私的做法，向明思宗进言:“上所谕甚善，而密勿政机，诸臣参互拟议，不必显言分合。至臣等晨昏入直，势不能报谢宾客。商政事者，宜相见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际。”意思是，拟票之事在首辅主持下秉公办理，而不必强调是分是合；辅臣早晚

都在朝房值班，不在私邸接见宾客，有要事相商时一律到朝房来谈。明思宗听后，立即宣谕百官，遵照执行。

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初，吏部依照明思宗的指示，会推增补内阁辅臣的候选名单，结果推出东林党人成基命、钱谦益等11人，而被明思宗看重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不在其中。有人便暗中散布流言，说此番会推，“皆谦益党把持”。一心想钻进内阁的礼部尚书温体仁见有机可乘，遂借天启元年（1621年）的所谓“关节受贿”事件，递呈《直发盖世神奸疏》，指责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明思宗问他奸党是谁。温体仁先是指主持会推的吏部和科道官员，后又将为钱谦益辩白的辅臣也说成是钱谦益的同党。所谓“关节受贿”事件本来在天启年间早已结案，明思宗下令重审，结论与原先一样，证明“关节受贿”与钱谦益无关。廷臣因此愤愤不平，纷纷上疏弹劾温体仁。十二月，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家居时曾向崔呈秀行贿，御史任赞化也弹劾温体仁娶娼、纳贿、夺人财产等不法行为。明思宗召见大臣，温体仁仍力诋毛、任为钱谦益死党。明思宗深以为信，深夜秉烛，在内殿召见韩爌等辅臣，气愤地说，六科十三道各有职掌，国家大事不见条陈，只以私意彼此相攻。若再如此，朕将罪以乱政之法。韩爌揭发礼部尚书等大臣与阉党互相勾结、贪污腐化的罪行，这就是国家大事。但韩爌不好直接顶撞皇上，只得说毛九华、任赞化等言官“一时见识不透”，请求皇上宽宥他们。明思宗接着说，卿见人何曾有国家的意思？若实实为国为民为封疆，朕自看得出来。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才上本。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不忧国，只是

分立门户，动说什么党，什么东林，何益国事家情？从内殿回来，韩爌即具揭上奏，说：“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但当论其才品臧否，职业修废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庙堂，畛域横分于宫府，非国之福也。”意思是，人臣事君不应分门别户，人君对待众臣也不必问其是东林还是非东林，而应按其人品与才能进行黜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消除存在已久的党争。可惜，明思宗听不进去，未予采纳。

第三，保护正直之士，抑制邪恶小人。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抗金名将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致死，传首九边，遗体不得归葬，并被抄家追赃，是一大冤案。崇祯元年（1628年）秋，工部主事徐尔曾为之诉冤，要求为其昭雪，未获准许。第二年，熊廷弼之子诣阙上疏，请求携父尸归葬。韩爌即为之申冤，说熊廷弼之死，实由逆阉魏忠贤欲杀杨涟、魏大中诬以行贿，从而尽杀杨涟等人；接着，又诬以贪污17万两，严令追赃，查抄家产，刑及妻孥，迫使其长子自刎而死，女儿吐血而亡，冤情大矣！明思宗终于允许熊廷弼之子携其父之遗骸归葬。

天启年间由阉党杨维垣引进的御史史堃、高捷，在内阁大学士刘鸿训罢斥杨维垣等阉党分子之后，合力攻击刘鸿训，因而为言官所不齿而被罢官。王永光执掌吏部后，又极力推荐，拟重新加以起用。钱龙锡坚持正义立场，坚决反对，终使此议告寝。

刘鸿训当阁臣时，锐意任事，痛斥阉党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霍维华之流，因此引起阉党分子的刻骨仇恨。他们合谋攻击刘鸿训，诬以受贿、擅自改敕，并劾以用田仰巡抚四川，受贿2000

金。李标、钱龙锡都站出来为之辩护，力言“鸿训不宜有此（改敕之事）”,“力辩其纳贿之诬”。

第四，悉心处理军国重务。韩炉复任首辅后，辽东形势危急，但国家财政困难，朝议多主张裁汰各镇驻军，兵科给事中刘懋还上疏建议裁汰驿卒。明思宗拿不定主意，向韩炉征求意见。韩炉回答说，裁汰冗兵，应该只清理冒名占籍吃空饷和增置的冗兵，冲要地方的额兵不能裁汰。驿传负担过重，疲惫不堪，应该责成各地的巡抚、巡按查实核减，以苏民困，将节省下来的费用还之于民。明思宗点头表示赞同。

明思宗好察边事，常派厂卫的旗尉四处侦伺。宣府巡抚李养冲上疏委婉地批评说，旗尉往来如织，来无影，去无踪，不仅踪迹不定，而且费用也无所从出。明思宗不明所以，将这个奏疏拿给李标等辅臣看，问道，边情危急，派遣旗尉侦察，有什么不对？再说，祖宗设立厂卫是干什么用的？李标回答说，派旗尉侦察确实应当慎重。李养冲的奏疏认为，旗尉外出侦察，地方官就得向他们行贿，否则怕他们回去说地方官的坏话。但要行贿，这笔钱又从哪里出呢？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明思宗听了，默然不语。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统率后金八旗兵绕道蒙古闯关南下，取道遵化，将薄都城。京师戒严。明思宗急召廷臣商议对策，吏部左侍郎成基命请求召还天启年间曾任阁臣的孙承宗，任以兵事。明思宗加以采纳，任命成基命为内阁大学士，并命孙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筹划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守备。孙承宗入京，明思宗当即召见，询以御敌之策后，连连点头称赞，命其“总督京

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并催促首辅韩炉草拟敕书命所司（指军事机构）铸给关防印鉴。孙承宗与袁崇焕率明军英勇作战，迭挫后金军队，终于逼迫皇太极退兵，使京城转危为安。

东林内阁秉政年余，辅佐明思宗定逆案、理朝政、伸正义、抑邪党、保京师，工作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不久，明思宗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下令逮捕入卫京师有功的袁崇焕，阉党余孽借机掀起一股翻案风，诬陷、攻击参与清查逆案的韩炉、李标与钱龙锡等东林党人。钱龙锡于崇祯二年（1629 年）十二月致仕归里，后被逮入诏狱。崇祯三年正月，韩炉也致仕还家。到三月，李标乞休家居。至此，所谓的东林内阁便告解体了。

在酝酿组建东林内阁的同时，明思宗也在思考如何平定奢安之乱、稳定西南局势的问题。

洪武初年，明朝在统一西南地区时，为了减少阻力，明太祖实行“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的政策，保留并新建了一批土司，通过他们来统治当地的少数民族。土司职位是世袭的，但其承袭必须经过朝廷的审核并履行严格的手续；土司对朝廷负有按时朝贡、服从征调的义务。不过，土司的内政完全自主，朝廷不加干预，因而也具有较强的割据性。某些土司的野心一旦膨胀，图谋割地自立，便会发动武装叛乱。

洪武四年（1371 年），明军平定四川，元彝族永宁宣抚司禄照归附，旋改为安抚司，七年又改为宣抚司。万历初年，永宁宣抚使奢效忠死，奢氏家族内部发生二三十年争袭职位的斗争。后来，在朝廷的支持下，由奢效忠之妻世统抚养长大的奢效忠之侄奢崇明承

袭职位。奢崇明表面上对明廷恭敬有加，实际上心蓄异志，与其子奢寅暗中招纳亡命之徒，图谋反叛。天启元年（1621 年），后金攻占沈阳、辽阳，明廷遣官招募川兵赴援辽东。奢崇明请调马步土兵 3 万援辽，得到批准后，即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奔赴重庆。但他们到重庆后，却又久驻不发。四川巡抚徐可求带病移镇重庆，催促其从速进兵。樊龙等要求给每个土兵发放安家银 20 两，朝廷因国库空虚，只答应发给每个土兵 17 两，3 万马步兵共计 54 万两。后因筹措困难，实际只拨付 4 万两。樊龙等便以此为借口，于九月发动叛乱，诛杀徐可求等 20 多名文武官员，占领重庆。后分兵四路，一扼夔州水口，一守通往綦江、遵义之要道，一断通往泸州之交通，一截川西之栈道，构筑起坚固的防线。

在永宁（今四川叙永）等待消息的奢崇明，得知樊龙已顺利占领重庆，立即与其子奢寅率领大军攻占遵义，并分兵攻打合江、纳溪、泸州、兴文、永川、长宁、荣昌、隆昌、壁山等城，全蜀震动。奢崇明自号“大梁王”，设丞相以下各文武官职，于十月间统兵数万进围省城成都。此时，成都城内只有 2000 名守军，粮饷告绌。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一面急邀石柱（今属重庆）、罗纲（今四川德阳东北）、龙安（今四川平武）、松（今四川松潘）、茂（今四川茂县）诸道兵入援，并征集成都周围 200 里内的粮食运入城里，一面与巡按御使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拒守。朱燮元用火器击退叛军的进攻，又派人掘开都江堰，放水注满早已干涸的护城河，以阻滞叛军的攻势。叛军在成都四面筑起望楼，高与城齐。朱燮元派勇士突击，斩杀三名叛帅，放火烧毁望楼。朝廷

得到朱燮元拒守成都的奏报，提拔他为右副都御史，兼四川巡抚。不久，石砫宣抚司掌印女土官秦良玉带兵抵达成都城下。此前，奢崇明举兵反叛后，曾遣使携丰厚的礼品去找秦良玉，妄图拉她入伙。但秦良玉向来对朝廷忠心耿耿，她下令斩杀来使，令其弟秦民屏、侄秦翼明带领 4000 土兵急趋重庆，潜渡渝江，驻营南坪关（今重庆南川区南平镇），以断叛军之归路；自己则应朱燮元之调，亲率 6000 精锐溯江而上，赴援成都。与此同时，其他诸道援兵，也陆续收复安乐、乐至等县，赶到成都城下。不过，此时叛军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来，双方的战斗进入僵持的态势。

天启二年（1622 年）正月，奢崇明的叛军制造形似舟船的攻城器械，高一丈左右，长 500 尺，中起楼数层，载着手持机弩毒矢的数百名叛军，由几百头牛拉着前进，向成都守军发起攻击。朱燮元招募勇士发射炮石，击中驾辕之牛，牛掉头返走。官军乘势发起冲击，大败叛军。奢崇明部将罗乾象见叛军势衰，主动联络官军，决意投降。朱燮元又派牙将周斯盛诈降，邀奢崇明前来商议有关事宜。奢崇明果然应约前来，后察觉中计，急忙打马而逃。他眼看破城无望，准备撤军。罗乾象趁机在营内纵火，叛军大乱。奢崇明父子仓皇拔营远遁，逃往泸州。罗乾象率部归明，被围困 102 天的成都至此彻底解围。

成都解围后，官军乘胜追击，次第收复江安、新都等地。五月，各路官军进逼重庆。重庆三面阻江，只有城西一面通陆，但筑有佛图关、二郎关两道险关，易守难攻。叛军拥有精兵数万，驻守城西通远门城壕至二郎关的 17 个营垒。朱燮元经过精心策

划，命监军副使丘志充、杨述程和总兵杜文焕率兵从正面发起进攻，令秦良玉、秦民屏率兵绕至后路，两面夹击。叛军惊溃，秦良玉等夺取二郎关，杜文焕破佛图关。诸将进抵城下，进行合围，城中粮食匮乏。朱燮元以计擒杀樊龙，张彤亦为乱兵所杀，失陷9个月的重庆终被收复。接着，官军又收复了距永宁宣抚司不远的泸州。

十一月，明廷晋升朱燮元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四川，兼制湖广军务，仍兼四川巡抚。翌年，即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朱燮元决计攻占永宁，捣毁奢崇明的老巢。他召集诸将，说:“我久不得志于贼，我以分，贼以合也。”认为官军所以迟迟未能平息叛乱，是由于兵力分散，而叛军兵力集中的缘故。于是，他列营永宁北面的纳溪，阳为进取，暗中却令大军会集于永宁西北的长宁。布置停当后，即由长宁发起强攻，连破麻塘坎等寨，然后与秦良玉合兵，在土地坎击败奢寅，追至老军营、凉伞铺，尽焚其营。复追至横山，入青冈坪，进抵永宁城下，一鼓而克之。叛军不少人溺水而亡，2万人投降。副总兵秦衍祚等，也攻占遵义。奢崇明父子逃入蔺州(今四川古蔺)。官军继续追击，于七月收复蔺州城。奢崇明父子率残部逃往贵州水西龙场（在今贵州修文）客仲坝，投靠奢崇明之妹、水西宣慰使安尧臣之妻奢社辉。朱燮元认为四川已无叛军，也不穷追。奢崇明便在贵州安顿下来，与安邦彦的叛军会合，做最后的挣扎。

安邦彦是贵州水西彝族宣慰使安位的叔父，是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万历末年，水西宣慰使安尧臣死后，由年幼的儿子安位袭

职，其妻奢社辉代管土司事务。安邦彦一心想取安位而代之，进而据地称王。他暗中勾结奢崇明，奢崇明起兵叛明后，派人向他求助，他即于天启元年（1621 年）二月挟安位举兵响应。一时间，48 土目各率部应和，全省骚动。安邦彦分兵攻破安顺、平坝、霑益（今云南宣威），自统一军进围贵阳，称“罗甸大王”。三月，明熹宗令湖广、云南、广西官军赴援贵州。尚未卸任的贵州巡抚李枟和巡按御史史永安督率贵阳城中军民拼死抵御。安邦彦几次尝试攻城，皆无法拿下城池，便派兵截断通往贵阳的各条道路，使各路官军无法入援贵阳。李枟和史永安见城中粮尽，人相食，连章向天启元年十月擢任贵州巡抚的王三善告急，要他从速赴援。王三善进兵平越（今贵州福泉），遭到挫败，又派人向四川求援，迟迟不敢进兵。史永安复上疏弹劾，他这才分兵三路，向贵阳挺进。安邦彦听说官军突至，不知人数多少，派人侦察，回报说有数十万之众，仓皇带领护卫逃窜。被围 10 个月的贵阳终告收复，但城中的 40 万军民大多已战死、饿死，仅余 200 人。

贵阳解围，王三善遂有轻敌之心。不久，湖广、广西、四川的援兵先后到达贵阳，他决定继续追击叛军，于天启二年（1622 年）十二月底令一军屯陆广（在今贵州黔西东），指向大方安位巢穴，一军屯鸭池（今贵州黔西东南），指向安邦彦巢穴。两路官军仅有汉土兵 6 万，加上轻敌冒进，先后被数万叛军击败。贵州境内的苗族土司见官军失利，纷纷起兵附和叛军，进据龙里。安邦彦纠合逆党宋万化等再犯贵阳，被官军击败。宋万化及其妻皆被擒，安邦彦为之夺气。不久，附和叛军的诸苗相继降附，王三善发下黄旗，令

竖诸苗寨中。安邦彦望之胆寒，不敢再出来活动，只能屯兵水西以自守。后来，奢崇明父子在四川被击败，逃入贵州投靠水西，奢崇明的气焰又复嚣张起来。面对这种局势，王三善决定合师进剿。他集合诸将商议，但天启二年十一月出任贵州总督的杨述中与诸将却多持反对意见，主张实行招抚。王三善坚执己意，于天启三年闰十月亲自统兵 6 万渡过乌江，进攻大方。奢社辉及其子安位逃往火灼堡（在贵州西北部），安邦彦逃奔织金堡。安位派人乞降，杨述中应允，要求他擒献奢崇明父子以自赎。王三善附加一个条件：除擒献奢崇明父子，还要擒献安邦彦，才许招抚。双方来回谈判，一拖就是几个月。安邦彦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整旧部，聚集力量。在这个关键时刻，王三善又拟在贵州改土归流，废土司改设郡县，当地苗族和土司惶恐不安，又纷纷依附于安邦彦，叛军势力复振。孤军深入的王三善久屯大方，陷于乏粮的困境。杨述中因与他意见不合，拒绝伸出援手。王三善只得在天启四年正月向贵阳撤退。叛军尾随追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殁。安邦彦又令心腹陈其愚诈降。王三善不知有假，令其随行参赞军务。陈其愚便在鸭池将王三善撞下马来。王三善自刎未死，被俘遇害。

明廷逐渐意识到，王三善等人的战死，奢安之乱迟迟不能平息，是由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军事行动不相协调造成的。为了统一指挥，天启五年（1625 年）三月任命朱燮元以兵部尚书衔总督云、贵、川、湖、广西军务。朱燮元奔赴重庆，调集兵马。安邦彦侦知，拟乘朱燮元发兵之前，于天启六年分兵进犯云南、遵义，而令奢寅攻打永宁。但奢寅未及举兵，即被朱燮元收买的心腹阿引杀

死。奢寅一死，安邦彦觉得自己年岁已大，难有作为，遂向朱燮元求抚。朱燮元奏报朝廷，得到允准后，派参将杨明辉前往招抚，自己则回浙江山阴老家料理父亲的丧事。但杨明辉奉朝廷制书，却只招抚安位，而未赦免安邦彦之罪。安寿彦一怒之下，杀掉了杨明辉。抚议由是告寝。

明思宗继位后，忙于清除阉党势力，无暇他顾。到了崇祯元年（1628 年）六月，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已被清除，《三朝要典》已被焚毁，钦定逆案的名单也在草拟之中，他便重新下令召回朱燮元，命其仍督云、贵、川、湖、广西军务，兼巡抚贵州，赐予尚方剑，继续负责平定安奢之乱。此时，叛乱发生已近 7 个年头，战火纷飞，里井萧条，贵阳居民不及 500 家，附近山谷的苗、仲家（布衣族）又因官军多杀降报功而依附于叛军，局势非常严峻。朱燮元赴任后，大力招抚流移，广开屯种，招募勇士，扩充兵力。并檄调云南兵马下乌撒（今贵州威宁），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自己亲统大军驻扎陆广，以逼大方。另派总兵官许成名、参政郑朝栋由永宁收复赤水。安邦彦闻讯，派兵分守陆广、鸭池、三岔河（在今贵州织金县东部）诸要冲，另派一军赴遵义。安邦彦自称“四裔大长老”，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其部将悉号“元帅”，想以水西为根据地，称王西南。他们统兵十几万，赴永宁以御川军。行至赤水河，朱燮元授意许成名佯败，诱敌深入。安、奢不知是计，进至永宁。朱燮元乃遣总兵林兆鼎、副将王国祯、刘养鲲分别率兵从三岔、陆广、遵义三个地方向永宁挺进，对安、奢形成合围之势。安邦彦急忙分兵四应。兵分而力弱，而官军人多势众，叛军因而纷纷

溃逃。在天启二年（1622年）已投向官军的原奢崇明部将罗乾象，又以奇兵绕出其背进行突袭。安邦彦、奢崇明逃奔永宁五峰山桃红坝的山顶，官军乘雾猛攻，安、奢又复大败。最后逃至红土川，于崇祯二年八月十七日皆负伤而被俘斩。

安邦彦、奢崇明授首之后，朱燮元以贵州境内叛军已大部被歼，不欲穷兵，派人招抚安位。安位犹豫不决。朱燮元集诸将商议，说："水西地深险多箐篁，蛮烟瘴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今当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贼乏食，将自毙。"诸将依计而行，四面迭攻百余日，毙敌万余。副将刘养鲲又派人深入大方，放火焚烧安位的宫舍。安位大为恐慌，于崇祯三年（1630年）派人请降。朱燮元提出四个条件：贬秩；割出6目地归朝廷；交出杀害王三善的凶手；开辟毕节等驿道。安位全部接受，率48土目投降，安奢之乱彻底平定了。

第二节　整肃吏治，唯才是举

明思宗在即位诏中宣布，他将在遵循祖制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吏治与民生问题。但实际上，他对民生问题只采取了若干小动作，如在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下令暂停苏杭织造太监的上供，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对而言，他对吏治的整肃倒还比较用心，多少算是做了点儿实事。

在惩处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之后，明思宗于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十二日即戒谕百官，要求他们“自今为始，各务涤濯肺

肠，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延慢之习，勿得苟怀私图，致偾国事，动诿之权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职掌还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节，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内外各衙门积年弊窦，尚未清厘，该部院自行检举陈奏，痛加洗剔，勿事虚文。大要为国节财，为民择吏，固圉者以封疆为重，守土者以民困为本。其有挟私坏公，逞臆荧听，不从国家起念，专以窥瞷妄营者，朕不时廉察，决不轻贷。一切奏议有关国计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议纷更，惟其大法小廉，柔远宁迩，以佐朕平明之治"。三月初七日，辅臣李国槽条陈十大新政，请求皇上厉必为之志，务典学之益，执总揽之要，广听纳之方，谨内侍之渐，崇节俭之德，核职掌之实，精用人之衡，恤下民之苦，循久任之法。明思宗批示道："卿所奏十事，订谋硕画，裨朕新政，事关朕躬，当一一采纳施行。"五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召见阁部大臣等官员，谕辅臣来宗道等曰："票拟之事，须悉心商榷。"谕吏部臣曰："起废事重，会推宜慎。"又指斥户部"边饷措办无术"。再询问兵部事务，尚书王在晋的回答不够详细，明思宗便命太监拿来纸笔令其写下呈上。尔后，又告谕刑部："天旱，凡用刑务效先朝平允。"此后，明思宗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整肃吏治。

明思宗整肃吏治，侧重于改革用人制度与提高行政效率两个方面。

在用人方面，明思宗面对复杂的局势、成堆的问题，亟盼打破原有制度的束缚，选择具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出任各级官吏，帮助自己实现中兴之治。崇祯二年（1629 年）十一月，后金兵临京师，翰

林院庶吉士刘之纶上疏，说国家养士二三百年，豪杰莫不思望风自效于阙下。但他们不屑奔走于庸夫俗子之前，而又不肯夤缘巴结权贵以展其才，如果广行招徕而鼓舞之，则一人可当千百人之用。希望皇上奋然图治，破除庸俗之调，开功名之门，选任豪杰之士，凡战守之方，犄角之术，一切听其所为。谁能决策捍卫都城，阻敌逼近京郊者，即予爵赏；谁能控御通州、昌平，与敌决战，使之不犯先皇陵寝者，予以爵赏。与此同时，庶吉士金声也上疏，奏陈以重兵守御通州、昌平，并推荐草泽义士申甫与刘之纶，说他们具有将才，可膺此任。申甫是个游方僧，与刘之纶结识后，常一起谈论兵事，并自费造出单轮火车（用火器击敌的战车）、偏厢车、兽车（也是战车），还用木头造西洋大小炮。明思宗派人取来他们自造的战车，看后十分高兴，即日召见，命申甫为京营副总兵，赐给白银17万两，令其招募新军，便宜从事；改金声为山东道御史，监申甫军；授刘之纶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申甫仓促招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民，所需军装、兵器又不能按时供给，自然没有什么战斗力，接连为后金军队所败。申甫也于当月二十日在卢沟桥阵亡。第二年正月，刘之纶也在遵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明思宗这次擢用申甫、刘之纶等人，虽然没有收到御敌的实际成效，但申、刘却都表现出效忠国家的英雄气概。此后，明思宗仍然坚持这一用人方针，并将它概括为“先才后守”四个字。所谓“先才后守”，即把才干放在操守前面，就是唯才是举的方针。当时许多大臣对这个方针有不同意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左都御史刘宗周即持反对态度，说许多人只看才干，不问操守，但从来没见

过操守不行、品行不端的人，遇到敌人敢于向前冲杀，士兵能听从他的号令的。但明思宗强调："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刘宗周说，前人之所以败坏，都是由于贪欲膨胀的缘故。所以，就应对时局的剧变而言，也应先守后才。明思宗仍然坚持："大将别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认为在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必须选拔和任用能救时济世的干才，而不能墨守成规，刻意追求十全十美的完人。

根据这个"先才后守"的方针，明思宗强调选任官员应不拘资格。明初官员的任用不受资格的限制，大抵有以下三个途径：一是荐举，二是进士和在国子监读书的贡生（即监生），三是吏员。弘治、正德以后，开始强调资格，形成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的三途并用格局。三途之中，尤重进士，而轻举、贡。至于吏员，只能担任最低级的官职。到成化末年，吏员仅可担任佐贰、幕僚、监当、管库之职，非得有人保举，才能担任州县的正官。明思宗对这种制度很不满意，多次告谕掌管官吏任用的吏部："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内外，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认为国家用人，只求把事情办得顺当，百姓安定。庸鄙之徒是既当不了京官，也做不了地方官的。如果只看资历、薪俸就加以任用，他个人当然高兴了，但国家和百姓又该怎么办呢？

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山阳武举陈启新诣阙上疏，痛陈用人唯问资格之弊，说："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生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犹三途并用，今惟一途。举、贡不得至显官，一举进士，横行放诞，此资格之病。"他手捧奏疏在正阳门外跪了三

天，才由太监递入宫中。明思宗阅后，感到此疏切合他用人不拘资格的意旨，立即提拔他为吏科给事中，历兵科给事中。类似这样破格擢用人才的事例，还有很多。仅由举人出任巡抚的数量，就大大超过此前的所有皇帝。据清代官修《明史》的记载，“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丘民仰等十人都是举人出身而官至巡抚的，陈新甲更由宣府巡抚升至宣大总督，最后官至兵部尚书。

明思宗还把选任官员不拘资格的做法，运用到内阁大学士的选拔上。明代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内阁大学士的升降由皇帝决定，其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还得取决于皇帝的批红，但内阁大学士毕竟是皇帝的重要助手，在明代中后期是皇帝下面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对政局影响最巨的大臣。因此，对内阁大学士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也就成为明思宗用人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

明初的内阁大学士，皆从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侍读、侍讲官员中选任。翰林院的官员，在明初诸色人等兼用。天顺二年（1458年），内阁首辅大学士李贤奏定翰林院纂修专用进士，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遂成定制。明思宗继位后，召见大学士商议政事，发现有些阁臣虽饱读诗书，有文学之才，但往往不谙政务，更不了解现实的国情，不仅没有应变济时的能力，而且还常常闹出一些大笑话。比如大学士郑以伟，有次代皇上拟旨，竟将

奏疏中的“何况”两字当做人名，在票拟中写道：“何况着按抚提问。”令所在地的巡按、巡抚提审“何况”，让人哭笑不得。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思宗先是往翰林院掺沙子，改变非进士不入翰林的格局。崇祯七年（1634 年），他下令考选推官（知府、同知、通判的下属官员，掌管司法监察）、知县，从中选拔编修、检讨，进入翰林院，从而改变翰林院官员清一色进士出身的状况。接着，又于第二年六月，任用非翰林之外僚张至发为内阁大学士，从而打破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张至发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进士，历任知县、礼部主事、御史、大理寺丞，清理积弊，多所厘正，得到明思宗的赏识。崇祯八年春，擢升为刑部右侍郎。六月增置阁臣，遂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他是自嘉靖年间许赞之后，自外僚擢任阁臣的第一人。此后，还有多名非翰林的外僚，被擢入内阁，参与机务。崇祯十一年六月，吏部官员反对这种自外僚擢任阁臣的做法，拟用老办法从翰林中会推阁臣。明思宗不允，命再斟酌，说：“词臣不拘资序，前旨甚明，何滥徇游移也？其并推在籍堪任者。”他之所以一再坚持“并推在籍”，即外僚中的“堪任者”，是“欲阁臣通知六部事”，了解、熟悉六部的政务。由于原有的阁臣中已有首辅刘宇亮出自吏部，于是吏部官员便从户部推出薛国祥，从礼部推出方逢年，从兵部推出杨嗣昌，从工部推出蔡国用担任阁臣。刑部推不出合适的人选，便以大理寺少卿范复粹代之。其中，仅有方逢年曾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其他人皆出自外僚，而范复粹由少卿擢任阁臣，尤属异数。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进一步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

弟入学应试授官。

明制，除皇帝的嫡长子封为皇太子作为储君之外，其余皇子皆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其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这些宗藩，皆世代享受岁禄，不授职任事。而且，藩禁越来越严，藩王就国后不允许再度入京，甚至不准出城，即便给父母扫墓也得事先提出申请。同时还规定“二王不得相见”，宗室子弟形同囚徒。亲王和某些郡王既有丰厚的岁禄，还可在岁禄之外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生活优裕。将军以下，特别是中尉，岁禄就不那么丰厚，也没有什么门路可取得朝廷的赏赐，只能尽量多娶妻妾，多生子女，或者收养异姓，以增加禄米。因此，宗室人口迅速膨胀，岁禄的数量也大量增加。朝廷因负担不起，常常不能按时发放，致使许多将军以下的宗室成员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嘉靖初年，枣阳王朱祐楒上疏朝廷，说“宗室久锢穷困”，请求“开四民业，以安贫宗，且省禄粮”，明世宗未予批准。后来，南陵王朱睦楧又条陈七事，提出“立宗学以崇德教，设选科以省禄米”的建议，也未被理睬。隆庆二年（1568 年），王世贞应诏上疏，建议废除奉国将军诸子的禄秩，让他们分居附近州县，拨给房款，免除徭役，从事农耕或商贾；有志于举业者，让他们照常入学应试，经考试后出任南京及（布政）司、府、县官，也未被采纳。万历年间，刘应秋上《议处宗藩事宜疏》，详论宗室子弟宜开四民之业、自谋生路及入学应试授官，认

为让宗室子弟开四民之业，弛出城之禁，既可省坐食之费，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又可使他们得到固定的收入，缓和朝廷与宗室的紧张关系，引起了明神宗的重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郑世子朱载堉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神宗终于下诏允行，但只令奉国中尉以下人等入学应试，而辅国中尉以上不许，理由是辅国中尉以上爵位尊荣，难以授职。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封爵与科举原属二途，如果辅国中尉以上的宗室子弟愿从科举，中试后自应按照士子出身的资格一体选任官职，而不拘泥于原先的爵位。明神宗才再次下诏，令宗室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皆可与生员共同应试，并规定如果中了进士，二甲选任知州，三甲选任推官、知县；如果乡试中举，也照常例除授官职，但一律不得除授京职。

嘉靖以来，所有请求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的建言，都从减轻朝廷负担的经济角度来考虑。明思宗进一步开放藩禁，更多的是从延揽人才的角度着眼。崇祯四年（1631年），宗室子弟朱统钸考中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以“统钸宗室，不宜官禁近”为由，请求改任中书舍人。朱统钸据理力争，明思宗命仍授庶吉士。崇祯八年正月，吏科左给事中阮震亨上言，请求仿效明太祖重定《祖训录》颁赐诸王的办法，申饬《宗藩事例》。当时，农民起义军刚攻破凤阳，焚毁皇陵，明思宗亟思广罗贤才，遂重申祖训的规定：“郡王子孙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其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秩，其升转如常选法。”翌年二月，礼部拟出选用宗室人才的具体条例。第一步是荐举，规定宗室子弟先由五宗

保结，再由王府长史据结详访，呈报亲王核查，开具才能实迹上报。第二步是考验，由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水利、保障拊循（安抚百姓）”等项，逐一叩问其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再举行对策考试，或由皇帝平台召对，然后因才授职。条例还就宗室子弟入仕后品级的转换、升迁、解任等逐一规定了具体的细则。但是，宗室子弟长期在王府中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对明思宗此举的意图并不理解，他们渴望的是高官厚禄，并不愿意从事繁杂的日常工作，因此往往产生失望的情绪。比如辽王的后裔朱术珣，被明思宗钦召入京后，授为户部主事，负责管理草场。他老大不高兴，上疏发牢骚说，以奉旨钦召、亲承召对之官，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重申保举之制。崇祯八年（1635 年）八月，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按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年来升抚道，内地竞营，边徼规避。或其老耆贪庸，又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并按祖宗保举成法，令南北两京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各举堪任知府者一人，无论是中举或未举的贡生、监生均可；令在京翰林、科道官及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也不拘资格。至崇祯十一年二月，吏部以保举试授知州 5 人，知县 21 人，州同知 3 人，判官 5 人，县丞、主簿各 7 人，另有不堪任使被罢斥者 5 人。

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明思宗反复告谕百官，办事应“勿事虚

文"，要注重实效。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严厉的批评，说:"祖宗设立部科衙门，各有职掌，内外监察，法甚明备。乃近来人情玩惰，废弛成风，即如各项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该部久不题覆，以致紧要事务率多稽迟，殊非政体。"针对这种状况，他下旨规定，自崇祯元年（1628 年）二月所发的章奏，都限 10 天内做出批复，"如仍稽违，部科互勘"。六月，工科给事中刘安行巡视太仓银库，发现银库预支官俸多达 36 万两。明思宗得到奏报，即命刘安行会同户部进行清理，查明是哪位官员何年何月预支官俸，多少数额，限 10 天之内向他报告，做出处理。

明思宗对文牍主义盛行、奏疏越写越长之风十分不满，批评说:"章奏冗长，不便省览。"规定以后各衙门所写奏疏，务必简明扼要，字数不得超过 1000；如果 1000 字写不完，不妨再另写一个奏疏。他不仅要求奏疏写得简短，不事虚文，而且要求仿效古人的做法，在奏疏拟成之后，写个简单的提要，粘贴在奏疏之前，便于阅读。

不过，明思宗的整肃吏治，并没有触及吏治败坏的核心，即官吏的贪腐问题。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深刻地指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不大力惩治贪腐，只单纯改革用人制度、惩办官僚主义、改革文风等，都无法取得成功。因此，他将惩治贪腐作为整肃吏治的第一要务来抓，使用严刑峻法加以惩办，诸如"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赃之人，徙其家于边"，"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贪污"赃至六十两

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等，从而收到“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效果。明思宗对官吏的贪贿、官场的腐败虽然也深恶痛绝，但却未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惩治，而只做口头或文字上的告谕和训示，结果贪风愈刮愈盛，官场的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几乎变得无官不贪。在如此恶浊的环境里，整肃吏治的其他措施自然难以真正得到落实。再加上明思宗本人猜忌多疑、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又极好面子的性格弱点，更使他整肃吏治之举措大打折扣，未能坚持到底，因而成效甚微。

第三节 引进西方科技文化

为了实现中兴之治，明思宗还积极支持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

自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者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西方传教士也踏着殖民者的足迹，到各地传播基督教，作为其殖民统治的工具。在欧洲宗教改革中，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旧教（即天主教）仍然保持着统治地位。为了扩张天主教的势力，以与日益兴盛的新教（即基督教）相抗衡，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创立了一个传教组织，1540 年获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命名为“耶稣会”。此时，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势力已扩展到东方，耶稣会在西方无力与基督教对抗，便极力向东方发展，力图挤进中国的大门。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船只遭遇风暴，须上岸晾晒浸水的货物，买通广东地方官员，攫取了在我国澳门的

居住权，许诺每年缴纳白银 500 两。万历元年（1573 年），他们将 500 两白银改交明政府，获得在澳门的租借居住权。此后，澳门便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基地。到万历年间，一些耶稣会士陆续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这些传教士逐步意识到中华文明是有别于欧洲文明的另一种灿烂文明，只有在尊重中华文明和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互相仿效，才能达到使中国民众皈依的目的。于是便改变以往那种“一手拿剑，一手拿《圣经》”的暴力传教方式，采取温和的方式在中国传教。其中，尤以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的成绩最为突出。1582 年，他先到达澳门，在那里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万历十一年随耶稣会士罗明坚到肇庆，建立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开始了在中国的布道生涯。后来，他先后迁居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昌、南京。万历二十八年与另一耶稣会士庞迪我一起北上，到达北京，向明神宗献上圣像、大小自鸣钟、《万国图志》、西洋琴等 30 多件礼物。明神宗见大小自鸣钟的时针在嘀嗒声中不停移动，到整点时还会自动报时，惊喜异常，爱不释手，下旨在宣武门内拨给一块土地，准许他们在那里建立教堂（今南堂），使之获得了在北京居留、传教的合法地位。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尽量随从中国的风尚，穿中国衣服（先穿僧服，后改穿儒服），吃中国饭菜，使用中国语言，研读儒家典籍，广泛结交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向他们介绍西方近代的科技知识，同时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天主教教义，甚至修改教规，允许教徒祭天、祀祖、拜孔，吸收他们入教。利玛窦的布道，得到了瞿太素、冯应

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都先后受洗入教；同时也得到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官僚的支持，使他得以顺利进入北京，并在北京立足传教。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传教的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罗雅谷，德国人邓玉函、汤若望，法国人金尼阁等。他们基本上都沿用利玛窦温和的方式，在中国各地传教。及至明末，全国各重要地方几乎都建立起教堂，教徒不下数万人。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传播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热潮。这受到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的积极欢迎，同时也受到一些守旧士大夫和官僚的强烈反对。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即上疏指斥西方传教士“暗伤王化”“为患叵测”，南京巡城御史遂派兵逮捕王丰肃、谢务禄等西方传教士和 14 名中国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极力营救未果。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下旨，将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谢务录等“督令西归”，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等“亦令归还本国”。这些传教士大多躲到澳门，有的则藏到信教的士大夫家中。明神宗死后，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叶向高重新入阁主政，罢斥沈漼，这场“南京教案”的风波才告平息。

明思宗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近代科技文化颇感兴趣，但他不像明神宗对待钟表那样只限于把玩欣赏，而是注重实际应用，为实现明王朝的中兴、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其突出的表现，是《崇祯历书》的修撰与西洋火炮的引进、应用。

《崇祯历书》是在徐光启的督导下制定的。徐光启，字子先，

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他一生勤奋好学，并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对天文、历法、数学、农桑和水利都曾作过精深的研究。因其家乡屡遭倭寇侵扰，对兵书也常研读。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考中进士。此前，他曾在家乡和两广教书，并于 34 岁时在韶州认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从此开始与传教士的密切交往。42 岁那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第二年他考中进士后，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即在北京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并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丰厚精深的学养，为参与并督导《崇祯历书》的修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与季节的变化密切相关。人们很早就注意观察天上日月星象的运行情况，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积累丰富的知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封建统治阶级更把日食、月食看作国家治乱兴衰的象征，所以都极其重视历法的制定。明代的《大统历》，是洪武年间根据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修订而成的。明宪宗成化以后长期未加修订，因而出现明显的误差，人们纷纷请求加以改革。郑世子朱载堉在疏请改历未果后，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进呈自行创制的《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但未被理睬。河南佥事邢云路也上书请求改历，被主管历法的钦天监指为“惑世”。当时西方的天文历法随着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和手段层出不穷，新的天体运行学说纷纷涌现。精通西方天文历法的利玛窦一到北京，也向明朝皇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同样未被采纳。万历三十八年十



《徐光启像》轴



《汤若望像》版画

二月十五日发生日食，钦天监推算的日食分秒与亏圆时刻都不准确。朝野强烈要求改革历法，礼部只好奏请选任邢云路、范守已参与历事，同时命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与庞迪我、熊三拔等传教士翻译西洋历书。已 30 年不上朝的明神宗，将奏疏留置宫中，不做处理。李之藻、徐光启便在任官的余暇翻译、整理历法书籍，并继续呼吁改革历法，但徐光启却在天启五年（1625 年）遭到阉党分子的弹劾而罢官，直到明思宗继位才被召返京复职，未几以礼部左侍郎理部事。

崇祯二年（1629 年）五月初一日发生日食，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的日食时刻都不准确，只有徐光启运用西洋历法推算的顺天（北京）、应天（南京）的日食时刻是准确的。明思宗大怒，严厉切责钦天监官员。于是礼部奏请开局，由徐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进言，建议取西洋历法与郭守敬历法参互考订，会通中西。接着，又上《历法修正十事疏》，推举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参与修历。明思宗当即予以批准。九月，在宣武门内南堂东边的首善书院正式开设历局，以礼部左侍郎徐光启为监督，追加礼部尚书衔，李之藻为协助，开始了明朝历史上最后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修历工程。

徐光启认为，要修成一部能够“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的新历，需要大量翻译、整理西方的历法文献，吸收其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以便为《大统历》校正讹谬，增补缺略；同时又要加强天象观测，尽可能正确地掌握天体运行的规律，确立反映这种规律的各类时间标识，作为修历的依据。为此，在他

的大力举荐下，龙华民、邓玉函入局参与历法的修订。龙华民主要的精力放在传教上，这项工作便落到邓玉函的肩上。邓玉函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中最为博学的一位，为意大利著名的灵采研究院（又名山猫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进入历局后即投入紧张的译书工作，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译出《测天约说》《大测》等天文学著作七卷，各种换算表十卷，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于崇祯三年（1630 年）去世。徐光启于是上疏推荐在华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罗雅谷入局，继续其未竟之业，明思宗立即批准。罗雅谷、汤若望也都翻译了一些西方天文学著作。在翻译、整理西方历法著作的同时，这些传教士还带来一些西方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如崇祯七年汤若望和罗雅谷曾向明思宗进献一架从欧洲带来的价值昂贵的望远镜，明思宗特许二人入宫安装，后来还兴趣盎然地亲自操作这架望远镜观测过日食与月食。同年，汤若望等传教士又向明思宗进献特别精致的天体仪、半面球形图及水平日晷。汤若望和罗雅谷还亲自动手，制造小日晷、望远镜、圆规、小号天体仪、星高机等天文仪器。现存北京雍和宫的天球仪、日晷等三件天文仪器，经考证就出自汤若望之手。这些仪器的引进与制造，提高了天文观测的水平。

崇祯六年（1633 年），徐光启因老病请辞历局职务，不久病逝。临终前，他奏请以山东参政、天文学者李天经接替他的职务，完成未竟之业。李天经在几位传教士的协助下，呕心沥血，于崇祯八年终于完成了历书的修纂。它被定名为“崇祯历书”，共计一百三十七卷（今存一百卷与一百一十卷两种本子），采用第谷所创立的天

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第谷体系是介于哥白尼日心体系和中世纪托勒密地心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的宇宙体系，虽然落后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但比之于我国传统的浑天说宇宙模型却是一个进步。《崇祯历书》引进地球和经纬度的概念，大大提高了推算日食、月食的精确度；引入球面三角法，保证了天体运行轨迹计算的精确度；还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即周天分为 360 度、一日分为 36 刻（即 24 小时）、60 进位制以及黄道坐标制等。这样，就将中国天文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从而与世界天文学同步发展。

《崇祯历书》推测的日食、月食屡验不爽，但却遭到一些保守派和宦官的阻挠而未得推行。崇祯十六年（1643 年）三月初一日日食，《崇祯历书》的推测又独应验。八月，明思宗下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第二年三月，新历尚未施行，北京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明王朝的统治覆灭。后来，清军进入北京，确立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参与制定《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它献给清廷。清廷下令在全国推行，改称为"时宪历书"。

西洋火炮又称"红夷炮"，因"红毛夷"而得名。红毛夷是明人对荷兰人的称呼，以其须发皆赤也。红夷炮起初专指荷兰火炮，后来成为西洋同类火炮的通称。这是一种大型火炮，比中国传统火炮（火铳）口径大，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膛压，射程更远，杀伤力也更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荷兰舰船进入广东水域，与明朝水师相遇，双方发生一场激战，明军首次见识了这种火炮。此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其中就包括西洋



《崇祯历书》

火器的制造技术。徐光启、李之藻曾向利玛窦学习过西洋大炮的有关知识，徐光启还将它传授给弟子孙元化。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被后金军队击败后，徐光启曾多次上疏，提出练精兵、致训器的建议，并受命为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他函托李之藻、杨廷筠等人赴澳门购募西洋大炮。泰昌元年（1620 年）十月，李之藻派其学生张焘，从澳商手里购得西洋大炮 4 门。但当李之藻回京复命，催促将所购西洋大炮迅速北运之际，徐光启已经去职。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沈阳、辽阳相继落入后金之手，形势更加危急，徐光启再度被起用。他与李之藻及兵部尚书崔景荣都建议用西洋火器对付后金的进攻，并奏请仿造西洋大炮。于是明廷又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手里购得英国制造的西洋大炮 36 门，并征召善造西洋大炮的传教士阳玛若、毕方济等及夷商入京，商议制造西洋大炮。天启五年，徐光启在阉党的排挤下再度去职。第二年正月，袁崇焕在宁远采用凭借坚城以西洋炮还击的战术，击退后金的进攻，并击伤努尔哈赤，充分显示了西洋大炮的威力。此后，各边镇纷纷请求配备西洋大炮。

明思宗继位后，复职的徐光启受命制造火器，同时再次提出到澳门购置西洋大炮的主张。明思宗采纳这个建议，于崇祯二年（1629 年）命两广军门李逢节、王尊德到澳门购买 10 门西洋大炮。二月，葡萄牙炮兵统领公沙·的西劳和耶稣会士陆若汉率炮手、炮匠，携带 10 门大炮经广州北上。十一月，抵达涿州。此时正值后金皇太极率兵攻破大安口（今河北遵化西北），抵达京畿地区，这 10 门大炮便留在涿州布防。后金军队听说有西洋大炮守城，未敢贸

然进攻，弃良乡而走遵化，再次反映出西洋大炮的威力。徐光启大喜，十二月急请令兵仗局铸造二号西洋大炮，并亲自前往涿州迎取西洋大炮。明思宗对此大加支持，命他“与兵部总理细加斟酌，密奏以闻”。西洋大炮迎至北京，明思宗即命京营总督李守锜会同提协诸臣将它们架设于都城冲要之处，精选将士练习点放之法，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并决定派人再到澳门购买西洋大炮。第二年，当中书姜云龙和陆若汉抵达澳门时，葡萄牙商人却漫天要价，甚至无理地提出许多损害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苛刻条件，如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筑城、撤走中国政府驻澳门的参将、葡萄牙船只赴澳门不受检查、增加运往澳门数万石粮食等。明政府当然不能接受这些条件，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也连上四疏，表示强烈反对。明思宗于是下旨收回购炮命令，将姜云龙革职回籍。

徐光启自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奏请仿造二号西洋大炮后，又多次疏请仿造。到崇祯三年四五月间，已造出50门。在这前后，两广总督也仿制了50门。第二年十月，后金军队攻陷大凌河城，辽东战事吃紧。此时，明廷已造出西洋大炮179门，徐光启受命协同料理京城守备事宜。他进一步提出守城、制造火器和练兵、建立一支装备西洋大炮的精锐部队的建议。他的计划是建立15营，每营4000人，计6万人。每营除配备各种车辆（包括战车）和火器外，还有西洋大炮16门。为此，他建议调自己的学生、登莱巡抚孙元化领兵入京。孙元化以善用西洋炮法著称，他辖下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中，王征曾向邓玉函学过力学、机械学，并与之合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张焘是李之藻的学生，对西洋大炮

也有研究。他们曾帮助孙元化仿造西洋大炮，装备其部队。徐光启拟调他的部队入京，组成一营，以之为基础，逐步扩充至15营。但是，徐光启这个奏疏呈上未及两月，登莱参将孔有德于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发动吴桥兵变，攻陷登州，俘获孙元化和王征。登州的西洋大炮尽为孔有德所有。徐光启以孙元化部队为基础，组建装备西洋大炮的精锐部队的计划随之化为泡影，他本人也于崇祯六年因久病而抱憾辞世。同年，孔有德投降后金，他手中的西洋大炮落入后金之手。此后，明军在火器装备方面再无优势可言，明与后金军事实力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更难以阻挡后金的攻势了。

崇祯末年，明朝面临满洲八旗兵和农民起义军的两面夹攻，形势更加危急。此时到澳门买炮的路子既已堵死，而善于造炮的徐光启又已去世，明思宗决定由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来主持制造西洋大炮。汤若望虽然精通天文历法，但制造西洋大炮却是外行。他查阅大量西洋文献，经过一番刻苦钻研，主持造出了西洋大炮20门，大的重1200斤，小的重300斤。在离京城40里处的广场上试验，一次点放成功。明思宗极为高兴，特颁旨嘉奖，命其再造小炮500门。在此期间，汤若望还与中国学者合著了《火攻挈要》一书。该书由汤若望讲授，焦勖编纂，赵仲校订，崇祯十六年（1643年）成书并刊刻梓行。原书分上、下两卷，另附《火攻秘要》一卷，清道光年间潘仕成将其合并辑录成上、中、下三卷。上卷记述火器的制造方法并附有各种火器的图形；中卷记述火药的制造、存放与搬运方法；下卷介绍火攻的方法和铸炮的注意事项。这部著作的问世，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新式火器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

积极的作用。

除了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明思宗对西方传入的天主教也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产生了好感。

同其历代前辈一样，明思宗也是信奉佛教、道教的。利玛窦入京，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设堂传教后，天主教开始在北京传播。汤若望经徐光启的推荐参与修订历法之后，受到明思宗的信任，得以出入皇宫，便借机在宫中传教。崇祯四年（1631 年）即在皇宫内劝说10名太监入教。第二年，在宫中举行第一台弥撒，为御马监太监庞天寿施洗入教。庞天寿入教后，把天主教和耶稣会士一一介绍给皇室，于是皇室人士纷纷入教。后来在宫中建立了两个小教堂，便于宫中的教徒做弥撒。据统计，到崇祯九年，已有亲王 140 人、皇室人士 40 人、诰命夫人 80 余人加入了天主教。汤若望还极力向明思宗宣传天主教义。崇祯十三年，他曾向明思宗进呈印刷精美、色彩绚丽的多幅《耶稣行迹图》。明思宗谕令悬之于御座大殿，令皇室及诸大臣观赏了 10 多天。汤若望还向明思宗进呈过一本 150 页的羊皮纸的画册，上面绘有耶稣的生平事迹。就在这一年，汤若望还上疏，直接劝说明思宗入教，说:“天主正道，与释道等教殊趣，以昭事天地真主为宗旨，以导人仁睦忠良为本分，以悔过迁善为入门，以生死大事有备无患为究竟。王者用以治国，则俗朴风醇，人心和辑；君子奉之修身，则存顺殁宁，永远吉祥。诚普世之人所当共务钦崇，以符造物之本旨，以一人生之归向者也。”此外，已受洗入教，与李之藻、杨廷筠并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于崇祯五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后，也极力向明

思宗宣传天主教义。因天主教以上帝为唯一的真神，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他还劝皇上撤毁宫中的佛像，以表达对天主的诚敬。

汤若望、徐光启等人的宣传，引起了明思宗的浓厚兴趣。他自小就在好佛佞道的宫中长大，对佛、道虔诚崇拜，但不管是哪路神仙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走向衰败、濒临危亡的命运。既然神佛仙翁无法保佑自己，何不求助于那位外来的天主呢？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说不定这位唯一的真神真能保佑自己渡过难关，实现中兴之梦哩。明思宗于是提笔疾书，赐给汤若望“钦褒天学”的四字题词，并制作多个匾额，分送各地教堂悬挂。他还下达拆毁宫中佛像的圣谕，命人将玉皇殿、英华殿、隆德殿、乾清宫的佛像移往宫外。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载了搬出宫外的这些佛像：“皆裸佛交构形，凡数百尊。……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头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男人背而叠之。”王誉昌《崇祯宫词》中有首记述玉皇殿撤像的诗，其注云：“内玉皇殿永乐时建。有旨撤像，内侍启钥而入，大声陡发，震倒像前供桌，飞尘满室，相顾骇愕，莫敢执奏。像甚重，不可动摇，遂用巨绠曳之下座。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光启奉西氏之教以辟佛者，而上听之也。既而知撤像时灵异，言于上，上深悔之。而宫眷之持斋礼诵，较盛于前矣。”另有一诗记述将乾清宫佛像撤往宫外寺院另行安置之事，谓：“灵感全凭一念生，先于明诏去乾清。宝云高拥莲花座，依然行踪有乐声。”后来，总督杨嗣昌奉命镇压农民起义军，为了解决军饷匮乏问题，明思宗还下令“将宫中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兵饷”。由于“虔事上帝”，明思宗还诏“群臣名‘天’者

悉改之”。有个大理寺推官原名天工，就是遵照明思宗的这道诏令而改名为“良谟”。宫中因此议论纷纷，远近哄传明思宗要抛弃原先的佛道信仰，改奉天主教了。

但是，就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思宗收到汤若望劝他入教的奏疏不久，他最宠爱之田妃所生的皇五子朱慈焕突染重病。病危之际，明思宗前去看望，五岁的小慈焕手指天空，说九莲华娘娘现立空中，历数父皇毁佛与苛求外戚之过，说完便咽气了。所谓九莲华娘娘，指明神宗先母孝定李太后。她因好佛，宫中画像将她画作立于九莲座之上，故被称为“九莲华娘娘”。明思宗十分痛悔，连忙下旨将此前移往宫外的佛像又移回宫中，从此不再信奉天主，遇事便向神佛祈祷。

明思宗对科学技术寄予厚望，对西方传来的天主教怀有好感，这在明朝诸帝中实属罕见。最高统治者的这种个人爱好，客观上为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探寻、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加上明中后期实学思潮的激荡，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纷纷从空谈性理转向经世致用，投身于科学研究，力图实现富民强国、解救危机的理想。徐光启除研究天文历法，督导历书的修订，还长期坚持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的写作。弥留之际，他谆谆嘱咐其孙子，应尽快将《农政全书》缮写完毕，进呈朝廷。徐光启去世后，明思宗不时想念，命其后人进献遗书。徐光启的孙子徐尔斗将这部遗著献上，明思宗下旨“仍着该抚按梓印广传，以重民事”。该书六十卷，共60多万字，“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是一部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之大成而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学术著作。江西奉

新人宋应星，崇祯年间曾出任江西、福建、安徽的地方官，有机会接触下层的群众，细心观察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熟悉生产领域的工艺流程，后乃弃绝科举仕途，写出一部系统记述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天工开物》十八卷，被誉为世界科技史上的“百科全书”。安徽桐城人方以智，广泛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理论，撰写了《物理小识》十二卷。南直隶江阴人徐弘祖，更是厌恶功名，热衷于观察、探究大自然的奥秘，从22岁起长期外出游历，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16个省区，首开系统实地考察自然、探索自然的新型研究之路，留下了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在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科技名著，犹如璀璨的明珠，在明末漆黑的天幕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形成极其独特的奇妙景观。

在国势危难之际，不愿当亡国之君的明思宗，一反空谈性理之风，赏识经世致用之士，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对外来天主教义产生好感，敢于任用精通中西科学技术的官员和耶稣会士，敢于在宫中安置天文观测仪器，显示出同那些保守的前辈不大一样的品格。但是，由于他对科学技术等外来新鲜事物的兴趣是和济时救世密切相联系的，因此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色。他缺乏长远的目光与宽阔的视野，未能认识到国内经济已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世界经济也以海洋为交通途径向全球一体化发展，而是固守着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传统，即位之后，在重视农业的同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来保护、扶持工、商业特别

是海外贸易，也没有及时地把几乎单一的农业税制转化为多种税制并举，相反却在崇祯元年（1628 年）重申海禁政策，从而阻滞经济的发展，堵塞了多种税源，使国家的财政困难无法得到缓解。更为严重的是，对西方殖民者侵夺我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行径坐视不问，不仅继续容忍葡萄牙人以每年 500 两白银的低价租居澳门，而且对天启年间分别从南北两端入侵我国台湾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也未采取任何反击行动，听任双方在岛上展开激烈火并，最终由荷兰人独占台湾 38 年之久，直到明亡之后才由郑成功重新加以收复。

第四节　夙夜焦劳，急功近利

为了实现中兴之治，明思宗以太祖朱元璋为榜样，自奉俭朴，不贪女色，忧勤惕厉，夙夜焦劳。

明思宗就帝位后，就效法明太祖生活俭朴的作风，多次重申“崇俭去奢，宜自朕始”。鉴于父亲明光宗、长兄明熹宗为女色所误的教训，刚即位即没收魏忠贤所献女子带进宫中的“迷魂香”，接着又下令毁弃魏忠贤让小太监在便殿复壁内焚烧的另一种香，因为这两种香都会诱发春心的萌动而思淫欲。此后，终其一生，明思宗都不贪女色。崇祯十五年（1642 年）九月，原计划采良家女子充当九嫔，刑科给事中光时亨鉴于时局严峻，请求缓行，他立即接受。崇祯末年，明思宗宠爱的田贵妃见他因时局危迫而忧思过度，向他的父亲田弘遇询问有何办法让皇上开心。田弘遇说不妨将他从苏州买来的名妓陈圆圆送入宫中，供皇上玩赏，或可缓解其宵旰之忧。

明末江南经济繁荣，崇尚声色之娱，苏州尤其风靡。陈圆圆原名陈沅，本是罪犯之女，色艺双绝，“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名噪一时。江南风流公子冒辟疆在崇祯十四年曾慕名拜访过陈圆圆，后来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陈姬之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田弘遇原籍陕西，后居扬州，以女贵，官左都督，好佚游。他花重金将陈圆圆从苏州买来，带回北京，金屋藏娇。听了女儿的话后，他将陈圆圆好好地妆饰一番，送入宫中，希望能博得皇上的欢心。孰料明思宗根本不感兴趣，下令将她送回了田府。

日常生活中，明思宗也自奉俭朴，不尚奢华。明神宗以来，皇帝的伙食日费万余金，他下令尽量减省，仅存百分之一。到崇祯十五年（1642 年），据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当时皇帝的伙食费每月 1046 两，平均每日只有三十五六两；皇后、皇贵妃和皇太子的伙食费也都相应减省，分别为 335 两、164 两和 120 两。崇祯十六年九月，明思宗又下令，将自己的伙食费减去一半，后妃等人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按照惯例，皇帝的冠袍靴履应该一天一换，明思宗改为一月一换，冠袍里面则经常穿着洗涤多次的旧衣服。有一次日讲，他发现自己内衣的袖口已经破损，露在袍服袖子外面，很不雅观，就不时将它掖进袍服的袖子里。讲课的老师见了，对他说，穿旧衣裳是一种美德，陛下不必掩饰。明思宗还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中一



陈圆圆像

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或陶器。他还规定，诸臣服饰的袖长不得超过一尺，不得擅用金银。在明思宗严格自律的带动下，后宫没有把玩珍珠宝玉之娱，没有声色歌舞之乐，闲暇时只有幽雅的古琴之音相陪伴。周皇后见国势日衰，举步维艰，在宫中也力持节俭。她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也不为外戚乞求恩典赏赐，遇到过年大臣入宫朝贺，所行的赐赉也依礼而定，力戒奢侈。崇祯八年（1635年），她还命太监从苏州购进 24 具棉花纺车，教宫女纺纱，以培养她们勤劳节俭的习惯。崇祯朝的后宫，气氛虽然压抑，但却未见历代诸朝濒临灭亡之前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

不过，明思宗自奉俭朴的另一面，是刻于理财。明思宗继位之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战争持续不断，军费的开支日益膨胀。当时国库空虚，已无力支付这笔庞大的军费，但皇帝的内府私库并不缺钱。因为万历年间，明神宗通过传索帑金，加上派遣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内帑之充牣已亘古所无矣”。明神宗死后，明光宗在位仅一个多月，明熹宗在位也仅 7 年。短短 7 年时间，内府的积蓄并没有花光，但明思宗却如张岱在明亡之后所写的《烈皇帝本纪》中所指出的：“以宫中内帑，视为千年必不可拔之基，祖宗所贻，不可分毫取用。”一旦军饷告绌，他便大叹穷经，声称“目今帑藏空虚”，于是“日贷之勋臣，日贷之戚畹，日贷之内珰，天下视之，真谓帑藏如洗矣”。勋臣、戚畹和内珰自然也学他的样，大叹穷经，不肯往外拿钱，所贷之赀犹如杯水车薪，无法弥补军饷的亏空。于是明思宗就不顾百姓的死活，一再实行加派，先是加派辽饷，接着又加派剿饷，然后再加派练饷，从而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使农民起义

的烈火越烧越旺。待到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明思宗“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所积存的帑金，“无不尽出以资盗粮！”

明思宗不讲究吃穿，也不喜欢声色之娱，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军政大事的处理上面。明朝刚建立时，明太祖就定下每日视朝的制度，并严格加以执行。但后来的皇帝大多将这项祖制视为具文，特别是隆庆末年、万历初年，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视朝，以后干脆连三、六、九日也免朝。明思宗一上任，就宣布恢复每日视朝的祖制。隆寒盛暑，除事先告知免朝之外，他每天都到文华殿视朝，与群臣共议国事，宣布谕示。除了视朝，他还不时地召对平台。所谓“召对平台”，即召见群臣议政，亦称“召对”。当政初期，国事丛集，召对更为频繁。崇祯十五年（1642 年）因形势危急，还规定，视朝完毕之后，文武大臣如果还有重要的事情奏报，可以报名，听候召见，有人阻拦则以奸欺论处。遇到召对，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以及翰林院记注官、锦衣卫堂上官都得参加。召对的场所在文华殿，阁臣办事在文渊阁。为了应付皇上的随时召见，阁臣便常留宿阁中。

除了视朝、召对，明思宗每天还亲自批阅奏章。当时疆域多事，奏章也繁。明思宗怕大臣报喜不报忧，敷衍卸责，大多亲自过目，并做出处理。崇祯九年（1636 年）二月，淮安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存在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唯重作文，二是资格用人唯尚文途，三是推官行取唯选进士，要求专拜大将，并举孝廉以崇实行，罢推官行取以除积横之习，蠲灾伤钱粮以苏累困之氓。内阁

大臣认为此疏狂言无忌，拒不受理。陈启新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被宦官曹化淳发现，将他的奏疏转呈明思宗。明思宗正锐意求治，读罢此疏极为惊喜，立即授其为吏科给事中，命遇事直陈无隐。有些臣僚的奏疏夸夸其谈，却无实际内容，明思宗非常反感，常常加以斥责。兵科给事中曾应遴的上疏，往往不分轻重，从第一到第十几罗列一大堆事情，明思宗便把他召来，当面诘责一顿。明思宗不仅认真披阅奏章，对阁臣代他起草的票拟看得也很仔细，反复地斟酌删改。崇祯十年六月，阁臣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颇长，明思宗涂抹删改之后，仍不满意，最后全部删去，批了三个字："放他去。"在交付部院科道施行的奏章上，明思宗的朱批时间多有"子(相当于现今夜间 11 时至 1 时)、丑时（相当于现今夜间 1 时至 3 时)"的字样，说明他批阅奏章往往到夜半三更尚未休息。遇到军马紧急之务，他更是彻夜不眠，几乎不停地批阅奏章，有时一夜就连发几道圣旨。

除了视朝、批阅奏章，明思宗还极其重视日讲与经筵。明思宗虽然自幼喜爱读书，但他毕竟不是皇太子，没有接受过如何当皇帝的皇储教育。入继大统之后，他就非常重视日讲与经筵，接受讲官关于传统文化与历史知识的教育，从中寻求解救危局、实现中兴的灵感与启迪。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他就帝位，十月十五日即开始日讲，崇祯元年（1628 年）二月又开启经筵。经筵分为春讲与秋讲，在春、秋两季各举行一两次。春、秋经筵开讲之后，就进入日讲。所谓日讲，就是每天必须进讲，除非皇帝事先下旨传免。经筵与日讲其实并无多大差别，只是经筵更加隆重、

更加讲究礼仪而已。经筵设有两个书案，一在御前，一在讲官前；日讲只设一个书案，皇帝与讲官都坐在书案之前，显得更加随意而亲密无间。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对经筵与日讲大多敷衍了事，明世宗与明神宗后期甚至长期停止经筵与日讲，但明思宗却听得极为认真，讲官如果不用心讲解或者讲错，都会引起他的不快。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日讲官姜曰广进讲《通鉴》时读错了段落，明思宗即下令停讲，改讲《春秋》。当时翰林院词臣只有文震孟研习过《春秋》，为当时的《春秋》名家，便由他进读。文震孟讲得极为精彩，明思宗竟于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听讲 4 天。二十四日，讲《祭伯传》，文震孟考虑到“宰晅”一章存在阙疑，准备略去不讲。明思宗说：“‘宰晅’一章，正见当时朝政失宜，所以当讲，今后以此类推。”文震孟便又继续讲下去。崇祯十一年，经筵讲官王铎进讲经书，解析“敬”“信”“悦”等字，过多地使用反诘语气，联系近事时又使用“白骨如林”的语句，明思宗听了非常反感，责怪他“敷衍数语，支吾了事，全不能发挥本义”。王铎吓得面如土色，急忙离案下跪待罪。明思宗让他起来，他又忘记谢恩。由于认真听讲并勤于思考，明思宗从经筵与日讲中获益不浅。崇祯十一年七月，他在一次召见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时即感慨地说道：“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时从经筵启沃，略知一二。”

除了亲御经筵与日讲，明思宗还勤于读书。“四书”“五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祖训》《帝鉴图说》等书，几乎是朝夕不离手，一有空

闲就要翻阅。他还命武英殿中书画《历代名君贤臣图》，写《正心诚意箴》，制成屏风，安放在文华殿、武英殿，以便随时观览，警策自己。

由于长年累月地视朝，批阅奏章，处理军国大事，亲御经筵与日讲，他常常是天不亮即起床，一直忙到深夜也不得休息，既没有假期，也没有文化娱乐，身体常常处于非常疲惫的状态。明神宗的昭妃刘氏，崇祯时住在慈宁宫，掌管皇后的印玺。这位刘太后为人谨厚，抚爱诸王，明思宗对她非常尊敬，遇到年节都要前去看望，对她施礼问安。有一次，明思宗来到慈宁宫，对刘太后行过礼后，顺便在椅子上坐下，稍微一闭眼，便睡着了。刘太后连忙告诫身边的太监、宫女不要惊动他，并给他再披上一件衣裳御寒。过了一会儿，明思宗醒过来，起身拜谢太后说，神祖在世之时，天下太平，海内少事。现在天下多难，民生艰苦，我两个晚上连着批阅文书，未曾合眼，实在困得不行，以致在太妃面前睡着了，实在失礼。刘太后听了，不觉潸然泪下。

但是，明思宗的忧勤惕厉，夙夜焦劳，是与其急躁和褊狭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越搞越糟，导致局势的不断恶化。明思宗自小在宫中险恶的环境中长大，形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17 岁时，在危难之际继承帝位，毫无理政治国的经验，认为“慎重即因循”，急于求成，切盼短期内就能重建太平盛世，振兴朱家基业。崇祯元年（1628 年）十一月，陕西道御史陕嗣宗曾上疏，在表扬明思宗“三不可及”的美

德之时，也批评他“五不自知”的弊病，即自视甚高，近乎予圣；刚愎自用，习于尊倨；猜忌多疑，任意斥责；急于求治，旦夕责效；过于明察，流于繁苛。第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也上疏指出："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釀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弊。”

由于求治太急，急功近利，明思宗治国理政，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制定长远的治国方略，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左右摇摆，朝令夕改，结果适得其反。崇祯元年（1628年），左副都御史杨鹤上言："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缙绅拘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他的这种看法，颇得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传为至理名言。第二年，明思宗有次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大学士成基命，亟言法纪废弛，宜力加振刷。成基命回答说，皇上的求治过于急切，比如整理一团乱丝，应该先找出头绪。如不找出头绪，只能越理越乱。同年九月，刘宗周的上疏也指出："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矜，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

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以后几年，他又几次上疏，指出：“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但是，所有这些奏疏，明思宗不是嫌其迂腐，全不晓国势人情，就是嫌其疏阔，无补于时局，一概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所素，继续执行其顾近不顾远、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因而只能越搞越糟，直至最终败亡。

明思宗猜忌多疑，对周围大臣多不信任，时刻担心他们怀有贰心，或办事偷懒。于是，他极力鼓励告发，并利用锦衣卫的缇骑和东厂的隶役四出侦伺，对大臣进行监视。户部尚书孙居相为官清廉，负气敢言，在与给事中杨时中的通信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之语，被厂卫侦知，明思宗即下旨将他逮捕，谪戍边卫。薛国观为人阴鸷溪刻，不学少文，由于首辅温体仁的密荐，得以超擢重用，后升为内阁大学士。有一天，明思宗同他谈及大臣的贪婪，他说：“使厂卫得人，安敢如是！”站在旁边的东厂太监王德化，不觉汗流浃背，于是刻意侦伺、收集他的阴私，密报皇上，使之逐渐失去信任。崇祯十三年（1640年），薛国观贪污受贿事发，被明思宗下令赐死，遂悬梁自尽。厂卫受宦官控制，东厂提督就是由太监充任的。厂卫肆意侦伺、抓人、审讯、行刑，根本不受法律的约束，刑部也不得过问。刑部如果过问，触怒了厂卫，厂卫寻机罗织罪名，即可置之于死地。崇祯五年，工部郎中孙肇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南京礼部主事金铉、周镳，因弹劾宦官张彝宪，便被遣戍、削籍或罢官。崇祯十五年闰十月，礼科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

熊开元因言事获罪，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未几明思宗又密谕锦衣卫帅骆养性在狱中将其处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约九卿共救，并奏言，“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二臣“即有应得之罪，亦当付法司（即刑部）。今遽下诏狱，终于国体有伤”。明思宗怒甚，曰：“法司、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而将姜、熊移交刑部，后又下令将姜、熊押至午门各廷杖一百，最后将姜埰谪戍宣州，将熊开云谪戍杭州。

明思宗刚愎自用，极为自信，虚荣心重，极好面子。刘宗周在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的上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后来，内阁大学士谢陞也批评他说：“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因此，他喜欢表扬，愿听阿谀奉承之辞；讨厌批评，听不得逆耳之言。对有损他尊严的言论，更是记恨在心，想方设法进行报复。刘鸿训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由明思宗钦点进入内阁的，起初颇受信任，但他对政务的处理意见有时与明思宗相左，未被采纳，曾私下说，“主上毕竟是冲主”，意即皇帝还是个孩童。这话传到明思宗耳朵里，他极为震怒。后来，阉党分子诬告刘鸿训贪污受贿，擅改敕书，明思宗就想置之于死地。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力救，明思宗还是将他谪戍代州（今山西代县），使他崇祯七年死于戍所。崇祯六年九月入阁当大学士的钱士升，见明思宗为政操切，首辅温体仁又以刻薄佐之，上下嚣然，就于崇祯九年九月撰写《四箴》以献，大意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此言深中时弊，明思宗表面上优旨褒扬，内心却老大不高兴。过了一个月，有个名叫李琎的武生

请搜括江南富户的财产以输官，钱士升拟旨将李琎下刑部提问，明思宗不许。他上疏力争，说："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仇，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但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不意，明思宗却在他的奏疏上批道："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意思是，你想沽名钓誉，前面的《四箴》之疏就已足够，无须再上这个奏疏。钱士升惶恐不安，连忙引罪乞请退休，明思宗当即批准。

由于刚愎自用而又求治太急，明思宗对臣工总是求全责备，专横残暴，刻薄寡恩。不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之后，立马就要求见到成效。出了问题，不是反思自己决策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而是归咎于文武百官，责怪他们不能尽忠尽责，操办不力。臣工稍有过失，轻则训斥、罚俸、降职，重则施刑、廷杖、削职、谪戍、处死。正如河南府推官汤开远所指出的：现在宇内凶气充塞，好像是有圣主而无善治，原因就在于只有皇上一人辛劳，而没有众臣的辅佐。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暇。陛下自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不论是众臣推举的，还是皇上简拔的，也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过失，统统削籍谪戍而不少宽贷，甚至逮入大牢拷打追比，几乎是刑乱世而用重典。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执法的官员，遇到明思宗轻罪重罚甚至无罪滥罚的诏旨，为了避免惹恼皇上，都不敢主持公道，而是一味唯皇上之命是从。有些奸佞之徒，为了邀功请赏，甚至加重对蒙冤受屈者的处罚，如史籍所载，"一时诸司官无不以残刻为事"。据统计，明思宗在位期间，先后诛戮总督 7 人、巡抚 11 人（河南巡抚李仙风被捕后上吊自杀，尚不计在

内)。就连位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周延儒、薛国观 2 人被杀，这是自明世宗诛杀夏言以来所仅见的现象。由于许多大臣不断地受到惩罚，官员的更换十分频繁，如蓟镇总督就曾在半年之内换了 5 人。明思宗在位 17 年，兵部尚书换了 14 人，刑部尚书更是换了 17 人，其中有 9 人因审狱时与皇帝意见相左而受罚。如此滥施惩罚与频繁换人，不仅使“先才后守”的唯才是举政策大打折扣，严重挫伤官员的积极性，使其难以施展才干，而且使大批耿直之臣遭到贬斥，许多忠臣良将遭到杀戮。正如刘宗周所指出的：由于求治太急，用法太严，“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崇祯一朝，内阁辅臣更是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有明一代，先后共任用阁臣 160 余人，崇祯一朝竟多达 50 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这些阁臣中，崇祯初年的刘鸿训、钱龙锡、韩炉、李标、钱象坤、孙承宗等人还较正直，也有一定的才干，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但由于过分耿直，他们既不见容于皇上，又受到同僚中一些奸佞之徒的掣肘与排斥，任职不久便纷纷去职。崇祯二年（1629 年）周延儒入阁、并于四年升任首辅之后，内阁中便多是一些庸碌之辈，如周道登、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王应熊、黄士俊、刘宇亮、薛国观、方逢年、范复粹、姚明恭、陈演、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有的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有的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如崇祯十一年六月入阁的程国祥，只是委蛇其间，自守而已，就连皇上召对时也是缄默无语，不发一言。有的则是胸无大志、善伺意旨的奸佞之徒。明思宗最宠信的，恰恰是这类大奸似忠的人物。阴险刻毒但善

于揣测上意的温体仁入阁之后，虽屡受大臣的弹劾，但常得明思宗庇护，在阁8年多，成为崇祯一朝辅政时间最长的一位阁臣。如此走马灯似地更换辅臣，加上排斥直臣而重用佞臣，崇祯一朝也就难以形成一个稳定而有为的政治核心，为其中兴之治进行周密的筹划与尽心的辅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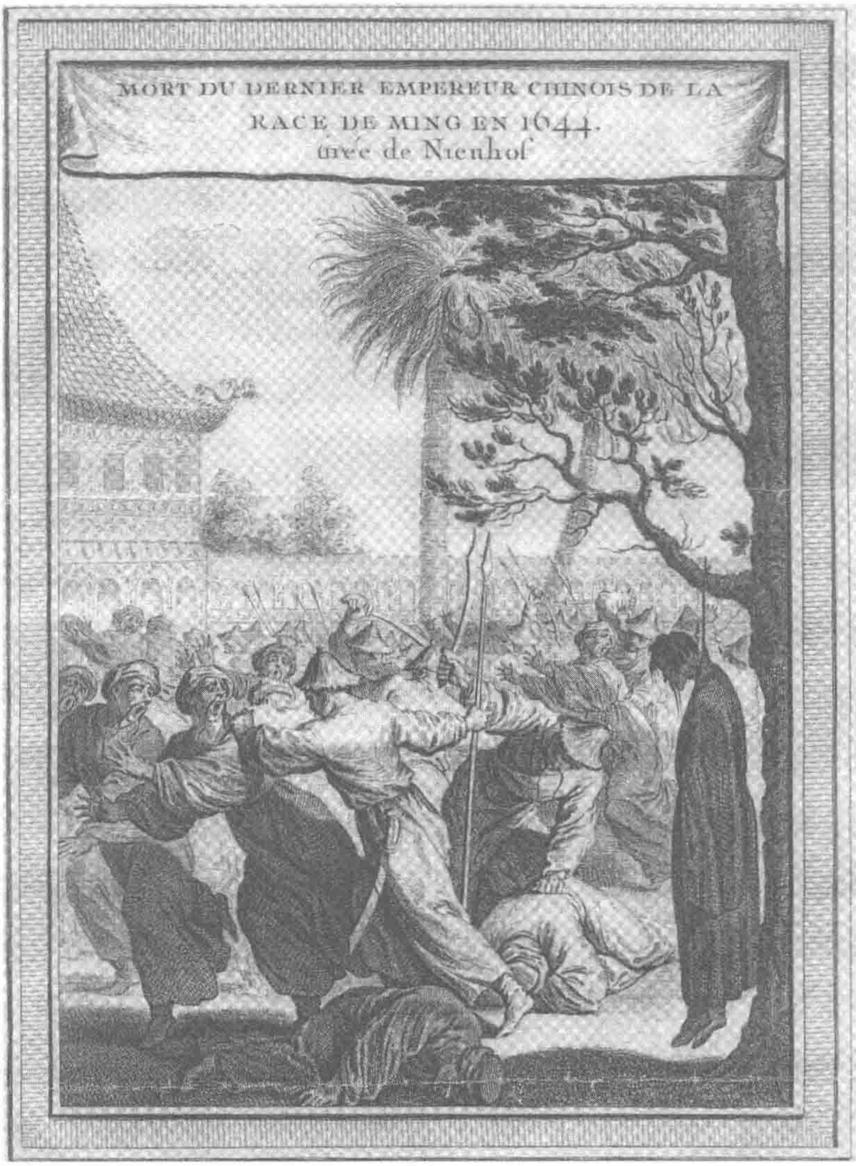
在明思宗看来，文臣武将全都不能尽忠尽责，不可信任，他便一反即位之初严禁民间自宫为宦、禁止廷臣结交内侍、撤销各边镇守太监的做法，大力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开始把身边的心腹太监安插到一些要害部门，充任耳目手足，借以强化君主专制的统治。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明思宗就任命司礼监掌管文书的内官监右少监宋尚志提督正阳等九门、永定等七门及皇城四门，巡城点军，内官监赵本清为副手，从旁协助。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绕道漠南蒙古从蓟门一线越过长城南下，京师戒严，明思宗又命太监提督九门及皇城门，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四年九月至十一月，更是大规模起用宦官。九月，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财政收入；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往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自监视兵饷。十月，命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诏往关、宁、蓟镇（治在今河北迁西三屯营）东协、中协、西协监军。十一月，命李奇茂监视陕西苑马茶商，吴直监视登岛兵饷。从此，北方各个军事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高于督、抚。文武大臣纷纷上疏表示反对，明思宗就是听不进去，将谏诤之臣撤职罢官，或革职为民，说：“朕览卿等公疏为遣用内臣一事，太祖明训朕岂不知？但成祖以来亦闻有用之者，皆

出一时便宜。况天启年间所遣（内臣），朕尚撤之，岂至今反用！朕又何尝不信任文武（大臣），无如三四年来敝坏不堪，朕是万不得已，亦权宜用之。若文武诸臣实心任事，撤亦不难。”随后又命 4 名太监分赴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中监功记过，督催粮草；另派一批太监分赴各仓，同提督诸臣盘验收放；还命太监高起潜监视锦州、宁远，太监张国元监视山（海关）、永（永平，治今河北卢龙）、石塘（在今北京密云北）等路，综核兵饷，犒赏军士。

后来，由于文武大臣的不断劝谏，明思宗只好在崇祯八年（1635 年）八月下诏，撤回总理及监视各道的宦官，但仍让高起潜继续督理关、宁军务，表明他对宦官仍然十分信任，将坚持借助宦官以强化皇权之策。仅隔一年，他又再次大规模起用宦官。九年七月，清兵再次迂回，进逼居庸关，明思宗即派太监李辅国、许进忠、张元亨、崔良用分守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倒马关（在今河北唐县西北）、龙泉关（在今河北阜平西）、固关（在今山西阳泉东）。不久，清兵进入昌平，明思宗令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 6500 人防治马水沿河。又使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各路援军，监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入援的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皆属高起潜指挥。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太监魏国征为天寿山守备，旋改总督宣府、昌平等营，邓良辅为分守；太监邵希诏监视中、西二协，杜勋为分守；太监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军务，兼理漕运河道，孙茂霖为分守。此时的宦官不仅是监军，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军队，气焰因此更加嚣张。这些太监，多为市井无赖出身，昏庸

愚昧，却又妄自尊大。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胡作非为，不仅大肆贪污受贿，而且任意侵克军资。一旦遇到敌人辄拥精兵先逃，诸将皆耻于屈居其下，因此皆难以克敌制胜。宦官的重用，破坏朝廷的礼法纲纪，挫伤文武大臣的积极性，败坏军政事务，导致了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许多大臣纷纷上疏弹劾他们，明思宗虽将这些大臣降级贬官，但也不得不于十三年三月再次颁发《撤回各镇内臣诏》，将所有边防事务交给督、抚、镇、道负责。次年二月，还下令严禁内臣干预外政，重申廷臣毋交结内臣之令。十五年正月，又下令"罢提督京营内臣"。

然而，仅隔半年，为了抵御清兵，明思宗又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命太监王承恩提督勇卫营。十一月，又命其督察京师城守，并命太监方正化总监保定军务。此后，宦官的派遣始终未再中断。崇祯十七年春，面对分兵两路向北京挺进的大顺农民军和关外日益壮大的清兵，无计可施的明思宗只得派宦官奔赴各地，或监军，或统兵战守。仅二月二十一日，一次就派出十几名宦官监制各镇。当月，还命内监分守京师九门。但是，这一切并未能挽救明亡的命运。相反，许多太监见大势已去，都纷纷投向大顺军，甚至打开京城的大门迎降。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跟随明思宗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尽，为大明王朝作了殉葬。


MORT DU DERNIER EMPEREUR CHINOIS DE LA
RACE DE MING EN 1644.
tirée de Nienhof

《崇祯皇帝自缢图》版画

第四章
袁崇焕与孙承宗督师蓟辽

第一节　重起袁崇焕督师蓟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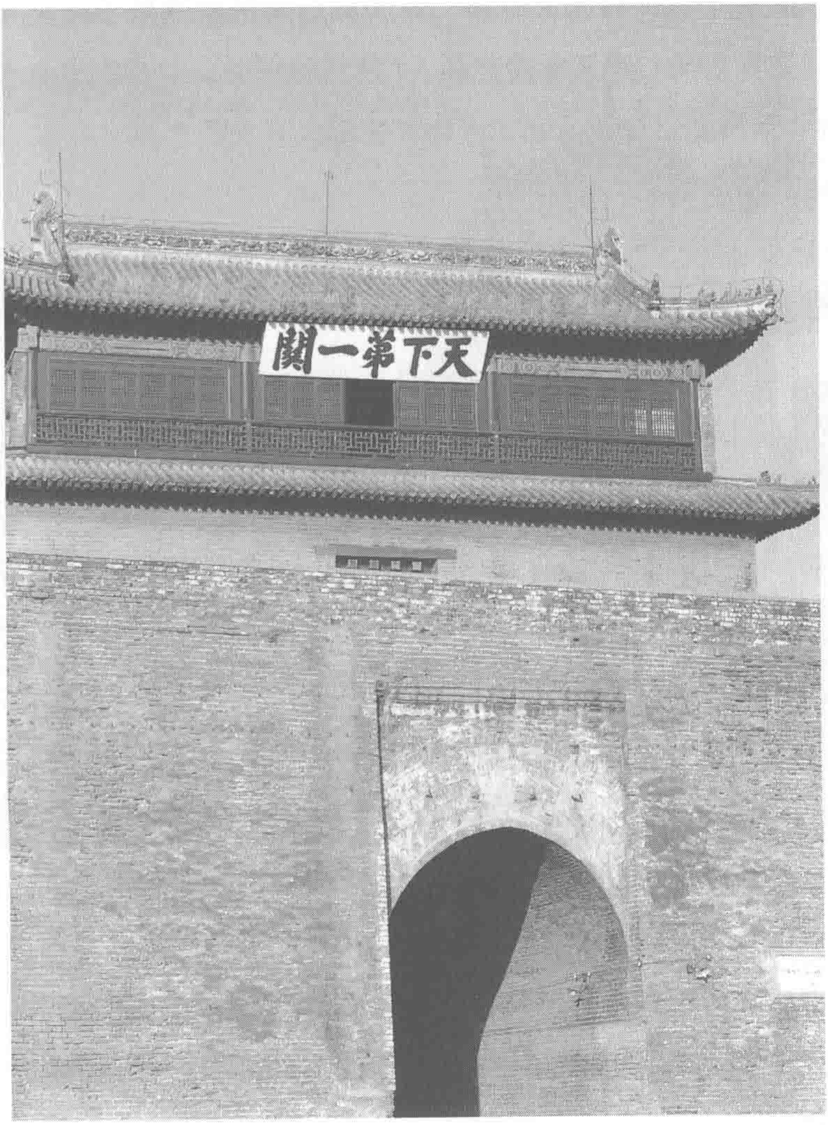
万历后期崛起于辽东的后金，趁着明朝政治腐朽、国力衰颓之机，四出攻掠，不断坐大，已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天启年间川贵的奢安之乱尚未平息，天启末年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又在陕北燃起，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新的威胁。明思宗深知，正是为了对付后金所增派的辽饷，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加上天灾频仍，广大农民才被迫揭竿而起。辽事如不了结，民变也难以平息。因此，他继位之后，在铲除阉党、平定奢安之乱、整肃吏治的同时，就把平定辽东作为营求中兴之治的重大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宁远大捷与宁锦大捷，阻止后金八旗兵的南下，使明朝获得暂时的安宁。但袁崇焕被阉党排挤离任后，关于辽东的战守之策又在大臣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辽东战守之策的争论由来已久。当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公开叛明之时，明神宗根本不放在心上。待努尔哈赤举兵攻陷抚顺，他才如梦初醒，但仍未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主张“大彰挞伐，以振国威”，得到首辅方从哲的附和。于是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要他统兵相机征剿，务期殄灭。方从哲及兵部一些官员更是主张速战速决，认为大兵一到，胜利指日可待。一些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后金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积累起相当的实力，不是轻易可以击败的，必须在出征之前进行精心的筹划与准备，待条件具备才可出兵。如奉调率军参与这次征战的总兵官

刘铤就曾指出，当时“兵饷未充，士卒不习，将领未协，不便大举”。但明神宗、方从哲和兵部听不进去，一再催促杨镐从速进兵，结果打了大败仗。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熊廷弼接替辽东经略之职，采取以守为战、筑城以守的计策，却又遭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反对。王化贞力主速战速决，得到其座主、首辅叶向高的支持。经略与巡抚意见相左，步调不一，导致了广宁的失陷。熊廷弼被逮捕下狱，又遭阉党爪牙的诬陷而被斩首弃市，传首九边；王化贞虽也入狱，但得阉党庇护，直到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死。天启二年二月，孙承宗起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八月受命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城及蓟、辽、天津、登州、莱州等处军务。他认为“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山海关别名）；失觉华（今菊花岛）、宁远，必不能复辽左”，派袁崇焕、满桂等修筑宁远城，构筑一道坚固的宁锦防线，将后金铁骑挡在辽河以东，但他终因遭到攻击而辞职。代为辽东经略的阉党分子高第，尽反孙承宗所为，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主张退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反对，坚守宁远，高第竟下令将锦州、杏山（在今辽宁凌海市西南）军民尽撤关内。后金乘机围攻宁远，被袁崇焕击败。宁远大捷后，袁崇焕重新修复锦州、中左（在今辽宁锦西东北）、大凌河（今辽宁锦县）三个城堡，初步恢复孙承宗的宁锦防线，并经明熹宗的同意，与皇太极进行和谈，以延缓后金的进攻。由于双方的条件过于悬殊，未能达成协议。皇太极率兵围攻锦州，锦州城防工事已修缮完毕，后金八旗兵未能得手，吃了败仗；转攻宁远，再遭败北。明军又取得了宁锦大捷。

宁锦大捷结束不久，主张放弃锦州，将防线内移的浮议重新抬



山海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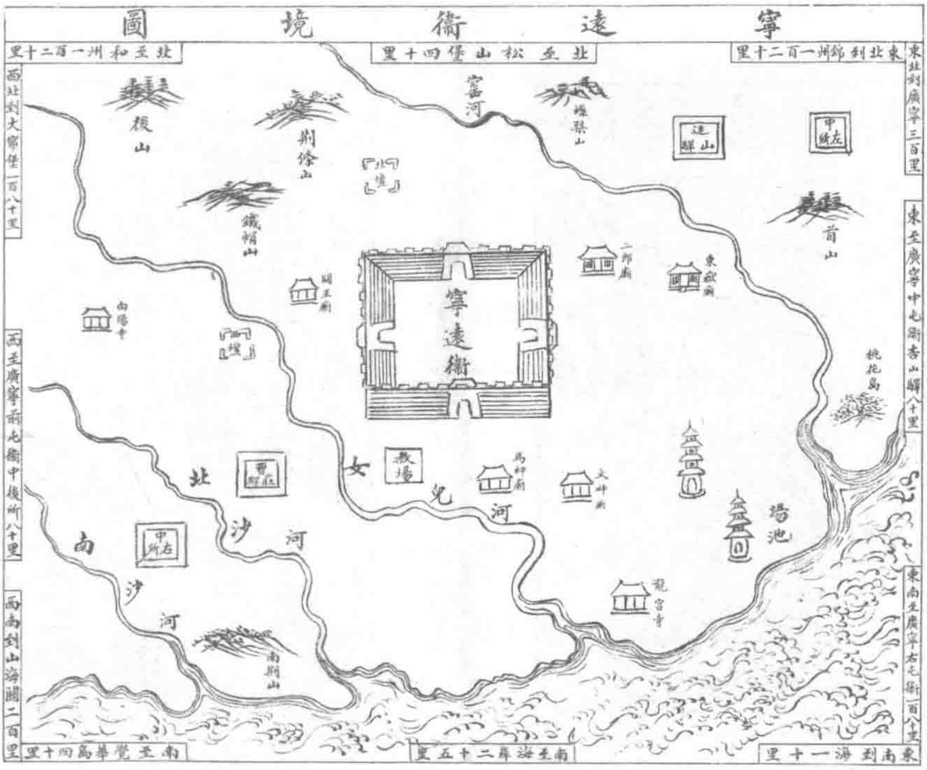
山海关上的明代炮位

头。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镇守太监纪用上疏，说锦州应轻兵以防，小修以补，敌至则坚壁清野以待。蓟辽总督阎鸣泰进一步上疏，认为当年议修锦州城已属失策，接着又因锦州这个弹丸之地，几乎扰动半壁江山（指宁锦之战），虽然侥幸无事，但也岌岌可危。现在的锦州只能悬为虚着，而不可做为实着；只可设为活局，而慎勿泥为死局。言外之意，锦州不应花大力气坚守，该放弃时就要放弃。具体负责守御锦州的总兵官尤世禄也认为，锦州城池受多年风雨摧剥，城垣营舍崩坏，万万不能久居，乞请移驻杏山。奉命守御塔山（在今辽宁锦西东北）的总兵官侯世禄也说，其地低洼，又靠近高山，不易防守，最好移驻他处。这些主张与高第的主张一脉相承，皆属浅薄之见。如果丢弃锦州与塔山，宁锦防线便自行瓦解，无疑等于向后金敞开大门，后果将不堪设想。署兵部事右侍郎霍维华在答复阎鸣泰等人的上疏时，即严加驳斥，强调“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倘临时设谋饵敌出奇，应听新督师熟计而行”。明熹宗最后下旨：“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并重申杜文焕驻守宁远、侯世禄驻守塔山、尤世禄驻守锦州的决定，要他们修筑城池，操练士马，以战守为急图，并互相协作，不得推诿观望，以免自取罪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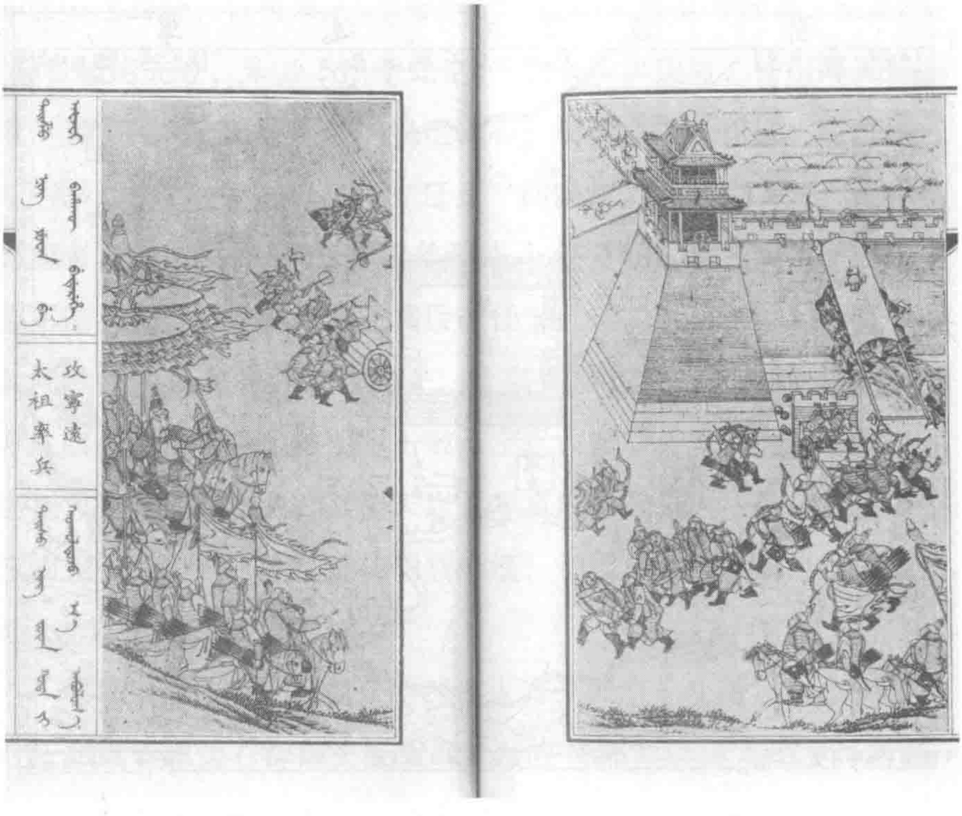
明思宗继位后，廷臣纷纷请求重新召用袁崇焕，以加强辽东防务。袁崇焕，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落籍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为人慷慨有胆略，心系辽东战局。天启二年（1622年）他入京朝觐，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当广宁师溃，他未经请示，瞒着家人单骑出

阅关塞，还朝后表示，“予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孙承宗入主兵部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后，提拔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他即上疏保证：“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孙承宗对他的上疏极为赞赏，批复说：“异日破虏先登，未必不出于此也。”袁崇焕出关后，任山海关监军道，奔走风霜，驰驱险隘，稳定民心，安置辽民，积极支持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以辽人守辽土”的决策。孙承宗主张“诸将有材胆者，当留关外用”，建议他辞去山海关监军道之职，出任宁前监军道。袁崇焕遵嘱，经题奏后改任宁前道。后与副总兵满桂一起共同承担宁远防务，筑城戍守。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13万八旗兵围攻宁远，被明军击败。宁远大捷后，袁崇焕被擢任辽东巡抚，重整辽西防务；又于天启七年再度击败皇太极的进攻，取得宁锦大捷。但是，立了奇功的袁崇焕，却因未能巴结魏忠贤而遭弹劾，被迫引病辞职。

明思宗即位后，根据众臣的请求，于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任命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上疏，认为袁崇焕不怕死，不爱钱，并在辽东打过仗；遇到强敌压境，别人都拼命呼吁，急盼朝廷的援兵，他却将母亲、妻子带到军中，奋勇杀敌；纸上谈兵，人人都可以自命为高手，他却冲杀在敌人的刀锋矢石之下，从而练就冲天的胆气和克敌制胜的真本事，“此臣所以谓始终可用也”，要求皇上加以重用。明思宗采纳这个建议，崇祯元年二月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让


寧遠衛境圖
北至和州一百二十里
北至松山堡四十里
東北到錦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廣寧三百里
西北到大寧堡一百八十里
東至廣寧中屯衛杏山驛八十里
西至廣寧前屯衛中後所八十里
西南到山海關二百里
東南至廣寧右屯衛一百八十里
南至覺華島四十里
東南到海一十里
寧遠衛
後山
荊條山
鐵帽山
首山
桃花島
女兒河
北沙河
南沙河
教場
湯池
龍宮寺
南荊山

《全辽志·宁远卫境图》



《满洲实录·进攻宁远图》

其全权处理蓟辽军务，希望他整饬边防，平定辽东，收复失地。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奉召入京。明思宗当即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和袁崇焕，讨论平辽方略。明思宗先对袁崇焕表示慰问，然后询问他将采用什么办法平息后金的骚扰、侵犯。可能是感动于皇上的重新起用和亲自召见，血气方刚的袁崇焕回答说，收复辽东的方略，已另有奏疏详加陈述。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万里之外，倘假以便宜行事之权，计五年，全辽可复。明思宗喜出望外，连声说道，倘能复辽，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努力解天下之倒悬，你的子孙也将世代享受恩惠和封赏。此时，一旁的内阁辅臣韩炉、刘鸿训、李标、钱龙锡4人也觉欢欣鼓舞，异口同声地称赞道，崇焕肝胆志气，识见方略，确实可嘉，真奇男子也！袁崇焕急忙叩头谢恩。

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许诺，显然是过于轻率了。就明与后金对峙的形势而言，收复辽东的目标并不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后金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东北大片土地和人口，但由于肆行掳掠与屠杀，把奴隶制强行推广到已经高度封建化的辽东地区，将掳掠来的大量汉族人口和战俘充作奴隶，并实行民族同化和压迫政策，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改变风俗习惯，引起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激起辽东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投毒、逃亡、武装暴动的事件屡屡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秩序很不稳定。并且，分布在辽东北边和南边的漠南蒙古东北诸部尚倾向明朝，对后金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而明朝方面，虽在辽东失去广宁以东之地，但在辽西地区经过孙承宗、袁崇焕连续多年的经营，城坚兵锐，屯粮充实，人心稳定，聚集着与后

金对抗的一股强大力量；在后方，又有山海关内广阔的地区作为后盾，可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再者，漠南蒙古东北诸部尚倾向明朝，对后金起着牵制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挽救辽东的败局带来了希望。不过，也应该看到，皇太极时期后金的实力已非努尔哈赤初起时可比。他在继位之后，不仅发兵征服朝鲜，解除其后顾之忧，而且正在逐步削夺八旗贝勒的权力，集中汗权；鼓励通商，发展农业生产；开科取士，缓和女真与汉族的矛盾，从而大大增强了实力。而明朝内部，自明神宗亲政以来，政治昏暗，军政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在这种局势下，要阻挡后金的进攻，进而收复辽东，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因此，当明思宗暂时退回便殿稍事憩息的时候，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便走到袁崇焕跟前，小声地向他询问五年平辽的方略。不料，袁崇焕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原来，他的五年复辽不过是安慰皇上的一句空话，并没有什么把握。俗话说，君无戏言，许誉卿不得不小心提醒说，皇上英明，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效，怎么办呢？

经许誉卿的提醒，袁崇焕自觉失言，脑子迅速转动起来，思谋着如何转圜的对策。待明思宗回到殿中，他急忙对五年复辽作出解释，说辽东边事是40年积累的局面，原本不易了结。但陛下既然委任于臣，臣岂敢推辞？不过，如要办成此事，必须假以便宜行事之权，也就是说，五年之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都必须让臣得心应手，才有望奏效。明思宗听了，当即交代署理户部的侍郎王家祯、署理工部的侍郎张维枢、吏

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务必一一照办。接着，袁崇焕又想到万历亲政以来党争不断、言官舆论纷扰、边臣处处受到掣肘的问题，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和众口则不足。臣一出关门，距京师万里之遥，难免有忌功妒能之人，播弄是非，造谣生事，虽不以权力掣臣之肘，但也能以舆论乱臣之谋。明思宗站起来认真倾听，略加思索，也当面回答说，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为此介意！袁崇焕见所提条件都已得到满足，只能表示，臣如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何颜面见皇上！明思宗即催促他尽快出关，以纾辽民之盼。在一旁的内阁辅臣刘鸿训等忙提请皇上收回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 年）四月、七月分别赐给节制关外四镇的左都督满桂和辽东督师王之臣的尚方剑，改赐袁崇焕，令其便宜从事，明思宗也一口答应。结束召见之前，明思宗还特地招呼袁崇焕走到跟前，和颜悦色地说，愿卿早平外寇，以纾四方苍生之困！临退朝时，又叮嘱近侍太监，赐给袁崇焕一顿酒席。

通过这次召见，袁崇焕看到明思宗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外患的焦虑，也感受到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和殷切期望之情，这一切无不令他深受感动。赴汤蹈火，舍身卫国，他在所不辞。但他也希望皇上能从实际出发，给他一点回旋的余地。经过反复思考与斟酌，袁崇焕仍然认为他过去在辽东所实行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稳妥的，必须坚持。因此，两天之后，便以“钦差出镇行边督师”的身份，向明思宗呈递一份奏疏，接续平台召对时所担忧的言官舆论纷扰、边臣屡受猜忌排挤的话题，巧妙地重申自己的平辽

方略。他援引熊廷弼、孙承宗在辽东经略任上为人排挤构陷的事例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这个奏疏，强调自己作为一名边臣，所能做的就是坚守他一贯主张的固守、征战与和议三着并重，而以固守为主，以征战与和议为辅的方略。“法在渐而不在骤”，其深层含义，是准备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而不是五年复辽。希望皇上能“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要着眼于成败之大局，不要计较一言一行之得失，不要为某些大臣的疑虑忌恨所动摇，更不要为敌人的挑拨离间所迷惑。但高度兴奋的明思宗并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仍下旨表彰他忠勇久著，说“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令“战守机宜，悉听便宜行事”。

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初七日，袁崇焕肩负明思宗的重托，单骑星驰出关。出关之前，辽东巡抚毕自肃传来宁远兵变的消息，说驻守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因4个月未领到军饷，聚集到巡抚衙门请愿。毕自肃向户部请饷，户部拒发。士兵因而哗变，其他13营也起而响应，将毕自肃等人严加拷打。兵备道郭广新赶到，用身体掩护毕自肃，并筹措几万两银子，补发部分欠饷，才使事态暂时缓

和下来。明思宗指示兵部迅速平定哗变，说“有能缚叛开门官兵，重加升赏；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因此，袁崇焕出山海关后，迅即赶往宁远，未及入督师行辕，便径直进入兵营，宣布皇上的谕示，使哗变士兵陆续返回营伍。接着，经与兵备道郭广新密谋，召见为首的杨某、张某，令其绑缚哗变首领以宥前罪。几天后，15名哗变首领被抓获，枭首示众，并惩办贪虐致变的几名官员，奖励都司程大乐一营未参与兵变的官兵。一场兵变风波，终告平息。

接着，袁崇焕着手调整关内外的防务。过去全辽只设一名总兵，后来后金崛起，总兵更设不定。阉党崔呈秀掌管兵部大权后，为安插亲信，在山海关外添设了三四名总兵，事多掣肘。袁崇焕上奏朝廷，经明思宗批准后，在山海关内外各设总兵一名，将熟悉辽东战局的蓟镇总兵赵率教调任关内总兵，加官一级，挂平辽将军印，驻守山海关城；行伍起身、惯历战阵的关内总兵麻登云调任蓟镇总兵。关外分辖宁远、锦州两地的总兵朱梅、祖大寿，朱梅因有病在身解除职务，两地守军统归祖大寿管辖，加祖大寿都督同知衔，挂征辽前锋印，驻守锦州。中军副将何可纲加都督佥事衔，驻守宁远。袁崇焕向明思宗表示，臣自期五年复辽，就专门倚赖这三名将领，他们当与我相始终。届时不见成效，臣亲自杀了这三员大将，然后领受刑狱官的处斩。

继宁远兵变之后，不久又发生了锦州兵变。这两次兵变以及在辽东镇守多年的经验，使袁崇焕深刻地认识到，拖欠军饷往往是激发兵变的直接诱因。为了稳定军心，巩固防务，他赴任督师不久，即上疏请求从速发放山海关内外积欠的军饷74万两，以及太仆寺

马价银、抚赏银4万两。不料，兵部与言官却就如何解决拖欠军饷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兵部认为兵饷之绌主要是因为士兵太多而岁饷太浮，言官则认为是由兵籍空悬，许多军官冒领所致。袁崇焕见户部发不出银两，又请求批发皇帝的私库内帑。明思宗不肯动他的内府积蓄，只管诘问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毕自严敷衍说，户部缺银，容当陆续筹措拨付。最后几经商议，明思宗只得采纳内阁辅臣的建议，准发袁崇焕饷银30万两，还不及袁崇焕请求拨付数额的四成。当初答应袁崇焕督师的条件之一——“户部转军饷”，就这样打了个大折扣！

在调整关内外防务的同时，袁崇焕还尽力修补已遭破坏的明蒙联盟，以图借助漠南蒙古的力量对抗后金。明朝末年，蒙古分为漠西卫拉特、漠北喀尔喀和漠南三大部分。与明朝近邻的漠南蒙古，在东北有蓟辽边外的喀喇沁、察哈尔、内喀尔喀和嫩江流域的科尔沁等部。当时漠南蒙古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察哈尔汗名义上是各部的宗主，士马强盛，横行漠南，诸部不堪其苦，但其内部又矛盾重重。各部因后金不断侵夺其牧场与抚赏之地而对其持敌视抵抗的态度，对明朝则是既扰边又挟赏，用扰边以求抚赏。孙承宗与袁崇焕出任辽职之后，都加紧对漠南蒙古的抚赏，并争取与之结盟。从天启二年（1622年）起，先后与喀喇沁、敖汉、察哈尔、内喀尔喀结盟，并尽力协调察哈尔林丹汗与各部的矛盾，共同助明抵御后金。对各部的扰边行为，则予以坚决回击。但是，当袁崇焕受到排挤而离开辽东之后，漠南蒙古各部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昔日与明结盟的蒙古部落，有的已被林丹汗兼并。林丹汗由于担心各部

依附后金，他自己也率部西迁至宣府、大同一带驻牧。目光短浅的明思宗认为对漠南蒙古的抚赏徒耗金钱而无实际效益，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 年) 七月革除对漠南蒙古诸部的赏赐与互市。皇太极则一改往昔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以战为主的策略，采取孤立林丹汗、对其他各部偏于怀柔之策略，用联姻、盟誓、封赏等各种手段，拉拢漠南蒙古其他部落。这一招很快奏效，漠南蒙古大部分部落纷纷倒向后金。当年九月，他即联合敖汉、奈曼、内喀尔喀、喀喇沁、科尔沁诸部，共同攻打察哈尔，大败林丹汗，占领了西拉木伦河流域。

袁崇焕督师辽东后，已是“西部（指漠南蒙古）无存，东患(指后金之患）我独当之”，形势极为严峻。但他仍坚持“合西虏而厚其与”的政策，希望修补业已破坏的明蒙联盟。为此，他特地举荐曾长期担任过蓟辽总督的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王象乾上任后，与袁崇焕都认为“西虏靖而东自宁”，奏请明思宗改变做法，每年给予察哈尔林丹汗赏银 8.1 万两。明思宗批准，于崇祯二年（1629年）重新实现对林丹汗的抚赏。察哈尔部西迁宣、大后，驻牧蓟门以北的是喀喇沁部。该部首领束不的早在袁崇焕督辽之前，即与皇太极有过交往，之后还互相联姻。崇祯元年十月，因塞外发生大饥荒，喀喇沁部向明朝请粟，许多边臣表示反对。袁崇焕认为，只要稍加劝导并助其度过灾荒，便可促其脱离后金，坚持将自己本已十分拮据的粮食卖给喀喇沁。翌年三月，塞外又发生大饥荒，他仍应束不的之请，继续把粮食卖给喀喇沁。

为了统一事权，在辽东巡抚毕自肃因宁远兵变上疏引罪、后逃

至中左所上吊自杀后，袁崇焕请求明思宗取消辽东巡抚的建制。后来，登莱巡抚孙国桢被免职，他又请求取消登莱巡抚的建制。皇上都一一照准。这样，在袁崇焕督师的军事管辖范围内，辽东、蓟州和与辽东隔海相望的山东登州府、莱州府，便不再有巡抚之设，也无人可与他的权力相抗衡了。

第二节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

为了统一事权，袁崇焕还不惜同室操戈，设计诛杀了不受节制的平辽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祖籍山西太平（在今山西襄汾西南），因父亲到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经商，他在那里出生，便以出生地为籍贯。他少时家贫，厌读经书，好骑射，嗜围棋，后学麻衣相术，靠摆摊测字、为人相命为生。有一天，他在舅父沈光祚一位熟悉孙吴兵法的幕客那里读到兵书，觉得很对口味，从此好谈兵事，在与好友对饮时，曾拍案大呼："不封侯，不罢休！"30岁时，毛文龙听说辽东危急，认为施展身手的时机到了，便只身入京，密走关外边塞，观察山川形势。在京担任兵部主事的沈光祚得知他的兴趣与志向，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好友、辽东巡抚王在晋。天启元年（1621年），王在晋遂将他收入标下，署练兵游击。

当时正值辽沈陷落不久，王在晋与辽东经略熊廷弼在战守方略上发生严重分歧。熊廷弼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坚持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三方布置之策，主张在陆上集中主要兵力固守广

宁，全力制敌，并沿三岔河两岸修筑堡垒，置游兵轮番出入，以迷惑后金军队；海上则在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袭扰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乘虚从辽南打击后金的侧背，动摇其人心，使其有后顾之忧，然后伺机出兵，收复辽沈失地。为确保这个战略计划的施行，熊廷弼还提出，联合朝鲜，使其出兵鸭绿江上，声援和策应明军的行动。同时，要在登、莱增设巡抚，由经略驻守山海关，居中指挥调度广宁、天津、登莱三地的军队，故名曰“三方布置策”。但是，呆头呆脑而又刚愎自用、素不习兵而又好说大话的王化贞，却提出一个沿辽河分设六营、划地而守的主张。熊廷弼表示反对，认为辽河窄而难恃，堡垒小而难容大兵，应该集中兵力固守广宁。如果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假使敌军的轻骑潜渡辽河，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败，则诸营皆溃。辽阳距广宁 360 里，敌骑非一日能到，若有动静，我必预知，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因此，万万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王化贞见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非常忌恨，便授意毛文龙出面搅局，带兵袭取镇江（在今辽东丹东东北）。

天启元年（1621 年）五月，毛文龙奉王化贞之命，率领 192 名兵丁，乘坐 3 艘船，由三岔河南泛沿海诸岛，收降辽东逃民。七月，到达朝鲜的弥串堡，得知为后金镇守镇江的明朝叛将佟养真带兵外出，城守空虚，便派人潜入镇江，密约后金中军陈良策为内应。当时正值登莱巡抚陶朗先派参将王绍勋带领 2000 多名兵丁，驾驶数十条船，到朝鲜接回南逃的辽民。毛文龙诡称这些船只都是自己的，陈良策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二十日夜半，毛文

龙带兵偷袭，陈良策捉拿佟养真，里应外合，一举拿下镇江堡。毛文龙偷袭成功后，附近汤站、险山人民即分别捉拿后金守堡官降于毛文龙，长甸的后金守堡官则主动向毛文龙投降。努尔哈赤闻讯，二十六日即命皇太极、阿敏率兵5000前去镇压。二十七日，毛文龙逃入朝鲜义州躲避。二十九日，后金兵屠镇江堡，俘去12000余人。

王化贞便利用毛文龙的这次偷袭大做文章，自称“发纵奇功”，向朝廷奏捷，要求马上大举进兵。举朝大喜，认为这是若干年来的“空谷之音”，命登、莱和天津发舟师2万，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以策应毛文龙；王化贞从广宁挑选精兵4万，进据辽河，联合西部蒙古，乘机进击；熊廷弼居中节制，统一指挥。但命令下达后，经略、巡抚都互相观望，按兵不动。不久，王化贞又上疏，说后金已弃辽阳不守，辽东失陷将士日夜盼望官军到来，西部蒙古诸部都愿出兵相助，敌军驻守海州（今辽宁海城）者仅止2000，河上也只有辽卒3000，若潜师偷袭，势在必克。投靠魏忠贤的兵部尚书张鹤鸣表示支持，请令催促进兵。原先支持熊廷弼的明熹宗遂改变态度，批准王化贞的奏请，并提升毛文龙为副总兵。熊廷弼随即上疏，指出我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龙发兵偷袭，既打乱三方布置之策，又耽误联络朝鲜之计，目为奇功，乃奇耻耳。但朝中大臣皆以袭取镇江为奇捷，仍令驻守辽东的明军执行王化贞的计划。结果，蒙古诸部按兵不动，王化贞也未敢进兵，夺取海州的计划完全落空。事实证明，毛文龙的搅局行动，干扰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加剧经、抚的矛盾。正是辽东经、巡的不和，埋下了日后广宁失守

的祸根。

镇江之役后，毛文龙逃至朝鲜义州，多次遭到后金军队的袭击，又逃至宣川林畔。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加毛文龙为平辽总兵，设镇于皮岛，铸给关防，希望他继续抗击后金。朝鲜怕毛文龙在陆上生事，引起后金的入侵，劝毛文龙迁入海岛。当年十一月，毛文龙便率众入据距朝鲜铁山80里的海中皮岛，并分兵占领附近的几个小岛。皮岛位于鸭绿江之东，也称“东江”，又名“椴岛”，属朝鲜平壤府三和县。岛上荒芜无人，多蛇虎，东西15里，南北10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呈三足鼎立之势。它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之中，号称“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文龙在岛上率部披荆斩棘，制造器械，招集流民，通行商贾。过往的南货缯帛，北货貂参，都得向毛文龙挂号纳税，方可放行。毛文龙还与朝鲜、暹罗、日本进行贸易，每月可收入白银10万两。经过几年的经营，遂称雄镇。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与部将计议，认为辽东要地当数金州（今辽东大连金州区），它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镇，西通广宁，东向则可图复辽东失地。如果拿下此城，陆路可扼后金骑兵，水路可往登州运粮、停泊。于是，毛文龙命部将率兵，于七月初袭取金州。闰十月，听说后金调集兵马，将渡河来袭，毛文龙又调兵3万，率各将领攻牛毛寨、乌鸡等处，命张盘守金州，自还皮岛。尔后，他以此向朝廷告捷。朝廷遂提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认可他设镇皮岛。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有在海上牵制后金的作用。兵部

大臣就说:“文龙灭奴（指努尔哈赤）则不足，牵制则有余。”有的甚至说:“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昏庸的明熹宗直呼毛文龙为“毛帅”，在谕旨中多次称赞他说:“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西顾，惟尔是赖。”派太监王敏政、胡良辅赴朝鲜册封国王李倧时，还特地命他们转赴皮岛，赏赐毛文龙银两、蟒衣。毛文龙正是凭借朝廷的倚赖，一面广招辽东逃民，数年之间约达二三十万。他令富者皆为毛姓，如若其弟与子孙。凡海岛官民，赏罚升降，生杀予夺，皆听从他的处置；另一面则派人入京贿买权贵，勾结阉党，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毛文龙便以此为资本，谎报自己有兵 20 余万，向朝廷索要军饷，每年 120 万两。他坐镇皮岛，仅有几次对后金的骚扰活动，且大多失败而归，但却夸大其辞，虚报战功，向朝廷邀赏。由于阉党势力的日益膨胀，由此引起的党争也日益激烈，人们都无暇顾及僻处东北海中的毛文龙，只得听任其据地自雄。

明思宗继位后，毛文龙为了试探这位年轻的新天子对自己的态度，于天启七年（1627 年）九月上奏朝廷，诉说他“七年苦楚，百战勤劳，有不平者五事”，要求派人替代其职位。刚就位的明思宗不了解毛文龙的情况，只能下诏予以慰留。与此同时，毛文龙又加紧与后金的议和活动。早在努尔哈赤之时，后金就多次派人以“中分土地”并优待毛文龙在辽的族属为条件，招降毛文龙。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续对他进行招降。但当时毛文龙并未下决心投降，谈判无果而终。新天子继位，毛文龙感到前途未卜，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又主动派人找皇太极进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基本达成

“彼此罢兵，共享太平”的协议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默契。不料，当后金的谈判代表科廓、马通事于崇祯元年（1628 年）五月来到皮岛时，被明朝户部官员黄中色察觉。毛文龙为了掩盖通款的真相，杀掉马通事，而将科廓解送北京，降金的通款活动暂告中止。十月，毛文龙与皇太极又恢复谈判，但由于双方各怀鬼胎，互相猜疑，毛文龙最终没有向后金投降。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早在出任辽东巡抚之时，他即曾在天启六年（1626 年）奏请撤销东江镇；次年，东江遭受皇太极的袭击，他又持观望的态度，不曾出兵救援。毛文龙对袁崇焕也心怀怨望。当袁崇焕代表朝廷与后金议和，皇太极乘机东征朝鲜，致使袁崇焕受到弹劾之时，他就是其中一名积极的弹劾者。此次袁崇焕受命督师辽东，已对皇上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皇上也已授予他便宜行事之大权，并按照他的请求撤销了可能对督师权力产生掣肘的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他当然是不容再有一个不服调遣的渠帅存在，决计要除掉这个自命不凡、不服节制的毛文龙。在离京前夕，当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问及复辽的方略时，他回答当先从东江做起。钱龙锡不解，问道：“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且毛帅未必可得力。”他答道：“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并说，入其军，斩其帅，这是古人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必要时，我也不会落人之后。

袁崇焕出关督师后，首先采取措施，力图从经济上控制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 年）三月，他上疏朝廷，请求重申海禁，规定登州不许有一船出海，所有运往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长门运至

宁远外海的觉华岛，经旅顺口转运到皮岛；先前由天津运送的粮饷，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并须经督师衙门挂号，方可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运输渠道，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毛文龙即于四月间上疏申诉，说袁督师封锁登州海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船畏法不来，诸将都说“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明思宗未予理睬。毛文龙再上一疏，申诉他对朝廷的耿耿忠心，说他恢复辽东的志向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实在是文臣误臣，而非臣误国。他似乎已预感到不久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又把矛头直指袁崇焕，说：“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愤，操戈矛于同室！”明思宗继位后，曾两次派人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崇祯元年四五月间，户部官员黄中色核定的数额为3.6万名，十一月登莱道王廷试更裁定为2.8万名，这给明思宗留下深刻的印象，觉得此人说话并不靠谱，必须警惕。况且此时明思宗更为关切是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他也已授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大权，因此对毛文龙的这个奏疏并未太在意，只是淡淡地回复说：“岛兵裁定，照额发饷，近已有旨。督师欲面咨筹略，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

袁崇焕从毛文龙的这一连串动作中看出他不会轻易就范，决定用计除之。当毛文龙再次派人向袁崇焕索饷，袁崇焕佯装不明底细，在大庭广众下高声大发议论，说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的难处，稍有不合，就想办法刁难人家，成何体统。既然缺饷，何不详细呈报上来。于是，他从运来的粮饷中拨出10船交给来人带回，并亲笔写一封慰问信，连同一笔犒赏银两、猪羊酒面等，随船捎给毛文

龙，以麻痹毛文龙。毛文龙不明所以，还特地前往宁远，对袁督师表示感谢。袁崇焕见毛文龙没起疑心，就和他约定在双岛再次会晤，捎带检阅东江的官兵。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按照事先的约定，从宁远启程，乘船经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蝦蟆岛，于二十九日到达双岛。毛文龙也从皮岛赶来，翌日前往督师船上拜谒，献上币帛酒肴等礼品。不久，袁崇焕又到毛文龙的营帐回拜。临别时，袁崇焕表示他在船上不便设宴招待，想在岸边设帐举宴，与诸将官共同欢饮一番。毛文龙当即点头应允。

六月初三日，袁崇焕登上双岛，毛文龙率东江将官列队欢迎。进入营帐后，毛文龙屏退侍卫，与袁崇焕密谈至深夜三更。第二天，毛文龙设宴招待袁崇焕，又与之密谈到深夜。袁崇焕要毛文龙告老还乡，毛文龙回答说，我久有此心，不过只有待我了解辽东的军情形势和灭奴的诀窍，灭了后金，乘势攻占朝鲜，方可成行。大有此地舍我其谁之概。袁崇焕还曾通过随从提出改革营制，设置监司，以监军纪和操练。毛文龙同意改革营制，但反对设置监司。袁崇焕又提出要检阅骑射，并犒赏官兵，向毛文龙索要官兵的花名册。毛文龙不肯亮出家底，只说本人所带的亲丁，连同双岛上官兵共计3500多人，明日集合领赏，并阅视骑射。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的山上设置营帐，令参将谢尚政率领甲士埋伏在营帐之外。毛文龙到来，所有随从士卒都被挡在外面，只许毛文龙只身进入营帐。袁崇焕对他说，我明天一早就得动身返回，无法同你告别。你一人担负国家海外守御的重任，请受我一

拜。互相拜毕，袁崇焕随即与毛文龙登山阅视将士的骑射，并给将士发放犒赏。犒赏完毕，袁崇焕逐个询问将官的姓名，120名将官都说姓毛。毛文龙解释说，他们都是敝户的子孙。袁崇焕话中有话地笑道，你们哪里都姓毛，是事不由己啊！这样的好汉，个个都可用。我宁远前线的将官薪俸高，士兵的粮饷多，尚且感到吃不饱，你们在海外辛劳，每名只领到一斛米，一家几口人都吃这份口粮，如此困乏，实在令人感到酸楚痛惜，请受本部院一拜！只要你们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没有粮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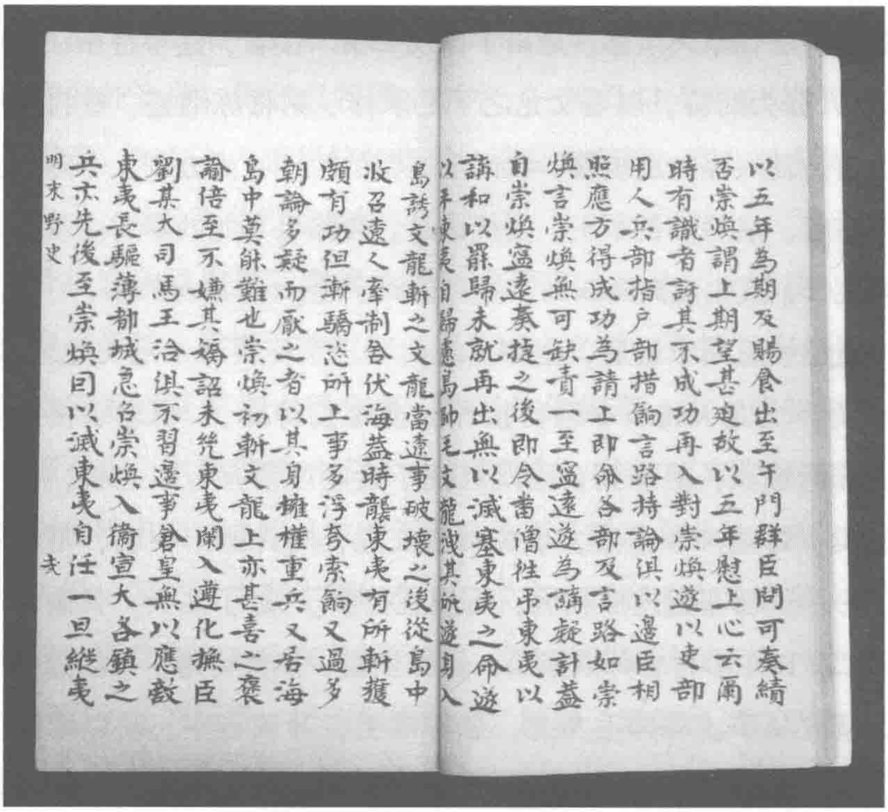
待将官谢恩完毕，袁崇焕便转身责问毛文龙，本部院节制四镇，申严海禁，实恐天津、登、莱受腹心之患。今请设东江饷司，钱粮由宁远运送东江也很方便。昨天与你相商，你非要解银自往登、莱召买。本部院提出移镇、改革营制，分旅顺东西约束核饷，并已向朝廷申奏，将军又执意不允，这不是欺君是什么？现今皇上英明天纵，国法岂能容你胡作非为！说完，不容毛文龙分辩，便西向叩首，请皇命夺去毛文龙的冠带。旁边的随从早有准备，立即动手夺下毛文龙的冠带，把他捆绑起来。接着，袁崇焕当众历数毛文龙专制一方、冒功欺君、潜通岛夷、观望养寇、无汗马之劳等十二大罪。毛文龙丧魂失魄，一时语塞，只是一味叩头，乞求免于一死。袁崇焕问东江诸将官，毛文龙如此罪恶，你等以为该不该杀？诸将在夏日的暴晒下直冒冷汗，大惊失色，连连点头说该杀。有个别将官称说毛文龙数年辛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袁崇焕驳斥说，毛文龙原本不过是一介布衣，如今官至极品，满门封荫，尽足酬劳，他却如此悖逆！然后朝西叩头请旨，说："臣今诛文龙以肃军。

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说罢，取出尚方剑交给旗牌官，立即将毛文龙斩于帐前，并大声告谕东江将士：“诛止文龙，余无罪。”

第二天，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祭奠礼，拜曰，昨天杀你，是执行朝廷大法；今天祭你，是出于僚友私情。接着，宣布将东江士卒2.8万人分为四协，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统领；收回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剑，令陈继盛代为掌管。然后犒赏军士，安抚诸岛，废除毛文龙的暴虐之政。六月初九日，袁崇焕离开双岛，登舟返回宁远。

袁崇焕返回宁远后，立即上疏向明思宗奏报诛杀毛文龙之事，疏末说：“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明思宗接到奏报，殊为惊骇，但想到自己既已授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便又批复说：“卿能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布置遵照敕谕，听便宜行事。”过了几天，又谕示兵部曰：“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便宜从事。岛帅毛文龙，悬军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登州，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形。崇焕目击应机，躬亲正法，据奏责十二罪，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无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谕，乃着安心任事。”

不过，就袁崇焕来说，诛杀毛文龙无疑是办了一件错事。毛文龙坐镇东江，8年之间尽管对后金仅有为数不多的骚扰活动，没有



以五年為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群臣問可奏績
否崇煥謂上期望甚廹故以五年慰上心云爾
時有識者訝其不成功再入對崇煥遂以吏部
用人兵部指户部措餉言路持論俱以邊臣相
照應方得成功為請上即命各部及言路如崇
煥言崇煥無可缺責一至寧遠遂為講疑計蓋
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即令番僧往弔東夷以
講和以罪歸未就再出與以滅塞東夷之命遂
以平東夷自歸慮島帥毛文龍洩其所遂身入
島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
收召遼人牽制各伏海蓋時襲東夷有所斬獲
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
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身擁權重兵又居海
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亦甚喜之褒
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東夷闌入遵化撫臣
劉某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
東夷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之
兵亦先後至崇煥曰以滅東夷自任一旦縱夷
明末野史　卅

《幸存录·毛文龙被斩》



毛文龙墓碑亭

多少胜绩，而且索饷过多，令人不快，并有与后金通款的行为，但只要他没有真正投降后金，后金的西进就不能不有所顾忌，这对后金就是一种牵制力量。毛文龙一死，东江无主，各支队伍互相攻杀，对后金便失去牵制作用。后来，四协并成两协。不久，两协首领刘兴治据皮岛叛，杀东协首领陈继盛，后来自己又为参将沈世魁所杀。参将孔有德、耿仲明走依登莱巡抚孙元化，后与总兵黄龙发生矛盾，叛投后金。广鹿副将尚可喜与沈世魁之子沈志祥等，也皆先后投降后金。与宁远互为犄角的东江抗金基地，最终丧失。

第三节　己巳之变与袁崇焕被冤杀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为后金南下攻明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皇太极在宁远、宁锦之战失利后，意识到后金的八旗铁骑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城，面对明军“倚仗（西洋）火炮，死守城池”的战法，后金军队只能败衄而归。于是决计避关外、扰关内，绕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古，从明军防御薄弱的蓟门一线入关，深入明朝腹地，逐步削弱明朝军事实力，再伺机与之决战。皇太极说:“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为此，他一面加紧对漠南蒙古的征战与招抚，一面又与袁崇焕重开和议谈判，为其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争取时间。

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和谈，始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时。当时他任辽东巡抚之职，议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修复宁远之战中遭受破坏的

宁锦防线。皇太极为了实施其“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的战略计划，也需要争取时间用兵朝鲜，因此同意展开和谈。但由于双方议和的条件相差悬殊，在皇太极征服朝鲜之后，谈判即告终止。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调整对明作战的方略，又主动向明朝展开和平攻势。他多次派人向辽东抚镇表达和谈的意愿，但遭到明思宗的坚决拒绝。袁崇焕复出督辽，需要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以便进一步巩固宁锦防线，并镇抚蒙古，加强蓟门一线的防御力量。因此，他继续执行“和为旁着”之策，未经朝廷批准，便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遣使携书随同后金来使抵达沈阳，与皇太极展开和议谈判。双方使臣几次往返，皇太极要求以三岔河、大凌河为界划分两国边界，袁崇焕要求后金退出辽东、归还辽人。双方达成和议的根本条件差距太大，谈判只能无果而终。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联合敖汉、奈曼、内喀尔喀、喀喇沁、科尔沁等部攻打察哈尔，大败林丹汗。脚踩两只船的喀喇沁部在遇到大饥荒时向袁崇焕请粟，但因畏惧林丹汗，担心明朝自顾不暇，又深结皇太极以自保。崇祯二年中，喀喇沁部彻底倒向后金，并将从明朝那里低价买来的粮食提供给后金军队食用。皇太极认为绕道内蒙古南下攻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三个多月，皇太极即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亲率后金八旗兵与蒙古兵约10万之众，在喀喇沁部首领束不的的导引之下，避开宁远、锦州防线，绕道辽西，分

兵向蓟门一带前进。孙承宗、袁崇焕往年重视对漠南蒙古的抚赏，却忽略了对蓟门一线的防御。袁崇焕复出督辽后，虽曾上书明思宗说："惟蓟门凌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又建议："蓟门单薄，宜宿重兵。"明思宗也曾令："蓟镇各口择将添防。"但此时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烽火已在陕北点燃，明廷很难再调集大量兵力来加强蓟门的防御。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后金和蒙古骑兵很快就从喜峰口西边的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西北）、龙井关（在今河北迁西北）、马兰峪（在大安口西南）突破长城，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有效阻击，就合兵直逼遵化城下，离城 5 里扎营。这一年为农历的己巳年，故称此事为"己巳之变"。

遵化城距北京不过两三百里，后金铁骑不日即可直逼京师。十一月初一日，京师宣布戒严，形势极为严峻。袁崇焕在当日即自宁远启程返回山海关。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一线，属蓟辽总理刘策防区，关内兵力空虚，守御疏虞，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但袁崇焕考虑到自己督师蓟辽，顺天府在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保卫京师亦是自己无可推卸的职责，便急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兵前往遵化驰援。他还赶到榛子岭调动兵马，命保定巡抚解经传驰赴救援。赵率教原是蓟镇总兵，是一员悍将，又熟悉蓟镇一带形势，接到命令后火速起兵，三昼夜即赶到蓟州镇的驻地三屯营。但驻守三屯营的总兵朱国彦不让他的部队入内，于是他又策马西向。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抵达遵化城下，同后金、蒙古骑兵展开激战，身中流矢而亡，全军皆没。次日，后金与蒙古骑兵攻占了遵化县城。

袁崇焕见京师危急，未经请示朝廷，即率祖大寿、何可刚入卫，于十一月初十日抵达蓟州。明思宗闻讯，极为高兴，温旨慰勉，发帑金犒赏将士，令其尽统诸道援军。袁崇焕遵旨，立即部署诸路兵马：以原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营（在今河北迁安东北）；参将邹忠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敌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扼敌；保定总兵刘策还守密云。自己亲率大军，居中策应。明思宗接到奏报，对袁崇焕的部署表示赞许："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惟卿便宜。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

此次后金兵绕道内蒙古闯关南下，兵部的反应十分迟钝。遵化失陷后3天，兵部尚书王洽才上报。明思宗大为震怒，下令将王洽下狱。后瘐死狱中，复坐以大辟之刑。十一月初十日，刚入阁办事的大学士成基命等力请起用原内阁辅臣孙承宗。明思宗下诏命孙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理兵马钱粮，筹划通州防务，并先入京陛见。孙承宗，字稚绳，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授编修，后调入詹事府任职，寻受齐、楚、浙党的排挤而告假还乡。明熹宗继位后，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讲。翌年，受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二年（1622年）自请督师辽东，遂以原官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后受魏忠贤的排挤而告病还乡。此次接到明思宗的任命，他即于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匆匆赶到京城。明思宗在平台召见，与之商议京师防

御之策。孙承宗对皇上说，臣闻袁崇焕驻守蓟州、满桂驻守顺义、侯世禄驻守三河，这是妥当的决策。但又听说已令尤世威回守昌平，侯世禄驻守通州，将防线收缩到京师外围，这似乎过于消极，并不合适。明思宗见他主张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反对退守昌平、通州一线，问到，你主张守三河，有何用意？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孙承宗回答说，守住三河可以挫败敌军向西进犯通州逼近京师，也可防敌南下，包抄京师的南翼。明思宗又问，你打算怎样为朕保卫京师？孙承宗请求皇上为守城的士兵补充装备，厚加犒赏，以稳固人心。接着，又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措施。明思宗表示赞许，并改变对他的任命，让他留京负责京城内外的防御事务，并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但是，仅过一天，明思宗听说后金、蒙古军逼近通州，又于次日半夜改变主意，传旨命孙承宗驻守通州。

就在明思宗召见孙承宗的当天，袁崇焕经侦察发现，皇太极已越过蓟州，直扑京师，使他在蓟州阻挡敌军的谋划落了空，急忙率马步军 2 万追蹑。皇太极连下京师东面的屏障玉田、香河、顺义等县。袁崇焕决定疾驰京师，于十六日晨抵达运河重镇河西务。副总兵周文郁提醒他，外镇之兵，未奉明旨即入京城，恐生嫌疑，认为“大兵宜向贼，不宜先入都”，况且敌军在通州，我军屯张湾，就食于河西务，如果敌弱就战，敌强则守。当时社会上曾有袁崇焕与后金勾结的流言，朝廷下达了不许袁崇焕越过蓟门一步的命令，但袁崇焕还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只是担心皇太极不与明军交战而直扑京城。京城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庚戌之变”后未曾遭到敌军的攻击，一旦遇袭，民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他抱着“君父

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的一片忠心，不顾劝阻，于十六日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京师左安门外。但由于京师戒严，他未能及时入城，直到深夜，才驰奏后金、蒙古兵逼至城下的消息。消息一传开，舆论哗然，京城人竟称是袁崇焕召敌入犯，生性多疑的明思宗为之心动。皇太极在通州之北 20 里扎营，派 200 名骑兵至京师试探，闻炮声而退。至十九日，后金八旗与蒙古骑兵气势汹汹地杀向京城。其时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俱戍守德胜门，侯世禄胆怯避战，满桂孤军拼杀，不少士兵又被城上发炮误伤，终于抵挡不住。满桂率残兵退入城内，自己也负了伤，被士兵抬进关帝庙内暂歇。驻屯广渠门外的袁崇焕，率祖大寿诸将以品字形队列迎敌。袁崇焕肋中数箭，仍身先士卒，奋勇拼杀。士卒也勇猛异常，久战不退。孙承宗从通州遣还救援京师的尤岱率 3000 骑兵赶到，与袁崇焕、祖大寿两路夹击，殊死搏杀。双方血战六七个时辰，后金八旗与蒙古兵力渐不支，开始退却。明军乘胜追击，直至运河边上。敌军仓皇渡河，溺死无数。皇太极仰天长叹："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于是只好放弃攻城，下令撤军于南海子（在今北京永定门外 20 里处）。

战事稍歇，明思宗缓过气来，下达了一个措辞严厉的诏书，强调要申明法典，雪耻除凶，号召省镇文武官吏率领精锐勤王，入卫京师。

皇太极见攻城不能克，野战又受挫，决定用反间计来除掉屡次战胜自己的强硬对手袁崇焕。当时后金军队俘获两个明朝太监杨春和王成德，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看

守。皇太极退至南海子后，就密嘱高、鲍两人，故意坐到两个太监旁边，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乃上（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巡抚为督师之误）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春躺在旁边闭眼装睡，悉记在心。随后，他被放回。愚蠢的杨春竟像《三国演义》中的蒋干那样，听信高鸿中、鲍承先的谣言，一回到宫中立即密报明思宗。

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的明思宗，本来对袁崇焕就存有疑心。当初，袁崇焕不经请示斩杀毛文龙，他虽然表示“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但心中并不愉快。这次袁崇焕未经朝廷允准，又径自率兵来到京城，更加深了他的疑虑。而己巳之变的发生，又使京畿地区遍遭后金、蒙古铁骑的蹂躏，不仅城外许多戚畹、中贵的园亭庄舍横遭劫掠，而且不少黎民百姓也惨遭杀害，家破人亡。他们并不了解辽事的种种艰难，反而认为这是袁督师有意通敌和无力防御的恶果。一些戚畹、中贵纷纷向明思宗告黑状，哭诉袁督师的“罪行”。杨太监的密报，正好印证了这些戚畹、中贵的哭诉。一个惩处袁崇焕的计谋已在悄然酝酿之中。不过，面对强敌兵临城下的危局，为了稳定军心，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于二十三日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和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之臣，并对袁崇焕深加慰劳，还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给袁崇焕披上。但是，当袁崇焕提出由于连日征战，士马疲惫，请求入城休整时，明思宗却断然拒绝。

袁崇焕对明思宗的戒备、猜忌之心，浑然不觉。二十七日，他派出500精骑，潜至南海子附近，偕各地赶来的勤王之师，用火炮

轰击皇太极军营，皇太极慌忙逃遁。此后几天，京城外围的局势渐趋平静。

京师戒严后，明思宗即于十一月初十日命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过了几天，又派太监冯元升等查核军队兵员和军饷，并命太监吕直携万金及盐、米、酒、羊等物劳军。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劝谏，说："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不知危急败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终不可与共安危。皇上亦以亲内臣之心亲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则太平可致。"明思宗就是不听。

十二月初一日，明思宗又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与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京城九门与皇城的皇极门，并命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都城的卫戍部队京营，从而把京城和皇城的警卫直接控制在听命于自己的宦官手里。接着，下令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黑云龙和祖大寿。他事先派人向袁崇焕传旨，让袁崇焕从速入宫议饷。当时袁崇焕正指挥副总兵官张弘谟等率部跟踪、追击敌军，忙丢下军务赶往宫中。没想到一入宫，明思宗当面就问起诛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伤满桂之事。袁崇焕摸不着头脑，一时答不上来。明思宗便命满桂脱去衣裳显示所受之伤，意思是此为袁崇焕蓄谋而为，随即令锦衣卫将他拿下，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站在一旁的祖大寿大惊失色，战栗失措。大学士成基命顿首请皇上慎重考虑，认为"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其他阁臣也极力劝阻，说"临阵易将，兵家所忌"。明思宗不听，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

第二天，明思宗下旨，将负责修筑城防工事的工部尚书张凤翔

逮捕入狱，营缮司郎中许观吉、都水司郎中周长应、屯田司郎中朱长世各廷杖八十。许、周、朱三人年老体衰，皆毙于杖下。同时，提拔大同总兵满桂为总理，节制勤王入卫的各路军马；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军。

祖大寿率领将士随督师袁崇焕驰援京师以来，虽然几番血战，但竟然不许入城休整。而且，许多市民因受谣言的蛊惑，竟误信是袁督师招致敌军的入犯，并迁怒于袁督师麾下的辽军。城墙上的守御士卒，口口声声称辽将、辽兵为奸细，故意从城墙上扔下砖头，砸伤辽兵。京营的将卒在八旗铁骑之前毫无作为，但却屡屡出城砍死辽军士兵，甚至将辽军的哨探捉进城里，纳银后才放回，否则就作为奸细杀死。这种际遇，本来就使祖大寿心中愤愤难平。如今，见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袁崇焕被捕下狱，他不免要为自己和辖下的辽军担忧。况且，他、袁崇焕都与满桂存在矛盾，如今让他受满桂节制，估计也没有好果子吃。因此，他一离开平台，便与何可纲率领入援的 1.5 万辽军精锐于十二月初四日东行，毁山海关而出，拟撤还宁远。

敌军尚未撤退，一支最具战斗力的劲旅却离京东归，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震动。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奏报明思宗，并说他的属官职方司官员余大成有召还祖大寿的办法，可调他来询问。明思宗急调余大成，问他有何对策。他说:“寿非敢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于是，便命阁部九卿与余大成来到狱中，经反复劝导，让袁崇焕写下规劝祖大寿顾全大局的蜡书。明思宗随即派信使携蜡书往召祖大寿。信使策马追赶，在锦州

以东之地追上祖大寿一行。祖大寿接到袁督师的手书，痛哭流涕，但仍犹豫不决。随军的 80 多岁老母说，你们之所以出关，是因为失去了督师。现在督师未死，尔等何不立功赎罪，然后乞请皇上宽宥袁督师呢？祖大寿于是即日集合辖下的将士 3 万余人，返回山海关。

皇太极得知明思宗中其反间计，逮捕袁崇焕下狱，除去他的一个心腹大患，喜出望外，遂集中兵力攻掠畿南一带。他先挥师攻克良乡，知县党还醇等战死。又分兵下固安，再转攻卢沟桥，副总兵申甫、监军金声以刚招募的 7000 新兵应战，被抄了后路，全部被歼。后金、蒙古军乘胜抵达永定门外。明思宗急忙下令设文武经略，以梁廷栋与满桂充任，各赐尚方剑，分别驻屯西直门与安定门。此时满桂正屯驻宣武门瓮城之内，称敌强援寡，未可轻战，但明思宗派宦官催促出战。满桂不得已挥泪而出，于十七日以 5000 人在安定门外同敌军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满桂箭创骤发，坠马而亡，副将孙祖寿与参将周旗等战死，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满桂战死后，明思宗命原山海总兵马世龙代为武经略。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城，皇太极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于是遣使送信给明思宗，要求议和，然后率部东向，一路掳掠，返回沈阳。

明思宗当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没有将他置于死地的意思，而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当时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死上疏，为袁崇焕鸣冤，明思宗批示说："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

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拟擢用。”听到祖大寿重返关内，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的消息，脑中又闪现重新起用袁崇焕的念头，说：“守辽非蛮子不可。”袁崇焕是广西人，“蛮子”是明思宗对他的昵称，表明他对袁崇焕还是想再度擢用的。但是，阉党余孽却借机掀起一股攻击东林党、为钦定逆案翻案的浊浪，从而将袁崇焕逼上了死路。

明思宗钦定的逆案，并未将阉党一网打尽。漏网的阉党分子看到袁崇焕虽非东林党人，但其座主是现任内阁首辅东林党人韩炉，其擢用与建功又与东林党人特别是孙承宗关系密切，于是便将袁崇焕案牵扯到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首辅韩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钦定逆案的主要负责人身上，力图把他们攻倒，再为逆案翻案。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十六日，阉党余孽、江西道御史高捷，首先捏造事实诬“指（袁崇焕）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钱龙锡上疏抗辩，说明自己与袁崇焕的交往过程，提请罢黜。明思宗下旨慰留。高捷再上书攻击，明思宗为之心动。钱龙锡再辩之后，引疾辞归。明思宗随即命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寻又命何如宠、钱象坤并为内阁辅臣。崇祯三年正月，由输赀而进的中书舍人加尚宝卿衔的原抱奇，继高捷攻击钱龙锡之后，也上疏诬告内阁首辅韩炉“主款误国，招寇欺君”。不久，韩炉连上三疏，致仕归里。二月，左都御史曹于汴，又遭史䇓、高捷等的弹劾而归。三月，继韩炉而任首辅的李标，因觉皇上深疑廷臣结党营私而五次上疏，乞休而去。东林内阁的瓦解，使阉党余孽在朝中的势力迅速扩增，朝廷更为天性机敏、善于揣摩上意的周延儒等人所把持，朝中变得更

加污浊了。

阉党余孽于是加紧对袁崇焕落井下石，力图将他置于死地。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史𫄨又捏造事实诬劾已经辞职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并胡说钱龙锡接受袁崇焕几万两银子的贿赂，存放在姻亲徐本高的家里。明思宗怒不可遏，即给袁崇焕定下"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大罪名，限刑部5日内查明真相，拿出具体的处刑方案。八月十六日，经过所谓文武大臣的商议，明思宗宣布："依律磔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袁崇焕在狱中得知死期已临，仍吟诗表达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耿耿忠心："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但是，误信谣言诬词的京城百姓，却仍然把袁崇焕当成招致后金入侵的罪人，编出民谣唱道："投了（投入牢狱）袁崇焕，达子（指后金、蒙古）跑一半。"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之时，围观的百姓蜂拥而上。刽子手每从袁崇焕身上割下一小块肉，旁边的百姓立即花钱买下，就酒吞咽下去，边咽边骂一声，直到将他身上的肉吃尽，上演了一幕令人发指而又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

清代官修《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思宗冤杀袁崇焕，自毁长城，他的中兴之梦随之破灭，再也难以找到克敌制胜、收复辽东的帅才，明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袁崇焕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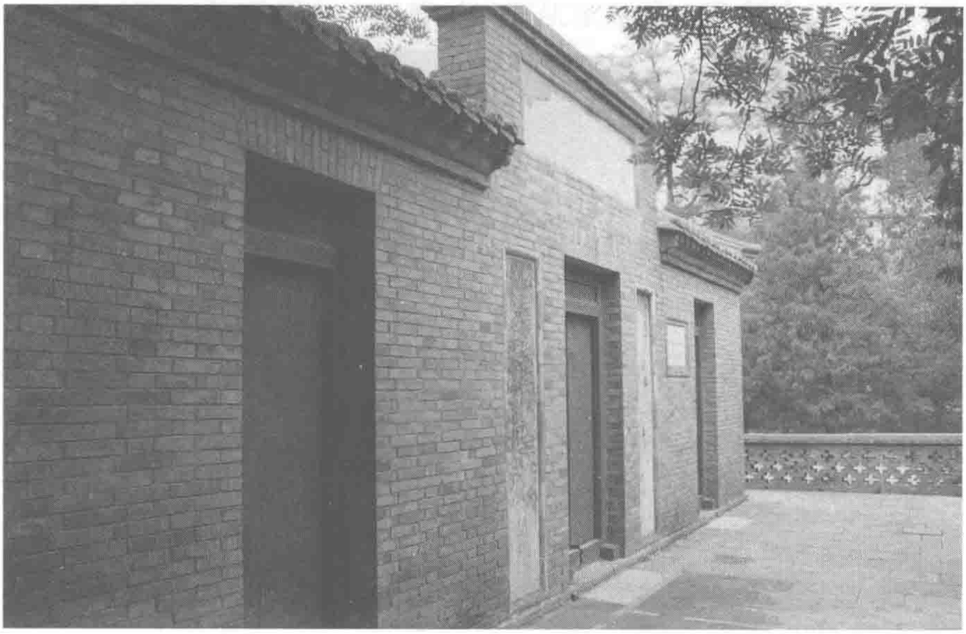
袁崇焕墓碑拓片

第四节　孙承宗再镇关门

明思宗鉴于祖大寿率辽兵离京东返，急忙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五日下诏，令驻守通州的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急赴山海关，一面招抚东返的辽军，一面重新收拾山海关内外的防务。十二月初七日，孙承宗接到诏令，不及准备，即刻携 400 骑兵和副将茅元仪、游击石柱国、岳维忠等启程，顶风冒雪，昼夜奔驰，经三河、蓟州、玉田、丰润、永平、抚宁，于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山海关。

孙承宗一到山海关，立即出榜安民，稳定社会秩序。当时关内运来的粮饷已经断绝，仓库空空如洗，孙承宗暂向商人借贷，筹措饷银，分发将士，稳定军心，民心也随之安定下来。关城里面严重缺水，他又组织兵民挖掘百眼水井，解决喝水的困难。城中聚集着千余名流民，他出官廪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并组织他们协助巡行街巷，守卫仓局。接着，孙承宗动员兵民，花了不到 1 个月的时间，重新修缮破败的城墙，疏浚淤塞的壕沟。关城过去是东面迎敌，现今后金军队入犯京师后东返，又面临着西面迎敌的问题。孙承宗又下令在城墙上的西侧另筑一道护墙，架设平射大炮和西洋大炮，并在关城以西的正面设置步兵一营，两翼再各设步兵一营，另设骑兵一营协同作战，以遏西来之敌。山海关东西两侧的防御力量，因此大大加强。

孙承宗坐镇山海关之后，仍然时刻关注着后金、蒙古军的动



袁督师庙原址



袁督师庙额

向。皇太极自京师的南畿撤退之后，京畿与山海关之间，兵戈四起，烽烟遍地。孙承宗一抵达山海关，即令山海关总兵朱梅、道臣王楫及宁前道孙元化，再从所部选派步骑兵 1.5 万名，由接踵到关的马世龙统领，西行援助京师，并派选 200 名哨探，往来于京师与山海关之间，沟通消息。接着，又派从东江前来投奔的刘兴祚以及郑一亨、靳国臣、石柱国率所部 4000 人驰援山海关西面的重关永平，令黄惟正率部驰援抚宁。刘兴祚所部先胜后败，刘兴祚战死，其弟刘兴贤被俘。崇祯三年（1630 年）正月初四日，永平落入后金之手，但黄惟正部多次击退后金的进攻，使皇太极难以从正面染指山海关。

就在永平失陷的当天，辽东总兵祖大寿率马步官兵 3 万余人，从关外返回山海关。当初祖大寿率领辽军离京东返，路过通州附近的张湾时，孙承宗即派游击石柱国给他送去一封亲笔信，建议他率兵收复遵化，以实际行动来“赎袁督师之罪”，并表示自己将奏明皇上，请予免罪授奖，但石柱国追了 300 多里，没能追上祖大寿。孙承宗又上奏明思宗，说明祖大寿是因袁崇焕下狱而生危疑，希望皇上“大开生路，曲收众心”。明思宗阅后准奏，令祖大寿图功自效。两天后，孙承宗又上书建议派马世龙前去追谕，“缘辽将大半多世龙旧部曲”。明思宗于是命孙承宗前往山海关招谕祖大寿，说：“夫关宁兵将，乃朕遏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又卿旧日部曲，卿可作速遣官宣布朕意，仍一面星驰抵关，便宜安楫。”孙承宗抵达山海关后，溃逃的辽军将士纷纷归顺，但祖大寿仍犹豫不决。住在关外的妻子左氏派人对他说，现在兵溃，你为何不以死来谢孙大人，还

厚着面皮回来？我要关闭城门，架设大炮轰你，然后自杀以谢罪。这对祖大寿下决心返回山海关，起了重要的作用。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初四日，他终于率部返回了山海关。孙承宗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辽军的回归，然后在督师府衙署接见祖大寿、何可纲、张弘谟三位将领，绝口不提溃退之事，而是坦诚地勉励诸将杀敌立功，以报天恩。祖大寿当即报告，说他自己已将家财全部捐出，用为军需。孙承宗再三表示嘉奖。

皇太极正为是否攻打山海关而犹豫不决之时，听说祖大寿回归山海关，即于正月十八日派出三个剃发汉人手持书有“讲和”二字的黄旗，携其亲笔信，前往祖大寿军营“议和”。祖大寿立即上报孙承宗，孙承宗当众宣布：“听大将军处分！”又私下密嘱祖大寿在军前烧毁皇太极的书信和“讲和”黄旗，以激励辽军的斗志。祖大寿一一照办，并斩杀来使，表明自己与后金誓不两立的决心。与此同时，孙承宗又命茅元仪、周文郁带龙武三协水师，登舟急赴皮岛，挥师金、复（在今辽宁复县西北）、海、盖（今辽宁盖县），直捣后金老巢沈阳，并张贴文告，声称将调东江、天津、登、莱之兵，连同龙武营，合共10万人，兵分两路，一从东江攻取辽阳，一路从旅顺进入海州。调东江之师捣敌老巢的计划虽因种种变故未能付诸实施，但皇太极闻讯也不能不为其老巢担心，遂于二月底从迁安东北的冷口遁出长城。

皇太极虽然率主力遁出了长城，但在关内还留下部分兵力驻守遵化、永平、滦州（今河北滦县）、迁安四城，以为来日再度攻明的前哨基地。孙承宗于是又肩负起收复关内四城的重任。

收复关内四城的战斗，是从建昌营打响的。此前，有些将领主张先攻打山海关西边的重要关隘永平，但孙承宗力主先打建昌营。建昌营是永平东北方向一处重要的长城关隘，是山海关至马兰峪长城的中间连接点。攻取建昌，从横向看，可使明军的长城沿线边堡连接起来；从纵向看，可以斩断后金南北的联系通道。经过一番部署，祖大寿率领明军于二月初七日抵达建昌城下。城里不愿向后金投降的守军起而响应，擒获投降后金的建昌营中军白衍庆，打开营门迎入明军。建昌营收复了。

随后，孙承宗又遣辽军500骑，协助三屯营总兵杨肇基，在遵化北面大败后金兵，挺进遵化城下。这时的明军分为两路，东路为孙承宗的祖大寿部，驻扎在山海关及抚宁、昌黎、乐亭等地；西路为受孙承宗之命驻屯于丰润、玉田一带的马世龙部。朝廷新任命的蓟辽总兵张凤翼，亦在马世龙军中。张凤翼、马世龙主张先攻遵化，然后关门打狗，全歼敌军。他们派人向孙承宗征求意见，孙承宗未表赞同。孙承宗认为，关内的后金军虽仅据有四座孤城，只有两万人马，但他们乘屡胜之余威，士气高昂，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并且，永、滦、遵、迁四城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粮械充足，易守难攻。我军虽有东西两路，但东路军经长途跋涉，多次苦战，已呈疲惫之态，而且还要东顾关门的安危，难以全力投入战斗。西路军多系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而且粮草拮据，器械不足，要仰面攻城，没有必胜的把握。万一攻打遵化之战失利，由于边境的道路崎岖难行，粮械接济不上，口内、口外敌军南北合击，我军腹背受敌，处境就非常艰难被动了。此时孙承宗已命何可纲、

张弘谟等发兵攻占开平（指今唐山东北之开平，非元上都开平）。这样，东南一线的沿海重镇抚宁、昌黎、乐亭和开平就都为明军所掌控，便于从海路向前线的军队运送粮饷和装备。因此，孙承宗主张先攻滦州，再图永平，由东南向西北压迫敌军，同时留出董口（在今山海关北）和大安口一条通道，迫使敌军从那里向北逃遁，免得他们坚守死战。二月二十六日，孙承宗将他的战略构想写信告知西路明军的总督张凤翼及总兵马世龙，同时上奏朝廷。明思宗大喜，对他的构想深表赞同，要他“居中提缀，一应进止，悉听便宜”。

经过一番准备，孙承宗率东路明军于五月初四日举行誓师仪式后，经昌黎、乐亭，向滦州挺进。西路明军赶来会合。明军包围了东、西、南三面，故意留出北门为敌军逃遁之口，并在其必经之路埋下伏兵。战斗从五月初十日打响，经过几次攻城，守城的后金军队经不起明军矢炮的攻击，于十三日北逃，又遭遇明军的伏击，仅有数十人遁入永平。此战明军毙敌1600名，缴获战马1200匹。

就在攻克永平的同一天，奉命包围迁安的朱梅也在城中内应的配合之下，一举收复了迁安。到十四日，何可纲所率的一支明军进抵永平城下。守敌见大势已去，也弃城北遁。在永平战役打响的当日，谢尚政率领的一支明军亦抵达遵化城下。十六日，明军攻城，守备向葵首先登城，30余名士兵一拥而上，守敌遂开北门逃遁。孙承宗闻知永平、遵化守敌北逃，急令祖大寿分兵一部，出关于锦州西南之虹螺山进行追杀阻截，杀伤无数。

从五月初四日誓师起，历经近半个月的战斗，明军收复了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和20多个边堡，斩获敌军首级3200余

颗，杀死固山、牛录数十名，缴获马骡、器械、弓刀无数，史称“遵永大捷”。

五月十八日，孙承宗从永平返回关门，开始筹划重建蓟辽防务。为了防止敌军杀回马枪，卷土重来，孙承宗首先着重抓紧敌情的侦察和炮兵的操练。由于战火的破坏，原来传递敌情的烽火台俱已残破不堪，一时难以修复。于是，他命令所辖诸军的各级将领注意侦察敌情，并及时送达督师官署。同时严令诸军练习炮术，以坚城大炮守住关内外的战略要塞。他要求诸将必须率先熟练掌握大炮的操作技术，教给下属各级武官，然后再训练士兵。他还不时抽查、考核各级将官的炮术，合格者有奖，不合格者限三日后再考。如仍不合格，就地免职。为了惩处给皇太极引路的喀喇沁首领束不的和随同后金入犯京师的蒙古部落，孙承宗还命令诸将率部从长城诸隘出击蒙古。蒙古诸部不得不向北远遁，近边 300 里内再也不见穹庐的踪影了。

正当孙承宗着力恢复和重建蓟辽防务之时，却发生了新进的辽东巡抚丘嘉禾在锦州被后金围困之事。丘嘉禾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中举，不知兵却又好谈兵，崇祯元年（1628 年）被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三年，又被兵部尚书梁廷栋派往马世龙军中充当监纪，至当年六月被破格擢任右佥都御史兼辽东巡抚。他踌躇满志，提出在旅顺开镇的计划，因遭孙承宗的反对而放弃，遂于当年八月轻率地率军北上锦州，准备攻取广宁。皇太极闻讯，迅速调集两万精兵，将锦州紧紧包围起来。孙承宗既担心皇太极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偷袭山海关，或再捣蓟州，又不能不顾丘嘉禾的安危而见

死不救。他再三斟酌，命驻守山海关之宋伟、驻守宁远之何可纲及驻守前屯（今辽宁绥中西南）之张弘谟等部，坚守阵地，坚壁清野，警惕敌军来袭；同时，各拨出部分骑兵，由何可纲率领，东援锦州。后金八旗兵看到明援军到来，遂于九月初撤围他去。

当年年底，年迈有病的孙承宗连上十一疏，乞请辞职还乡。明思宗见朝中无人可代任其职，不予批准，他只能以老病之躯，勉力支撑。崇祯四年（1631 年）正月初八日，他出关东巡，历前屯，经宁远，直抵松山（在今辽宁凌海市南）、锦州，于二十日返回山海关。二月初九日再次出关西巡，从三道关（在今山海关北）、一片石（今河北抚宁东北九门口），历石门寨（在一片石西南）、燕河营（在今河北抚宁西北），遍访三协十二路大小城堡，而后由石塘路经平谷，过盘山（在今北京平谷与天津蓟县交界处），入蓟州而还，于三月初九日回到山海关。经过两次出关巡视，孙承宗向朝廷呈上一份 2600 字的长篇奏疏，陈述其重建辽军、收复失地的封疆计策，并向朝廷推荐曾在平定安邦彦叛乱中显露才华的太仆寺少卿傅宗龙作为蓟辽总督的人选，期望由他来接替自己肩负起这一重任。

孙承宗的封疆计策，包括复城一项。孙承宗在前次督师时，曾在右屯（在今辽宁锦县东南）、大凌河（今辽宁锦县）两城设兵驻守。后来，高第出任辽东经略，尽撤戍守的兵士、器械，右屯、大凌河因而破败倾圮。右屯是当时明辽西防线的最前哨，为锦州门户。它距海仅有 20 多里，便于运送粮草，进可攻，退可守，并可通过大小凌河两个城堡与锦州保持联络。孙承宗认为，明军欲收复辽东，必须先收复右屯城；而如果收复右屯，敌军必然来攻。为

此，必须修筑大小凌河（在今辽宁锦州东）两城，以连接松山、杏山和锦州。但丘嘉禾在锦州解围之后，图建奇功，又于崇祯四年（1631 年）初动起出兵收复广宁、义州（今辽宁义县）、右屯三城的念头。兵部尚书梁廷栋就此事征询孙承宗的意见。他再次表示，以现有兵力难以守住广宁；广宁距海 180 里，粮草运输也极不方便。如要收复失地，不如先复右屯，并筑大小凌河两城。梁廷栋将这个意见上奏朝廷，明思宗批准先复右屯的建议，命调祖大寿率辽军主力出关作战。三月，祖大寿率部移驻大凌河。同月，丘嘉禾也来到大凌河。梁廷栋随后令总兵秦翼明领兵 1 万出关护修，发班军 1.4 万人出关修筑大凌河城。修筑工程开工后，丘嘉禾又嫌大凌河城小，擅作主张，在修筑大凌河的同时修筑右屯卫，但因工料不足，使工期一再拖延。到了五月，梁廷栋在与吏部尚书王永光的倾轧中，先扳倒了王永光，后又被王永光之党所劾倒而罢官闲住，由南京刑部的熊明遇接替其职务。熊明遇根本不懂军事，也不了解辽东的战局，上疏反对修筑大凌河。明思宗下旨，修筑屯、凌之事，应着“枢辅会同该抚再行商酌”。恰在这时，丘嘉禾因与祖大寿闹起矛盾，忽然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支持新任兵部尚书熊明遇的主张，下令停止了已修筑大半的工程。修城的辽东官兵义愤异常，祖大寿立即上书向朝廷告状。孙承宗从维护巡抚的尊严出发，扣下了祖大寿的奏疏，但仍暗中将奏疏的内容透露给内阁大学士。五月，丘嘉禾被改调南京太仆寺卿，以霸州兵备孙谷代之。孙谷怕死不肯赴任，朝廷改命山东兵备谢连代之。谢连也胆小如鼠，迟迟不肯赴任，于是又改命兵部右侍郎刘宇烈为辽东巡抚。此事一拖再

拖，孙承宗只得独力支撑修筑大凌河之责。七月十六日，他亲至工地视察，见到只要再花二十几天工夫即可完工，便上书请求复工。不料，到八月初二日，兵部却下达明思宗的诏旨：“凌、屯工程可缓，即着速撤军，赴蓟修筑城垣。”孙承宗只好令丘嘉禾、祖大寿及设防辽军、修筑班军从速撤离。仅差几天的大凌河修筑工程，终于告寝。

就在修筑大凌河工程告寝之际，皇太极却亲率八旗大军，分兵两路，于八月初六日进抵大凌河城下。皇太极吸取攻打宁、锦失败的教训，改取围城打援的战法，掘壕树栅，将大凌河四面包围起来，另遣一军携西洋大炮驻营锦州大道，以阻截明朝的援军。祖大寿、何可纲率城中守军出战，皆被击退。孙承宗为解大凌河之围，派宋伟等率部驰往锦州，又调东江守将黄龙，发舟师攻略镇江、盖州，以为声援。八月十九日，他亲至中右所，拟赴宁、锦指挥作战，但明思宗却下旨让他“兼顾内外”，他只好返回关门。九月十一日，孙承宗又接到明思宗要他携尚方剑，同巡关御史王道直亲赴宁、锦，督励诸将援剿的命令，于是又出关抵达宁远。他先命关门副将靳国臣率3200精骑疾趋松山，接着又命锦州之丘嘉禾率宋伟、吴襄长驱至大凌河。九月二十日，孙承宗与王道直抵达锦州。孙承宗将宋伟、吴襄军各分为两营，合共四营，命永平道张春监军，向东开拔。随后在小凌河与后金军打了两仗，移住于大凌河城东南的长山。后金八旗兵冲杀过来，明军殊死拼杀，炮声不绝，终因寡不敌众而败衄。张春受伤被俘，绝食而死。

大凌河城被围两个月，粮尽饷绝，夫役商贾多被饿死，士卒宰



清太宗皇太极盔甲



清太宗皇太极马鞍

马充饥，城内居民甚至炊骨爨骸以食。皇太极多次写信向祖大寿劝降，均遭拒绝。到十月中旬，城内粮绝薪尽，何可纲不愿投降，自杀殉国。祖大寿于二十八日献城投降。他以“妻子在锦州”为由，“请归设计诱守者降”，皇太极放他返回锦州。十一月初九日，皇太极下令拆毁大凌河城，率部携带缴获的3500门火炮等返回沈阳。

大凌河失守后，朝廷诸臣纷纷上疏弹劾孙承宗与丘禾嘉。孙承宗见明思宗猜忌多疑，而把持朝政的周延儒、温体仁辈又不能认真辅政，连上十几道奏疏请求致仕归家。十一月得到批准，于是驰驿回籍。袁崇焕被冤杀，孙承宗又被罢归里，关外明军从此一蹶不振，对后金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了。



清太宗皇太极腰刀

第五章
温体仁的得宠与垮台

第一节 会推阁臣事件与党争的复起

明思宗在继大统之前，对万历中期以来的党争多少已有耳闻，深知这种门户之争对朝政的深刻影响。他就帝位后，崇祯元年（1628 年）正月，御史罗元宾又上疏指出，国家之所以不得其理，无实心任事之臣，是门户之争在作祟。当今之世，不仅应革除借门户以锢异党之弊，也宜革除借门户以报同党之端。明思宗表示嘉纳。同月，他在一道谕旨中明确表示,“分门别户，已非治征”，要求群臣“化异为同”,“天下为公”，精诚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兴之治。崇祯二年三月，“钦定逆案”颁布后 10 天，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弹劾蓟镇巡抚王应豸克饷激变。明思宗见疏中有王应豸系“魏党私人”等语，非常反感，批评说:“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私!”

明末的党争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民谏诤，说:“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又说:“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当时有不少耿介正直之士，遵照明太祖的谕旨，曾对他的某些错误决策提出谏诤，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性命。此后，直言谏诤便成为明代士子的一种传统。每当有昏庸的皇帝在位，就常有正直的大臣敢于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要求革新朝政，

改弦更张。酒色财气俱全的明神宗亲政不久，就懒于上朝而勤于搜刮，把朝政搞得一团糟，臣僚更是纷起谏诤，并逐步发展成激烈的党争。以东林党人为一方的清流派，与以宣、昆、齐、楚、浙诸党为另一方的浊流派，围绕一系列政治事件展开长期的争斗。前者多为敢言直谏的正直之士，他们为国家社稷的安危，要求重振清明之治，体恤民瘼；后者多为阿顺明神宗旨意的邪恶之徒，他们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处处看明神宗及其宠信的阁臣与宦官的眼色行事，以谋一己之私利。但东林党人过分依赖皇帝，热衷于宫廷斗争，结果导致愿望的落空而陷于失败。后来，得到东林党人支持的明光宗继位，擢用东林党人入阁，为天启初年的“众正盈朝”创造了条件。但天启朝的明熹宗却是一位昏庸的君主，继位不久，宦官势力迅速膨胀，齐、楚、浙诸党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集团，东林党人随即遭受严重的迫害和打击。明思宗继位之后，虽然铲除阉党，钦定逆案，并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并未将阉党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势必要求继续清除阉党余孽，而阉党余孽又力图翻阉党之案，双方的斗争必将继续下去，这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

明思宗没有看到党争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不能抓住其症结正确地加以引导和解决，反而由于自己的猜忌多疑、刚愎自用、不辨是非，亲自介入党争，支持所谓“孤立”无援，也即所谓无党无派的奸佞之徒，从而导致党争的复炽。

明思宗刚继位时，为了稳住魏忠贤，对其安插的内阁辅臣未加触动，继续留任。随着清除阉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多名与阉党有染

的辅臣陆续致仕，到崇祯元年（1628 年）十月，内阁只剩下周道登、李标、钱龙锡 3 名辅臣。天启四年（1624 年）被排挤出阁的韩爌虽已下诏召回，但尚未到任。明思宗决定乘机改组内阁，命吏部提出会推增补辅臣的候选人名单。消息一传出，各派势力立即四处活动，力求进入会推名单，得到皇上的点用。

觊觎辅臣之职、活动最为积极的首推周延儒。周延儒，字玉绳，常州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会试与殿试皆名列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年间，先后掌管过司经局、南京翰林院。明思宗即位后，擢礼部右侍郎。他生性警敏，善于窥度皇上的旨意。崇祯元年（1628 年）冬，锦州守军因欠饷发动兵变，督师袁崇焕请求发放军饷。明思宗问众大臣如何处理，诸臣知道国库已无银可支，但皇家私库内府有钱，一致请求皇上从私库拨出银两支付军饷。周延儒深知明思宗是个吝啬的小气鬼，便说关门以往只防御外敌，现今还要防备内部的叛军。宁远哗变，发给军饷，锦州哗变，再发军饷，各个边镇就会群起效仿，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明思宗又问，那怎么办。他答道，事情紧迫，饷不得不发，但终究还得寻求一种经久之策。明思宗点头称是，并降旨切责群臣。过了几天，又单独召见周延儒，询问有何经久之策。周延儒答道，饷莫如粟，山海关并不缺粟，缺的是银子，为何发生哗变，其中必有隐情，安知不是骄弁挑唆、煽动以胁迫袁督师乎？必须揪出幕后挑唆、煽动哗变的骄弁，加以严惩，才能彻底平息事端。明思宗觉得他的眼光高于群臣，开始对他另眼看待。他也扬扬自得，眼睛紧盯着内阁辅臣的位置，不仅极力巴结外戚如郑贵妃的侄子郑养

性、明神宗的妹婿万炜和东厂头目唐文征以为内援，而且花费 8 万两银子买通内廷，排挤东林党人。他认为，自己既已被皇上看中，又有郑、万、唐的内援以及内廷的支持，被列入会推名单肯定是十拿九稳。

另一个谋求辅臣职位的人物是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博学，工辞章。29 岁点中探花后，即结交叶向高以及孙承宗、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道周、文震孟等东林名流，往来密切。后来，东林名士纷纷遭到阉党迫害而致死，他也遭到阉党的攻击而罢归，俨然成为江南东林的首领。崇祯元年（1628 年）起复故官，不过几月升至礼部右侍郎。以他的资望与才学，被列入阁臣的会推名单，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但钱谦益的同乡及门生、户科给事中瞿式耜看到明思宗高看周延儒，担心他若与自己的老师同列会推名单，可能被皇上看中，对自己的老师不利，于是便极力阻止周延儒进入会推名单。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永光是由于瞿式耜的推荐，于五月间由礼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的，但因与阉党有染正杜门乞休，势在必去。御史梁子璠上疏，请求用吏部侍郎张凤翔代为主持枚卜（即会推之事）。瞿式耜上疏反对，主张仍由王永光主持此事，待事毕再听其离职。这个请求得到批准，他又私下叮嘱王永光，将周延儒摒弃在名单之外，而将钱谦益列为名单的第二位。

十一月初三日，吏部遵照明思宗的命令提出了一份 11 人的名单，依次排列是：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郑以

伟，尚书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礼部右侍郎罗喻义，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

这份会推名单一宣布，立即引起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和礼部尚书温体仁的强烈不满。周延儒暗中散布流言蜚语，称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明思宗阅视名单，见其中没有他高看的周延儒名字，也听信周延儒的流言，怀疑廷臣结党营私。温体仁见状，遂上疏公开挑起党争。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举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任礼部尚书。他为人外表曲谨，而内里猛鸷，机深刺骨。此次会推阁臣，他身为礼部尚书，也志在必得。但因资望不高，加以其座师沈一贯于万历年间担任辅臣13年，首辅4年，政声不佳，因而未能被列入会推名单。他知道明思宗忌恨臣下结党，又听信周延儒说此番枚卜皆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的流言，决定在“结党”二字上大做文章，彻底扳倒钱谦益。于是，便在十一月初五日递上《直发盖世神奸疏》，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

所谓“关节受贿”，指的是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主持浙江乡试时发生的事件。当时，金保元和徐时敏两个奸人假冒钱谦益的名义，策划了一场科场舞弊案。他们采用科场屡见的舞弊手段预捏字眼，假称关节，卖给应试的士子，约以中举后取偿。有个叫钱千秋的读书人，花了2000两银子买到“一朝平步上青云”的七字关节。他将这七个字置于应试文章每个段落的末尾，考官据此判断此考生已买了关节，便予录取。发榜时，钱千秋

果然中试而成举人。钱谦益被蒙在鼓里，懵然不察，但金保元和徐时敏却因分赃不匀，将此事抖了出来。浙党的韩敬，当初与钱谦益同时参加殿试，因为巴结宫中的大太监，得了头名状元，钱谦益只中第三名探花。后来钱谦益在三年京察时，便借故将韩敏革职，从此两人结下深仇。他听到钱谦益关节受贿的消息，立即派人到北京大肆宣扬，并联络礼科给事中顾其仁查阅试卷，寻找证据，具疏弹劾。恰好钱千秋已到北京参加会试，钱谦益一问果然属实，只好上疏检举金、徐与钱千秋的舞弊行为。刑部审讯结案，将金、徐、钱三人皆发遣烟瘴地面充军。后来金、徐俱瘐死狱中，钱千秋发往东胜右卫充军。钱谦益与本房试官郑履祥确不知情，以“失于觉察”罚俸三个月。

温体仁的奏疏，之所以将7年前早已查明真相并做出判决的所谓“关节受贿”案重新提出，旨在证明钱谦益是“神奸结党，欺君罔上”，没有被提名为辅臣候选人的资格；现在由他把持枚卜，必然是想让谁做官就让谁做官，想推举谁就推举谁，以此来激怒明思宗。明思宗既已听信周延儒关于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的谗言，看过温体仁的奏疏更进一步加深了对钱谦益的怀疑，第二天便召对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大臣、翰林院记注官、科道掌印官、锦衣卫堂上官等，让温体仁与钱谦益当面对质。

对质在文华殿进行。明思宗先问温体仁，爱卿参奏钱谦益受钱千秋贿，结党欺君之罪，可是实情吗？温体仁答道，字字属实。又问，奏疏中说钱谦益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官，想推举谁就推举谁，

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把持。钱千秋案件不曾结案，钱谦益就不该起用。如今枚卜，就不该推举他这种人。明思宗转而问钱谦益，温体仁参奏爱卿的事，可是真的吗？钱谦益书生气十足，不是理直气壮地说出此事早已结案，自己并未参与其中，只是犯了失察的过错，而是先自我批评一番，说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处非其据，温体仁参臣极当，但钱千秋之事关系到臣的名节，不容不辩。此事刑部早已勘问明白，现有案卷可查。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都证明已经结案，但温体仁仍坚持不曾结案。但明思宗命人到礼部取当年试卷，到刑部取审讯案卷，对质暂时停止。

取来礼部试卷和刑部案卷之后，对质继续进行。明思宗问温体仁，奏疏中所说的"神奸结党"，奸党是谁。温体仁先是答说钱谦益之党甚多，不敢尽言，接着又指责负责主持枚卜的吏部官员和科道官与钱谦益结党，继而又说替钱谦益辩解的辅臣也是钱谦益的同党。章允儒愤怒地反驳说："'党'之一字，从来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这等说。臣犹记得当日魏广微欲逐赵南星、陈于廷诸臣于会推吏部尚书汪应蛟、刑部尚书乔允升缺，使魏忠贤加一'党'字，尽行削夺。大抵小人为公论所不容，将公论之所归者指之为'党'，留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榜样。"明思宗一听，认为这话等于把他这位皇上比作了魏忠贤，喝令锦衣卫把章允儒逐出文华殿。

文华殿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温体仁又火上浇油，指责吏部尚书王永光操控此次枚卜。明思宗问王永光，这次会推推出钱谦益，是公还是不公。王永光回答，吏部是从公会推，至于结党，臣实不

知。参与会推的御史房可壮也说，臣等都是公议。明思宗指斥道，推这等人，还说是公议？他要在场的大臣表态，辅臣李标、钱龙锡说，关节之事与钱谦益无干。温体仁立即奏曰，分明满朝都是谦益一党。臣受四朝知遇，忠愤所激，不容不言。关节是真，若不受贿，如何得中？李标、钱龙锡一听温体仁把他们都说是钱谦益一党，回答说，钱千秋的事前次已经招问明白。不料，正在气头上的明思宗却说："招也闪烁，不可凭据！"一直未曾吭声的周延儒即刻站出来附和，配合温体仁表演一场双簧。他说，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现有招案朱卷，已经御览详明，关节已有的据，不必又问诸臣。明思宗又问众臣，朕着九卿科道会推，便推这样人。就是会议，今后要公；如会议不公，不如不会议。卿等如何不奏？周延儒顺着竿子往上爬，进一步奏曰，大凡会议会推，只是相沿故套，原无许多人，只是一两个把持住了，诸人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祸随。明思宗抬眼望去，问明职名，知是周延儒，点头称赞说："只有这官奏了几句。"温体仁见周延儒受到表扬，也使出以退为进的策略，谦恭地奏道："臣孑身孤立，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臣疏既出，不惟谦益恨臣，凡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叨九列（卿）之末，不忍见上焦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乞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明思宗忙加挽留，既为国劾奸，何必求去！

经过一天的所谓对质，钱谦益关节受贿之事似乎就成为证据确凿的定案。第二天，明思宗传下圣旨："钱谦益既有议论，着回籍听勘！钱千秋法司提问！"并令章允儒、房可壮各具疏认罪，瞿式耜、

梁子璠各具疏回话,"俱着降三级调外用"。

事后，对钱千秋事件重新进行审理，证明所谓钱谦益关节受贿查无实据，他的过错在于失察。廷臣愤愤不平，纷纷上疏抨击挑起事端的温体仁。御史黄宗昌弹劾温体仁热衷于枚卜，欲以"结党"二字破先前公论之不予，且钳后来言路之多口。新任吏科给事中沈惟炳上疏指出，廷臣中有公是公非之异同，不能一概斥之为"党"。四川道御史王相上疏指出，温体仁欲以"党"字堵塞言官之口，预先为日后申救钱谦益者扣上结党的大帽子，那么，不救钱谦益、不攻温体仁者，岂不都成为温体仁之党！江西道御史毛九华还上疏揭发，温体仁居家时曾抑买商人木材。商人告到官府，温体仁向崔呈秀行贿，才免于被追究。阉党分子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生祠，温体仁还写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明思宗看过毛九华的奏疏，要他讲讲具体事实。毛九华再奏，说自己入京途中曾在文安县的书店买到一本温体仁媚珰的诗册。原来，阉党的亲信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祠迎像时，温体仁父子匍匐前驱，赋诗赞颂，诗中有"衮衣""朱雀""宫殿"之类僭拟不伦的字句，并特地刊刻绘图呈送魏忠贤。后来魏忠贤被抄家时，诗册散落于民间。臣抵京又得知温体仁在原籍乌程县，用 500 两银子强买商人价值 3000 两银子的木材。商人向东厂投诉，温体仁向崔呈秀行贿，才免于被追究。接着，贵州道御史任赞化也上疏，揭发温体仁娶娼妓倪瑞为妾，纵容其父倪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被推官毛士龙擒获。温体仁怕牵连自己，又贿赂狱卒，杀掉倪四灭口。

温体仁见言官弹劾他的奏疏如雪片似地纷至沓来，坐立不安。

他急忙向明思宗上疏，说他因为弹劾钱谦益而招致言官的攻击，却无一人站出来替他说话，"臣孤立可见"，以表明自己确实无党。他要求与毛九华当面对质，以澄清事实。此时，明思宗正忙于钦定逆案，无暇顾及。待到钦定逆案的谕旨颁布之后，才于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五府、六部及科道诸大臣，让温体仁与毛九华、任赞化等言官当面对质。

这次对质，明思宗采取袒护被告温体仁的态度，让他首先发言。温体仁鼓动他的如簧之舌，抢先发动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他说，臣若一心媚珰，此诗必以手书为贽，万无木刻之理。既系木刻，必流传广布，岂有九华得之途中，而京师反无别册？……皇上试问九华，此是臣刻的，还是他人刻的？若臣自刻，必无此理……若但以刻木为据，则刻匠遍满都门，以钱谦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明思宗竟认为他说得有理，问毛九华，此册从何处得来。答曰，臣实八月中买自途间。再问，八月中得的，为何至今才发。答，臣十月考选，十一月才到任，不敢造次具疏。又问，你知册页是何人刻的？答曰，温体仁既有诗，有刻的，便有卖的，臣即可买。至于何人所刻，臣何从问之。温体仁抓住这句话，一口咬定，九华唯恐说册页是京师得的，便可查，只说是途中得的，无处可查了。

接着，明思宗转换话题，询问毛九华疏中所说温体仁压价强买商人木材的事。温体仁辩解说，臣未尝买木头。若是强骗商人之木，商人何不告到巡抚、巡按？此事乃无端诬告。毛九华指出，此事没有告到抚按，因为抚按不能代商人申冤，否则他怎会告到魏忠

贤那里？温体仁又辩解道，商人如果告到东厂，容易调查，但这些年清查阉党不遗余力，臣若有此事，怎么两三年之内不见有人告发我呢？明思宗见两人相持不下，让辅臣表态。不久前刚到任的首辅韩爌，对皇上的重新起用心怀感激，便揣摩皇上的心思，替明思宗说出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温体仁平日硁硁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参论枚卜一疏，愤激过当，致犯众怒，所以诸臣攻他。"温体仁听罢，又趁机说了一堆毛九华是钱谦益同党的话。明思宗竟说，温体仁也辩得是，完全肯定了温体仁对毛九华的答辩。

尔后话题转到任赞化奏疏的对质上面。对质之前，明思宗先对辅臣说："言官言事，自有大体（任赞化指责温体仁娶娼为妾）。这是何等话，如何在朕面前亵言渎奏？"实际上给对质定了调子。然后质问任赞化，毛九华参论温体仁一诗，尚且不真，你如何又参他许多无根之言，且亵言在朕前渎奏？任赞化只得认罪，臣一时偶失检点，出言粗率，臣有罪。但他仍坚持疏中揭露温体仁丑行的事实，说臣疏中所论事体，皆臣采访，十分准确，才敢入告。明思宗问温体仁，卿怎么说？温体仁坚决否认娶娼之事，说臣从无此女，我与海宁陈与郊结成儿女姻家，一查便可明白。任赞化说，温体仁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晓得陈与郊的名字？说他娶娼妓为妾，京师万口喧传，臣始知之。温体仁抓住他的破绽，责问道，你先说采访准确，如何又说是传闻？任赞化辩道，闻言入告，臣之职掌。皇上只下九卿科道会勘，如一言不实，臣甘罪。明思宗厉声喝道，朕自有鉴裁，你如何敢渎奏！在明思宗的袒护之下，这场对质又以温体仁的胜利而告终。

傍晚时分，殿内点亮明灯，召对续续进行。明思宗与辅臣谈了北方的边防问题后，又提起今日的对质之事，对首辅韩炉说:“卿见他（指言官）何曾有国家的意思？若实实为国为民，为封疆为生民，朕自看得出来。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才上本。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不忧国，只是分门立户，却说什么党，什么东林，何益国事家情？”明思宗这句话表达了他对言官弹劾温体仁的不满，但他忘了挑起这场争论的恰恰是他所支持的温体仁，而给对手扣上结党大帽子的恰恰也是温体仁！

温体仁与毛九华、任赞化的对质结束后，明思宗下令逮捕钱千秋，命三法司再审。在刑部的重刑之下，钱千秋的供词仍与原先毫无二致。温体仁再次上疏弹劾三法司官员“欺罔”,“狱词尽出钱谦益之手”。参与会审的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以及太仆寺卿蒋允仪、给事中陶崇道及御史吴甡、樊尚璟、刘廷佐等纷纷上疏指出审理钱千秋时，有几千人在场观听，绝不是一只手、一张嘴能够掩盖得了的！但明思宗还是把钱谦益革职闲住，而钱千秋经不起酷刑死在狱中。

第二节　周延儒和温体仁的得宠及互相倾轧

周延儒、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之时，图谋翻逆党之案的阉党余孽嗅出其背后隐约带有攻击东林党人的味道，看见了实现其梦想的希望。为人阴鸷溪刻、不学少文的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此前曾投靠魏忠贤，充当其干儿义子，力攻东林党人，生怕清算逆案时遭到整

肃，便转而投靠温体仁。崇祯二年（1629 年）二月初一日，上疏力诋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与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三人操纵枚卜大典，是“东林盟主，结党乱政”。此疏遭到言官的有力批驳，沈惟炳指出，“东林”一词不过是阉党及附逆诸臣陷害正直大臣的一种名色，至今仍然沿用不变，难道是要为阉党保护晚局不成？许誉卿反驳说，臣如结党乱政，逆珰用事时何不随众求容，而屡讦奸邪，抗疏去国？他在上疏自白之后，愤然辞官而去。不过，薛国观还是因此疏被温体仁看中，暗中向明思宗作了推荐，使之得到超擢而大用。

周延儒、温体仁为人奸佞而又带头打击东林党人，当然不受东林党人的欢迎。他们从薛国观的行动中，看到力图翻案的阉党分子与东林党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便大力拉拢和勾结漏网甚至丽名逆案的阉党分子；阉党分子也从薛国观身上看到希望所在，纷纷投靠周延儒和温体仁。两股势力迅速合流，共同打击东林党人，党争因此愈演愈烈。

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钱龙锡，在崇祯初年定逆案时曾参与主持工作，史书说“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阉党分子对他恨之入骨，周延儒、温体仁决定首先拿他开刀。最先跳出来的是因勾结阉党而革职，后由吏部尚书王永光起用的江西道御史高捷。崇祯二年（1629 年）十月，后金分兵三路入犯。十二月初一日，明思宗误中后金反间计，将蓟辽督师袁崇焕逮捕下狱。十六日，高捷便乘机上疏，先赞扬“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辇下啧啧万口诵圣明英断”，接着由袁崇焕追究到内阁辅臣钱龙锡，诬告他向袁崇

焕“发纵指示”，搞“诡计阴谋”，毛文龙之死系“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刃之谋”，对这种人绝不可“宽斧钺之诛”。此时京师保卫战尚未结束，明思宗未予理会，只是批道:“龙锡忠慎，岂有是事，高捷不得过求。”钱龙锡上疏说明同袁崇焕的交往过程，提请罢黜，明思宗下旨慰留。但高捷仍不放过，再次上疏攻击钱龙锡，明思宗态度有所动摇。钱龙锡在再次上疏申辩的同时，不得已向皇上引疾辞官。

钱龙锡辞官而去，阉党分子仍不罢手，想借此机会继续追击东林党人，以求达到翻案的目的。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漏网的阉党分子、吏部尚书王永光在会推天津巡抚人选时，故意将列入逆案名单的王之臣排在6位候选人的头名，借以试探明思宗的态度，心里盘算着一旦王之臣被点用，就可以大胆地实施翻案计划。明思宗拿到会推名单，犹豫不决，征询周延儒的意见。周延儒感到王永光做得太过性急，也太过露骨，欲速则不达，反而会将事情搞砸，只得对皇上表示，如果王之臣可以起用，那被列名逆案的人都应平反，而崔呈秀、魏忠贤也将昭雪了！明思宗恍然大悟，便命排在会推名单第四位的翟凤翀为天津巡抚。

王永光的试探没有得逞，阉党分子仍不罢休。就在王永光这次试探的前后，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至二月，参与审定逆案的内阁首辅韩炉、左都御史曹于汴都因遭到弹劾而辞官，继为首辅的李标也因皇上深疑臣下结党，于三月间连续上疏乞休而去。王永光以及名列逆案的兵部侍郎吕纯如等人以为有机可乘，又蠢蠢欲动。吕纯如在天启七年（1627年）曾与太监刘兴、赵秉彝护送明神宗第

六子惠王就藩荆州，对随行太监极尽揄扬褒美之能事，回京复命又大拍魏忠贤的马屁，一则曰“厂臣一选良材”，再则曰“厂臣之率属严”。此时，他在王永光的纵容下，公然上疏为自己翻案，说护送惠王的复命疏“未尝归美厂臣，不当列于逆案之内”。言官因慑于王永光的威势，谁都不敢吭气。明思宗的老师、日讲官文震孟挺身而出，向明思宗进言，说现今敌骑刚刚撤退，群小合谋，以王永光等为奥主，必欲借边事以翻逆案。他揭发吕纯如为无耻之徒，惨杀名贤之辈；王永光身为六卿之长，而假窃威福，擅行私意。明思宗要他一一据实奏明。文震孟又逐一奏明吕、王的各种具体劣迹，并揭发吕纯如在家时经常对人讲“冢宰（吏部尚书王永光）不去，此案必翻”,“而永光与一二私人聚族而谋者，日夜以打破逆案、汲引群凶为第一要义”，点明王永光等人阴谋活动的要害是为逆案翻案。但明思宗没能听进去，反而说文震孟是“任意牵诋，殊为多事”。

不过，由于文震孟的进言，吕纯如等人的翻案活动还是未能得逞。王永光、吕纯如、高捷之流转而利用明思宗准备严惩袁崇焕的心理，对袁崇焕落井下石，以兴起大狱，既为逆案中人发泄怨气，又借以牵连钱龙锡。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因勾结阉党而被革职、后由王永光起用的山东道御史史𡐓，上疏诬告已经辞官的钱龙锡是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的主谋，并说他接受过袁崇焕数万两银子的贿赂，存放在姻亲徐本高家里，“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明思宗大为震怒，令有关衙门于5日内查明。锦衣卫掌印官

刘侨就斩帅、议和两件事再次审问袁崇焕，然后呈上审讯报告，说毛文龙之事，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当时只是用书信问过袁崇焕准备如何处理，系袁崇焕专断杀之；与后金议和之事，袁崇焕多次写信向王洽与钱龙锡征求意见，王、钱均未准许。但是，明思宗还是下令处决袁崇焕，谴责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

群小深受鼓舞，御史田惟嘉上疏推荐起用逆案中人杨维垣、贾继春，通政使章光岳也上疏推荐起用逆案中的吕纯如、霍维华、徐杨光、傅櫆、虞廷陛、叶天陛等6人。但逆案名单是明思宗钦定的，他自然不许被轻易否定，果断下旨道:“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荐用，成何政体!”

九月初三日，中军都督府召开会议，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和科道官共60余人参加，专门审议钱龙锡的案件。审议的结论是，袁崇焕杀毛文龙，钱龙锡虽启其端，但他两次致书袁崇焕，其意均不专在杀戮；至于议和，为袁崇焕首倡，钱龙锡不能抗疏发奸，罪责难逃。但他属于《大明律》中规定的享有减刑、免刑特权的“八议”范围，如何处刑，当断之于皇上。明思宗看过审议报告，便剥夺了钱龙锡的八议特权，降旨令锦衣卫逮捕钱龙锡。

明思宗对钱龙锡的态度，大大助长了群小的嚣张气焰。工部主事李逢申、锦衣卫佥书都指使张道浚和工部主事陆澄源接连上疏，弹劾继李标之后出任首辅的东林党人成基命，迫使他连上三疏，辞官归里。张道浚还连带攻击文震孟等人的“诬枉奸欺”之罪。文震

孟上疏答辩，指出“张道浚未谙文义，谬析臣疏，代人报复”，暗指其背后有人操纵。

在这样一派乌烟瘴气的氛围之下，钱龙锡于十二月被从松江华亭的家中逮至京师，下到锦衣卫的诏狱。他在狱中上疏，就杀帅、议和之事进行自辩，并附上袁崇焕以前写给他的原信和他答信的原稿，以作佐证。明思宗阅后，还是一口咬定“其事已有迹”，命他“静听部议”。

丽名逆案的群小再次受到鼓舞。他们暗中策划，觉得既然皇上不让公开翻逆案，那能否由袁崇焕牵连钱龙锡，再由钱龙锡牵连到一大批东林党人，然后诬指袁为逆首、钱为逆党，另立一个逆案，与先前所立的逆案相抵呢？谋划确定后，决定由兵部挑头发难。但兵部尚书梁廷栋担心此计未必能够成功，一旦失败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不敢贸然行事，结果使阴谋胎死腹中。《国榷》说这一谋划“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明通鉴》则说是“温体仁、王永祚（王永光之误）主之”。两书所载谋划的情节大体一致，只是具体主谋略有不同，很可能周延儒、温体仁、王永光三人都是幕后的主谋。

对钱龙锡究竟如何处置，部议的结果是对其实行大辟（也就是死刑），而且决不待时。崇祯四年（1631 年）正月，多次上疏论救的黄道周再次上疏指出，“令阁臣以边事坐诛，后之阁臣必顾盼踌躇”，要皇上在边事孔棘之际，慎重从事。疏中还影射抨击辅臣周延儒、温体仁。明思宗抓住疏中“今巷议谬悠，谓杀累辅为毛文龙报仇”一句话，要他作出解释。黄道周这句话实际上是借街谈巷议之名来影射群小力图借这一起大案来报此前的钦定逆案之仇，但又

不好明说，所以在回话时含糊其辞。明思宗令其务必明白奏闻。他再次上疏，只好回避要害问题，笼统地表示辅臣钱龙锡一旦瘐死狱中，后世不察，就会使圣主背上杀害辅臣之名，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心存古道，故冒昧沥血进谏。明思宗很不高兴，指责他“曲庇罪辅”，把他贬斥为民。不过，经过黄道周的进谏，他还是降旨：“龙锡无逆谋，令长系。”将死刑改为长期关押。

崇祯四年（1631 年）五月，久旱无雨，刑部尚书胡应台、给事中刘斯琜分别上疏请求宽宥钱龙锡。明思宗下旨再审，最后下令释放钱龙锡出狱，谪戍定海卫（今浙江舟山）。他在定海卫戍所待了 12 年，其间遇到两次大赦，都没有得到宽宥；他儿子请求输粟赎罪，也未得到准许。直到明思宗上吊自杀，南明的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右佥都御史祁彪佳向弘光帝申冤，才最终得以无罪恢复原官，回归故里。

钱谦谧案与钱龙锡案的最大得益者是周延儒与温体仁。当初，周延儒以生性警敏、善于窥度皇上意旨而得到明思宗的青睐。在钱谦益案中，他首先带头攻讦钱谦益结党，更是切合明思宗反对臣下结党的心意。因此，钱谦益案结束后，明思宗即于崇祯二年（1629 年）三月的一天午后，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两人密谈至深夜。言官猜测皇上因钱谦益案而暂停会推内阁辅臣，此番单独召见，可能是想让他入阁辅政，便纷纷上疏纠弹周延儒，借以阻遏他的入阁。御史黄宗昌劾其生平秽行，御史李长春论单独召见之非，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揭发周延儒一向与逆案中人冯铨密相勾结，力图入阁以翻逆案。御史刘之凤等人更联名上疏，说

皇上单独召见周延儒的旷举，臣等闻所未闻。臣等共同揣测，周延儒独对之时必作飞鸟依人之状，曰某也党、某也非党，某宜留、某宜去；又必曰举朝无一人不欺皇上，独臣一人捐身家性命以为皇上。明思宗一概不予理睬。到十二月，趁钱龙锡引疾辞职之机，突然下达特旨，拜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崇祯三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扩大自己势力，推荐姻亲吴宗达和温体仁入阁。明思宗认为温体仁孤立无党，朴忠可用，于六月命他与吴宗达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接着，周延儒、温体仁又唆使锦衣卫佥书张道藩、工部主事陆澄源攻讦继李标为首辅的成基命，迫使他在九月间辞官而去。周延儒遂一跃而为内阁首辅，明思宗加他少保衔，改为武英殿大学士。

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明思宗擢用周延儒和温体仁，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挽狂澜于将倒，实现明朝的中兴之治。但是，周延儒与温体仁并不把国家民族和王朝的命运放在心上。在当时众多的社会矛盾中，阶级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正是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导致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最大的威胁。但是就在广大农民已经极端贫困的状况下，崇祯三年（1630 年）九月，兵部尚书梁廷栋因军饷不足，请求再增田赋，说今日民穷之故，唯在宦贪。如果贪风不除，即使不加派，百姓照样愁苦；如果贪风止息，即使再加派，百姓也会欢欣自若。明思宗令下户部议。户部尚书毕自严阿顺梁廷栋之意，认为“今日之策，无逾加赋”，奏请将原来的辽饷在每亩征银 9 厘之

外再征银 3 厘，即加征 165 万余两。作为首辅的周延儒和辅臣温体仁当然明白，百姓的穷困并不仅仅是官吏贪贿一个原因，何况梁廷栋在没有提出解决官贪的有效对策之前，即遽然加派辽饷，必然使本已愁苦的百姓陷于更加愁苦的困境而遭到人民的怨怼和反抗，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但他们都默不作声，不曾表示反对。明思宗竟将他在即位诏中所许诺的要设法解决“民艰”问题的诺言抛之脑后，在当年十二月批准实行辽饷的加征。从崇祯四年起，每年辽饷田赋部分数额达到 667.9 万余两，如果加上辽饷中的杂项、盐课、关税等，辽饷的总数则高达 1029.9 万余两，结果是“海内并咨怨”。

周延儒与温体仁根本不把国家民族和王朝的命运放在心上，整天想的是如何谋取一己的私利。周延儒当上首辅后，大权在握，肆无忌惮。他擢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都同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他的子弟家人横暴乡里，激起强烈的民愤，被乡民放火烧掉房屋，掘掉祖坟；他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当上副千户，连其家的奴仆周文郁也当上副总兵。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温体仁入阁比周延儒晚，资历也比周延儒浅，只能屈居其下。他表面上对周延儒毕恭毕敬，极尽谄媚，暗中却打着取而代之的算盘。为此，他一面对明思宗务为柔佞，以讨皇上之欢心，另一面则加紧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崇祯四年（1631 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罢官后，他即用自己的同乡亲信闵洪学顶替这个空缺，此后凡异己者皆令闵洪学以部议之名论罢，并起用想翻逆案的

御史史堃、高捷，侍郎唐世济及副都御史张捷等，以为心腹。双方的矛盾，很快就发展为公开的争斗。

崇祯四年（1631年）春季的会试，按照惯例，一般应由次辅温体仁主持。周延儒认为这是收揽名儒作为自己门生、扩大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不顾公务繁忙，亲自出面主持会试。结果，将自己的连襟陈于泰列为殿试第一名状元，自己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列为会试第一名会元，名士张溥、夏日瑚等人也同时考中进士。温体仁对周延儒越例以首辅身份担任主考官本来就十分不满，他的党羽薛国观又打探到周延儒在主考时的违规行为。据说周延儒事先嘱咐各个分房考官在呈卷之前，偷看密封的号码，从中舞弊。吴伟业的本房考官李明睿就是受周延儒的指使，把吴伟业的试卷放在最前面，让评卷官员首先看到。薛国观便将这些情节透露出来，闹得舆论一片哗然。御史正准备上疏进行弹劾，老奸巨猾的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卷子呈给明思宗御览。皇上阅后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表示赞赏。既然明思宗作了表态，人们不好再说什么，此事不了了之。

到了闰十一月，周延儒贪污受贿、家人横暴的种种劣迹逐渐暴露，言官纷纷上疏弹劾。陕西道御史余应桂说，登莱巡抚孙元化耗费军饷超过毛文龙几倍，不仅毫无战功，反而发生两次岛兵哗变的事件，但周延儒却百般庇护，这是因为他是周延儒的同乡，每月都给周府送来大批的人参、貂皮和金银。周延儒还收纳“巨盗”神一魁的贿赂。不仅如此，他居家横暴，兄弟占尽江南良田美宅，激起民变。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揭发周延儒，说他收受张廷拱贿赂的白

银 3500 两而授以大同巡抚；接受孙元化贿赂的貂参金珠而对他曲为护持；还收受吴鸣虞贿赂的常州腴田 5000 亩，而将他由户部调至吏部，并力加庇护。到崇祯五年（1632 年）二月，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在登州发动叛乱，俘虏孙元化，舆论更是哗然，人们一致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认为促使孔有德等叛乱的罪魁祸首是周延儒。周延儒一再为自己辩白，甚至假惺惺地请求辞职。明思宗虽然下旨挽留，但对他的宠信已开始动摇。温体仁正暗中组织力量，准备给予致命的一击，周延儒却指使其亲信、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于六月间上疏，攻击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驱除异己，说："我朝罢丞相，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阁臣不得侵焉。今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业以为常。"明思宗见过此疏，觉得华允诚胆子太大，诘问他受何人指使。华允诚再次上疏，说："体仁生平，纱（折）臂涂颜，廉隅扫地。陛下排众议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谐，岂知包藏祸心，阴肆其毒。又有如洪学者，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尽善类，无人敢犯其锋者，臣复受何人指使？"明思宗由是隐约感觉到温体仁和闵洪学两人既为同乡，恐怕不能免除朋党之嫌，于是下令夺华允诚半年俸禄，而让闵洪学回家养病。这等于给两边各打五十大板，想借此止住双方的争斗。

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的争斗并未因此而止息。崇祯六年（1633 年）正月，周延儒的连襟、翰林院修撰陈于泰借疏陈时弊之机，影射攻击温体仁。温体仁则指使宣府监军太监王坤疏劾陈于泰盗窃科名，牵连到周延儒。周延儒上疏乞请辞官，未获批准。二

月，他即指使给事中傅朝佑上疏，说太监不当弹劾首辅，蔑视朝廷，怀疑背后有邪恶奸佞之人指使。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黜，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开万世口实。"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写了一通慷慨激昂的上疏，抨击内臣的越职行为。遣用宦官是明思宗的主意，见到弹劾宦官的奏疏自然大为恼火。他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对王志道说："遣用内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议论之烦也。"王志道回答说："王坤参及辅臣，故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明思宗还是坚持："朕见廷臣于国家大计不之言，因内臣在镇，未便作弊，故借王坤疏挟朝廷，诚奸巧也。且文武各官，朕未尝不用，因其蒙垢，勉用内臣耳。"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赶忙打圆场，说王志道之疏并非专论内臣，实际上是谴责臣等失职。明思宗火气稍减，令王志道退出文华殿。第二天，下令将王志道革职为民，并对周延儒说道："卿昨辩王坤疏，日后录入史书，甚是好看！"

温体仁见扳倒周延儒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于三月间递上一疏，说他的同乡湖广副使张凤翼在崇祯四年（1631年）夏天曾对他提起一件事：有一年内阁收到一个将狱囚提出行刑的奏疏，明思宗已表示同意，但周延儒将原疏封还，皇上又同意停刑。周延儒即令武弁李元功去找狱囚，说停刑是周延儒的功劳，向他们索要酬金。事后，周延儒还扬扬得意地对辅臣李标说："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遂改留，余有回天之力！看来今上是羲皇上人。"所谓"羲皇上人"，是指传说中的伏羲时代的太古之

人，讥讽不识时势、脱离现实之人。把当朝皇上称为羲皇上人，是大不敬之罪。明思宗大为震怒，将李元功逮入诏狱，并穷诘陈赞化疏中揭露周延儒所说的话是从哪里听来的。陈赞化说，得之上林典籍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张凤翼还曾亲自对他复述过。明思宗更是怒不可遏。锦衣卫帅王世盛对李元功严刑拷打，李元功死不认账。明思宗将王世盛连降五级，令其加强审讯。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救，温体仁不仅不予以回应，还暗中将和周延儒关系密切的官员罢黜殆尽。周延儒四面楚歌，被迫于崇祯六年六月引疾乞归。温体仁当即代皇上拟旨准予归里，但明思宗还是给周延儒留了点面子，赐给白金、彩缎，派专掌捧节、奉使的行人护送他回宜兴老家。

周延儒在与温体仁的倾轧中落马，眼看温体仁就要接替他的首辅之职，心有不甘。他知道温体仁人品不行，廷臣都不愿让这种小人当政，便怂恿他们劝皇上重新起用同自己一起入阁、不久致仕的何如宠。何如宠昔日在内阁中的地位高于温体仁，如果重新召回，就将堵死温体仁升任首辅之路。明思宗觉得何如宠操行恬雅，与物无竞，无党无派，是可用之人，果然下诏命何如宠从速进京。何如宠当年在内阁任职仅 1 年半的时间，接到诏令，不禁回忆起当年辞职的情景：崇祯四年（1631 年）春，周延儒越例主持会试，让他充当副手。事后温体仁借机大加攻击，他连上九疏乞休，总算躲过了一劫。回到安庆府桐城老家后，他曾递上一疏，劝皇上不时读读《资治通鉴》，体察古今之治乱，区别臣僚之忠佞，实际上是让皇上提防温体仁这种小人。现今皇上又召他还朝复职，与温体仁一起共

事，自己哪是温体仁的对手？于是赶紧上疏辞谢。但在皇上没有允准之前，他还得启程赴京。途中他走走歇歇，尽量拖延时间，并连续多次上疏引疾推辞，希望能得到皇上的恩准。见到何如宠迟迟未能进京，刑科给事中黄绍杰对明思宗指出："君子小人不并立，如宠瞻顾不前，则体仁宜思自处！"言外之意是，温体仁应该主动辞官。明思宗觉得他过于放肆，把他降调外任。但何如宠坚决不入京，并递上他第六个请辞的奏疏。既然无人肯出任首辅之职，温体仁也就如愿以偿地升任首辅了。

第三节 温体仁的走红与垮台

温体仁如愿以偿地当上内阁首辅之后，照样不把心思放到国家社稷的安危上面。当时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后金的袭扰越来越频繁，百姓困苦不堪，他不曾提出任何有效的对策，整天想的是如何结宠于上，保住权位。

温体仁善于揣测上意，逢迎有术。经过多年的窥探与观察，他深知这个年轻的皇帝，不喜欢听逆耳的忠言，只喜欢听顺耳的谀辞，便使尽一切手段，对其逢迎巴结，讨其欢心。平日，他对明思宗表现得十分谦卑，一再对皇上表示："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有人批评他善窥帝意，他巧辩说，我替皇上起草的谕旨，多写得不到位，要由皇上御笔批改。我佩服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去窥探皇上的旨意呢？明思宗决定要办的事，

他明知不对，也从不表示反对，而且照办不误。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杨嗣昌为了实施围剿农民军的“十面张网”的战略计策，建议在此前每亩加征1分2厘田赋的辽饷之外，再加粮6石，每石折银8钱，共计增赋280万两，称为“剿饷”。这项加派如果实施，势必将本已十分困苦的广大农民逼入水深火热的深渊，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使起义的烈火烧得更旺，无异于饮鸩止渴。但他作为首辅，并未提出异议，最后由明思宗于闰四月下诏付诸施行。因此，温体仁给明思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认为此人既孤立无党，又朴忠可靠。

温体仁目光短浅，没有什么经天纬地的大才干，但为人机敏，有点儿小聪明，又工于心计，操办一些具体的事务显得精明干练。内阁票拟，经常涉及一些刑名、钱粮的事，由于名姓繁多、头绪纷繁，许多辅臣感到头痛，但他却了然于胸，很少出错。同他共事的内阁同僚，如吴宗达、郑以伟、王应熊、张至发、黄士俊、刘宇亮、薛国观等辅臣，又都是碌碌无为的庸才，更衬托出他的“鹤立鸡群”，从而更加得到皇上的欣赏。为了提防政敌的攻击，温体仁在当时贪风盛炽的官场，从不公开收受贿赂（黄宗羲说温体仁之苞苴，巧于纳者也，周延儒不巧于纳者也。观其身后之富，岂不纳苞苴者所致乎），又给人留下廉洁自持的印象。此外，温体仁虽忮刻专横，却又藏机极深。他想推举某个亲信，往往暗中指使他人率先举荐，自己再使力以助其成；想排陷某个政敌，又先行宽贷，以激上怒，再严行惩治。手法隐蔽巧妙，不露痕迹，从而又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因此，在明思宗的眼里，温体仁是既孤立

无党、朴忠可靠而又精明干练、廉洁自持、公正无私，自然对他另眼高看，宠信有加了。

温体仁之所以能扳倒周延儒、爬上首辅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漏网的及名列逆案的阉党分子的助力。为了酬谢阉党分子，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当上首辅后，就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推翻钦定的逆案。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十一日，温体仁用计挤掉与己不和的吏部尚书李长庚，由他的亲信、漏网阉党、吏部左侍郎张捷主持部务。都察院左都御史张延登也随李长庚去职，明思宗下令府、部、九卿及科道官推举堪任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人选。温体仁便暗中活动，授意张捷推举名列逆案的吕纯如为吏部尚书。他还暗中嘱咐与之交好的辅臣王应熊，让他暗中支持张捷，并放出风声，说此次会推“阁部同心”，内阁与吏部的意见完全一致。八月二十一日，明思宗在文华殿召对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商议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人选。他先说明召对的用意，吏部尚书乃用人的官，须要天下第一才品。立贤不以其方，卿等举来。接着，勋戚、大臣便退入殿西偏室，文臣退入殿东偏室，各自书写推荐名单。王应熊站在张捷身边，眼睛紧盯着张捷的笔下。旁边的大臣觉得奇怪，便问所荐何人。张捷回答说：“吕纯如！”旁边的大臣纷纷表示反对，他们有的推荐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有的推荐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唐世济是温体仁同乡，张捷当然同意荐用，但吏部尚书他还是按照温体仁的嘱咐坚持推荐吕纯如，说：“总宪（都察院左都御史）世济可，冢宰（吏部尚书）非纯如不可！”

待明思宗要大臣提交推荐名单时，张捷抢先启奏:“臣已推举两人，但这两个人都是举朝都不想用的。”明思宗待大臣推举的名单收齐后，问在场的科道官:“你们为何不推举?”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回答，会推大典，科道官向无保荐的先例。九卿如果推举得当，则由皇上点用；如果推举不当，臣等再站出来纠参。明思宗点头称是，随即拿起张捷的推举名单。仔细一看，不觉皱起眉头，大声斥责道，吕纯如是钦定逆案之中有名字的，张捷为何推举他?张捷辩解道，吕纯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钦案中列其名字，说他“颂美逆贤”，当年大臣递交给魏忠贤的“红本”俱在，并无一字涉及此事，岂可坐以“颂美”之罪?明思宗说，吕纯如自己也曾就此事作过申辩，但绝不能由此开启推翻钦定逆案的先例！接着，他把目光投向科道官，问他们有何看法。卢兆龙奏曰，张捷推举的吕纯如丽名钦定逆案，臣等正准备纠参，皇上已有明谕，臣等不敢再来多嘴了。张捷仍然坚持己见，说吕纯如清直可用，如今弃之草野，实在可惜。御史张三模反驳说，廷推冢宰，关系甚重。吕纯如生平是否贤良，姑且勿论，但他既然名列逆案，声名狼藉，出任此职，何以服人?况且逆案早有定论，吕纯如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张捷继续声辩，引来众多科道官的一片反对，他们纷纷揭发吕纯如往日的劣迹秽行。明思宗命张捷退下，随即问温体仁有何意见。温体仁见举朝反对起用吕纯如，转而推荐谢陞为吏部尚书、唐世济为左都御史。

温体仁想借推举吕纯如再次试探明思宗的态度，试图为推翻钦定逆案打开一个缺口，不想却碰了一个大钉子。但他仍不死心，后

来又指使新任左都御史唐世济举荐逆案中人霍维华，因遭群臣的反对，唐世济被迫辞职。此后，温体仁不敢再起用逆案中人，但亦因此更加仇视不肯附和自己的廷臣。

温体仁是万历末年与东林党对立的浙党首领沈一贯的门人，受其座师的影响，从骨子里仇视东林党，在钱谦益、钱龙锡案中力攻东林党人。当上首辅后，更是利用职权极力打击东林党及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廷臣。日讲官姚希孟是东林党人文震孟的外甥、韩炉的门生，素为东林党人所推重。韩炉主定逆案，参考了他的不少意见。华允诚疏劾温体仁，温体仁怀疑是受姚希孟指使。他借口姚希孟与谕德姚明恭在崇祯三年（1630年）主持顺天乡试时发生两名武生冒籍中试的事件，将已迁任詹事的姚希孟连降二秩，调往南京掌翰林院事。东林党人罗喻义当日讲官，进讲《尚书》，撰写《布昭圣武讲义》，联系现实，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之语。内阁审读讲义，温体仁不悦，命正字官转告罗喻义进行修改。罗喻义来到内阁，隔着屏风讥讽温体仁。温体仁向明思宗告状，说按照制度，只有经筵讲官的规劝言论多于经书正文的讲解，日讲则是讲解正文多于规言。罗喻义的做法是用了经筵之制，且让他改正，反而遭到他的侮辱，请皇上裁定。明思宗令下吏部议。罗喻义反驳说，讲官在正文之外旁及时事也是传统的制度，臣辗转敷陈是希望对时政有所补益。温体仁叫删去，臣恐愚忠不获上达，致忤辅臣，今草稿俱在，望皇上省览明察。温体仁还是指使吏部将罗喻义革职闲住。

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明思宗为开创新局面，趁温体仁因

遭言官的弹劾、称病休假的机会，召集数十名廷臣，进行代皇上起草谕旨的票拟考试，试图从中选拔新的辅臣。詹事府少詹事文震孟因屡次受到温体仁的讽刺、压制而闷闷不乐，称病在家，没有赴试。不料，过了几天，明思宗却作出决定，未参加考试的文震孟和参加考试的张至发升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与温体仁等协同办事。

文震孟，字文起，苏州府吴县人，是“吴门四才子”文徵明的曾孙，以研究儒家经典《春秋》而著称。天启二年（1622 年）获殿试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因上疏弹劾魏忠贤，与编修陈仁锡、庶吉士郑鄤并斥为民。崇祯元年（1628 年）重新起用，先后出任侍讲学士、左中允、左谕德、右庶子、少詹事，充当日讲官。崇祯三年春，漏网阉党之流乘机报复东林党人，他上疏纠劾，揭露群小合谋推翻逆案的企图。明思宗说他“任情牵诋”，但群小合谋翻案的阴谋亦由是受阻，从而引起温体仁的不满。

文震孟性情耿直，一身正气，给明思宗讲课时常联系时政，进行规劝。当时许多大臣被逮系狱中，文震孟进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就反复规讽，明思宗即降旨将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释放出狱。原先在日讲、经筵中，没有《春秋》的课程。明思宗认为《春秋》一书有益于人们了解国家的治乱安危，让内阁推荐讲官讲解。温体仁知道文震孟是研究《春秋》的名家，却推说没有合适的讲官，不予推荐。还是次辅钱士升作了推荐，才让文震孟进讲《春秋》。文震孟一开讲，明思宗就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文震孟请病假，他都不批准，生怕耽误《春秋》的讲解。温体仁看到这一

幕，心里酸溜溜的，妒恨之心油然而生。当时文孟震虽已擢任少詹事，官居四品，但按照规定还不能在紫禁城里骑马，因年迈体衰，托人向温体仁求情，请将他的官秩改为三品，以便能骑马出入紫禁城。温体仁却指着内阁的首辅座位，板着面孔挖苦他说，不久你就可以坐上这把交椅了，何必改三品呢？

正在家中养病的温体仁，听说明思宗亲自点用文震孟，担心会对自己不利，慌忙声称病已痊愈，回到内阁主持政务。刚开始，他表面上对文震孟客客气气、恭敬有加，每次拟旨都找文震孟商量，文震孟提出意见也都一一照改。文震孟不无高兴地说，温公虚怀若谷，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奸猾。和他共事的大学士何吾驺提醒说，此人城府很深，未可轻信。果然，没过多少时间，温体仁就摆出首辅的架势，不时指责文震孟拟旨不当，要他修改；如果不从，即径自提笔抹去。文震孟很是气愤，有次竟将疏稿摔到他的面前。温体仁虽然表面显得很有风度，没有同他计较，内心却恨死了文震孟，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年十月，他便借许誉卿事件大做文章，终于导致文震孟落职出阁。

许誉卿，字公实，松江府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举进士，天启初年任给事中，曾上疏弹劾魏忠贤，声名大著。崇祯初年，因弹劾漏网阉党吏部尚书王永光仇视东林党人，遭到温体仁亲信薛国观的攻击而愤然辞官。崇祯七年（1634年），被重新起用。翌年二月，凤阳被农民军攻陷，皇陵被焚，他又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及内阁大学士温体仁、王应熊“玩寇速祸”之罪，被明思宗斥为“苛求”。温体仁因此把许誉卿视为眼中钉，就在官职的

升迁上百般加以刁难。许誉卿当给事中已有 14 年之久，其他不少比其资历浅的碌碌无为之辈都已升任京堂官，他想出任南京太常卿之职，以便就近迎养年迈的老母。文震孟和何吾驺都支持他的这个请求。温体仁却授意吏部尚书谢陞上疏指责许誉卿“营求美官”，他再据此奏疏拟旨道：“大干法纪，着降级调用！”他预料明思宗对这种钻营官职的不正之风必然会严加惩处，既然是“大干法纪”，不能仅仅处以降调。果然，明思宗省览后，发回原先的票拟，责令重改。温体仁重拟，改为“削职为民”。文震孟据理力争，何吾驺也壮胆帮言，温体仁就是不予理睬。文震孟愤慨地说，科道官去当老百姓，这是极为光荣的事，谢谢你老先生的玉成！温体仁即将此语密报给明思宗。明思宗当即大怒，一改先前对他的信任态度，斥责他和何吾驺“徇私挠乱”，下旨将何吾驺罢官，将文震孟落职闲住，实际上也是罢官。文震孟从入阁到落职出阁，前后不过 3 个月时间，是崇祯朝在阁时间最短的一位辅臣。

国子祭酒倪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 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明思宗继位后，魏忠贤已经伏诛，阉党遗孽杨维垣上疏，将东林与崔呈秀、魏忠贤一伙并称为邪党，企图把水搅混，破坏对阉党的清查工作。崇祯元年（1628 年）正月，倪元璐挺身而出，首先上疏严加驳斥。寻进侍讲。四月，又上疏请毁《三朝要典》。后累迁至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又上《制实八策》，其中“端政本”一策是对温体仁的规劝，而“伸公议”一策则是批评张捷推荐吕纯如图谋翻逆案之举。温体仁及其亲信因此非常嫉恨倪元璐，但倪元璐雅负时望，也颇得明思宗

的欣赏。有一天，明思宗亲手写了倪元璐的名字交给内阁，叫呈上他的履历。温体仁担心皇上会重用倪元璐，正好勋戚诚意伯刘孔昭想谋求掌控戎政之职，他便以这个职务作诱饵，叫刘孔昭上疏诬告倪元璐。刘孔昭见利忘义，状告倪元璐之妻陈氏尚在，却又将其妾冒充继室向朝廷请求册封，"败礼乱法"。明思宗下诏令吏部查核。吏部尚书姜逢元是倪的同乡，他和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堂兄御史倪元珙都说陈氏因有过失已经离开了倪元璐，王氏是倪元璐明媒正娶的继室，而不是妾，乞请册封完全合礼合法。部议让抚、按核实上奏，但温体仁却拟旨："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将倪元璐落职闲住。

温体仁还想方设法打击正在崛起的复社。复社继承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反对以"私权"定朝政，主张"以国事付公论"，得到官府中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的支持，而遭到同阉党有瓜葛的官员的仇视。复社有些成员如吴伟业、张溥等，是在崇祯四年（1631 年）的会试中考中进士的。这次会试本应由温体仁担任主考官，但却由周延儒所取代，从而成为温、周互相倾轧的一个由头。作为周延儒的门生，张溥、吴伟业等进士及第的复社士子，同情周延儒，而对嫉贤妒能的温体仁持鄙视的态度。崇祯六年春，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请求加入复社，遭到复社领袖张溥的拒绝。恼羞成怒的温育仁，便雇人写了《绿牡丹传奇》，在浙江各地演出，用以影射张溥等复社名士。张溥和另一复社首领张采，亲自跑到杭州，向好友浙江督学副使黎元宽求援。黎元宽下令查禁，并追究作者的责任，但因碍于首辅温体仁的权势，未直接处理温育仁，只将温育仁的奴仆关进

了监狱。温体仁随即进行报复，将黎元宽革职查办。崇祯九年，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篇托名徐怀丹写的檄文，据说是温体仁唆使人写的。檄文攻击复社首领张溥、张采“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犯有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召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等十大罪，给复社施加压力。复社成员纷纷上疏弹劾温体仁。温体仁遂派亲信到苏州一带去做地方官，就近到张溥的家乡太仓搜集整治张溥的材料，并暗中“募人劾溥”。崇祯十年三月，张溥的同乡陆文声因想加入复社而遭拒绝，诣阙上疏，极言“风俗之弊，皆源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立即添油加醋，明思宗便用朱笔写下措辞严厉的谕旨:“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温体仁马上命南直隶提学御史倪元珙查核，但倪元珙回奏说，复社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磋，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陆文声以私怨而妄告诬状，宜究罪处治。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连仲也皆疏称复社无罪。他们三人都遭到温体仁的贬斥。福建人周之夔曾当过苏州推官，后被撤职，他虽加入复社，但怀疑是张溥暗中捣鬼使其落职，听说陆文声弹劾张溥，也伏阙疏称张溥“把持计典”，并诬告复社结为朋党，蔑视圣旨，但经过巡抚张国维等核查，证明周之夔被撤职同张溥毫不相干。温体仁很不满意，代皇上拟旨将张国维斥责了一通。

清代官修的《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传》，说他辅政数年，“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

与善类为仇”,“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他所引用的亲信，都是苟以充位的庸才。在内阁中同他合得来、受他信任的，则只有碌碌无为的吴宗达和刚愎自用的王应熊。吴宗达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入阁充任大学士的,《明史》没有他的专传，而遍阅《明史》的其他各传，只有因其“溺职”而遭言官弹劾的记载，其庸碌无为可想而知。因为是庸才，所以一切皆听命于温体仁。王应熊博学多才，熟知典故，性溪刻强狠，刚愎自用，但善迎帝意，明思宗在崇祯六年十一月特旨命其入阁。当时朝野震惊，给事中章正宸上疏弹劾，指出王应熊“强愎自张，纵横为习，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济贪。今大用，必且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但明思宗不听，将章正宸逮入诏狱论罪，削籍而归。王应熊入阁后，与温体仁狼狈为奸，倾陷忠良。当时北京街头流传了一首民谣，讥讽内阁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乌归”指温体仁，因为他是乌程籍的归安人;“王巴”指王应熊，因为他是四川巴县人;“篾片”指吴宗达，因为他碌碌无为，事无主见，可以像篾片一样任意弯曲，一切都听命于温体仁。由这样一些乌龟、王八和篾片组成的内阁，就如同妓馆一样，毫无操守可言。“瘟”是温体仁的姓的谐音，指瘟神，是说皇上使用以温体仁为首的这些阁臣辅政，就像遭到瘟神一样，总要遭殃的。京城还有一首民谣即唱道：“崇祯皇帝遭瘟了!”

明思宗猜忌多疑，对臣下总是疑神疑鬼，极不信任，唯独对善于迎合帝意的温体仁宠信有加，让他辅政前后8年（实足7年），担任首辅也有4年的时间。温体仁所上的密揭（即秘密奏疏），他

全都批准照办。温体仁的头衔也越升越高，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之优渥无人可比。

温体仁自度受他排挤、打击的正直之士太多，积怨极深，担心将来遭到报应，倡言内阁为机密重地，阁中的议论、决定一概不许外泄，呈给皇帝的密揭一概不许发抄，也不留底稿，免得让人抓住把柄。因此，他如何排挤、打击、中伤、陷害正直之士，许多朝臣都不完全清楚。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崇祯九年（1636年）至十年间，不少大臣纷纷上疏弹劾温体仁。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劾其有“十二罪”“六奸”，却被明思宗罢斥为民。新安卫千户杨光先效法海瑞，带着棺材上疏，参劾温体仁的亲信、贪横无赖之言官陈启新，并及温体仁：“体仁柄国以来，边骑两薄都城，流贼各省延蔓，平治之绩安在？国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恤，扶持之责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无一，诚殆哉一个臣也！”要他自动“引罪以去”。明思宗又怒其“恣臆乱政”，下令施以廷杖，谪戍辽东。

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的庇护，愈发恣肆妄为。他想起当年被他攻倒、革职为民，在家乡闲住了7年的钱谦益，担心其声望颇高，将来可能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必将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决定进一步加以陷害，必欲杀之而后快。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让其亲信、负罪逃到京城避风的常熟巨奸陈履谦想办法。陈履谦找到常熟县衙门书手张汉儒和奸人王藩，对他们说，杀钱谦益以应温相之募，富贵可立至也。于是议决由张汉儒出面告御状。张汉儒发挥

其刀笔吏的伎俩，无中生有，起草了一份弹劾钱谦益及瞿式耜 58 条大罪的奏疏，交给温体仁呈递上去。温体仁随即代皇上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讯。钱谦益在狱中写了两份奏疏自辩，明思宗未予理睬。于是又托自己座师孙承宗之子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援。曹化淳出自早先的司礼监太监王安的门下。王安为人刚正，明神宗死后，他为明光宗的继位立下汗马功劳，后被魏忠贤杀害。钱谦益曾为王安写过墓志铭，曹化淳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得知其冤情后，立即设法营救。温体仁闻讯，又指使陈履谦散发匿名揭帖，称钱谦益出 4 万两银子托周应璧求款于曹化淳，并让王藩出面检举告发。安排妥当后，温体仁以为稳操胜券，便如往常兴起大狱前夕那样，照例称病，乞请休假，住进了刚刚修缮的湖州会馆，以示自己同即将发生的案件毫无瓜葛。

但是，这次温体仁搬起的石头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曹化淳见温体仁亲信诬告自己收受钱谦益 4 万两银子的贿赂，被彻底激怒了，主动向明思宗请缨，由他负责彻查此案。明思宗批准后，他以奉旨清查的名义，派出锦衣卫的缇骑四处缉访，很快查明陈履谦的罪行，把他逮入东厂，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在五更突击审讯。陈履谦招出这次密谋的全部过程，交代所有的情节“俱乌程（温体仁）一手握定”。明思宗看了审讯报告，大吃一惊，感慨地说：“体仁有党！”一气之下，命将陈履谦、张汉儒各打一百棍，立枷而死，并决心除掉温体仁。由温体仁一手提拔上来的辅臣张至发还蒙在鼓里，在温体仁的乞休奏疏上拟好挽留的谕旨，呈给皇帝。明思宗毫不犹豫地拿起朱笔，抹掉张至发的“挽回”语

句，批了“放他去”三个大字。正在湖州会馆吃晚饭的温体仁，听到太监宣读的圣旨，大惊失色，面如死灰。京城百姓闻讯，欢声雷动，连老妪、小孩都额手称庆。

第二年，温体仁在家中病死。不争气的明思宗竟还为之惋惜，赠太傅，谥“文忠”。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温体仁“有党”固然可恨，但其“朴忠”还是值得肯定的吧。

第六章
屡扑不灭的起义烈火

第一节　剿与抚的两难抉择

明思宗即位之初，把主要精力放在清除阉党、改革内政与整饬边防、抵御后金两个方面。他没有认识到，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官绅地主的佃仆。加上国家的赋役征敛过于苛重，更使农民无以为生，只能四处逃亡，或者奋起反抗，从而导致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成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因此，他在陕北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只是把它当做历朝历代都曾发生的一般民变对待，既未采取有力措施来抑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减轻国家的赋税征敛，也未调动大军前往镇压，认为只要地方官员调遣当地驻军进行围剿即可扑灭。

出乎明思宗的意料，陕北农民起义的烈火自天启七年（1627年）点燃之后，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烧越旺。因为，陕西是当时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陕西，特别是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工商业很不发达，而王公、勋戚、官绅、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官府的赋役征派又极苛重。例如，以厉民最甚的赋税加派来说，明政府规定不论土地肥瘦一律按亩均摊，陕西地广土瘠，加派不仅不因土瘠而稍减，反而因地广而增加，人民的负担比其他土地肥沃的省份要重得多。陕西历来又是自然灾害的频发之地，天启、崇祯年间更是灾荒连年。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饥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蓬草吃尽，则剥树皮以食。到

年终树皮又吃净，只得掘山中一种名叫“青石”的石头为食，不几天就腹胀下坠而死。侥幸活了下来的人，只得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几天后大多面目赤肿、体内燥热而亡。许多地方，尸体枕山满谷，臭气熏天。成群结队的饥民，四处流浪，甚至“相聚为盗”。这就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埋下了无数的火种。

陕西又是明朝的边防要地，延绥、宁夏、固原三个边防重镇驻兵多达 17 万人。陕西还是西北驿站的总枢纽，京城通往西北及西南的几条驿道都通过这里，在驿站供役的驿卒数量也比较多。往年，陕西的贫苦农民往往把充当边兵或驿卒作为谋生手段，靠微薄的饷银和驿站报酬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是由于朝政的腐朽和国家财政的困难，明末的军饷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有的地方常常拖欠两三年甚至五六年。兵士生活无着，起初是典衣卖箭，后来竟然鬻子典妻，或沿街乞食，甚至离伍潜逃。而自明中期以来，驿递制度又弊窦丛生，大小官员任意使用驿递，并在常例食宿供应之外敲诈勒索，致使驿卒困苦不堪，甚至卖儿贴妇以应横索，而地方官吏又任意克扣驿站的经费，驿卒的报酬不断减少，既填不饱肚子，更养不起驿马。崇祯元年（1628 年）六月，明思宗见到御史顾其国反映驿道骚扰累民的奏疏，让内阁传谕兵部，遵照旧例从严控制驿递的使用。崇祯二年四月，刑科给事中刘懋建议对驿递严加整顿，从而节省驿站的经费开支。明思宗大喜，立即改命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专职负责此事。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国裁撤了十分之三的驿站，共裁减驿站经费 65.5720 多万两，解部移作军用，结果又使大批驿卒失业，生活无着。潜逃的兵士和失业的驿卒便结伙行

劫，待到饥民发动大起义后，也都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有的驿卒因为知兵能战，甚至充当起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人。

由于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天启七年（1627 年）二月澄城县农民起义爆发后，很快就得到陕西及周边广大饥民、边兵和失业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 年），府谷王嘉胤率杨六、不沾泥张存孟等群掠富家，遭官府追捕，聚众起义。白水县王二也聚众举起义旗，攻破宜君县城，随即北上与王嘉胤会合，众至五六千人，聚集于延安、庆阳的黄龙山（在今陕西白水县北）中。不久，被陕西督粮道洪承畴击败，潜入山谷。当年，还有王大梁起义于汉南（今陕西汉中南部）；王左挂、苗美等起义于宜川；高迎祥起义于汉川，号称“闯王”；王自用、混天王起义于延川；点灯子赵胜起义于清涧。当年十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还奏报固原发生兵变，哗变的士兵劫取州府的财物，转攻泾阳、富平、三原。崇祯三年十一月，从辽阳军中逃回的神一元，在延西一带率领 3000 多名饥饿的戍卒起义，连续攻克新安边、宁寨营、柳树涧三堡，占领保安县（今陕西志丹县）。后来神一元战死，由其弟神一魁继为首领。

就在这个风起云涌、群雄并起的年代，后来成为明末农民战争两大首领的张献忠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李自成，延安府米脂县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出生于米脂县双泉堡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曾入寺为僧，后为地主放羊。成年后应募到本县訚川（银川）驿充当驿卒，崇祯三年（1630 年）因驿站经费裁减而离开，随即率领本村的饥民，投奔不沾泥的起义队伍，称“闯将”。张献忠，延安卫柳树涧人，也出生于万历三十四



《洪承畴像》轴



洪承畴祠原址

年，少年时代曾受过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时代曾当过延安府的捕役，常遭同事的欺侮，于是转而投身起义。他每战辄先登，众服其勇，很快成为一支起义队伍的首领，自号“西营八大王”。

到崇祯三年（1630年），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陕西全境和甘肃东部、山西西部，大小起义队伍几十支，众达数十万人。其中，既有汉族百姓，也有许多回族和蒙古族民众。这些起义队伍，主要都以逐粮就食为目标，组织比较松散，战略战术水平也不高，遇到官军，胜则继续前进，败则退入深山之中。

农民起义在陕北刚刚爆发的时候，陕西的地方官害怕朝廷追究责任，往往隐瞒不报。崇祯初年担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遇到州县上报“盗贼”事件，就把来人痛打一顿，说：“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意思是，这些“盗贼”无非是些饥民，现在发生饥荒，他们抢些东西填肚子，待到明春地里长出新的庄稼，他们有了粮食就不会闹事了。但是，农民起义的声势不断扩大，实在无法隐瞒了，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胡廷宴和延绥巡抚岳和声才不得不各自上奏朝廷。当年二月，陕西三边（延绥、宁夏、甘肃三个边防重镇）总督武之望病死，哗变的士兵又放出谣言，说武之望并非病死，而是服毒自缢，也就是畏罪自杀。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既深感陕西局势严重，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又都视陕西为畏途，谁也不肯接手武之望之职。陕西三边总督的接替人选迟迟无法解决，一拖几个月，吏部只好会推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此职。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治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举进士，历任洛南、长安知县，后擢为御史，

因上疏直言无忌，遭当事者的排斥而辞职。天启初年起为太仆寺少卿，擢为右佥都御史，又未改其耿直的秉性，毫无顾忌地为熊廷弼辩护而被魏忠贤除名。崇祯元年（1628 年）九月，明思宗起用他为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使他感激涕零。因此，当吏部会推他为陕西三边总督时，他虽然深知自己并不知兵，又缺乏在边疆任职的经历，却未加推辞。明思宗在平台召见，询以平乱方略，他答曰："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崇祯二年三月，明思宗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代武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杨鹤抵任之后，看到自己的军事部署收效甚微，起义群众反而越剿越多，加上当年冬天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皆奉诏率部赴京勤王，更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疲于奔命。于是便在崇祯四年（1631 年）正月上疏，提出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主张。他指出，"盗贼"之起是因饥荒至极，专门用剿，需要调动大军，所费不赀，结果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而实行招抚，要想取得实效，先要赈济，以解散队伍，接着要进行安置，给予耕牛、种子，使之归农复业。如此一来，"抚局既毕，剿局亦终"，不用调动大军，也不需要筹措大量军饷。

杨鹤主抚的奏疏，遭到部分廷臣和地方官的反对，但也得到不少廷臣和地方官的支持。此时的明思宗，正为对付辽东的后金而焦头烂额，自然希望能尽快扑灭后院熊熊的起义烈火。况且在朝廷财政拮据的状况下，他一时也难以筹集大量饷银、抽调大批军队对农民军进行征剿。所以，经再三斟酌，他同意了杨鹤主抚的主张，表示："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随即从内帑拨出 10 万两银

子，命御史吴甡巡按陕西，携款放赈，招抚“流盗”。

得到明思宗的批准后，杨鹤放手在陕西大力推行他的抚局。当时陕西起义军东路的王嘉胤、曹操罗汝才、八大王、老回回马守应、闯将、蝎子块拓养坤等都已率部进入山西，留在陕西主要是西路起义军，其中以神一魁部力量最大。崇祯四年（1631 年）二月，神一魁率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在今甘肃合水县北）。杨鹤前往宁州（今甘肃宁县），派宁州知州周日强前往招抚，并令定边副将张应昌退兵。神一魁表示同意，在三月初九日派大小头目 60 余人，率众至宁州接受招安，送回俘获的合水知县蒋应昌和保安知县印信一颗。十六日，神一魁亲至宁州拜见总督，杨鹤宣敕赦免，授予神一魁官职，并散给降众以饥民印票，勒令解散，遣送还乡。这时，吴甡携带 10 万两银子来到陕西放赈，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还乡领取救济款项，点灯子、满天星周清、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刘道江等起义首领也接受招抚。陕西的起义一时归于沉寂。杨鹤向朝廷奏报说，关中地区已经“转乱为治”。

但是，杨鹤的抚局很快便以失败告终。第一，朝廷的招抚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吴甡带来的 10 万两银子，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 5 万两银子和 2 万石粮食，所救饥民不及十分之一。而招抚之后，又无钱安置解散的起义群众。杨鹤曾上疏指出：“今既奉旨招安，若不稍为赈济，是出于死地，终不能以生全也。”请求皇上“别赐臣一二万金，以为赈济之用”，但却遭到明思宗的拒绝。第二，明廷在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与实行招抚之后，继续加紧

对农民的征敛。崇祯二年（1629 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建议减免赋税一分，明思宗坚持一分不减。崇祯三年九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请求豁免陕西的欠赋，明思宗只准免除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赋税，当年欠赋不许免去。当年十二月，明思宗还下令在全国增派辽饷，规定每亩除现加 9 厘外，仍再征银 3 厘，前后共银 1 分 2 厘。第三，一些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苗美之叔），在投降之后，又被主剿派阴谋杀害。

上当受骗的群众于是纷纷拿起武器，重新发动起义。崇祯四年（1631 年）五月，陕西巡按御史吴甡就上奏，说群“贼”之受抚者向亦不少，然而旋灭旋生、倏抚倏叛。明思宗批示说：“至流贼阳抚阴逆，督抚尤当用心整集兵马，速奏荡平。”七月，独行狼、李老柴攻陷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先前已投降的田近庵等以 600 人应之。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可天飞何崇谓等不下数万众，也在庆阳、环县一带重新起义，四出攻击。九月，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又重新起义，北上攻克宁塞县。当年九月，明思宗便下诏将杨鹤革职，第二年将他谪戍江西袁州（治今江西宜春）。

明思宗将杨鹤革职查办后，于崇祯四年（1631 年）九月任命延绥巡抚洪承畴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洪承畴，福建泉州府南安人，天启七年（1627 年）任陕西督粮道参议，崇祯三年升任延绥巡抚。他是个主剿派，在延绥巡抚任上，曾与延绥总兵杜文焕密谋策划，杀害了已受招抚的王左挂、苗登云等 98 人。第二年，又指挥延绥东路副总兵曹文诏进兵山西阳城，追击

王嘉胤，并于六月间用计杀害王嘉胤。王嘉胤部因此溃败，其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王自用率余众出逃。曹文诏以功升任临洮总兵。九月，又命绥德州守备孙守法渡过黄河，在山西石楼县偷袭抚而复叛的点灯子。点灯子猝不及防，被降丁贺思贤砍死。

洪承畴升任三边总督后，更是踌躇满志，与陕西巡按御史吴甡分别上疏请饷。当年十二月，在明思宗的催促之下，兵部尚书熊明遇答应立即筹措拨付20万两银子。此时，入侵京畿的后金军队早已饱掠而去，入京勤王的沿边五大镇总兵已先后率部返回了陕西，可参与对农民军的征剿。手里有兵有饷，洪承畴便对留在陕西的农民军各部进行全面出击。他命定边营副将张应昌率兵攻打安塞谭雄部的起义军，又派延绥总兵王承恩赴宁塞，攻打降而复叛的神一魁。神一魁败走。其部下黄友才杀神一魁而降，不久复叛去。崇祯五年（1632年）春，洪承畴上疏乞请截留陕西税银20万两，得到明思宗的批准。他又遣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琪、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和张应昌等各率大军进剿农民军。农民军在宁塞战败，退守环县北面的东川、西川，乘势围攻庆阳。洪承畴急忙从鄜州（今陕西富县）赶往庆阳，曹文诏与贺虎臣同时赶到，在西陕（今陕西西濠）会合。三月，曹、贺率部夹攻农民军，大小十余战，斩杀1000多人，官方誉之为“西陕大捷”。不久，洪承畴设伏俘获不沾泥，斩杀于延绥；曹文诏在环县击败可飞天和李都司，又追击郝临庵、独行狼于耀州（今陕西耀县）。郝临庵、独行狼战败后为叛徒所杀。到当年冬天，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几支势力较大的农民军已基本被镇压下去。

陕西的农民起义军虽已基本被镇压，但山西的农民军却越战越强。从崇祯三年（1630 年）二月起，在陕西起义的老回回、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刘九思等部即已渡过黄河，攻克蒲县，然后分两路南下。后来，明廷改主抚为主剿，调集大军交洪承畴指挥，加强镇压。从崇祯四年到六年，王嘉胤、八大王、闯将、曹操等部也先后进入山西。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山西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或者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三年，一位山西乡绅曾感慨地说："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这些农民军，以王嘉胤的实力最大。王嘉胤在阳城遇害后，其左丞紫金梁率领余众逃出，会合山西境内的其他起义军，声势复振。这些起义军合共 36 营，其首领包括八大王、曹操、闯将、闯塌天刘国能、老回回、蝎子块、闯王、点灯子、革里眼贺一龙等，众号 20 万，共推紫金梁王自用为盟主，结成松散的联盟。后来，点灯子在石楼县惨遭杀害，但其他各部仍然发展很快。他们主要活动于晋南的平阳（今山西临汾）、晋东南的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安（今山西长治）和晋中的汾州（今山西汾阳）、太原、沁州（今山西沁县）三个地区。各支队伍分头活动，流动作战。山西巡抚许鼎臣、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崇祯三年接替病死的马士麟担任山西总兵的张应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崇祯五年八月，闯将李自成等部还从晋城南边攻入豫北，占领修武，兵锋直逼怀庆府城（今河南沁阳）。河南巡抚樊尚煜叫苦不迭，明廷急调昌平副总兵左良玉带兵前往堵击。

洪承畴见山西成为起义军活动的重心，决定精选官兵3500名，由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入晋配合山西官兵进行围剿。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明思宗批准他的请求，命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与山西总兵张应昌协谋征剿。

曹文诏率领陕西精锐官军入晋后，加紧对山西农民军的围追堵截。农民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攻打官军防御薄弱的地区。为此，明廷又不得不增派追剿镇压的兵力。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山西农民军越过太行山，向东进入畿辅，出现在顺德（今河北邢台）和真定（今河北正定）两府境内。为了阻止农民起义军进入畿南的平原地区，明廷急调通州兵、昌平兵，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昇夹剿。此后，明廷命左良玉专剿豫北起义军。因他手下只有2000余名昌平兵，势孤力弱，又于崇祯六年三月命四川副总兵邓玘和石砫土司马凤仪带兵赴援。到当年夏，因畿南、豫北农民军活动频繁，藩封于卫辉的潞王朱常淓上疏告急，劝皇上“早行剿灭”，“毋轻视贼”。明思宗又进一步发兵豫北，一支是由昌平副总兵汤九州率领的昌平兵，另一支是由总兵倪宠、王朴率领的禁军京营兵。

随着官军不断向山西、豫北、畿南的聚集，这一带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起初，农民军利用各地督抚彼此推诿、以邻为壑的种种劣行，发挥流动作战的优越性，避开敌人的重兵，在晋、冀、豫的接境地区不断转移，取得了不少战果。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时山西、豫北、畿南的农民军与官军相比，还是处于劣势。农民军力渐不支，吃了不少败仗。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农民军的盟主紫



卢象昇像

金梁王自用在济源的战斗中受伤后病死，其部众转归闯将李自成，却无人能接替他发挥协调各支起义军的作用。此后，农民军各自为伍，时分时合，处境更加困难。当年冬天，十几万农民军已被挤压到黄河以北河南彰德、卫辉、怀庆三府的狭小地带，粮食的取给也十分困难。此时，集中于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参与围剿的官军，总数达3万以上。农民军的处境极其险恶，面临着被围歼的危险。

但是，明思宗此前的一个决策错误，却为农民军的转危为安提供了契机。原先曹文诏奉命由陕西入晋，明思宗只授予节制陕晋诸将之权，而没有节制河南诸将的权力，更没有控驭山西、河南巡抚和宣大总督之大权，无法起到统一山西、豫北和畿南军事指挥大权的作用。山西巡抚许鼎臣、宣大总督张宗衡与河南巡抚樊尚燝便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甚至以邻为壑，将自己境内的农民军驱赶到境外相邻的地区。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农民军西路从辉县攻打清化镇（在今河南焦作南），游击越效忠战殁；东路与游击陶希谦战于武安，陶亦败殁。兵部指责这是河南当局“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的罪过，河南巡抚樊尚燝因此被撤职查办。其实，农民军之所以大量进入河南，是山西当局有意驱赶他们越过太行山，以邻为壑的结果。鉴于这种状况，河南乡绅于当月上疏朝廷，建议由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提督山西、河南两省军务，以统一军事指挥大权。兵部同意这个主张，并议决将洪承畴移驻潼关，以节制陕、晋、豫三省军事，兼制晋、豫二省巡抚及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明思宗考虑到陕西三边长城以北的形势也不乐观，

不想分散洪承畴对三边重镇的注意力，更主要是担心臣下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好驾驭，因此便以“剿贼抚镇专责，别设总督，反滋诿卸”为借口，坚决否定了河南乡绅的建议和兵部的议决，而于五月间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分别监视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之军。接着，派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出征，又命太监杨进朝、卢九德监军。但是，这些监军太监根本不懂军事，他们口衔天宪，恃势凌人，指手画脚，于武臣多所掣肘，反而进一步分散了军事指挥大权。他们又贪婪成性，不仅肆意侵克军资，中饱私囊，而且谎报军功，冒功请赏，这又给了起义军以可乘之机。

退守黄河以北河南三府之地的农民军，为了摆脱困境，决定用诈降的办法，从豫北渡过黄河突围南下。起义军仔细分析了当时面对的官军情况，觉得最能打仗的是曹文诏及其侄子曹变蛟，其次是左良玉、汤九州，而以王朴率领（总兵倪宠已于九月调往登、莱镇守），杨进朝、卢九德监视的京营兵数量最多，装备最为精良，但因有不少皇亲国戚在那里混差领饷，因此没有什么战斗力。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见到此前在张应昌军中监军的太监阎思印已在山西招降王刚所部500人，又招降别部300人，也急于招降一些起义军，以便向皇上报功请赏。于是这些农民军决计向京营总兵王朴诈降。在武安一带的张妙手张文耀、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便以重金贿赂王朴的陕西籍家丁，让他们在王朴面前求情。杨进朝、卢九德觉得这是立功的大好机会，立即答应。十一月十七日，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在武安拜会王朴，自称是“饥民头目”，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现今归降，望押还

故土复业。十九日，贺双全等 12 人又在张妙手陪同下拜会王朴、杨进朝、卢九德，接受“招安”。杨进朝、卢九德立即向皇上报功，说有 61 名“贼首”已受招抚，并准备把他们遣送回陕西老家。但是，这些诈降的起义首领，却在驻地以重金向官军、士兵和当地百姓购买裘、靴等物品，并偷偷向黄河岸边移动，暗中进行渡过黄河突围的准备。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些诈降的农民军，到达山西垣曲（在今山西垣曲东南）与河南济源之间的关阳、长泉一带。这里是黄河最狭窄的一段，向来水流湍急，从不结冰，但今年一反常态，竟然结冰如石。这一天，天寒风急，十几万大军分三路驰马踏冰，一举攻占黄河南岸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猝迎战，被农民军击毙。史称“渑池渡”。洪承畴、曹文诏的主剿政策宣告失败。明末农民战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节　农民军的千里转战

崇祯六年（1633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起义军渡过黄河进入中原大地，立即与当地的贫苦农民汇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起义洪流。明末农民战争从此进入中期阶段。

农民军渡过黄河天险之后，首先攻克渑池、伊阳（今河南汝阳）、卢氏三县，然后分兵出击。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等部由卢氏山区的“矿盗”充当向导，穿越山区小路直达内乡，再经邓州（今河南邓县）、淅川（在今河南

淅川南）南下，占据湖广的郧阳（治今湖北郧县）、襄阳地区。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张一川、满天星高汝砺等部十几万人则西入武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占领山阳、镇安、商南等地，再北上洛南，向西安挺进。洪承畴急檄郃阳（今陕西合阳），韩城官军迎头堵截，起义军遂又掉头南下，进入四川。接着，马守应等部也从湖广郧阳地区经长江北岸的山区入川，于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攻克夔州（今重庆奉节）。四川当局忙调当地官军和土司兵进行阻击。入川的农民军活动于川东北一带，但此地多深山密林，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无法解决，农民军于是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大部分北上陕西。

农民军的凌厉攻势，把中原腹地打得乱作一团。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为四战之地，但明朝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地方当局根本无法对付，告急求援的奏疏不断传到京师，有时甚至一日数至。廷臣议论纷纷，部分较有识见的廷臣鉴于各省督抚总兵事权不一、互相推诿，甚至以邻为壑的教训，建议在各省抚镇之上设置总督，以便统一指挥，协力征剿，并把目光投向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明思宗想想也没有别的计策，遂改变他原先所说的“剿贼抚镇专责，别设总督，反滋诿卸”的看法，同意设置五省总督的建议。但考虑到洪承畴身负三边重任，不便离开，决定起用不久前在延绥巡抚任上镇压多支起义军并在延水关剿灭陕西境内最后一支起义军的陈奇瑜，于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

陈奇瑜，字玉铉，山西保德州（治在今山西保德县）人，万历

四十四年（1616 年）成进士，授洛阳知县，天启二年（1622 年）擢礼科给事中。杨涟弹劾魏忠贤，他也抗疏力诋。六年春，由户科左给事中出为陕西副使，迁右参政，分守南阳。崇祯改元，加按察使职，寻历陕西左右布政使。五年，代张福臻巡抚延绥，卖力剿杀当地的农民军。就任五省总督后，他首先集中兵力围剿郧阳地区的农民军。郧阳地处陕、豫、川、楚四省的交界之处，多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历来为“盗贼薮渊”。他檄调各路官军集中于河南陕州（今河南陕县），再移师南下，进剿湖北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竹山一带的农民军。他令陕西巡抚卢象昇驻房县、竹山，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对农民军进行南北堵截。七月，他同卢象昇率军由竹溪进至平利（在今陕西平利西北）的乌林关，向农民军发起进攻。农民军遭受重大损失。李自成、张献忠部向西进入陕西。陈奇瑜得意扬扬，奏报朝廷说:“楚中屡捷，一时大盗几尽。其窜伏深山者，臣督乡兵为向道（导），无穴不搜，楚中渐有宁宇。”当他得知李自成、张献忠已转移至陕西，赶忙尾追而来。农民军不慎误入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这里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出口又被官军堵住，加上连下 70 多天大雨，刀锋锈蚀，弓弩弛解，衣甲浥坏，马蹄尽穿，几天吃不上一顿饭，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农民军首领决定诈降，他们下令将缴获的各种金银财物送到陈奇瑜军营，贿赂其左右诸将，表示愿受招安。接受贿赂的将领力主招抚。陈奇瑜以为农民军是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真心投降的，欣然表示同意，允许于八月约降。陕西巡按御史傅永淳表示反对，主张乘机用武力剿杀，说这些“盗贼”有数十万之众，即使招安，又如何安置？况且他们未遭受

重大打击，能洗心革面吗？恐怕天晴出栈道而向西，要想招安，也不可得矣！说罢痛哭流涕，苦苦哀求陈奇瑜放弃招抚而改取剿灭之策。陈奇瑜不听，坚持上奏朝廷，请求准予实行招抚。兵部尚书张凤翼表示赞同，明思宗批准了他的招抚方案。

得到明思宗的批准，陈奇瑜即放手对农民军进行招抚。他让4万多农民军依次有序地走出栈道，每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员负责遣送回原籍务农。陈奇瑜下令，沿途地方官府不得阻挠邀击，并须供应他们粮草。这些诈降的起义军士兵，一路上与护送的士兵揖让欢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坏了的换上新盔甲，弓箭丢失的换上了新弓箭。陕西巡抚练国事恐生不测，令杨麟率兵驻扎宝鸡县以为防备。当这些诈降的起义将士到达宝鸡请求入城时，宝鸡知县李嘉彦只准36人先行登城。待这36人登上了城，却将其全部捆绑杀害。农民军于是尽杀安抚官，重举义旗，攻破麟游、永寿（治今陕西永寿北）、灵台、崇信、白水、泾州（治今陕西泾川）、扶风等7县，与从略阳（治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来的其他起义军会合。关中大震。

陈奇瑜闻讯，如梦初醒，发现上了起义军诈降的当，但事已无法挽回，便把罪责推到宝鸡知县李嘉彦和陕西巡抚练国事身上，指责李嘉彦杀降激变，练国事“阻挠逗留，违节度以至于败”。明思宗大怒，未经核实，即下令将他们逮捕，以陕西左布政使李乔代为陕西巡抚。不久，由于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事，明思宗才于十一月下令将陈奇瑜逮捕下狱，后将其谪戍于边。

崇祯八年（1635 年）正月，明思宗任命洪承畴总督晋、陕、豫、川、楚五省军务，统率兵马征剿起义军。当时农民军采取避实就虚之策，已分兵突出陕西，一由陕州渡河，北上山西平阳；一由武关经南阳地区进兵湖广襄阳；一由卢氏县东攻河南郡县。后来，进入山西、湖广的两路起义军又都转入河南，与在河南的另一路起义军会合。三路起义军 13 家 72 营，共约数十万人，声势浩大。当地人描述起义军壮阔的行军场面说："贼骑千里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豫籍兵科给事中常自裕上疏朝廷，力陈中原乃天下安危之所系，现有"贼"众大小 72 营、二三十万人，蜂屯伊阳（今河南汝阳）、嵩县、宛（今河南南阳）、洛之间，大有侵汝、宁、郑、宋之意，虽然朝廷已派多位将领赶往那里，但兵不过几千，以杯水不足以救车薪之火，要求皇上另调关（山海关）、宁（宁远）、天津精兵猛将前往解救。明思宗令兵部安排。兵部尚书张凤翼经与户部尚书侯恂研究后，决定抽调西北边兵，真定、天津、关、宁铁骑及白竿子、罗坝土司兵等兵力 7.5 万人，马 1.5 万匹、饷银 77 万两（后增至 93.6 万两），命洪承畴出关节制，合力围剿。明思宗批准了这个调兵增饷方案，并同意从皇家的内帑中拨银 20 万两，令洪承畴出关会各部围剿，限 6 个月内扫荡廓清。如仍留余孽，督抚诸镇置之重典。

但是，未等东西南北的各路官军齐集河南，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过天星及扫地王、太平王等农民军已于崇

祯八年（1635年）正月上旬从河南进入安徽，十一日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前锋直指明中都凤阳。凤阳是明朝的“龙兴”之地，明太祖父母的坟墓和他少年出家的寺庙龙兴寺都在那里。明太祖一度在那里营建都城，称为“中都”。由于它是帝乡，明太祖曾下令永远免除凤阳、临淮两县的赋役，但能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原籍凤阳、临淮的人口，因犯罪而被谪、营建中都而被迁入以及大量被移居凤阳屯田的外来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又因为是帝乡，当地的各种营建和差役多如牛毛，加上土地贫瘠，又濒临淮河，明中期以后水利年久失修，常遭黄淮河水泛滥之灾，旱涝无常，贫苦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崇祯四年，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前往凤阳祭告皇陵后曾奏报其所见所闻，说凤阳土地确实贫瘠，在江北诸郡中属下下等，民居都是茅草房。一遇水旱，人们就携妻担子乞活四方，因而户口日减，欠赋越积越多。官府按规定的赋额征税，就将逋赋摊到没有逃亡的人户身上，从而又迫使他们逃亡，形成恶性循环。钱士升要求皇上施行仁政，蠲减凤阳的赋税。明思宗冷淡地批复“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搪塞了事。

当农民军进入河南，大有直捣凤阳的势头时，南京礼部尚书吕维琪曾对兵部尚书张凤翼指出，凤阳皇陵防守单薄，应早作防备。但张凤翼只发文凤阳、山东两巡抚及操江御史（专督长江瓜州、镇江以上河段），令其严备要害，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给事中孙晋提请张凤翼加强凤阳陵寝的防备，他竟答道，你是南方人，怕什么流贼？流贼起西北，不食稻米，他们的马也不喂江南草料！就在起义军攻打颍州之时，中都留守司发生兵变，杀死皇陵卫指挥侯定

国。凤阳商民因不满守陵太监杨泽的贪虐，又齐集凤阳巡按衙门之前请愿，然后火烧守陵太监的衙署，接着暗中派人前往颍州，向农民军献上图册，指明某处富家，何处无兵。农民军于是密遣壮士300人，扮作商人、车夫、僧道、乞丐，潜入凤阳城内。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大雾弥漫，正当当地百姓庆祝元宵之时，扫地王、太平王等部起义军突然进抵凤阳，与潜入城内的300壮士里应外合，一举攻占凤阳城，击毙凤阳留守署正朱国相及官军4000余名，并杖杀凤阳知府颜容暄。起义军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放火焚烧皇陵享殿和龙兴寺。过了3天，听说南京官军即将赶到，起义军才拔营南下，往攻庐州（今安徽合肥）。

凤阳皇陵被焚，这是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其直接责任者巡按御史吴振缨、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却故意隐瞒不报。正月二十五日洪承畴赶赴河南，令各省巡抚、总兵到河南集结之时，明思宗还蒙在鼓里，批准洪承畴的部署，进其兵部尚书衔，赐尚方剑，许其便宜行事。直到二月初七日，明思宗才得知凤阳危急，命总兵尤世威从徐、淮往援凤阳，杨御蕃率山东兵往护皇陵，刘泽清防守曹、濮。3天后，吴振缨眼看纸已包不住火，才上报凤阳之变。二月十二日，明思宗得到奏报，即素服躬赴太庙祭告祖先。第二天，下令逮治杨一鹏、吴振缨和守陵太监杨泽，并任命兵部右侍郎朱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府，移镇凤阳，同洪承畴协剿。

在扫地王、太平王攻打凤阳的同时，高迎祥等部已向西，经太和、亳州，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阴）、睢州（今河南睢县）、鹿邑、

太康等地，进入南阳府。张献忠等部则进入巢县，攻打庐州，克庐江、无为，再占和州（今安徽和县），然后折向西南，进入湖广东部的蕲（治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西北）、黄一带，后又挺进襄阳地区。洪承畴正月二十八日到达河南，三月初一日抵达汝宁（今河南汝南），不料农民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纷纷折回陕西，到四月间已悉数归秦。当时陕西残破已极，灾荒异常，饥民纷纷投奔起义队伍，农民军的人数很快就达到200万以上。

四月间，明廷所调的官军大部分已到达河南。四月十二日，洪承畴在汝州召集诸将开会，确定征剿方略。他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决定采取"分信地扼之，令不得流"的围剿计策，命左良玉、汤九州以5000兵马守瓦屋（在今河南西峡西偏北）、吴村（在今河南淅川西），控扼农民军从陕西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之路；尤世威、徐来朝以5500兵马守兰草川、朱阳关（均在今河南灵宝西南），控扼农民军从陕西进入河南卢氏、永宁（今河南洛宁）、灵宝、陕州之路；陈永福以1800兵马守卢氏、永宁诸隘口，以备堵截遗漏之敌；邓玘、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各以所部分守汉江南北诸隘口，控扼农民军进入湖广郧西、竹溪等地。自己则率贺人龙、刘成功进入陕西，并令曹文诏从湖广赶来会合。洪承畴的这个征剿计策，是想把起义军堵在陕西境内，自己带兵逐一加以剿灭。部署看似十分周密，但却不切合实际。当时陕西境内的农民军人数达200万以上，分散活动于各地，洪承畴不是集中兵力围剿农民军的一部，而是采取"分信地扼之"的办法企图将农民军围堵在陕西境内，这就使得本来有限的兵力变得非常分散，也更加单薄。况

且，当时官军士气又十分低落，将士都不肯用命，一再哗变。先是徐来朝部不愿扼守兰草川、朱阳关，士兵在卢氏县哗变；接着，邓玘由于长期克扣军饷，引起士兵的哗变。邓玘被吓得登楼越墙，慌乱中坠入火巷而被烧死。这样，未曾出师就先折损两支队伍。加上征调的罗坝土司兵又迟迟未能赶来，更使洪承畴捉襟见肘。但是，迫于6个月灭“贼”的严旨，洪承畴也只好挥师上阵，孤注一掷了。

四月底，曹文诏从南阳赶到晋、豫边界的灵宝县会见洪承畴。洪承畴担心商洛一带的农民军向汉中转移，令曹文诏从乡间小道直插洛南、商州，然后驰入汉中，迎面阻遏。曹文诏于五月五日抵达商州，见农民军驻营城外30里处，营火满山，即于夜半率侄儿参将曹变蛟、守备曹鼎蛟，都司白广恩发起攻击，初战获胜。六月，李自成等部围攻宁州（今甘肃宁县），曹文诏手下的副总兵艾万年，副将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率3000人往援宁州。双方在襄乐镇（在今甘肃宁县东北）交战，官军先获小胜，后来力渐不支，被迫撤退。行至巴家寨遭到农民军的伏击，艾万年、柳国镇被击毙，刘成功、王锡命负伤而逃。曹文诏闻讯，瞋目大骂，拔刀砍地，向洪承畴请战。洪承畴大喜，说：“非将军不能灭此贼。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在今甘肃平凉西北）趋淳化为后劲。”骄横狂妄的曹文诏率领3000人马向农民军发动进攻。六月二十八日，双方在真宁（治在今甘肃正宁）县境的湫头镇开始交战。李自成针对其轻敌寡谋的弱点，退军30里，将曹文诏诱至自己的埋伏圈，将他团团围住。一时杀声四起，飞矢猬集。曹

文诏自知无法脱身，拔刀自刎而亡。在明末官军中，曹文诏以狠毒“敢战”著称。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他同农民军作战7年，先后屠戮起义群众数万人，杀死起义首领数十名。当地的老百姓说，“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他被李自成等部所围歼，对明朝统治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洪承畴为之仰天恸哭，豫、楚的官军亦皆为夺气。

湫头镇战后，农民军乘胜东进，直逼西安。洪承畴急忙调兵守御泾阳、三原，好不容易才守住西安。当时的陕西，由于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萧条，起义军人数激增，很难找到足够的口粮。而明廷不甘于失败，又在不断调兵遣将，加强对陕西农民军的围剿。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处境，谋求更好的发展，马守应等农民军便不断冲击通往豫、楚两地的关隘。七月，首先冲击朱阳关。扼守此关的是徐来朝所率的天津兵，他们本不愿入山，曾在卢氏县哗变，后被强制上山戍守，根本没有什么斗志。农民军一到，徐来朝逃窜，一军尽没。月底，农民军又攻破兰草川，击伤总兵尤世威和游击刘肇基、罗岱。八月，乘势进入河南，越过卢氏县，到达永宁。到十月，高迎祥、张献忠、一字王刘小山、撞天王等部几十万人都已东出潼关，进入了河南。史籍描绘当时起义军出关的壮观场面说：“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留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只有李自成等部为数不多的几支农民军。洪承畴的堵剿计划宣告破产。

第三节　卢象昇与洪承畴的东西夹剿

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明思宗见限期6个月灭“贼”的愿望已经落空，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峻，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如焚。八月二十一日，他在平台召见阁臣及府、部、科道官，商议对策。大臣们个个小心谨慎，敷陈方略，但不是言不及义，便是纸上谈兵，不切实用。只有明思宗的老师、上个月刚由少詹事擢任内阁大学士的文震孟说了些切中要害的意见。文震孟是当时较有识见也较为正直的官员，凤阳皇陵被焚后，他曾上《皇陵震动疏》，称此事“真古今未有之奇变，君辱臣死之秋也”，请求皇上“奋然一怒，发哀痛之诏，按失律之诛，正误国之罪，行抚绥之实政，宽闾阎之积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盗，徐议浚财之源，毋徒竭泽而渔。尽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广集群策群力以定乱”。明思宗虽优旨报之，但却未能全都采纳而付诸施行。这次皇上平台召见，文震孟又直率进言：“今调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今惟严申号令，凡兵丁扰害民者，必杀无赦；将官能饬束兵丁，秋毫无犯，监军御史，立刻奏闻，破格优擢。”明思宗连连点头称是，又将他召入门内，再进一步陈述具体意见。文震孟便就如何改善官兵与地方官府及老百姓的关系，提出了具体方案。他指出，百姓团聚村堡，是“人自为守，家自为战”，而非犯上作乱。官兵不应以索粮为名，到处骚扰，以致“流贼”亦冒充官兵，混入村堡。今后凡官丁所过，地方官预

备粮草，不能以恶草敷衍，违者参处；兵丁亦不许进入村堡，违者听民间堵御，将官不得故意放纵。但是，这次召对，还是未能商讨出一个如何剿杀起义军的具体对策，敢说几句真心话的文震孟不久还因受到首辅温体仁的排挤而离开了内阁。

到八月二十六日，明思宗只好提升湖广巡抚卢象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赐予尚方剑，与总督洪承畴共同围剿起义军，"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昇督剿东南，如贼入秦，卢象昇督兵进关合围扫荡"。卢象昇接到任命，既感恩戴德，又忐忑不安，连忙上疏请辞，说自己的识见不及洪承畴的十分之五，才力不及十分之四，精神不及十分之二，希望皇上另简贤明。明思宗拒绝他的推辞，一再下旨催促，他只得硬着头皮上任，指挥中原的战事。当得知陕西农民军已大半进入河南后，明思宗又下令在原调的7万多兵力之外，再增调辽东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宁兵及山东、湖广等地官军2万，合共9万多人，以加强对农民军的镇压力量。

到了十月，明思宗还以"流贼"未平，皇陵震惊，颁布圣谕，宣布自己从初三日起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文武大臣同甘共苦之意，直至"寇"平之日为止。文武百官亦各"省察往过，淬励将来"。十月二十八日，又发布《罪己诏》，承担皇陵被焚的罪责，称："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同时捎带指责诸臣的"失算"，希望重新激起文武百官的斗志。

明思宗的《罪己诏》虽无实际内容，但它多少还是对广大将士

起到了某些警戒的作用。洪承畴和卢象昇便分别督令各路兵马迅速出动，分路进剿。

高迎祥等部进入河南后，河南起义军声势复振。卢象昇急忙赶往河南，十一月到达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部署对农民军的进剿。十一月十五日，他与辽东总兵祖宽夹击起义军整齐王部。整齐王败走，又与高迎祥等部合攻洛阳。祖宽领军来救，败之于洛阳东南的龙门、白沙。高迎祥与闯塌天、顺风王、扫地王等 13 营转战于汝州、光州（治在今河南潢川）一带，又在确山为祖宽所败。

崇祯九年（1636 年）正月，高迎祥、张献忠、闯塌天、动天摇等部数十万众，东下安徽，联营百里，强攻滁州。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寺卿李觉斯，用火球、火炮坚守滁州城，起义军连攻 3 日不下。卢象昇急率祖宽赶来，祖宽用关宁铁骑从农民军的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农民军措手不及，动天摇在城东五里桥战死。卢象昇率军继至，与农民军激战于 50 里外的朱龙桥。朱龙桥至关山一带，尸横遍野，滁水为之不流。滁州之战，高迎祥损失惨重，仅精骑就战殁 2000。滁州战后，高迎祥等部撤回河南境内，途中在朱仙镇、汝州杨家楼、裕州（治今河南方城）七顶山多次受挫，精骑损失殆尽。二月底，卢象昇赶到南阳，派人告知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要求将农民军拦截于汉水之北，以便将他们围歼于豫楚边界，但王、宋两人拒不遵命，未在汉水南岸设防。疲于奔命的农民军，除小部分仍留在内乡、淅川大山之中外，高迎祥、闯塌天等部便在光化县（治今湖北老河口光化镇）羊皮滩渡过汉水，进入郧、襄山区，与关中各部遥相呼应。

当高迎祥等大部分农民军东出河南之时，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张天琳（绥德人。当时另有一过天星，为惠登相，清涧人）、混天星郭汝磐、满天星等部仍在陕西坚持斗争。李自成有三四万人，过天星、混天星、满天星各有3万人。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李自成联合满天星、乱世王蔺养成、争功王、混天星等队伍计数万人，在宜昌、洛川一带活动，曾绕道韩城，欲渡黄河进入山西，因见黄河未能封冻，又转锋南下汉中。崇祯九年二月，洪承畴调集两万官军拼命追击，他们又分兵两路，从汉中北上。洪承畴担心农民军攻打西安，只得分兵追击。两支农民军遂又会合在一起，准备向西攻打兰州。洪承畴急檄固原总兵左光先和甘肃总兵柳绍宗合兵阻击。双方在干盐池（今宁夏海原西）展开一场激战，起义军大败，过天星张天琳求降，被安插于延安，不久复扬去。二月初十日，宁夏官军发生哗变，杀掉巡抚王楫。李自成、满天星等部乘机向榆林、绥德一带出击，五月与官军战于安定（治今陕西张县西安定镇），击毙延绥副将李成先，活捉并处死延绥总兵俞翀霄，毙敌3000人。接着攻打米脂，遭到贺人龙部官军的伏击，又遇大雨，无定河水泛滥，李自成与刘宗敏仅以数百骑脱离险境。不久，李自成的部将高一功率万余人从固原赶来会合，其势复振。尔后北上攻打延川、绥德、米脂。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百姓从者如归，队伍进一步得到壮大。李自成等部在陕西的活动，有力地牵制了洪承畴的军队，支援了入豫农民军的斗争。

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鉴于河南的农民军大部分已进入豫楚边界的大山之中，留在河南的小部分农民军也已被压缩在内乡、

淅川一带的山区，兵部尚书张凤翼上疏明思宗，建议敕谕河南、郧阳、陕西三巡抚各督将吏扼防，毋使逃入山中的“盗贼”逸出；四川、湖广两巡抚移师省境，听候援剿之命；总督、总理二臣率领大军入山围剿，并严禁商人进山贩粮，以期全歼“流贼”。明思宗批准他的建议，表示“克期五月荡平，劳师费财，督抚以下罪无赦”。

卢象昇接到明思宗的命令，只得指挥各部入山围剿。内乡、淅川、郧阳、襄阳一带，多崇山峻岭。卢象昇所部祖宽、祖大乐辖下的关宁铁骑长于平原地区的作战，却拙于山地作战，他们往往按兵不动，迟滞不前，令卢象昇叫苦不迭。他向朝廷上疏，大吐苦水，说豫楚大山绵亘，密箐深林，马不能进。我兵攀木逾崖，日行三四十里，车驴不能运粮，只能每人背米两斗，随兵而走。千兵入山需千人运粮，万兵入山需万人运粮，过期则兵夫同归于尽。因此，尽管卢象昇疲于奔命，弄得两眼浮肿，一身委顿，也无法阻挡农民军的流动出没，征剿之效甚微。

看到官军全力征剿却未见效，淮安卫三科武举陈起新曾于崇祯九年（1636 年）正月伏阙献疏，为朝廷的三大病根开出三剂药方，其中之一是“速蠲灾饬钱粮，以苏屡岁无告之颠连”。明思宗随即加以采纳，下令蠲免山西受灾州县新旧二饷，蠲免畿内崇祯五年以前的欠赋。五月十日，又下诏大赦“胁从诸贼”，称：“今日在豫者已困饥深山，在陕者零星窜伏，行将大兵加剿，必定玉石难分。”“为此再颁敕，遣官驰谕，各抚按大书榜示，从俗开导，如有悔罪投诚，弃邪归正，即称救回难民。……其或才力出众，愿向督理军前效用者，听其图功自现，一体叙录。”但是，这道大赦诏书只对

少数动摇分子具有一定的诱惑作用，却未能阻止农民起义的继续发展。因为诏书虽然讲了一大堆动听的话，并未许诺拨付赈贷牛种的安置经费，起义群众一旦缴械投降，还是没有活路。因此，当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包起凤奉命前往河南招抚时，应者寥寥。有的招抚官员前往农民军营地劝降，甚至被农民军处死。

当时，在众多的起义队伍中，以闯王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为强大。早在崇祯九年（1636 年）正月，闯王等部攻打滁州时，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即曾上疏指出："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当年三月初，高迎祥与闯塌天等部进入郧阳，然后转入陕西兴安、汉中。围剿高迎祥的重任，就落在洪承畴和三月间接任陕西巡抚的孙传庭身上。洪承畴主要负责围剿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孙传庭主要负责围剿陕南的高迎祥等部。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振武卫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举进士，先后担任永城、商丘知县，天启初年提升为吏部验封司主事、郎中，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而辞官归家侍奉寡母。崇祯八年（1635 年）重回吏部，担任郎中，后任顺天府丞。他接任陕西巡抚之初，曾向明思宗面陈陕西兵员不足的问题。他说，以往陕西的军队都宿卫边镇，而陕西巡抚专治腹地，不必考虑兵力的多少。现今形势大变，陕西境内"流寇"遍地，恐怕难以徒手搏强敌。明思宗答道，筹建军队难，筹措军饷更难。朕拨给今年饷银 6 万两，以后由你自己设法筹措，朝廷不加干预。孙传庭于是便着力整顿早已名存实亡的卫所屯田，每年收获屯课银 14.5 万两、米麦 1.35 万石，

用来募兵，组建起一支劲旅。考虑到高迎祥势力强劲，孙传庭兵力不足，洪承畴还抽调总兵柳绍宗前往支援，以加强对高迎祥的围堵追击。

七月中旬，高迎祥见汉中有官军重兵把守，无法通过栈道北上，决定从汉中东边的石泉北出子午谷，袭击省城西安。子午谷位于石泉北面，西邻黑水峪，有小道可通西安。率领官军追击的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部署重兵控扼西安西面的黑水峪出口。高迎祥率部进入盩厔（今陕西周至）南的黑水峪，随后与控扼出口的孙传庭官军展开四天激战。农民军初战获胜，击败参将李遇春部官军，后因连日大雨，粮饷断绝，接连受挫。孙传庭又使出招降的一手，以分化起义军。高迎祥手下的干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等人暗中投降官军。在马召原的战斗中，他们乘高迎祥下马张弓射敌之机，偷偷拉走了他的坐骑和身边的部卒。高迎祥只得脱下甲胄，躲进草丛，因而被官军俘获。七月二十日，孙传庭和洪承畴向朝廷奏捷，明思宗大喜过望，传令将高迎祥解至北京处死。

高迎祥被俘遇害，使农民起义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有的起义首领因此对前途悲观失望，走上了乞抚投降之歧路。如张妙手和蝎子块即分别到凤翔向官府乞求招安，率部投降。但是，更多的起义首领仍然继续坚持战斗。

就在高迎祥被俘的七月，因清（后金于崇祯九年四月改国号为清）兵再次入犯京畿，京师戒严，兵部急调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山（海关）、永（平）及关、宁、蓟镇各兵入援。九月，明思宗又下诏，调卢象昇北上，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五省总理

的空缺由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使王家祯接替，但其能力大不如卢象昇；卢象昇辖下的关宁边兵祖宽、祖大乐、李重镇也随之北上勤王，从而使对农民军的征剿兵力大为减少，这正好为农民军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李自成等部在占领绥德、米脂一带后，曾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但因山西巡抚吴甡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力量，又复西行，活动于宁夏、甘肃一带。

活动于湖广地区的老回回、张献忠、闯塌天等部，也重新活跃起来。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张献忠联合曹操、老回回、闯塌天等部共20余万，浩浩荡荡地自襄阳沿江东下，很快又与江北大别山脉英霍山区的"革左五营"中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会合，进攻皖东地区，迭克蕲、黄、六合、怀宁（今安徽安庆）、望江、江浦等地。从此，农民军便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要首领，分别活动于两个不同的地域。

第四节　杨嗣昌"十面张网"与起义的暂时沉寂

崇祯九年（1636年）八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犯而受到言官的弹劾，害怕遭到皇上的惩处，于九月初自杀身亡。明思宗环顾周围的廷臣，觉得没有人懂得军事，于是想起杨鹤之子、丁忧在家的原宣大总督杨嗣昌。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成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清吏司主事、员外郎，河南按察司副使，山永巡抚，宣大总督等职。后以父亲杨鹤去世，返乡守制，又遭母丧，久居不出。崇祯九年十月，

明思宗不经廷推，径自下旨起用他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 年）三月，杨嗣昌从家乡武陵来到北京。明思宗平台召见，他博涉文籍，又有口才，侃侃而谈，颇得皇上的信爱。此后每次召见，他不断向皇上大谈振刷军政的主张，迥异于对兵事无所作为的前任兵部尚书张凤翼。明思宗更觉得他是难得的能臣，不禁发出了“恨用卿晚”的感慨。他每有所请，明思宗都言听计从。

杨嗣昌面对中原农民起义军和辽东清军的威胁，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提出了“必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早在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即曾提出“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未受到朝廷的重视。杨嗣昌的这个奏疏以人身打比方来论述他的主张，说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今的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而“流寇”则祸乱于腹心之内，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必先安内方可攘外。根据这个主张，他把消灭“腹心之患”的农民起义军作为用兵的主要方向，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其具体方案是，以农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由四地的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农民军活动的非主要地区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由六地巡抚分防而协剿，这就叫做张“十面之网”。另以陕西三边总督与中原的五省总理率领机动部队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明思宗对此十分赞赏，说：“非君莫能办之也！”

为实现“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增饷262.8万两。后经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262.8万两只够11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18万两，总计增饷280.8万两，称为“剿饷”。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剿饷，明思宗召开几次御前会议，商议筹措的办法。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他自己首先喊穷，说:“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功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接着，就责问大臣们:“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皇上带头喊穷，勋戚和乡绅自然也拒绝不捐。怎么办呢?明思宗想借用一年各省“存留”的税粮。杨嗣昌曾在户部任过职，了解地方的财政开支，说各地存留的钱粮，除开支官吏师生和宗藩的俸禄，还要用于防海、防江、防倭、防矿盗，而自辽东发生战事以来，各地抽扣、搜刮、捐助又都从存留中开支，如今虽有剩余，也无济于大事。最后，杨嗣昌建议，将这笔剿饷全部加派到老百姓身上，但改变一年以前的“因粮输饷”为按亩均输。此前实行的加派办法是根据卢象昇的建议，规定凡缴纳地亩粮税在5两以上者加征若干，一般农民缴纳粮税都达不至5两以上，不在加派之列，多少体现了分别贫富的精神。杨嗣昌借口“欲分贫富，其事甚难”，主张一律按亩均输，不管缴纳多少税粮，均按田亩一体加征。明思宗急于剿灭农民起义，批准了他的建议，下诏加派剿饷，每亩加粮6石，每石折银8钱，共计280余万两。

要实现“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关键还在于专任剿杀的三边总督和五省总理两个主角的人选。三边总督洪承畴能征善战，但新

任五省总理的王家祯却是个庸才，难以同洪承畴一起担当合力围剿的重任。因此，杨嗣昌特向明思宗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来接替王家祯当总理，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熊文灿为贵州永宁州（今贵州关岭西南永宁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成进士，自诩知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崇祯初年，他在福建巡抚任上招抚了海寇郑芝龙，后升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又借助郑芝龙的海上武装力量平定海寇锺凌秀、刘香。明思宗曾怀疑刘香未死，而且不知熊文灿的为人，便派身边的太监以赴广西采办为名，前往广东秘密侦伺。两广物产丰饶，又是对外贸易的门户，为了保住两广总督的肥缺，熊文灿经常搜罗财宝贿赂朝中的权贵。这次见到皇上派来的太监，更是送上大批财物，并留饮十日。有天喝得正起劲的时候，太监说起中原的“寇”乱，熊文灿趁着酒兴，击案骂道:“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太监见熊文灿喜形于色，立即站起来，如实告知此行的用意，表示相信他确是当世之才,“非公不足办此贼”。熊文灿后悔失言，连忙推托说有“五难四不可”，但这个太监回朝后，还是在明思宗面前把熊文灿的胆识和才气吹嘘了一番，给皇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杨嗣昌原先从来没同熊文灿在一起共事过，对熊文灿的为人与才能并不了解。熊文灿的姻戚、礼部侍郎姚明恭，同杨嗣昌关系密切，得知他正在物色五省总理的人选，就极力向他推荐熊文灿，说文灿的才干已引起皇上注意，此人有内援，可荐。杨嗣昌觉得熊文灿的才识既然受到皇上的器重，大概错不了，便上疏向明思宗推荐。明思宗

欣然同意，任命熊文灿以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出任五省军务总理。

正当朝廷上下为实施“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而增兵增饷之时，陕西巡抚孙传庭于崇祯十年（1637年）七月上疏，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现今各边精锐已屡调尽空，部议集兵12万，不可得矣；海内脂膏已竭泽欲尽，部议征饷，未必如数矣；贼之地利在秦，枢臣十面张网之议，将使贼踞全秦为窟穴，致四正六隅为空张之网矣。贼之强者悉在秦，应毕智竭力以灭秦贼。秦贼平，则豫楚江北之贼便可传檄而定矣。明思宗却未加重视，只轻描淡写地下旨：“该部（兵部）看具奏。”部议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兵部尚书杨嗣昌不仅不予采纳，反而对孙传庭记恨在心，此后便处处加以刁难和打击。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和筹备，到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增兵、增饷诸事皆已就绪，上疏请求明思宗下达围剿令，说“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耳！”明思宗急于平贼，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三月平贼”计划，命从速付诸实施。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战略计划付诸实施之后，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十二年初，官军加紧了对农民军的剿杀，并取得了某些成效。

崇祯十年（1637年），活动于陕西的李自成、过天星等部与官军相持于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山区达七八个月之久。九

月，从秦州（今甘肃天水）地区出发，取道徽州（今甘肃徽县）、略阳，进军汉中。洪承畴督官军由栈道星驰赴剿，在汉中府城之外击败李自成。李自成所骑马匹被射杀，便裸身涉水而逃脱。汉中失利后，李自成、过天星乃于十月南下四川，先后攻克川西 38 座州、县城，进围省城成都。四川巡抚王维章及御史陈廷谟连疏乞援。明思宗下令将王维章革职，陈廷谟降三级“戴罪杀贼”，任命傅宗龙接替四川巡抚，并催促洪承畴火速统兵入川协剿。洪承畴急率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带着万名官兵入川，四川当局也调集六七万官军加紧追击围剿。李自成、过天星见官军云集四川，又于崇祯十一年正月返回了陕西。

李自成等部返回陕西后，分成几股进行活动，兵力分散，给了官军各个击破的机会。洪承畴与孙传庭分别对农民军加紧追击。五月，大天王、混天王部被孙传庭击败于合水，接受招抚。同月，过天星等部也在三水（今陕西旬邑）等地被孙传庭击败，于六月投降。明思宗大喜，命加孙传庭部衔，但杨嗣昌压下不办。李自成出川后，向西转移，三月间在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东新城）连打两个败仗，人员和马匹遭受很大损失，便进入西羌，准备在那里补充马匹。洪承畴急追不舍，李自成又掉头东返，进入陕、川交界地区，然后同六队祁总管会合，共 3000 多人，进入四川。洪承畴带领总兵曹变蛟、王洪入川，并派陕西监军道樊一蘅督促副将马科、贺人龙部入川追击。八月初，李自成等在南江县境战败，北奔陕西城固县境，在渡汉水时又遭到左光先的袭击，队伍只剩下一千四五百人，只得退入附近的山区。祁总管支持不住，

投降了左光先。李自成势力更是单薄，只好躲进深山密林，向东转战于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地区，尽量避免同大股官军正面交锋，其踪迹因此不甚为人所知。

崇祯十年（1637 年）初，张献忠、闯塌天、老回回、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革里眼、左金王等十几支农民军仍在江北地区活动。四月，张献忠率部西走，活动于河南南部、湖广北部地区。其他农民军继续活动于江北，时分时合，时而东进，时而北走河南，后来也逐渐向西转移。为了加强对这十几支农民军的镇压，明廷于当年九月，命太监刘元斌、卢九德统率 1.2 万名禁军赶赴江北。就在这个月，熊文灿也从广东北上，赴任五省总理之职，负责指挥诸将扑灭中原及江北的农民军。

熊文灿自知指挥作战非其所长，决定采用在福建招抚"海寇"郑芝龙的办法来招抚农民军。他在路过庐山时，特地去拜访好友空隐和尚。空隐问他，熊公自度统率的军队足以制敌死命吗？他答道，不能。又问，你手下的将领可有人能够嘱托大事、独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大局吗？他也答道，不知道。空隐和尚语气沉重地叹息道，你这两样都不具备，皇上却给你这样高的名位，寄予厚望，一旦失败，就该杀头了。熊文灿站立许久，这才和盘托出他心中的想法：我拟实行招抚，行吗？空隐和尚说，我料定熊公必行招抚，但流寇非海寇可比，必须慎之又慎！熊文灿告别空隐和尚，前往安庆。初抵安庆，他就派人遍贴招抚告示。十二月，又派曾卷入起义的生员卢鼎到闯塌天刘国能、八大王张献忠营中进行招抚，并广发招降檄文。同时令官军将百姓和粮食都迁入城中，让农民军无法得

到接济。明思宗闻讯大怒，下旨切责。杨嗣昌主剿，对熊文灿的主抚举措也心以为非，但既然推荐他来做五省总理，且又已夸下三月平贼的海口，也只得听之任之，遇到有人对熊文灿的抚局表示异议还站出来为之辩解几句。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与左良玉作战失利、又担心被张献忠吞并的闯塌天刘国能，带着5000人马在湖广随州向熊文灿投降。他的部众大部分不愿投降，散归老回回马守应和革里眼贺一龙。此后，刘国能充当明廷的鹰犬，掉过头来帮助官军剿杀农民军。

继刘国能之后，张献忠也接受招安。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南阳被左良玉击败负伤，转入湖广麻城、黄陂，同刘国能会合。十二月，当熊文灿派人招抚时，他表示接受，但尚犹豫未决，又转至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崇祯十一年正月，他率部进占湖广谷城，赶走刘国能的士卒，张贴告示说："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指闯塌天刘国能部）远遁。今欲解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聚集当地乡绅耆老为他具结作保，请求朝廷同意招抚。张献忠还派人携带大批财宝贿赂朝中权贵，并将一块1尺多长的碧玉和两颗径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熊文灿于是向朝廷建议招抚，并派监军道张大经代表他出席了张献忠在谷城举行的请降仪式。随后，张献忠将他的军队分屯于谷城外15里的白沙洲，盖起几百间房子，买地种麦，与民间两平交易，并在谷城每个城门派兵站岗，名义上说是"备他盗出入"，实际上是监视地方官府的行动。熊文灿命张献忠精简部卒，发给两万人军饷，其余遣散。张献忠说他手下的部卒都是壮士，愿举队跟从，如果

拨给他 10 万人的军饷，可保郧阳、襄阳、荆州（治今湖北江陵）三府安宁无事。熊文灿信以为真，为之请衔开饷，授予副将（即副总兵）的头衔，拨给 6 个月的军饷。熊文灿随即檄调其兵 4000 人去镇压其他农民军。张献忠却以刚刚受抚、“安集未定”为借口，拒绝出兵。许多文武官员都担心张献忠不是真心投降。杨嗣昌主张，张献忠应先杀李自成和马守应，才许招安，否则就把他杀掉。明思宗一改此前反对熊文灿主抚的态度，批驳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兵科都给事中姚思孝上言:“抚贼一事，亦难深信。这个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明思宗仍执意招抚，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哪里去?”

张献忠接受招抚后，拒不接受朝廷的改编和调遣，而是在谷城周围屯田耕作，造器练兵，以备来日再起，同刘国能的表现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的受抚对其他起义军还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年十一月，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小秦王白贵、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整十万黑云祥、混世王武世强等部接受招抚。罗汝才同白贵、黑云祥驻屯于房县，其他诸部分驻于竹溪、保康等地，均同张献忠一样，不接受改编与调遣，屯田造器，准备再起。第二年四月，射塌天李万庆、混十万马进忠也先后向明廷投降。至此，在河南、湖广地区活动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都受抚了，只有在安徽、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五支农民军（即“革左五营”）没有接受招安，但势力单薄，只得退入英霍山区，活动

也渐趋沉寂。明末农民起义暂时转入了低潮。

崇祯十二年（1639年）射塌天等投降后，熊文灿得意扬扬地奏报朝廷："臣兵威震慑，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即老回回马守应）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明思宗喜出望外，下诏褒扬。

第七章
周延儒的复出与赐死

第一节　传承温体仁衣钵的张至发和薛国观

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致仕后，明思宗将其他辅臣中位次居于首位的张至发擢为首辅，同时用枚卜之法点用吏部右侍郎刘宇亮、礼部右侍郎傅冠为礼部尚书，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左侍郎，俱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张至发是明思宗为打破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于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通过考试由外僚擢入内阁的，意在扩大人才的选拔范围。无奈他缺乏识别人才的目光，完全看走了眼。

张至发入阁后，一切听命于温体仁，很快就成为温体仁的亲信与同党。代温体仁出任首辅后，又传承温体仁的衣钵，执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排斥打击东林党人。福建漳浦人黄道周，字幼平，学贯古今，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他以文章风节闻名于世，严冷方刚，不谐流俗。按惯例，展书官进入经筵，必双膝跪地前行，他却独自用双脚行走，引来魏忠贤的侧目。不久，以母丧归里。崇祯二年（1629年）起复故官，进右中允。因连上三疏救钱龙锡，被明思宗连降三级，调任地方官。崇祯五年正月，因再次疏救钱龙锡，语刺周延儒、温体仁，被明思宗斥为民。九年起复故官，翌年进右谕德，掌司经局。当年冬，为太子选择东宫讲官，作为首辅的张至发，将黄道周摒弃不用。黄道周的同事项煜、杨廷麟为之鸣不平，要求将位置让给黄道周，张至发仍坚持不从。刑科左给事

中冯元飙上疏指出:“道周至清无徒，忠足以动人主（指皇帝），惟不能得执政（指首辅）欢。”张至发愤极，连上两疏痛诋冯元飙，极力颂扬温体仁的“孤执”“不欺”。但是，明思宗不仅未予理睬，后来还将冯元飙擢为太常少卿，再改南京太仆寺卿，迁为通政使。张至发的这两个奏疏，又引来29岁的翰林院编修吴伟业的痛斥。他上疏说，温体仁学无经术，性习险诐，庇暱小人，护持悍党，首辅张至发却盛赞其美德，一曰“孤执”，一曰“不欺”。体仁当国，有唐世济、闵洪学、蔡奕琛、吴振缨之流参赞密谋，有陈履谦、张汉儒、陆文声之流为之驱除异己，哪里算得上孤执？体仁家窝藏巨盗，财产遍布苕溪（指其家乡湖州），幕僚中不乏亡命之徒，又怎么谈得上不欺？

接着，翰林院检讨杨士聪上疏揭发吏部尚书田维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张至发见到奏疏，私自抄录一份偷偷送给田维嘉，让他预先做好申辩的准备。田维嘉恐慌不已，未等明思宗将杨士聪的奏疏批转给内阁，就抢先上疏为自己辩解。明思宗因此觉察到内阁有人给他暗通消息，下旨责其据实回奏。田维嘉隐瞒不住，只得如实交代。明思宗下令罢了他的官，从此也对张至发失去信任。随后，大理寺副曹荃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贪污受贿，又牵涉到张至发。张至发连疏为黄应恩辩解，请求调查核实。明思宗虽对张至发优旨褒答，但仍下令将黄应恩逮捕法办。张至发只好连上三疏，说自己有3条理由不适合担任首辅，请求辞职。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明思宗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理由是他的身体不佳，让他“回籍调理”。此事被当时人传为笑谈，说张至发是“遵旨患病”。

张至发担任内阁首辅不到一年即被罢官，接替其职位的孔贞运时间更短，为期不过两个月。代之而为首辅的是刘宇亮。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因清兵入掠，京师戒严，明思宗极度忧虑。刘宇亮自请督察军情，皇上大喜，即革除卢象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之职，命刘宇亮代之。明思宗将刘宇亮自请的“督察”改为“总督”，令他惶恐不安，因为他根本不懂军事，没有军事谋略与指挥才能，只得找辅臣薛国观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商量，请他们奏明皇上，自己也上疏说明情况。明思宗于是更改谕旨，让卢象昇留任原职，而刘宇亮只负督察的使命。等刘宇亮到达保定，就得到卢象昇战殁的败报。过安平，哨探报告清兵将至，他与随行部卒个个大惊失色，急趋晋州以避之。不想，晋州知州陈弘绪闭门不纳，守城士兵亦歃血为盟，誓不开门延纳一兵一卒。刘宇亮大怒，发射令箭，要求尽快打开城门，否则将以军法惩处。陈弘绪传出话来，说督师之来为的是御敌，现在敌兵即将到来，奈何反而躲避呢？如果是粮草不继，请找地方官去要；如果想进城，恕不奉命！刘宇亮驰疏纠劾，明思宗下旨逮治陈弘绪。州民纷纷前往北京伏阙诉冤，有数千人表示愿以自身替代知州受罚。明思宗还是将陈弘绪削职调用，并因此怀疑刘宇亮没有认真办事，只会到处骚扰百姓，对他完全失去信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刘宇亮抵达天津，见诸将消极避战，十分气愤，上疏纠劾。疏中涉及总兵刘光祚逗留不进的问题。内阁大学士薛国观正觊觎首辅之位，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合谋构害刘宇亮，说他私自拟旨于军前处斩刘光祚。待谕旨下达，刘光祚刚好

在武清打了个胜仗，刘宇亮便将刘光祚关进监狱，同时具疏乞请宽宥，接着上报武清的捷报。薛国观觉得机会来了，乃拟严旨，谴责刘宇亮前后的奏疏互相矛盾，下九卿科道议处。议处的结果，一致认为刘宇亮"玩弄国宪"，犯有"大不敬"之罪。刘宇亮上疏辩白，部议仍将他落职闲住。给事中陈启新、沈迅又落井下石，上疏请求予以重处，于是又改为削籍为民。二月，明思宗下旨，令其"戴罪图功，事平再议"。当了半年多首辅的刘宇亮，就这样被薛国观取代了。

《明史·薛国观传》说首辅温体仁垮台后，"张至发、孔贞运、刘宇亮继之，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国观得志"。薛国观是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1624 年）擢户科给事中，对时政颇有建策。魏忠贤专权后，大力攻击东林党，他也紧跟着弹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东林党人，不久升任兵科右给事中。魏忠贤遣宦官出镇监军，他又积极配合出镇太监疏纠东林人士，天启七年升至刑科都给事中。崇祯改元，薛国观立即来个大转弯，坚决反对阉党遗孽起用王化贞的主张。奉命往北镇祭医无闾（山名，亦作"医巫闾"，在今辽宁北镇县西，人呼为"广宁山"，主峰名"望海山"），返京后亟言关内外营伍虚耗、将吏侵克之弊，力荐满桂御边之才，受到明思宗的褒奖。陕西农民起义爆发后，薛国观又联合陕籍的京官，力请设防速剿，并追论阉党分子陕西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之罪。南京御史袁耀然上疏揭发薛国观天启年间依附阉党攻击东林的劣迹，他生怕遭到清算，上疏力

诋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从而得到温体仁的赏识，将他推荐给明思宗。他的官职也步步高升，至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被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薛国观当上首辅后，正如《明史·薛国观传》所云，“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全力推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庇护阉党余孽而仇恨东林、复社人士，但他的才智不及温体仁，伪装的手段更比温体仁差得远。温体仁表面上还装做不接受贿赂，而他则公开贪污受贿，无所不为。

其时贪风炽盛，这是让明思宗深感头疼的问题。有一天，明思宗宴请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之情，薛国观说这是厂卫不得人的缘故，如果厂卫得人，他们哪敢如此放肆！在旁侍候的东厂太监王德化吓得汗流浃背，此后便派人专门伺察他的阴私秽行。这时候，正好薛国观因重用内阁中书王陛彦而厌恶中书周国兴、杨余洪，诬告周、杨两人以泄漏诏旨而招权牟利，导致两人被逮下诏狱，最后被施以廷杖而毙于殿廷之上。其家人愤极，秘密搜集薛国观通贿的证据，向东厂告发。接着，周、杨两家又怂恿史堃的奴仆出面，状告薛国观吞没史堃寄存银子的事。

史堃是北直隶保定府清苑（今河北保定）人，身为御史却毫无德行，善于结纳宦官而成为王永光的死党。后巡按淮、扬，搜刮库存的赃罚银十几万两，装入自己的腰包；做巡盐御史，又掩取前任官员张锡命的贮库银20余万两。后以少卿家居。翰林院检讨杨士聪揭发吏部尚书田维嘉接受周汝弼8000两银子，让他做延绥巡抚，史堃起着中介作用。扬士聪还揭发史堃盗取盐课的事。明思宗叫史

蓳交代问题。他遂上疏攻讦杨士聪，并请敕命淮、扬监督宦官杨显名查核上奏。不久，原巡盐御史张锡命的儿子张沆又上疏弹劾史蓳，给事中张焜芳也上疏证实史蓳侵吞盐课有据，并揭发他曾勒索富户于承祖万两银子。史蓳慌了手脚，忙派家人携带重金去买通管理盐课账册的黠吏，令其涂改账册，以掩盖其侵盗行为。明思宗极为生气，剥夺他的官职。史蓳急带几万两银子入京，找到薛国观府邸，与之暗中密谋，上疏诬告张焜芳和他的弟弟张炳芳、张炜芳。当时阁臣多数庇护史蓳，准备拟旨严惩张氏三兄弟。明思宗没有同意，只剥夺张焜芳的官职，令其听候审讯。稍后，淮、扬的监督宦官杨显名上报查核盐课的结果，虽极力为史蓳辩解，但最终无法隐瞒丢失 6 万两盐课的事实，史蓳也终于被关进大牢。此时正值战事频繁，此案拖了很长时间未能了结，史蓳最终瘐死狱中。京城的百姓议论纷纷，传言史蓳带到京城的几万两银子，都被薛国观侵吞。史蓳的奴仆又出面告发，印证了这个事实。薛国观拼命辩解，说所谓史蓳的赃银是党人的诬陷，但明思宗怎能相信呢？

东厂太监王化贞所掌握的周国兴、杨余洪家人告发薛国观通贿的证据，以及史蓳奴仆告发其侵吞史蓳赃款的事实，使明思宗对薛国观的宠信开始发生动摇。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进一步激怒明思宗。当时明思宗正为财政入不敷出而发愁，薛国观建议用“借助”的办法来解决，说在外的臣僚由他负责，但在内的勋戚非皇上独断不可，并举明神宗生母孝定太后的侄孙武清侯李国瑞为例，说如果他能带个好头，其他皇亲国戚就能慷慨解囊。于是薛国观代皇上拟旨向武清侯家借助 40 万两银子。戚畹们知道，所谓

“借助”，其实就是捐献，谁都不愿往外拿钱。李国瑞就迫其庶兄李国臣拿钱，李国臣很生气，诡称父亲有家财 40 万两，我应该分得一半，愿意全部献出充作军资。明思宗开始没有答应，但薛国观坚持必须借助 40 万两，否则将勒期严追。有的戚畹建议李国瑞装穷，他果然藏匿家财，拆毁宅第，将一些盆盆罐罐和杂物摆到大街上变卖，以示家无余财。明思宗非常生气，下旨剥夺李国瑞的侯爵，年老体衰的李国瑞因此惊悸而死。有关衙门仍未停止追逼，皇亲国戚惊恐不已，人人自危。恰好明思宗宠爱的田贵妃所生的皇五子朱慈焕生病，戚畹们便通过宫中太监、宫妾制造谣言，说明神宗生母孝定太后已成为九莲华菩萨，在天上责怪皇上刻薄外戚，诸皇子尽当夭折，并将降神于皇五子。不久，皇五子果然死去。明思宗大为恐惧，急忙敕封李国瑞 7 岁的儿子李存善为武清侯，将李家上交的金银全部退还。明思宗因此深恨薛国观，准备等待时机狠狠地整治他一顿。

时机终于到来了。行人司的官员、复社成员吴昌时与薛国观素来不和，到了考选之时，担心薛国观从中作梗，派门人求见薛国观。薛国观答应考选时将他拟为第一，当得吏科给事中，但事后却只授予礼部主事之职。吴昌时受此戏弄，决心进行报复。他找好友、东厂理刑官吴道正密谋，揭发在家服丧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明思宗得到消息，进一步加深了对薛国观的疑忌。

崇祯十三年（1640 年）六月，督师杨嗣昌陈奏军情，明思宗令阁臣草拟谕旨。薛国观拟旨以进，明思宗很不满意，大发脾气，命五府、九卿、科道官议处之。执掌五军都督府的魏国公徐允祯、吏

部尚书傅永淳等人没有摸透皇上的心思，从轻议处，请令薛国观致仕或闲住。明思宗认为处分太轻，科道官必然会站出来纠举。出乎他预料的是，只有在五府、九卿、科道官的议决书上署名的给事中袁恺上疏批评傅永淳徇私，同时稍带指责一下薛国观藐视、妒嫉的过错。明思宗很不高兴，将他的奏疏狠狠地摔在地上，骂道，这算什么纠疏！下令剥夺薛国观的官职，放归故里。

尽管明思宗按照部议，将薛国观从轻发落，但满肚子的火气并未全消。薛国观却不知收敛，离京时竟将多年聚敛的金银财宝装上大车，排成一支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之上，招摇过市。东厂侦知后，立即报告明思宗，并派人至薛国观的府邸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严加审讯。王陛彦招出薛国观招摇通贿的事实，牵连到傅永淳、蔡奕琛和通政使李庚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 11 人。明思宗命将王陛彦关进诏狱惩治。接着，给事中杨恺再次上疏，揭发薛国观纳贿诸事，并牵连傅永淳、蔡奕琛。薛国观上疏力辩，攻击杨恺受吴昌时的指使。到十月，明思宗认为薛国观受贿有据，命将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第二年七月，薛国观被逮至京。明思宗已决定将他处死，因此没有将他关进大牢，而是令其待命外邸，他因而认为自己不至于被处死。八月初八日晚上，监刑官来到门前，他还在鼾睡之中。被叫醒后，看到来人都穿着浅红色的衣裳，知是监刑官，这才蹶然叹曰："吾死矣！"急忙找帽子，慌忙之中摸到一顶奴仆的帽子戴在头上，狼狈不堪地跪在地上接旨。听来人宣读"赐死"的诏书完毕，连连顿首，口中竟然发不出声，半天才说出句"吴昌时杀我！"随后遵旨悬梁自缢。第二天，使者

回宫上报监刑过程。又过一天，明思宗才许其家人收殓。明代的辅臣被处死者，自嘉靖时的夏言起，薛国观是第二个。随后，司法部门没收薛国观赃款 9000 两、田地 600 亩、故宅 1 座。

第二节　复社的崛起与周延儒的复出

在科举时代，读书应试、博取功名，是士子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明代的科举考试，生员应试要写八股文，不仅要熟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还要熟练掌握八股的文体和写作技巧。一些士子便想方设法四处寻师访友，互相切磋学问，交流心得，以求一登龙门。到明代后期，此风更盛，出现了许多以文会友、切磋制艺的文人社团，尤以江南地区数量最多。其中，著名的有应社、几社和复社等。

应社是天启四年（1624 年）由杨廷枢在常熟商业繁荣的唐市镇设立的，而对应社起着推进作用的则是张溥、张采。张溥，字天如，号西铭，苏州太仓人；张采，字受先，与张溥同里。张溥为应社规定了入社的标准:“先与乎其人，后与乎其文。为人之道，有一不及于正者，则辞之而敢就。”他还为应社制定社约，规定“毋或不孝弟，犯乃黜。穷且守，守道古处。在官有名节，毋或坠，坠共谏，不听乃黜。洁清以将，日慎一日”。要求所有成员在家尽孝悌之道，在官恪守名节，不坠落（即不与横暴的宦官之类同流合污），否则要劝谏，不听则除名。应社以切磋制艺为宗旨，经常评选八股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都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并以官方指

定的程朱注疏为依据。要写好八股文，不仅必须掌握写作的技巧，更须准确理解“四书”“五经”的义理。张溥认为，八股文风靡一时，人们专以应考学习为事，却忘掉了“君臣父子之大行”的“六经之法”，这是招致当今政治和道德颓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尊经复古”乃是改革政治腐败的紧急要务。为此，应社中的一些学者做了专门的分工，张溥、朱隗主攻《易经》，杨彝、顾梦麟主攻《诗经》，周铨、周钟主攻《春秋》，张采、王启荣主攻《周礼》，杨廷枢、钱楠主攻《尚书》。他们集古人之学说，加以批判检讨，力求给入社的初学者以正确的指导。不久，以应社为基础，扩大联络范围，又成立了广应社。

崇祯元年（1628 年），张采考中进士，张溥亦以明经贡入京师太学。在京期间，张溥广泛结交江南的江右、浙闽、松江及北方的燕、赵、鲁、卫等地的文社首领，与张采、杜麟徵、王崇简等，结成“燕台十子”之盟。这个同盟打出驱逐阉党余孽、复兴东林的旗号。后来几社的许多名士都参加了这个同盟，因此它实际上也就是几社的前身。

几社是崇祯初年在松江设立的。参与创社的杜麟徵、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都是当时有名的青年才俊。他们的文社起名为“几社”，寓“绝学有再兴之几”之意。这个“绝学”，指的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所倡导的儒家正统学脉。他们认为，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不主张苦读经书，而提倡静坐玄想的顿悟，导致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使儒家经学几乎成了绝学。因此必须再兴绝学，以承继儒家的正统学脉，同应社致力于研讨五

经之义可谓是不谋而合的。

崇祯元年（1628 年），吴江知县熊开元重视文治，延聘各地文人前来讲解儒学。当地文人孙淳联合吴翻、吕云孚、吴允夏、沈应瑞等，又成立了复社。

崇祯二年（1629 年），张溥从北京回到太仓，应吴江知县熊开元之邀，来到吴江，当地的巨室吴翻及沈氏的子弟都从之游学，他也因此与复社建立联系，并调停复社与应社之间的矛盾，促成复社与应社的联合，进而联合江北的匡社、南社，中州的端社，松江的几社，莱阳的邑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黄州的质社，江西的则社、历亭社、席社、昆阳社、云簪社，吴门的羽朋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明清时代山东的别称）的大社等，成立规模更大的复社。在熊开元的支持下，张溥在吴江的尹山主持召开了复社成立大会，宣布该社的宗旨、条规和课程。他在讲演中说，张溥不自量力，期与四方名士共同“兴复古学”，将使来日“务为有用”，因此名曰“复社”。

复社立有统一的条规和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它以研讨八股为宗旨，网罗的大批文士又皆海内人望，文章堪称一流，经常切磋制艺，并通过各地的文社征集文章，编为选集，互相观摩，因此入社的士子常金榜题名。崇祯三年（1630 年）乡试，复社成员杨廷枢、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纷纷中举。崇祯四年会试，吴伟业、张溥、夏日瑚、杨以任、马世奇、管正传、周之夔等人也都进士及第。此后，张溥又常利用自己的声望向有关官员推荐门下的弟子，这些被推荐的弟子在乡试、会试中每每

名列前茅。据当时人的记载,"赖其奖掖成名者数十百人","每一榜发,其中俊伟能文之士,一望便知为复社君子"。因此读书人纷纷请求入社,复社的规模迅速扩大,从初成立时的600余人扩增至3000余人,从而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复社除了举行定期的社集,还举办过几次大规模的集会,如崇祯二年、三年、五年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其中,尤以崇祯五年的苏州虎丘大会规模最大。除了江南的文人,还有来自山西、山东、浙江、福建、江西、湖广等地的文人,多达数千人。虎丘寺的大雄宝殿容纳不下,还在寺外生公台、千人石等处遍设坐席。人山人海,往来如织。复社的影响迅速扩大,除江浙地区外,还波及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西、山东等地。

复社自拟的条规以研讨制艺、"兴复古学"为宗旨,但它的复兴古学要求"务为有用",实际上追求的是经世之学。因此,它成立之后,就越来越多地涉足于朝廷的政治。复社自觉地继承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其领袖张溥就公开声称:"吾以嗣东林也。"他主张"以国事付公论",反对以"私权"来定朝政。他强调,应重视"文人"在议政中的作用,认为"文人之称,尊贵重大,不得轻也"。这样,复社人士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当时的门户之争。官府中与东林有瓜葛的官员,一般都对复社持支持态度,而与阉党有瓜葛的官员,则与复社相对立。

温体仁出任内阁首辅后,力图为阉党翻案而排斥东林,自然站到复社的对立面。"绿牡丹传奇"事件,就是温体仁攻击复社的开端。此后几年,他使尽各种手段,不断攻击复社人士。温体仁

致仕后，继为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都不喜欢复社，致使陆文声状告张溥之案迟迟不能了结，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 年）张溥病逝还未结案。

复社人士从这一系列事件中逐渐认识到，如无朝中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的支持，复社孤立无援，在政治上便难有作为。复社成员、已升任礼部员外郎的吴昌时给张溥写信，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说正人君子钱谦益遭到诋毁而罢官，文震孟入阁三月被排挤，致使东南君子不断遭到迫害，非周延儒复出不足以消弭灾祸。

周延儒对于自己遭到温体仁的排挤而失去首辅之职，一直心有不甘。他原本是东林党人陈于廷的姻亲，早年在乡里与姚希孟、罗喻义等东林党人关系也很密切。后来因攻击钱谦益而与东林党人结仇，下野之后颇有悔过之心，又逐渐接近东林党人。温体仁垮台之后，继任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继续执行温体仁路线，排挤、打击东林、复社人士。张溥心感忧虑，愤愤不平，但他环顾朝野，看到东林党人或被害而死，或被斥下野，已不复有当年气势，实难重新复起主政，而帮助其座师周延儒复出以阻止温体仁路线的继续肆虐，倒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因此，他私下找到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当即表示答应。于是，张溥便按照吴昌时的建议，决定帮助周延儒复出。

在张溥的策划之下，一场帮助周延儒复出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人分别出资，筹集 6 万两银子，贿赂太监曹化淳、王之心、王裕民等，打通关节。吴昌时也四出活动，结交皇帝身边的太监，让他们在皇上耳边吹风，施加影

响。张溥则亲自给周延儒写了密信，交代他复出后必须办理的“救时十余事”，包括蠲免逋赋、举用废籍、撤销监守中官、停止宫中操练等。周延儒均慨然允诺，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但是，周延儒能否复出，关键还要看皇上的态度。自温体仁出局之后，明思宗虽然内外兼用，但不论是由翰林进入内阁的，还是由外僚擢入内阁的，没有一个首辅让他感到满意。许多大臣向明思宗推举退休在家的周延儒，说他“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身边的宦官也不断给他说好话。明思宗反复比较，觉得实在找不出别的合适人选，也就表示同意了。

崇祯十四年（1641 年）四月，明思宗下旨，召前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入朝。张至发接到诏旨，想起当年致仕返里之时，明思宗不遣行人护送，仅赐给道里费 60 两银子，外加一匹绸缎，让他自己乘坐驿站的车船回家，规格只及一般首辅离职待遇的一半，觉得寒心。再回顾崇祯朝诸多首辅的下场，特别是薛国观的赐死，更令他不寒而栗。因此他连上四疏，坚决辞谢。

周延儒在宜兴老家等待着复出的时机。他虽然亟盼能早日重新出山，并已答应张溥等复社人士在复出之后要改弦易辙，但是，当他接到明思宗的诏旨，心情却十分复杂，既喜且忧。喜的是终于盼来复出的时机；忧的是此次重新出山，是否能够善始善终，避免重蹈前任首辅薛国观之死的覆辙，心里实在没底。就在接旨的当晚，他竟梦见已死去十年的夫人吴氏极力劝止他复出，说复出没有好下场。他将信将疑。吴氏说，不信的话，可随我到一个地方看看。周延儒随她前往，见到一个老和尚，脖子上系着一条绳索，吓出一

身冷汗而惊醒。不过，首辅的权位对周延儒毕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匆匆收拾行装，告别家人，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启程进京了。一路上风尘仆仆，薛国观之死的阴影始终无法在脑海里抹去，接旨当晚的梦境也不时在眼前闪现。走到山东境内，门生杨士聪来到运河岸边，登船拜谒，他不禁意味深长地对杨士聪说："自知再来必祸，而不敢不来！"

九月，周延儒抵达北京，出任内阁首辅。明思宗寄予厚望，随即给他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头衔，期望他能力挽狂澜，实现中兴之治。进京途中，周延儒不停地思考着张溥提出的救时十余事。入京后，亢直敢言的御史张肯堂又当面对他提出捐租起废、清理冤狱等急需办理的要务。他将这些意见梳理了一遍，在首次朝觐明思宗时，便滔滔不绝地陈奏自己的施政纲领，强调当务之急是减免农民拖欠的漕粮（明初的田赋以征收米、麦等实物为主，其中东南诸地征收的粮食通过大运河水运北京，供应京师宫廷和官吏的食用，称为"漕粮"。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全国田赋折收白银，但苏、松、杭、嘉、湖五府田赋仍征收实物，以保证京师漕粮的供应）、白粮（明代向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所征供宫廷和官吏食用的额外漕粮，包括宫廷用的白熟粳、糯米 17 万余石，各府部官员用的糙粳米 4.4 万余石，由粮户解运京师），减免民间历年拖欠的租赋，减免遭受战乱与灾荒地区今年的田赋，赦免流罪以下的人犯，召还因进谏而罢免的官员，起复诖误举人，扩大取士名额等。明思宗感到非常满意，逐一允准，并赐宴为他洗尘。宴罢，周延儒起身离去。明思宗退入宫中，面带

喜色地说:“还是他做!”孟冬十月，在祭祀太庙之时，见天气晴和，阳光灿烂，明思宗满面喜气地对近侍说:“周阁老毕竟（是）有福人!”

第三节 周延儒的短暂布新与败亡

周延儒复任内阁首辅之后，一改施行已久的温体仁路线，按照张溥的要求，请求皇上恩准开释漕粮、白粮欠户；蠲免民间积欠的租赋；凡属兵残岁荒之地，减免当年夏秋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发生水灾，许以明年用夏麦代缴漕粮；凡属流罪以下的人犯，一律赦免回家；召还因言事而迁谪诸臣，如李清等；起复诖误举人，扩大取士名额，一次就考选46名，全部充任御史以示尊崇；对宗室实行保举，破格提拔特异人才；修练储备，严核究实。举凡国防、民生、用人、理财，几乎无不涉及，大有革旧布新之概。时人记载说，一时“天下仰望风采”,“人亦乐归之”。

周延儒还对明思宗说，老成名德之臣不可轻易放弃。于是起用先前被罢废的郑三俊主持吏部、刘宗周主持都察院、范景文主持工部、倪元璐主持兵部，其他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也都被提拔上来，担任重要职务。并将被关押的傅宗龙释放出狱，为已故的文震孟、姚希孟追赠官衔。与此同时，周延儒还奏请明思宗，停止组织宫中宦官进行军事操练的内操，罢除厂卫的侦伺缉捕之权，除谋逆乱伦，其余作奸犯科案件一律移交刑部办理。这一系列举措，受到朝廷内外的普遍赞赏，咸称贤政。

周延儒还设法为张溥恢复名誉。崇祯十四年（1641 年）五月，在周延儒已接到复出诏旨但尚未抵京到任之际，年仅 40 岁的张溥暴病而殁，但一些人对复社的攻击仍然持续不断。不知道张溥死去的刑部侍郎蔡奕琛因坐薛国观党而下狱，还攻讦张溥"遥握朝柄"，声称自己的罪名是张溥一手捏造的，并攻击张采"结党乱政"。明思宗下诏，要求张溥、张采作出回答。张采回奏说，复社绝不是什么危险的政治团体，只不过是专门评选八股文而已。念张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尽力，未曾一日做官，可谓忠心耿耿。在当今皇上诏旨严责之下，尚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奏疏递上后，有关衙门不敢报告明思宗。周延儒抵京就任首辅后，将张采的奏疏呈递给明思宗，并极力为张溥美言。明思宗这才放弃对张溥的追究，并让进呈张溥的著作以备御览。

面对多年难得一见的新局面，明思宗既高兴，又对周延儒等辅臣心怀感激。崇祯十五年（1642 年）正月初一日，他在御殿接受群臣朝贺后，下了宝座，南面而立，令内侍召来阁臣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魏炤乘、谢陞、陈演，让他们东向而立，恭恭敬敬地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犹称先生，尚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说罢，面向西面的阁臣们做了个长揖，说："今而后，道德惟诸先生训诲之，政务惟诸先生匡赞之，调和燮理，奠安宗社民生，惟诸先生是赖！"表达了他对周延儒等辅臣既感激又期望他们进一步匡赞政务的急切之情。

此时的明思宗，对周延儒可谓是眷顾殊深，尊礼备至。因此，周延儒有时也敢于请求皇上纠正自己亲定的冤案。崇祯十五年

(1642 年) 八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在文华殿听罢日讲后，召集周延儒、陈演、蒋德璟、黄景昉、吴甡等辅臣前来议事，拿出奏章问道，张溥、张采是怎样的人？周延儒说，读书的好秀才。明思宗问，张溥已经死了，张采不过是个知临川的小官，科道官为何尚说他好？周延儒答道，张溥颇有胸中书，也会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时读过他的文章，又以其未见得用而感到惋惜。不然，张溥已死，说他又有何用？明思宗不以为然地说，张溥为人，也不免太过偏执。周延儒便把话题扯到黄道周的身上，说张溥、黄道周都有些偏执，只是会读书，所以人人都感到惋惜。弦外之音是，张溥固然已死，但黄道周却还活着，他被弃而不用，难道不让人感到惋惜吗？明思宗听后沉默不语，因为直言无忌的右谕德黄道周，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为经筵展书官，由于得罪魏忠贤而归家赋闲。崇祯二年起复故官后，又两次遭到明思宗的贬斥。九年再度起复，后进右谕德。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黄道周被列名其中，但明思宗不用黄道周而用杨嗣昌等 5 人。黄道周连用三疏，弹劾杨嗣昌、兵部左侍郎陈新甲与辽东巡抚方一藻，接着又在文华殿召见时与明思宗发生争吵。明思宗以“朋党”的罪名将他连贬六秩，降为江西按察司照磨，寻又下旨将他与推荐他的江西巡抚解学龙逮至刑部，一并廷杖八十，然后下令将黄道周遣戍广西。蒋德璟、黄景昉见明思宗不表态，又站出来为黄道周求情。周延儒又补充说，黄道周在狱中尚写许多书，即便是以前的奏章，也都是亲手写的。明思宗只是面带微笑地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叹口气说：“安得将如岳飞者而用之！”周延儒赶忙接上话说：“岳飞自是名将，然其破女直（即女真）事，

史多虚张。即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天下惜之’。”蒋德璟也说：“道周在狱逾年，只是读书及感戴圣恩，曾手书《孝经》百卷，各有题跋。此人大要还在忠孝一边，还望皇上赦他。”明思宗说：“既是卿这等说，岂止赦他，就用他也不难！”八月二十六日，他特准黄道周赦罪复职，但黄道周已看透明思宗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虽进京泣谢皇上让他重见天日，却表示自己有犬马之疾，乞请离京调养。明思宗也不挽留，放他回乡养病。

不过，有些大臣对周延儒在这个多事之秋复出的前景并不看好。当初周延儒刚复出时，召请因弹劾温体仁而被斥的右庶子倪元璐出山，倪元璐便致书婉拒。他在回信中指出，皇上要求天下治平的愿望甚明，但此时已与宋朝司马光再度出任宰相的形势大相径庭。司马光再相，所要做的只是废除前朝弊政而已，只要一举手就会招来一片欢呼。但现今是要使已经熄灭的灶火重新燃烧，既要钻木取火，又要节省柴薪，真是难上加难。假如你向皇上建议减免赋税，皇上必然要求你首先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政开支；假如你向皇上建议宽宥官员的过失，皇上必然要求官员建立功业。但要财政充足和建立功业，都不是一日可以办到的。而天下百姓仰望于老先生的，恰恰是尽快减免赋税与宽恕过失，一天都不能拖延。即此一端，其艰难险阻，岂是司马光再相时所曾遇到过的？治理天下，要明确标与本的区别。今日民变蜂起在于民穷，人才缺失在于刑法过严，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治标不治本。与其天天忙于治标而标不得治，还不如由本及标，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以求治本之功！

当然，难与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百姓所求于老先生的，未必都是很难的事，而老先生所做的，也未必都是很容易的事。至于倪某，年老体衰，已办不了什么大事，何况家中还有 81 岁的老母在堂，万无走出虎溪（倪元璐老家地名，在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一步之理。

倪元璐之所以拒绝应召出山，年老体衰、家有老母需要照顾不过是借口，实际上他是敏锐地觉察到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医治，因而不愿出山。时势既已如此，而周延儒本人又是庸驽无材略且又生性贪婪的人物，身边聚集的一帮人又都是势利之徒，这就决定了他走向败亡的必然结局。

周延儒复出之后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基本上都是治标而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穷困这个根本问题。农民起义的烈火很快复燃，张献忠转战于四川、湖广，李自成更是挺进河南，攻克洛阳，进围开封，把农民战争推向高潮。清军则乘机再度越过长城，入犯京畿。面对这种危急的形势，周延儒束手无策，不仅在军事上无所谋划，而且，由他推荐派出的两员督师，都因缺乏军事才能而偾事，从而暴露其庸驽无才略的致命弱点。

崇祯十四年（1641 年）底，李自成第二次进围开封。明廷调集各路兵马驰援开封守军，在朱仙镇与李自成展开激战，其中力量最强的左良玉部竟率先逃跑，最后退守湖广襄阳。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再围开封。六月，以周延儒为首的大臣廷议，主张起用侯恂，令督左良玉再援开封。左良玉年轻时曾因犯下抢劫军装罪而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才在援辽战

役中崭露头角，从此步步高升而至大将。他们认为，由于这层关系，如令侯恂前往督师，左良玉当能听其调遣。但侯恂因“徇私养奸”之罪，已于崇祯十二年关进监狱。明思宗于是特旨把他释放出狱，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军，进行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认为此时的官军已经处于劣势，不宜主动寻求农民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但朝廷坚持要他先解开封之围，严令其调左良玉军向开封靠拢，侯恂只好命左良玉率部北上。左良玉深知自己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全军北上可能会有被歼的危险。他派部将金声桓先率 5000 士卒前行，充当侯恂的护卫亲军，同时捎信给侯恂，说他将亲统 30 万大军随后前来会合。左良玉部按编制只有 2.5 万名，他用招降纳叛的办法自行扩充至 30 余万。侯恂一听说是 30 万人马，回信说无法解决这么多人的粮饷，请他不必北上。明廷令侯恂督师以解开封之围的愿望，也就随之化为泡影。当年九月，河南的官僚眼看救援无望，挖开黄河大堤，水淹开封。闰十一月，侯恂也被罢官，重新被投进大牢。

类似督师而偾事的，还有一个范志完。范志完是周延儒的门生，崇祯十四年（1641 年）冬周延儒主政，将他由分巡关内佥事超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不久又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第二年正月，督师关外的辽东总督杨绳武病死，进范志完为兵部左侍郎，督师关外，而以张福臻督蓟镇，驻关内。六月，又易范志完头衔

为钦命督师，总督蓟、辽、昌、通等处军务，节制登、津抚镇。十一月，言官弹劾张福臻昏庸无能，建议移督师于关内，裁撤蓟辽总督。朝廷于是召回张福臻，令范志完兼制关内，移驻关门。范志完深知其任重大，再三推辞，未获批准，又请求致仕，也不准许，不得已上书请求仍设蓟辽总督。明思宗命赵光抃赴任。就在此时，清兵已越过墙子岭（在今北京密云东）、青山口（在今河北迁西东北）等处入侵，大举南下。兵部弹劾范志完疏于防备，明思宗以敌兵未退，令其戴罪立功。然而范志完毫无谋略，胆小如鼠，不敢一战，所在州县先后陷没。范志完不仅尾追清兵而不战，而且纵兵掳掠，残害百姓。清兵一路打到山东，抢掠之后于崇祯十六年四月由原路北归。范志完因此遭到言官的弹劾而下狱，后被处斩。

周延儒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贪婪成性。复出之后，他大肆招权纳贿，拉帮结派。名列逆案的冯铨，对周延儒的复出捐资出力，周延儒许诺让他到户部任职。消息一传出，舆论大哗。冯元飙劝说周延儒将兵部左侍郎吴甡引入内阁，共同掌管人事的任用权。周延儒暗中活动，促使明思宗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擢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但当周延儒向吴甡提起任用冯铨的事时，吴甡却不置可否，回头召见户部尚书傅淑训，告以逆案不可翻。周延儒这才发现吴甡骗了他，从此与之结仇。周延儒想起用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要引用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吴甡都加以阻挡。此后，两人各自拉起自己的小帮派，因吴甡是江北扬州府兴化人，周延儒是江南常州府宜兴人，这两个小帮派便分别被称为“北

党”和“南党”。两派互相倾轧，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使政局更加混乱。

就在“南党”与“北党”互相争斗之时，在北京出现了一份匿名的所谓“二十四气”的诽谤传单。传单列出当时活跃于政坛的 24 个人物，每个人名的前头冠以“杀气”“戾气”“妖气”之类的形容词，后面加上“两头蛇”“灰地蛇”“桃树精”等绰号，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名单的攻击对象，既有“北党”，也有“南党”，说明它是出自温体仁路线的获利者之手，旨在挑起事端，引发新的党争，既借以发泄对周延儒等一批阁臣中止温体仁路线的不满，又达到破坏其革旧布新的目的。

明思宗一向反对臣下结党，看到这份诽谤名单，下诏戒谕百官，特别严责言官，不得助长这种风气。礼科给事中姜埰以为皇上的这番谴责是受了“二十四气”传单的影响，便慷慨激昂地上疏明思宗，说陛下特别看重言官，所以对言官要求严格，但圣谕说“代人规卸，为人出缺”这种事，臣敢说言官中没有人做过，不知道陛下为什么会这样说。最近流传“二十四气”的流言蜚语，必定是大奸巨憝恐怕言官对他们不利，故意用激烈的言辞激怒皇上，利用皇上的怒气来钳制言官之口。但如果人人都沉默不语，谁来为陛下议论天下大事呢？此时的明思宗正被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姜埰竟敢诘难他的诏旨，更使他火冒三丈，下旨将其逮下诏狱，严加拷讯。锦衣卫镇抚官经严刑拷打，献上狱词。明思宗很不满意，说姜埰的罪情特别严重，而且“二十四气”之说，类似匿名文书，见到就应该立即销毁，怎么还在奏疏之中反复加以引述扩散呢？要求锦

衣卫再加审讯，从速查明其动机。

正在此时，又发生了行人司副熊开元准备状告周延儒未成而下狱的事件。

熊开元原先在吴江担任知县时，仰慕张溥的学问名声，大力支持张溥在吴江县的尹山召开复社成立大会，颇受江南名士的赞赏。周延儒复出后，他升任京官，出任行人司副。他见别人升迁很快，希望升任更高的官职。恰好光禄寺亟缺人，便找周延儒请求帮忙。不知何故，周延儒没有办成这件事，从而引起他的不快。清军入塞骚扰京畿地区，明思宗下诏求言，凡官民陈言者，可至会极门报名，即日召见。熊开元认为机会来了，第二天赶到会极门报名，准备向皇上论劾周延儒。不料，待他进入文昭阁，却见周延儒站在皇帝旁边。他不好当面弹劾周延儒，只敷衍了事地谈了一些军事方面的意见就退了出来。

过了十来天，熊开元再次请求明思宗召见。没想到他在夜间跟随辅臣走进德政殿，又见到周延儒，便奏道，《易经》上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辅臣暂时退避一下。周延儒等辅臣再三表示要回避，明思宗不许。他无可奈何，只得上奏，陛下孜孜求治 15 年，天下却越来越加混乱，其中必有原因。明思宗问原因何在。熊开元答道，现在朝廷所谋划的，都集中在筹措军饷、平定外患内乱。这是本末倒置，就算整天整夜不吃不睡，也不可能求得天下大治。陛下登基以来，辅臣多至数十人，这些人只是陛下说他们贤能、左右说他们贤能而已，封疆大吏和国人未必认为他们贤能。皇上把他们作为心腹股肱任用，而庸人在高位，相继为奸，导

致人祸天灾的频发，至今都没有停止的迹象。等到言官揭发他们的罪行，皇上再加以诛杀或罢斥，政局的败坏已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明思宗听出他话中有话，再三诘问他是不是想推荐什么人。熊开元一再申辩说没有，但却不时睥睨在场的周延儒。周延儒看出他是想指控自己的无能，连忙向皇上谢罪。明思宗却说，天下不治，都是朕的过错，与你们大臣有何相干！熊开元这才把话挑明，说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时面奏政事得失，但辅臣站在左右，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而招来祸殃。况且，昔日的辅臣繁刑厚敛，摒弃忠良，贤人君子群起而攻之；现今的辅臣奉行德政，释放狱囚，蠲免欠赋，起用废籍，偶有不平之事，大家不过私下感叹几声而已。明思宗责备熊开元藏有私心，说话吞吞吐吐。熊开元忙为自己辩解，接着又要求皇上召集廷臣，问问他们对辅臣的看法，说陛下如果不察，将吏碍于情面或收受贿赂，失地丧师，也不惩处，谁还为陛下捐躯报国呢？周延儒等辅臣连忙说，碍于情面的事不能说全无，但收受贿赂之事绝对没有！熊开元又说，敌兵入口 40 多天，怎么不见逮捕、处罚一名总督、巡抚？明思宗说，总督、巡抚会推之时，人们都说其贤能，几个月后又说其无能，必欲去之而后快。边地与内地不同，短短几个月怎么叫人施展才能？熊开元还就督、抚的任用提出种种责难，明思宗听得不耐烦，命他退出。临走时，周延儒等辅臣让熊开元将其未尽的意见，写成书面文字呈上。

周延儒担心熊开元再上奏疏于已不利，当即吩咐亲信，进行阻挠。大理寺卿孙晋、兵部侍郎冯元飙找到熊开元，责怪他说，首辅多引用贤能之士，他要是离职，这些贤能之士都将全部下台。大理

寺丞吴履中也责备熊开元做得太过分。礼部郎中吴昌时，是熊开元当吴江知县时提拔上来的士子，他也给熊开元写信进行劝告。熊开元接受他们的意见，决定不再状告周延儒，只是浮皮潦草地写了一份奏疏皇上。明思宗当时正宠信周延儒，而且正为清兵未退而发愁，见到他不痛不痒的这个奏疏，勃然大怒，觉得在形势危急之际，他反复要求召见，结果谈的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这不是成心捣乱吗？于是命锦衣卫将他逮入诏狱，严加审讯。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是经周延儒的荐举而出任此职的，但他入掌锦衣卫后，结交宦官，了解到周延儒许多阴私丑事，因此对周延儒逐渐产生不满。而熊开元又是骆养性的同乡，他不愿加以深究，第二天就草草地向皇上递交审讯报告。明思宗更加生气，说熊开元诬告辅臣，是想使朕陷于孤立，便于他结党营私，背后肯定有人指使。骆养性对熊开元不施加重刑，是严重的失职。骆养性受到皇上的严厉谴责，只好动用重刑，再行审讯，追究其背后的主谋。熊开元实在没有主谋可供，索性大量揭发周延儒的隐私。明思宗下令对其施行廷杖，然后关进诏狱，并嘱咐骆养性，悄悄在狱中将姜埰、熊开元击毙了事。骆养性未敢轻率从事，征求同僚的意见。同僚提醒他，天启年间锦衣卫的长官田尔耕、许显纯滥杀无辜，结果都没有好下场。骆养性感到害怕，更不敢执行皇上的密旨，而是故意将它泄露给言官廖国遴，廖国遴再透露给同僚曹良臣。曹良臣遂上疏弹劾骆养性，说皇上绝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密旨。即使有这样的密旨，也不应该泄露，要求皇上立即处死骆养性和熊开元。明思宗因此十分被动，只得扣下这份奏疏。事情不了了之。

姜埰、熊开元因为向明思宗进谏而获罪下狱，许多大臣感到愤愤不平，纷纷站出来为之求情。

崇祯十五年（1642 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明思宗在中左门召对内阁、五府、六部、科道等部门大臣，讨论抵御清兵事宜。临近结束，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作为六科之长，首先站出来为姜埰说情，说同官姜埰干犯天威，是臣等的罪过，但他一向清苦，居官勤谨，身体孱弱多病，伏望圣恩宽宥。明思宗回答说，目今贼兵内犯，将近两月，既不能截之于外，又不能剿之于内，任其焚劫淫掠，惨不忍言。说着说着，竟掉下眼泪，一脸悲戚。接着说，姜埰不遵朕之谕旨，反来诘问朕，怎么能不从重处理？你们言官以言为职，当言的不敢言，却敢于欺藐朝廷。“二十四气”之说，是匿名传单，见到的就应该销毁，姜埰反而在奏疏里一再提起，就不得不问罪。吴麟徵不好反驳皇上的话，只能说，言官只管言事，至于言之当否，称职不称职，自听朝廷处分。随后，吴麟徵又把话题转移到熊开元身上，说熊开元亦以奏诘周延儒得罪，虽是出位妄言，但谚语说得好，“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贤相”，封疆事败坏至此，岂得不责备首辅，这也是人情之所必至。但是，明思宗硬说熊开元假托机密，阴行谗谮，以小加大，以贱凌贵，此风不可长。

户部尚书傅淑训也站出来为姜埰、熊开元说情，明思宗的一句“面谕甚明，不必申救”，就把他给顶了回去。

一向耿直敢谏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仍不死心，接着站出来申救姜埰、熊开元。刘宗周，字起东，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进士，选为行人。他安贫乐道，敢怒敢言，曾入东林书

院讲学，也曾参与邹元标、冯从吾的首善书院。昆、宣诸党攻击东林，他上疏说东林党人高攀龙等有国士风，“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天启年间，因屡疏指斥阉党分子，推荐东林党人，每每遭到阉党的排挤，天启四年（1624 年）被削籍为民。明思宗继位后，召为顺天府尹，入京即上疏批评皇上求治太急。不久，后金八旗兵进逼京畿，又上疏说国事危急，诸臣固然负有责任，但皇上亦难辞其咎。后因病辞职。崇祯八年（1635 年）七月，内阁缺人，吏部推举孙慎行、林钎及刘宗周 3 人入阁。刘宗周固辞未允，于次年正月入京。当时孙慎行已死，他与林钎一道进见皇上，又当面批评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明思宗感到如芒刺背，命林钎入阁为大学士，而将刘宗周改任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刘宗周再次上疏，批评皇上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明思宗更加恼火，谕阁臣拟严旨斥责。阁臣拟了 4 次，明思宗都不满意，又将他的奏疏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语气虽然尖锐，但透着忠直之情，于是降旨诘责一通了事。当年十月，刘宗周又上疏，认为造成“朝政日隳，边防日坏”的祸根是“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也就是重用宦官而内阁无为。前者是批评明思宗，后者是批评首辅温体仁。明思宗怒不可遏。温体仁又上疏力诋刘宗周，明思宗遂下旨将其贬斥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称旨，明思宗想起刘宗周，说他清正敢言，可用也。刘宗周固辞不允，翌年八月被任为左都御史。他见科道官与户部尚书申救无效，又挺身而出，滔滔不绝地奏道，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获罪，逮下锦衣卫狱。陛下度量卓越，像狂妄之臣宗

周、戆直之臣黄道周，都能宥过起用，二臣何其不幸，竟然不获法外之恩？明思宗回答说，黄道周有学问、有操守，非二臣可比！刘宗周又说，二臣诚然比不上黄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可用则用之，言不可用则置之，即使有应得之罪，亦应交付司法部门惩治。现今交付锦衣卫诏狱，实行朝廷私刑，终于国体有伤。明思宗大怒，说三法司、锦衣卫都是为朝廷执法，何公何私？且惩治一两个官员，怎么就伤了国体？刘宗周回答说，锦衣卫的人都是膏粱子弟，根本不懂礼义，只会听从宦官役使！明思宗更是火冒三丈，大声喝道，如此偏党，哪配当监察官！内阁首辅周延儒、都察院左都御史金光辰、兵部尚书张国维先后为刘宗周辩护，明思宗反而说，熊开元的奏疏背后肯定有人主使，想必就是刘宗周。冯元飙、金光辰、工部尚书范景文等都跪在地上求情，明思宗不仅不听，反而命令将金光辰同刘宗周一并加以惩处。第二天，下旨将金光辰贬三秩调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明思宗斥责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失职，将姜埰、熊开元之案转交刑部审理。新任刑部尚书徐石麒认为骆养性并未失职，根据原告的审讯口供拟定出处理意见：熊开元以钱赎徒刑之罪、姜埰谪戍。明思宗不满意，把徐石麒革职。姜埰、熊开元便一直关在刑部狱中。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 年）初，才将姜埰流放宣州，将熊开元流放杭州。

“二十四气”的匿名传单与姜、熊的案件，使吴甡“北党”与周延儒“南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出来，一向反对臣下结党的明思宗自然不会坐视不问。崇祯十五年（1642 年）三月，明思宗以襄阳、

荆州、承天连续落入李自成农民军之手，召对廷臣，流着眼泪请内阁大学士吴甡前往湖广督师，但吴甡提出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商议这个方略那个方略，迟迟不肯动身。明思宗极为恼火，说你再这样拖下去，敌人的退兵又都集中起来，你去了又有何益？到了五月，吴甡才被迫动身，过了一宿又被叫了回来。吴甡惶恐不安，连上两疏引罪，皇上许其退休。走到半路，又遭到辅臣陈演和骆养性的弹劾，被叫回京城，交三法司议罪，于十一月被谪戍云南金齿（在今云南保山南）。

周延儒也在劫难逃。崇祯十五年（1642 年）六月，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秘密议和的消息泄露，朝廷上下闹得沸沸扬扬，要求明思宗从重惩处陈新甲。周延儒作为首辅，明知议和是明思宗默许的，本应站出来替皇上承担责任，但却始终保持沉默，迫使极好面子的明思宗下诏处死陈新甲。明思宗也因此进一步看清周延儒的庐山真面目，对亲信大臣说："朕恨其太使乖！"

当年十一月初，清兵越过长城墙子岭等处南下，京师戒严，首辅周延儒拿不出御敌的方略，惊慌失措，只在石虎胡同口集中几百个和尚、道士，搞了个在"大道法场"念诵《法华经》的闹剧。崇祯十六年（1643 年）四月初，朝廷得知清兵在饱掠之后准备北撤，明思宗召见周延儒等辅臣，表示他要亲征。周延儒及次辅陈演、蒋德璟先后跪在地上请求代皇上亲征，明思宗都大摇其头。周延儒再次请求到前线指挥作战，明思宗这才表示同意，由他以阁部督师，阻断清兵归路，务期尽剿，无令生还。周延儒不得不启程赶赴通州。他见清军势大，根本不敢进行追击，只让明军士卒在道路两旁和清

兵后面不停鸣枪恫吓而已。当时天气逐渐转热，从小在东北山林里长大的清兵害怕炎热的天气，把掳掠来的金银财宝装载在车马之上，沿着涿鹿至天津300里地的各条大道，匆匆忙忙地往北撤退。周延儒却躲在通州城里，和前来勤王的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四总兵以及随征的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四大臣等大摆宴席，饮酒作乐。五月，清军退尽，他竟上书奏捷，明思宗也公然给他加封太师，荫子中书舍人，赐给银币、蟒服。周延儒推辞了一番，最后许以辞去太师之衔。有山人题诗讥讽曰："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

过了几天，骆养性和宦官派到前线的情报人员回到京城，汇报了周延儒在通州督师的真实情况。明思宗大为恼怒，令五军都督府及兵部审查议罪。周延儒自知罪行深重，自请戍边。明思宗说他"报国尽忱，终始勿替"，下旨"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这样，周延儒算是免于一死，得以荣归故里了。在返里途中，他不时想起辅臣蒋德璟偷偷告诉他皇上说的一句话，"朕恨其太使乖！""太使乖"，也就是太过精明、工于心计的意思。记得当时自己对蒋德璟道出了一句心里话："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侍侯这样一位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极好面子、听不得逆耳忠言的君主，不使乖，又能怎样呢？他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明白，面对这样的皇上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

不久，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又遭到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縯祚的弹劾。清军南下山东之时，雷縯祚驻守德州，曾上疏揭发范志完纵兵淫掠，克扣军饷，结交"大党"。明思宗以淫掠之事斥责兵部，

而令雷缤祚再详细陈奏。雷缤祚看到范志完是周延儒的门生，有所顾忌，一直拖着没有再奏。到了五月，他见周延儒被五军都督府与兵部议罪，鼓起勇气呈上第二份奏疏，详细陈述范志完在山东不敢同清军交战，却纵兵掳掠、克扣军饷的罪状，说这样一个贪腐渎职、无德无才之徒，从一个小官员骤升至总督，如果没有其座主这个"大党"做后台是不可想象的。奏疏还说："若夫座主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明思宗下旨逮捕范志完。

紧接着，在六月，兵科给事中郝絅又上疏，弹劾已调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吴昌时及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连仲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充当周延儒干儿子的劣迹丑行。奏疏称，凡是内阁票拟，事关机密，他们都事先知道。周延儒是天下之罪人，吴昌时、周连仲又是周延儒之罪人。御史蒋拱宸也上疏论劾周延儒，说吴昌时入周延儒之幕府，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为，赃证累累，万目共见。有一场科举考试，考中的不是周延儒的亲戚，就是用重贿买通关节之人，都是通过吴昌时经手办理的。周延儒之弟周肖儒，之子周奕封公然列名榜上，毫无顾忌，以致白丁和浑身铜臭的汪庶、陈咨稷等人，也夤缘登榜。奏疏最后还揭发吴昌时交通内侍李瑞、王裕民，泄露机密。

对范志完、吴昌时等人的弹劾，都涉及已经退休的周延儒，明思宗决定查个水落石出。他先召雷缤祚进京，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初八日在中左门召开御前会议，令其与范志完当面对质。对质中，明思宗特地问雷缤祚，疏中所说"称功颂德，遍于班联"，

指的是谁。雷缜祚回答说，指周延儒。并且，进一步揭发周延儒招权纳贿的罪行：起用废籍、清理狱囚、蠲免租税，皆以为己功；借考选科道官之机，网罗门生；卖官鬻爵。凡是想求得官职的，都得先向其幕僚董廷献行贿。欲求巡抚、总督之职，得先送上 2 条玉带、13 颗珍珠。如获成功，再给周延儒家送上巨额贿赂。明思宗大怒，将董廷献下狱，并将范志完处死。

七月二十五日，明思宗又穿上素服，带上太子朱慈烺和定王朱慈炯，在中左门亲自廷审吴昌时。吴昌时是浙江嘉兴人，有干才，曾为复社的发展和周延儒的复出出过力，被周延儒倚为心腹。但他为人贪墨而自傲，结交厂卫，把持朝政，同朝官员都忌恨之。廷审开始时，明思宗声色俱厉地喝令他上前，诘问其交通内侍的罪行。吴昌时矢口否认。明思宗命御史蒋拱宸当面对质，不料蒋拱宸为廷审的森严气氛所吓倒，匍匐在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明思宗将蒋拱宸斥退。吴昌时更加有恃无恐，说皇上想以此罪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但要臣屈招，则实不能。明思宗命锦衣卫用刑。辅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劝阻，说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乞将吴昌时交司法部门审讯。明思宗不听，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如果离开这三尺之地，谁敢依法从公审问？蒋、魏二辅臣只好退而请求不要在殿陛之上用刑，说此诚三百年来未有之事。明思宗却说吴昌时亦三百年来未有之人，坚持让内侍对吴昌时用刑。吴昌时的两条小腿皆被夹断，呼号之声响彻殿陛，直至昏迷，不省人事。在场的大臣私下叹息道，国家元气尽矣！明思宗命人将吴昌时拖进锦衣卫诏狱，不久传谕以“把持朝政，奸狡百端”的罪

名将其处斩。

在廷审吴昌时之时，有的大臣议论，说吴昌时不过是幺魔小吏，何必如此大动干戈？明思宗回应道，吴昌时是幺魔，难道周某也是幺魔？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狠整吴昌时的目的，是为了整治其后台周延儒。《明史·周延儒传》就说，明思宗廷审吴昌时之时，“始有意诛延儒”。果不其然，不久他就下旨，令锦衣卫派差役把周延儒从宜兴押解来京候审。

周延儒在家乡得到消息，预感此去必是凶多吉少，一把大火将他贮藏珍宝的三楹楼阁烧个精光。然后收拾简单的行装，由锦衣卫的差役押解进京，关押在崇文门外头条胡同的关帝庙，次日转移到正阳门内的关帝庙。周延儒上疏乞哀，明思宗坚决不答应，命三法司在 3 天内审议定罪。大理寺卿凌义渠主张从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和刑部尚书张忻主张从宽，后来采取折中方案，作出将周延儒发配边疆充军终身的判决。明思宗认为判罚过轻，亲自拟旨：“姑念首辅一品大臣，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处勒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辅臣蒋德璟等纷纷为之求情，明思宗说，“勒令自裁”已是从轻发落。十二月，吴昌时被推出斩首，周延儒在关帝庙上吊自缢。周延儒平日非常惜命，长期服用人参，断气之后四肢仍然温润如生。监刑的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怕他未死，命差役用铁钉钉入其脑门，才回宫复命。

周延儒复出之后短暂的中兴之梦，对于明王朝来说，犹如人之将死前的一幕回光返照。随着周延儒的自裁，中兴之梦彻底破灭，明王朝统治的末日很快也就到来了。

第八章
清军夺占辽西与明清议和的失败

第一节 皇太极迂回入犯内地

为了对付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军，明廷动用了宣府以西几个边防重镇的精锐之师，有时甚至动用保卫京畿的通州、昌平驻军和京营禁旅，对东北后金的防御力量相对削弱，这给了后金皇太极以可乘之机。

皇太极在大凌河之战后，继续执行其避关外、扰关内，迂回袭扰，摧残明朝腹地，削弱明朝军事实力，再伺机与之决战的作战方针。继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 年）第一次绕道内蒙古入边，突袭京师之后，又于崇祯七年五月，第二次绕道内蒙古，突袭宣府、大同。明思宗担心后金兵东向进击京师，宣布京师戒严，命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关，保定都御史丁楚魁等守紫荆关、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西北雁门所西雁门山上），并调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兵两万，分道往援大同，还命宣大等地“严备固守”。但后金军队仍如进入无人之境，深入到冀晋北部，纵深至山西中部，攻围大小 50 余座镇、台、堡，至闰八月初饱掠而去。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 年）九月，后金大将多尔衮率军出征察哈尔凯旋，带回林丹汗之子额哲保存的元朝传国玉玺。至此，皇太极继承汗位已届 9 年，朝鲜“称弟纳贡”，漠南蒙古被彻底驯服，黑龙江流域也被统一，明朝屡经攻击已是气息奄奄，后金已经具备夺取中原的实力。传国玉玺的获得，更有着“天命”有归的意味。皇太极于是决心攻入中原，与明朝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天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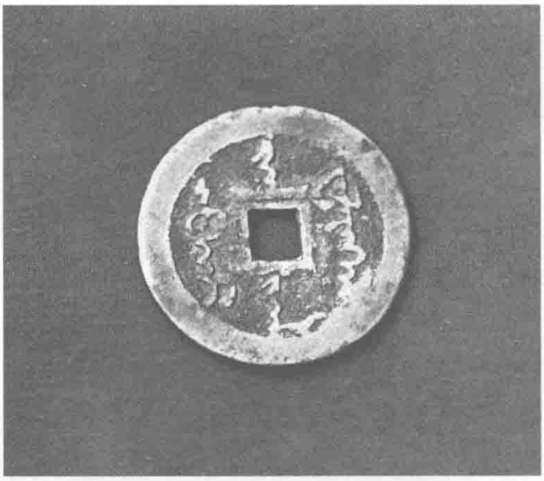
九年，他下令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以掩盖曾经臣服明朝的历史。第二年四月，按照汉族最高统治者的传统，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以示其夺占中原、取代明朝的决心。

就皇帝位的大典刚刚结束，为了掠取人畜财物，并试探京师附近的明军实力，皇太极决定由武英郡王阿济格为统帅，对明朝发动第三次入边袭扰的战争。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 年）四月，阿济格率 10 万满洲八旗精骑进至大同、宣府长城脚下，六月十六日分三路进入喜峰口（在今河北迁西北）。巡关御史王肇坤拒战失利，退保昌平。阿济格纵兵进击，攻占居庸关、昌平北路。大同总兵王朴急往驰援，与当地军民浴血奋战，击杀敌兵 1104 名，收纳降丁 143 名，但清军仍于七月初三分路会师于延庆，然后突入居庸关，进围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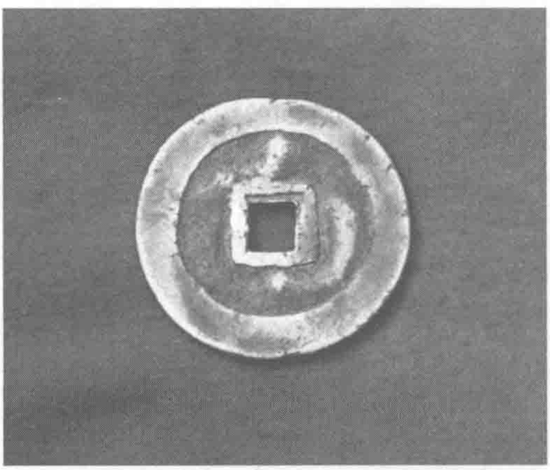
七月初三日，明思宗宣布京师戒严，并针对清军自宣、大入侵的进军路线，命宦官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在今山西五台东北），崔良用守固关。得知清军入居庸关、围攻昌平的消息，又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遣司礼太监魏国征守卫埋葬着明朝诸帝的天寿山。清军从西山抄小道进抵昌平，利用降丁做内应，攻占昌平。阿济格令清军放火焚烧明熹宗的德陵，然后率兵进逼西山，攻巩华城。守将姜瑄以火炮迎击。阿济格见巩华城城守坚固，一时难以攻下，决计南下。临走之前，又仿效皇太极使用反间计的做法，写信给曾经投降后脱逃而回的明副总兵黑云龙，约为内应。黑云龙将来信上交朝廷，以表自己的忠心。明思宗这次未再上当，召谕黑云龙说，朕熟悉敌人的计策，已当



《清太宗皇太极朝服像》轴



满文“天聪通宝”（正面）



满文“天聪通宝”（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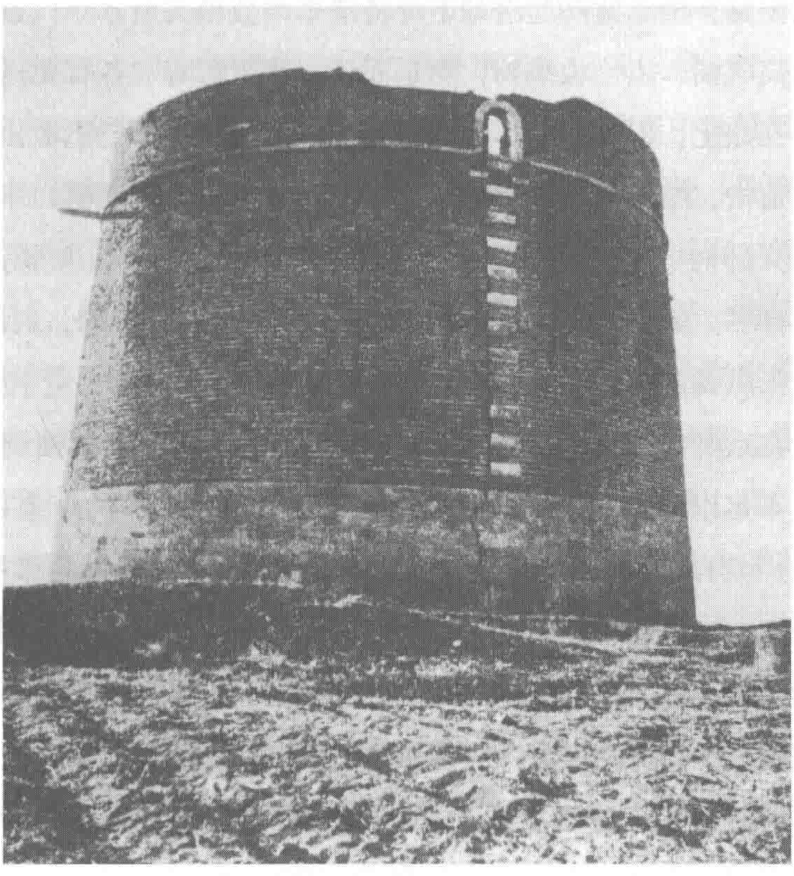
着群臣的面把阿济格的信件烧掉了，你尽管放心！不过，阿济格的来信倒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诱敌深入，痛加歼击。黑云龙果然将计就计，设伏引诱清军，斩杀无数。阿济格遂举兵南下，侵掠良乡。

七月初十日，叛变的昌平降丁迫近西直门，驻屯清河、沙河的清军也陆续南下。震惊不已的明思宗急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师各大门，并令兵部檄调山东总兵刘泽清5000人，山西总兵王忠、猛如虎4000人，山永总兵祖大寿5000人，大同总兵王朴、保定总兵董用文各5000人，关、宁、蓟、密各总兵祖大乐、李重镇、马如龙共1.7万人入援。调兵檄文发出后，明思宗见京城斗米300钱，物价飞涨，深感忧虑，又召见廷臣商讨防御之策。但大臣提出的却是禁止买卖、破格用人、列营城外、收养民间老弱等不着边际的建议，明思宗更主张廷臣捐俸助饷，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向才鄙而怯、巧于趋利避患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只得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出师，与宣大总督互为犄角。明思宗批准他的请求，赐尚方剑，给赏功牌500个，令监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总兵祖大寿为提督，与山海关总兵张时杰皆属高起潜指挥。

当明思宗召集廷臣商讨攻防之策、调兵遣将之际，阿济格采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攻占定兴、房山；八月，又连下文安、永清，分兵攻漷县（今北京通州区东南漷县镇）、遂安、雄县；不久，又从雄县奔赴涿州，遭到刘泽清的阻击；又转攻香河；再返回涿州，攻克顺义；复至昌平，向东北攻至怀柔、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西北），分兵屯密云、平谷；又返回雄县，再向北袭扰掳掠。



《清太宗皇太极朝服像》轴



明沙河驿烽火台旧照

清军入塞一个多月，迭克12城，俘获人畜179820，督师张凤翼和宣大总督梁廷栋只是尾随清兵，不敢出战，最后驻屯于迁安之五重安，固垒自守，经旬不出。九月初一日，清军出建昌冷口，携带大批人畜财物北返。冷口守将戴秉德竭力主张固守关口，堵截清军的归路，但总监高起潜却下令待清军半数出关后才予以截击。清军趾高气扬，俱艳妆乘骑，奏乐而还，并将写着“各官免送”的木牌扔在路上，以嘲讽明军的将官。高起潜估计清军已悉数出关，才下令追击，结果仅斩杀3名清兵而还。张凤翼想起崇祯初年己巳之变后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而死，还被处以大辟之刑，自知罪责难逃，饮药自尽。梁廷栋随后也自杀身亡。后来，因言官弹劾，刑部论罪，罢免张凤翼官职，梁廷栋处大辟之刑。但梁廷栋已死，免于施行。

在京师戒严之时，明思宗担心仅从北方几个边镇抽调兵力援京，不足以抵挡清军，还抽调正在郧西围剿农民军的卢象昇入京。但待卢象昇抵京，清军已经退去。明思宗遂诏擢其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赐尚方剑，以加强山西、宣大的防御。同时告谕兵部，说清兵今年饱掠而去，明年还会再来，练兵买马、制器修边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应该认真落实、抓紧抓好。为此，他特令兵部向武清侯李诚铭借银40万两，发往关、宁置备装备；向驸马都尉王昺、万炜、冉兴让各借银10万两，发往大同、西宁；还令工部向太监田诏借银10万两，置备甲胄；借魏学颜银5万两，修缮军营。所借之银，待战事平息、国库有余再如数偿还。如果尚义乐捐，则从优奖叙。名为借贷，实为捐助。

面对关外清军日益频繁的入犯和内地农民起义烈火越烧越旺的

局面，明思宗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把沿边兵力都抽往内地征剿农民起义军，边防空虚，清军的入犯将更加频繁，京师不保；从内地抽调兵力加强北方的防御，农民起义的烈火将烧得更旺。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他苦思焦虑，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月初三日，明思宗便借考选内阁辅臣的时机，在中极殿召见众大臣，就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出了一道策试题，让大家发表意见。接替张凤翼就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在答卷中继续发挥他在《敬陈安内第一疏》中的观点，主张必安内方可攘外。他列举三个历史典故，以古喻今：东汉建武年间，光武帝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批准呼韩邪单于的求和，实现与匈奴的和好；唐元和年间，魏博镇田兴来降，唐宪宗采纳李绛之议，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以百十万缗钱犒赏军士，减免六州百姓一年赋役；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连遭败绩，宰相张齐贤上疏，强调要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所举事例两正一反，旨在说明必安内方可攘外，暗示必须与清朝议和，以便集中全力剿杀农民军。

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伦理，历来讲究“华夷之辨”，宋朝就因对辽、金的议和而累遭后人的唾骂。五月十五日，给事中何楷、钱增和御史林兰友相继上疏弹劾杨嗣昌。何楷上疏指出杨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申市赏（即议和）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申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申不敢用兵之说也”，希望引起国人的警觉。明思宗对这些奏疏一概置之不理，因为与清朝的议和活动此前已在秘密地进行着。

原来，杨嗣昌在就任兵部尚书后，为了实施围剿农民军的“十

面张网”之策，他已暗中指使辽东巡抚方一藻派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方去试探口风。皇太极予以热情接待，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奏报，对明思宗说，既然对方同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到宁远谈判，免得京畿年年遭到惊扰，可以腾出手来尽快平定流“贼”。他要求皇上允许方一藻、高起潜“便宜从事”。周元忠返回宁远，带回皇太极给高起潜的信件，说“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方一藻上疏说，“势危兵弱，边腹交疲，绝款（拒和）尚宜详酌”，建议与清朝举行议和谈判。杨嗣昌也上疏说：“臣以练兵为正道，开市（议和）为权宜，舍此而以陵京频试边锋，臣不敢知。”明思宗在内心深处赞同杨嗣昌的主张，觉得这是当前唯一可行之策，但又不好明确说破，一来担心有失君主的颜面，损威失体，二来害怕承担责任。万一将来出了问题，臣民追究起来，一切罪责都得由自己来担当。经过反复考虑，他模棱两可地指示方一藻、高起潜“细酌”。心想，如果将来事情办成了，当然是自己发纵指示的功劳；如果办砸了，可以把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同自己毫无关系。杨嗣昌看透了明思宗的心思，再次上疏，请求皇上明确表态，批准“允行”，说唯有如此，“边臣乃敢从事”。到了六月，皇太极派人向方一藻催促议和。方一藻奏报朝廷，建议仿效隆庆五年（1571年）与蒙古俺答汗议和之例，与皇太极议和。

六月十八日，明思宗不顾许多大臣的抨击，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薛国观、方逢年为礼部尚书，范复粹为礼部侍郎，俱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杨嗣昌仍兼兵部尚书，执掌兵部。杨嗣

昌是在丧服未满之时由皇上下诏夺情起复为兵部尚书的，他入阁后，又以夺情起复丧服未满的陈新甲为宣大总督。何楷、林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立即抗疏指斥。黄道周更是连上三疏，其中一疏抨击方一藻议和，另外两疏弹劾陈新甲夺情起复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夺情入阁。他力斥杨嗣昌的议和主张："无论建虏（指满洲）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欵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明思宗遂于七月初五日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叫杨嗣昌与黄道周展开辩论。辩论中，明思宗不作表态。辩论结束后，他先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没有处理好当前局势，不能激发大臣忠公为国之心，接着便批评大臣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任用一位大臣就百般诋毁。最后宣布将黄道周连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也皆给予降职处分。

明思宗虽然以提升杨嗣昌的职权、惩处抨击杨嗣昌的官员等举措，来表明他支持杨嗣昌必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但他毕竟没有对议和问题明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也不敢擅自做主，贸然行动，与清朝的和议活动便戛然而止，不了了之。

皇太极见与明朝的和谈无果而终，果然将其“夏秋必有举动”的声明付诸行动，发动第四次迂回入边的战争。九月，由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阿巴泰统领的左翼兵，从青山关突入长城；由贝勒岳托、杜度统领的右翼兵，从墙子岭口入边。两路大军约定在通州会合，然后南下。皇太极则亲统满洲、蒙古八旗兵向山海关进发，以牵制明军。

十月初二日，明思宗下令京师戒严，征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命宣大总督卢象昇麾下的总兵杨国柱、虎大威进抵易州（今河北易县）作为左翼，调登莱、天津的兵马作为右翼，檄山东总兵刘泽清遏其前锋，高起潜为应援。同时，命卢象昇总督天下援兵，赐尚方剑，保卫京师。当时卢象昇正在服丧，他连上五疏乞求奔丧，明思宗不允，于七月初一日下旨加卢象昇兵部尚书衔，照旧总督天下兵马。卢象昇只好率军誓师，赶赴京郊。十月初四日，明思宗在武英殿召见文武大臣及卢象昇，问卢象昇有何御敌方略。他答曰，命臣督师，臣意主战。明思宗大不高兴，说朝廷原无说抚（议和），说抚乃外廷之议。卢象昇便简要地讲了他的想法："敌之所忌，着着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也；趋神京以撼根本，可虑也；分兵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也。厚集我兵备之，则寡发而多失；分兵四应，则出而无功。兵少则不备，食少则生乱，此御之难也。"末了表示："臣枕戈待战，望中枢（指兵部尚书杨嗣昌）勿掣臣肘。"明思宗激励了他几句，命他与杨嗣昌商议。卢象昇主战，杨嗣昌却劝说不要浪战。两人谈不到一块，卢象昇只好起身拜别，返回昌平。

十月初五日，卢象昇以3万兵马扼守昌平。此时清军已绕过京师北面，从京西向南挺进。卢象昇令诸将各选劲卒，于十五日夜分兵四路，袭击敌营。总监高起潜闻讯却写信劝阻，说什么只听说过雪夜下蔡州，未曾听说过月夜搞突袭。他还提前把夜袭指挥官总兵陈国威调往东路。为了避免高起潜的掣肘，卢象昇要求分兵应敌，自己驻守昌平，高起潜驻守通州。明思宗于是下旨将宣、大、山西

的 3 万军队划归卢象昇统辖，关宁入卫的 4 万军队划归高起潜统辖。但不久，明思宗又令卢象昇赶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剿。杨嗣昌担心引起卢象昇的误会，怀疑他在暗中捣鬼，力劝明思宗维持原先的分兵方案，并主张卢象昇不宜赴通州，而应驻扎德胜门外。随后，他还特地出城，到卢象昇军营向他解释。但卢象昇仍认为杨嗣昌从中作梗，气愤地说，公等坚意抚款，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且卢某受尚方剑，京师口舌如锋，倘若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马就到。纵使不畏祸，难道就不顾惜披麻戴孝之躯，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全失，有何颜面立于人世？还说，舍战言和，非卢某所知见！杨嗣昌辩解道，我从未言和。卢象昇说，周元忠赴江东议和，数日往来，其事虽由方一藻、高起潜具体操办，但在背后指使的却是你兵部尚书。此事国人共闻，谁能隐瞒？两人遂不欢而散。

就在明军诸将帅内部互相猜疑争吵之时，清军已于十月十二日逼近通州，随后即在通州两路会师。十五日，卢象昇仍按原定的计划，于夜半向清军营地发动突袭。先头部队开战奏捷，但因担任指挥的总兵陈国威被调走，指挥失灵，后续部队在孙堠被击败。同一天，高起潜部将刘伯禄在卢沟桥与清兵接战，也失败逃回。十九日，明思宗命诸大臣分守京师九门，同时召孙传庭出潼关，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征剿农民军之兵入援。孙传庭急遣白广恩等率兵万人出关，总督洪承畴以左光先、马科、贺人龙等领 4 万人继出潼关，合共 15 万兵马北上救援。

十一月初三日，京师闭门自守。初五日，清军攻占良乡，进击

涿州，然后分兵三路向南深入，一由涞水出易州，一由新城（在今河北新城东南）出雄县，一由定兴出安肃（今河北徐水）。明思宗在清军四处攻掠之际，再次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如何退敌的问题。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现今敌兵已经临近都城，朝廷尚无定议，不知是战还是款。明思宗问，谁说要款。范淑泰说，外间都此议论，况且凡是涉及警报，朝廷都秘不许传抄，讳莫如深。明思宗说，军事机密禁止传抄，并非有什么隐讳的事。翰林院编修杨廷麟又说，清军尚未犯塞之时，高起潜、方一藻都说当款，杨嗣昌也说当款；吴阿衡（总督蓟辽兵部侍郎）说款必可恃，杨嗣昌也说款必可恃。他们无不表里煽谋，宣情泄弱。其意在指责杨嗣昌等人以款致敌。明思宗大怒，当场把杨廷麟降为兵部赞画主事，命往卢象昇军营去当参谋。

内阁首辅刘宇亮见明思宗对清军入塞十分忧虑，自请出京督察军情。明思宗立即批准，将卢象昇革职听勘，命刘宇亮代行总督之职。不懂军事的刘宇亮急忙找薛国观及杨嗣昌帮忙。经杨嗣昌反复劝说，明思宗才收回成命，令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明思宗又剥夺卢象昇的兵部尚书衔，让他以侍郎衔总督军务，仍与高起潜一起戴罪御敌。

十一月初九日，清兵进攻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是大学士薛国观的亲信，只身悄悄逃离县城。已致仕家居的少师、大学士孙承宗虽无守土之责，却率全家儿孙挺身入城，领导高阳军民顽强抗击清军。他们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地击退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握有重兵的高起潜，此时就驻在百里之外的容城

县，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经过一天的激战，城中炮石竭尽，敌军终于攻上城墙，俘获了正在北面城墙指挥作战的孙承宗，将他押到城南3里的圈头桥兵营。清将包括他昔日的部将、已经降清的登州参将孔有德反复劝降，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为所动。最后，孙承宗在一片苇席上向北面的京师行三叩首之礼，用一条白绫自缢而死。全家30余口，除一名6岁的孙子躲在草丛中得以逃生外，其他人都不屈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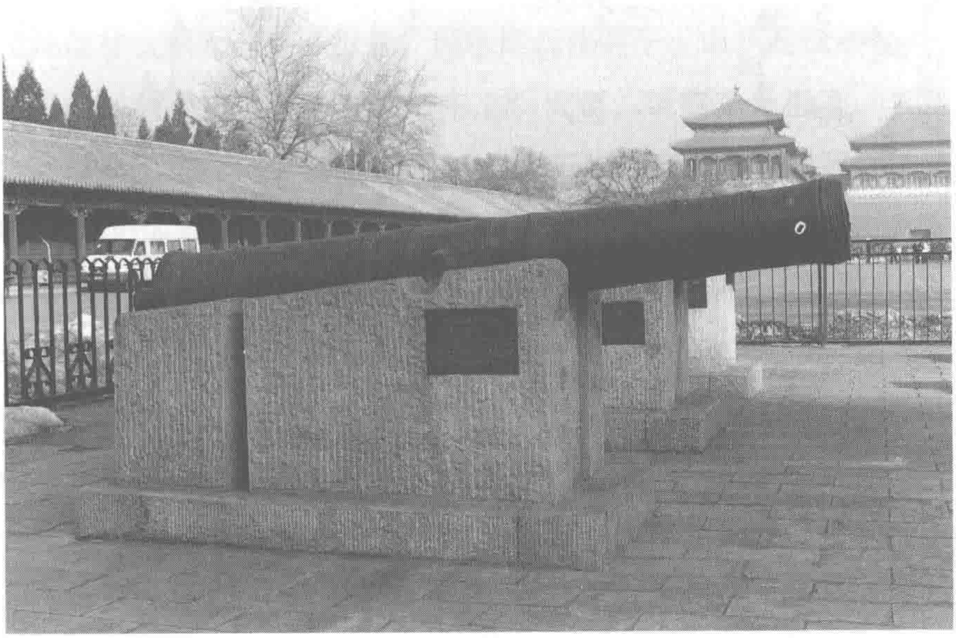
受到戴罪立功处分的卢象昇，心灰意冷。闻知清军分道南下，他率部从涿州进扼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并派兵部赞画主事杨廷麟去真定请求高起潜支援。高起潜不仅不予支援，反而率部向临清移动。卢象昇所率5000士兵陷于绝粮的困境。他自知必死，一大早走出营帐，对四周的将士拜曰："吾与将士同受国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附近三郡百姓听说，聚集军门之前，劝卢象昇移军广平（治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召集义师共同御敌，说："三郡子弟喜公之来，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他泪流满面地回答说，感谢父老至意。吾与流寇交战数十百次，从未吃过败仗。现在大敌西冲，援师东隔，食尽力穷，死在旦夕，不再徒累父老了！群众号泣雷动，都拿出仅有的斗粟升枣，送给军士当口粮。十二月十一日，卢象昇率部进至巨鹿贾庄，遭到清军的三重包围。卢象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地，自辰时（相当于现今上午7时至9时）战至未时（相当于现今午后1时至3时），炮矢俱尽。虎大威请求突围，他不许，犹奋身力战，杀敌数十人，身中四箭三刃，从马上跌落，

壮烈牺牲，一军尽没。高起潜闻讯，慌忙逃遁，又遇到清兵的埋伏，一军尽溃，仅高起潜只身脱逃。刚刚赶到保定的刘宇亮，听到卢象昇战死的消息，大惊失色，急忙逃往晋州躲避。

卢象昇所率明军被消灭，高起潜所统重兵不战而溃，清军便深入河北南部，直至景州（今河北景县）。杨嗣昌急命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防御。清兵于是绕过德州，分兵两路杀向济南，于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 年）正月初合兵攻占了济南。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副使邓谦济、周之训及知府苟好善等被杀，德王朱由枢也被俘，押解盛京沈阳。济南城池被焚毁一空，城内外积尸达 13 万具，惨不忍睹。接着，又攻下东平、莘县、馆陶、阳谷、寿张、兖州。

洪承畴与孙传庭于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月奉诏率陕西精锐之师，入卫京师。十二年正月，明思宗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为保定总督，不久又改为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孙传庭随即率部进入山东，杨嗣昌从登莱、祖大寿从青州赶来，安庆巡抚史可法也自徐州声援。清军因此无心恋战，饱掠一番之后，退向沧州、青县、天津，拟于二月由青山口出塞。因见驻守喜峰口的明总兵陈国威戒备森严，并派兵阻击，又于三月初五日转至丰润，但还是遭到副总兵杨德政、虎大威的阻击。初九日又转至冷口，见各路明军齐集，又经迁安县青山口出塞，返归辽东。

这次清军入塞，历时 5 个月，深入 2000 里，遍蹂京畿、河北、山东，攻下州县大小 70 余城，掠走大量的人畜物资。



清“神威大将军”炮



《全辽志·广宁左中屯卫境图》

三月十一日，京师解严。工科都给事中张缙彦上疏，请求惩处墙子岭入口、青山口续入、残破城邑、失陷藩封、饱飏出口五大要案中的失职官员。明思宗命杨嗣昌主持查核工作。最后经明思宗审批，按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五类罪状，开列一批负有重大罪责者的名单，共有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林，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总兵倪庞，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以下至州县官共36人，于当年五月在京处死。这是明思宗即位以来惩治封疆失事诸臣最为严厉的一次。但是，对这次清军入塞负有重大责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言官愤愤不平。给事中李希沆上疏说，自皇上即位以来，北兵三至，己巳（崇祯二年，1629年）之罪未正，致有丙子（崇祯九年），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拐弯抹角地要求惩治杨嗣昌。御史王志举的上疏，更是直截了当地揭发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求按以往失事兵部尚书丁汝夔及督师袁崇焕处死的先例予以惩处。明思宗却勃然大怒，贬了李希沆的官职，并把王志举革职为民。

由于一向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明思宗担心蓟辽的防御受到影响，便命洪承畴率领陕西的精锐之师驻扎蓟辽边境。这个决定，遭到孙传庭的反对。他写信给兵部尚书杨嗣昌，认为陕西劲旅不宜留在蓟辽边境，留下这支劲旅不仅无益于边境的防御，反而会助燃起义的烈火，因为他们的妻儿家产都在陕西，把他们勉强留下，将来不是哗变，就是逃亡，这是驱兵从贼。事关天下安危，不可不察！此前，孙传庭奉命提兵赴京，在近郊设防抵御之

时曾上疏说，年来疆事决裂，由计划差谬所致。待事竣之后，当面请商决大计。杨嗣昌觉得这是冲着他来的，非常不满，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现在再听到孙传庭的建议，更是心生疑忌，不仅不予采纳，而且也不向明思宗报告。京师戒严解除后，孙传庭上疏请求面见皇上。杨嗣昌大为吃惊，怀疑他要向皇上揭露自己的过失，便令来人把奏疏带回，并添油加醋地报告明思宗，引起皇上对孙传庭的猜疑。孙传庭大为恼火，上疏以耳聋为由辞去保定、山东、河南总督之职，乞求退休。明思宗十分生气，将他革职为民，令巡抚杨一儁查明其耳聋的真伪。杨一儁奏报，说他是真聋，并非“托疾”。明思宗竟下令将杨一儁与孙传庭一并逮捕下狱。朝野百官都知道孙传庭是冤枉的，但没人敢站出来为之申辩。

后金（清）兵在难以突破宁锦防线的状况下，先后 4 次迂回入塞，袭扰明朝腹地，并在崇祯六年（天聪七年，1633 年）攻占旅顺，进而于崇祯十年攻克皮岛，控制辽东沿海的岛屿，打破了明朝的海上封锁线。通过这些战役，后金（清）兵不仅掠夺大量财物和军事装备充实了自己，而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有生力量，侦知了明军的虚实，这就为突破宁锦防线、进一步与明军展开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松锦之战与洪承畴降清

清军第四次迂回入塞的战役结束后，皇太极觉得发动大规模进攻、与明朝主力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究竟从何处着手

展开这场大规模进攻，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年）正月，都察院参政、明朝的降将祖可法、张存仁等人联名向他上疏，提出三个“进取之计”。一是“刺心之着”：避开辽西正面战场，继续迂回入边，直捣燕京，割据河北；二是“断喉之着”：避开宁远、锦州，直抵关门；三是“剪重枝伐美树之着”：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明耕作自废，难以图存，撤锦州之守而回宁远，撤宁远之守而回山海关，这样宁锦便可不战而得。他们力主采取刺心断喉之着，认为剪枝伐树之计，“可施于勍敌之小邦，不可施于积弱之大国”。但皇太极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清军过去之所以迂回入塞，而且无法长久占领关内之地，就是因为有山海关的阻碍。要想攻取明朝京师，就必须先攻取山海关；而要攻取山海关，就必须突破宁锦防线，沿辽西走廊西进，夺取宁远、锦州。

辽西走廊是关内通往关外的咽喉要道。锦州位于走廊的东北端，长期以来一直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凌河之战后更成为明军的前哨阵地。锦州的西南方向，大约每隔20里，依次是松山、杏山、塔山三个城镇，再往西南40里，则是另一军事重镇宁远。宁远是锦州的依托，而锦州则是宁远的屏障。要想攻破宁远，必须先拿下锦州。过去清军几次绕道内蒙古迂回入塞时，曾经派遣精骑在锦州附近发动过几次征战，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通过这几次征战，皇太极已感觉到锦州防御坚固，绝不是经过几次突袭就可轻易攻破的。因此，必须先建立一个可供屯兵积粮的据点作为前进的基地。经过反复比较，皇太极把地点定在义州，于三月间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分任右、左翼主帅，率兵前往驻屯，耕垦筑城。义州

位于锦州和广宁之间的大凌河畔，距锦州只有 90 里，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清兵进驻 1 个多月，即已修起城堡，并将东西 40 里的地方全都种上庄稼。同时，设置兵营，不断运来军队、粮食和武器，对锦州形成进围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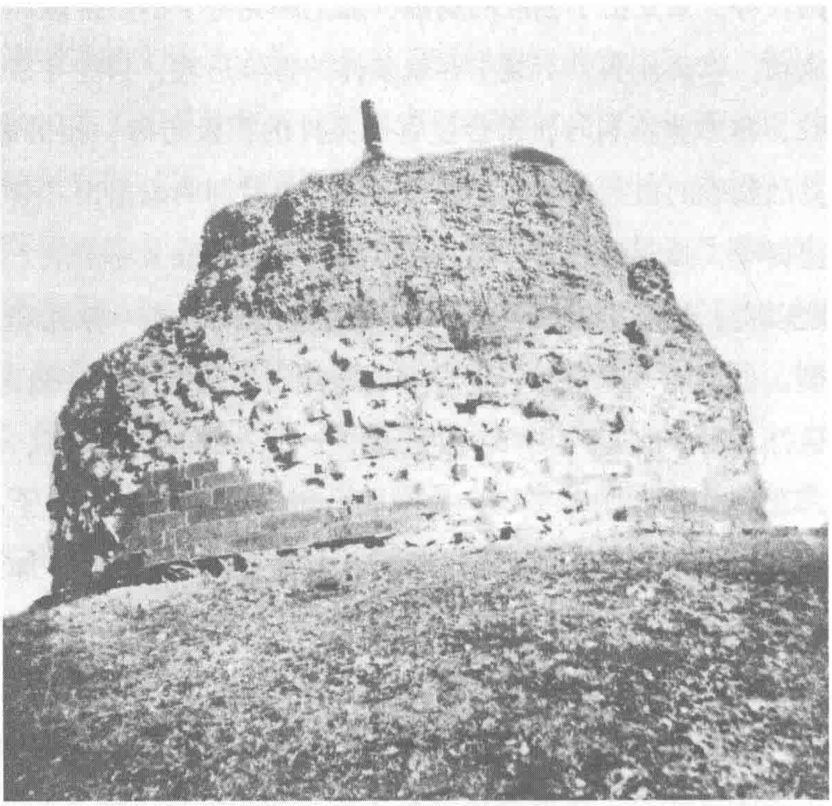
清军进驻义州的动作，引起了明朝当局的密切关注。崇祯十三年（1640 年）四月十三日，明思宗召开御前会议，询问大臣对清军进围锦州有何对策，并展示自己书写的“灭寇雪耻”条幅，以鼓舞大臣御敌的信心，但大臣大多不轻易发表意见，只有迂腐的礼部右侍郎蒋德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不着边际的话，大意是加强练兵，恢复早已废弃的卫所屯田制度、团练乡勇，等等。明思宗见他离题太远，问他如何缓解义州、锦州的危局。他武断地回答说，义州距锦州 90 里，锦州距宁远 60 里，宁远入山海关到达京师近千里，因此清军绝不可能从这一路进犯京师。清军占领义州，经由内蒙古的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仅仅 260 里的距离，便可进犯蓟镇、宣府，逼近京师，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蒋德璟的发言不得要领，其他大臣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会议不了了之。

由于在御前会议上大臣拿不出有效的对策，明思宗急命辽东督抚镇臣密筹方略，自行回奏。辽东巡抚方一藻在回奏的方略中，根本未看到清军屯垦义州的意义，竟然认为此举“实出下策”，然后泛泛地讲了一通“我第站定脚跟，整兵严陈松锦之间，合群策群力，始示弱以误之，终逼义以驱之”。蓟辽总督洪承畴吸取以往明清交战的经验教训，根据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提出了“守而兼战”的对策。万历年间的萨尔浒之战，杨镐对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

估计不足，轻举妄动，四路进兵，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后来，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在战守无资、形势险峻的情况下，采取以守为主、相机进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都曾有效地抑制后金的攻势，只是由于朝政的腐败，加上阉党分子的阻挠破坏，才未获成功。事实证明，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冒险进攻，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在形势不利时，符合主客观条件的积极防御，相机进攻，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他在密陈方略时即明确指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成其战。"也就是说，既不能一味死守，消极防御，也不能一味浪战，而应守而兼战，一边防守，一边进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洪承畴的密疏呈上后，兵部极力赞赏，认为他"真老筹边"，"战守双筹，内外兼顾，切中机宜"，要求皇上尽快予以批准。五月，明思宗即命洪承畴出山海关，北上督师，加强宁锦防线的防御。

就在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山海关北上之前，皇太极已于四月底令多尔衮、豪格等留守盛京，亲自率师前往义州。五月，他在巡视围困锦州的情况后，决定将锦州城东、北、西三面的庄稼全部割掉，以断绝城内明朝守军的粮饷，同时令投降的汉军举炮轰毁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堡，使之成为一座孤城。皇太极还决定，用一半兵力驻屯义州，3个月一换防，轮流更戍，作长期围困之计。

洪承畴出关后，首先命令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分练总兵刘肇基出兵杏山，驻守锦州的前锋总兵祖大寿与副总兵祖远泽出兵松山、杏山之间，进行接应。随后，清兵连续攻破锦州城东五里台、



明杏山驿路台遗址旧照



明杏山驿城门额旧照

城北晾马台等几个明军哨所，又攻克锦州城西九台与小凌河西岸二台等几个明军哨所，分兵两翼，逼困锦州城。七月，为解锦州之围，洪承畴率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山海总兵马科，与吴三桂、刘肇基合击清兵于杏山城北的黄土台，获胜后进至松山，再次击败清军。清兵的大部队于是退屯义州，不再出战。洪承畴乘机亲至杏山，督令明军将士将由天津海运至辽西各仓的米豆抢运至塔山、杏山、松山和锦州。到九月初六日，运至锦州的粮饷已足支到明年三月，松山的粮饷可支持到明年二月，杏山、塔山的粮饷也积存颇多。此后，考虑到严冬将临，前方战事较少，洪承畴才命曹变蛟、左光先、马科率所统兵马入关休整，以利来年再战；刘肇基拙于调度，由王廷臣代理；左光先返回原镇，由白广恩代理；吴三桂、王廷臣率所统之兵，往来于松山、杏山之间，佯示进兵。洪承畴还奏报朝廷，请求调近旁边军，合关内外兵马共 15 万人，“庶可成剿”，还说“师行粮从，必刍粮足支一岁，然后可议益兵”。明思宗一一照准。

皇太极对围攻锦州的失败非常不满。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 年）三月，他亲率 4 万余骑至锦州，听说清兵离锦州 30 里驻营，大为恼火，说：“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所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何时能得锦州耶？”下令严加切责，并将围困锦州的统帅多尔衮由亲王降为郡王，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前往代之。济尔哈朗采纳张存仁的建议，在明军炮火的射程之外扎营掘壕，将锦州严密包围起来，并策反城里的两营蒙古军，夺占锦州外城。为了加强围城的兵力，皇太极还命朝鲜柳琳等率兵前来支援。

其时，由掳掠的汉人组成的汉军八旗已于两年前组建完成，皇太极又令降清的明将孔有德、尚可喜等率领汉军八旗，携带几十门西洋火炮前往锦州增援。

崇祯十四年（1641 年）三月十四日，刚刚取代方一藻出任辽东巡抚的丘民仰向朝廷奏报，说从二月以来，清军不断向义州城输送军队、粮食和武器，其中有西洋大炮 30 门，小炮不计其数；明朝降将石廷柱及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在济尔哈朗的统率下，一齐向锦州外围赶来，形势十分危急。洪承畴于是在四月下旬率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杨国柱、中协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及马科、曹变蛟、吴三桂所辖兵马 13 万余齐集宁远，尔后向松山进兵，在东西石门与清兵展开一场激战，杀伤不少敌人，迫使清军向北退却。明军获胜后，在松山西北立营。六月，济尔哈朗令右翼清军向明军发动进攻。明军奋勇抗击，夺占了乳峰山顶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的清兵营地，击毙清将梅勒章京翁阿岱等人。明军由此开始在松锦取得了主动地位。

当时，锦州城里储存的粮食足支半年，援军相距不远，人心稳定。清朝虽已统一蒙古，征服朝鲜，并统一黑龙江流域，但其核心统治区却仅辽东一隅之地，人力、物力均感不足，屡屡向蒙古征兵，并强迫朝鲜出兵助饷，引起蒙古与朝鲜的不满。此次围攻锦州，皇太极曾令朝鲜出兵 5000 人，运米 1 万包，限于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 年）四月二十五日运至锦州南面的大小凌河口。但朝鲜派出的舟师迟迟不肯出动，拖到六月间到达北信口，遭遇明军又故意不战，遭到明军的截击，后船只又被风漂没，被礁石撞

坏，115艘船只仅剩下52艘，就将装载的粮食卸在盖州。皇太极无奈，只得将朝鲜舟师退回，仅留下1500名炮手参战。这些朝鲜炮手在当年五月到达锦州后，又消极怠战。其中一名叫金得平的放炮打不中目标，另一名叫李士龙的也是炮弹虚发，监军的清兵胡某一气之下斩杀了李士龙，并对金得平施以杖刑。征调来的蒙古骑兵，也常有逃入明境的现象发生。清军围困锦州1年，因粮饷匮乏，骑兵1天只有两餐，步卒则是1天只供给1顿饭，也产生厌战情绪，传言今年秋季如果攻不下锦州，就准备撤兵返回辽东。根据这种状况，洪承畴向朝廷奏报，表达他解锦州之围的决心："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

但是，明思宗对锦州被围已逾五月、声援断绝的局面还是感到非常担忧。五月十八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去年刚刚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问他有何解锦州之围的良策。陈新甲是四川重庆府长寿县（今属重庆市）人，举人出身，曾经担任过宁远前线兵备佥事，虽对辽事比较熟悉，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只好请求退而与内阁辅臣及兵部侍郎吴甡商议。尔后，他向皇上呈上一份《十可忧十可议》的奏疏，对形势持悲观态度，建议派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前往宁远，当面与洪承畴商议对策。

此时，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已重新走向高潮。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攻占湖广的谷城和房县，于七月间击败赶去镇压的官军。明思宗杀了主持抚局的总理军务熊文灿，命杨嗣昌出任督师，领兵围剿。张献忠西入

四川，以走致敌，再于崇祯十四年正月率部东下，进入湖广，于二月间攻克襄阳，诛杀襄王朱翊铭，迫使杨嗣昌自杀而亡，然后率部转攻河南。躲入深山密林的李自成也于崇祯十三年六七月间由郧、均进入河南，在次年正月攻占洛阳，诛杀福王朱常洵，然后乘胜围攻开封。面对这种局势，陈新甲坐立不安。他深知明思宗一向急功近利而又专横残暴，臣僚稍有失误便严加惩处，败一方即戮一将，陷一城即杀一吏，如果辽西的战事不能尽快结束，明军就无法腾出手来集中全力镇压农民起义，起义的烈火就会越烧越旺，自己作为兵部尚书便难辞其咎。因此，张若麒前往宁远与洪承畴商议对策不到1个月，他度日如年，并由对辽西形势的悲观态度中逐渐滋生出急躁冒进的情绪，未等张若麒带回与洪承畴的商议结果，即于六月十一日向明思宗提出速战速决的方案，鼓吹主动出击，四路进兵：一路出兵塔山，趋大胜堡（在今辽宁锦州西北），攻敌营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抄锦昌堡（在今锦州北），攻敌营之北；一路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一路出主力由松山攻敌营之南。

明思宗对陈新甲的四路进兵、速战速决方案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把它交给洪承畴的行营讨论。洪承畴坚决反对，说自己虽总八镇兵，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其他将领难以独当一面，只可共同作战；假使分三将于三路，恐怕寡不敌众；如果令其他五个将领协助之，谁来充当先锋呢？兵分势弱，更难取胜。当时，祖大寿也从锦州派人传话，“宜车营逼之，毋轻战”。洪承畴上奏朝廷，坚持自己且战且守的主张，表示要凭借松山、杏山转运粮草，做持久

战的准备。况且，锦州守备坚固，清军一时不易撼动，过了今秋，不但敌人势穷，就是朝鲜也将势穷，到时再同他们展开决战，这就是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今本兵（兵部尚书）议战，安敢迂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也。”明思宗觉得他的分析很有道理，表示同意。

但是，陈新甲仍然坚持己见，张若麒又同他一唱一和。此人躁率喜事，见到一场小胜便以为锦州之围可以立解。他向明思宗递上一份密疏，支持陈新甲的主张，并毛遂自荐，请求留在关外赞划军务。七月，清军因粮饷不足，扬言入攻三协以虚张声势。京师的明朝君臣最怕清军从三协乘虚而入，威胁北京。陈新甲又以此为借口，写信威胁洪承畴，你出关用兵1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而锦州之围未解，内地又将受困，到时你不进山海关，则三协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厚望？与此同时，陈新甲还向明思宗反复密陈速战速决与守而兼战的利弊，并推荐前任绥德知县马绍愉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出关赞划军务，以贯彻兵部的主张。在陈新甲、张若麒的再三鼓动之下，明思宗的态度发生大转变，遂下密敕，要洪承畴克期进兵，速战速决。这就埋下了日后明军惨败的祸根。

君命难违，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只得在宁远誓师援锦。二十八日，下令进兵，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与塔山西北的笔架山（在今辽宁锦县西南海中），自率6万大军出发，令余军继后，至松山集结。二十九日，他率部抵达松山，抢占乳峰山西侧后，环松山扎营：步兵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列七大营；骑兵驻扎于松山

东、西、北三面。洪承畴还传令镇兵分别进击东西石门，以分割清军，使其腹背受敌，并立车营，四围树木栅为城。由于所带粮草有限，决定同清兵展开一场决战，速战速决，以定胜负。部署甫定，即于八月初二日向清军发起攻击。祖大寿也从锦州城内杀出，但冲出二重围后，至第三重围被清军挡回。明军此战共击杀清兵 130 人，击毙清将固山、牛录等 20 余人。宣府总兵杨国柱阵亡，由山西总兵李辅明代领其军。此后连日作战，双方互有胜负。至初十日一战，明军大获胜利，清军自此不复出战。

此时清军前线的统帅是六月间替代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睿郡王多尔衮，他急忙派人驰赴沈阳，请求派郑亲王率另一半兵马赶来，协力拒敌，即请求改变原先以半数兵力出战、半数兵力在家休整的做法，全军出战。皇太极忧愤万分，急得吐血，只得按照其要求，倾巢出动，使参战的兵力超过历次进关兵力的最高数额 10 万，也在明军的 13 万之上，并且带病率领 3000 精骑前往松山督战。明军顽强抗击，二十一日一战斩杀数十名清兵。皇太极大惊失色，一度准备退兵。

但是，明军的暂时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朝廷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地位，而洪承畴临战指挥上的某些失误，又为清军提供了可乘之机。洪承畴在被迫执行速战速决之策，合兵挺进松山之时，将 13 万大军集中在松山与乳峰山的狭小地带，有前权而无后守，首尾全无顾应，忽略了与后方杏山、塔山的联络。大同监军张斗曾建议，宜遣一军驻扎于自塔山迤逦至锦州、延至松山城之右的长岭山，以防敌军抄我后路。洪承畴却没有采纳，反而说：“我十二

年老督师，若书生何知!”皇太极一到松山，立即抢占长岭山这个战略要地，然后抓住明军缺粮而又不擅野战的弱点，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不仅夺去明军在笔架山的12堆积粟，而且掘壕设障，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当时明军锐气尚存，有的部将请集精锐与清兵决战，而出奇兵夹击，分兵袭取南山。否则，就退保杏山，然后徐图再起。这不失为一条绝处逢生之计，但是洪承畴亦未予理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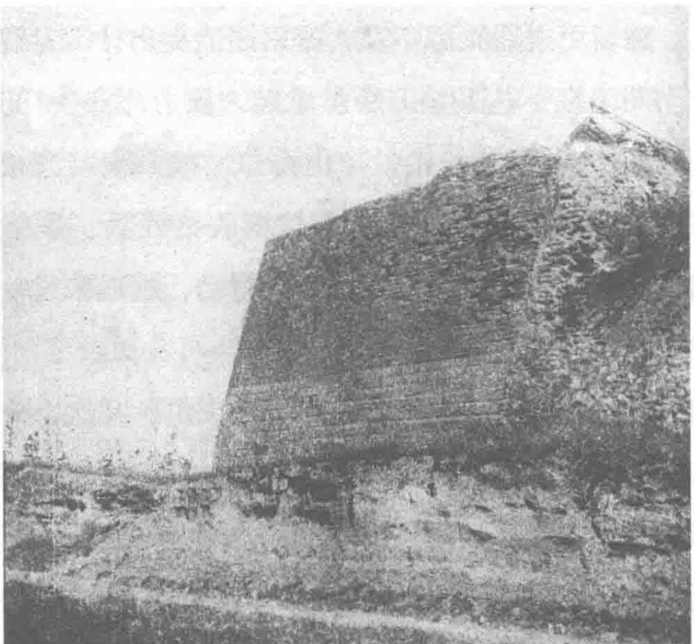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一晚，皇太极估计松山的明军由于缺粮可能突围南逃，将左翼清兵调至右翼，与右翼清兵比翼列阵，直抵海边，并命诸将分守杏山、塔山、小凌河口诸险要处，设伏以待。洪承畴见松山被围，城中粮储已不够食用3天，决定拼死一战。诸将议论纷纷，主张回宁远就食。一向力主速战的张若麒也写信给洪承畴，支持这种主张，军心顿时涣散。洪承畴只得令曹变蛟、王廷臣率两镇兵马坚守松山，其余六总兵分左右两路突围。胆怯的大同总兵王朴，在初更时分率先逃跑，吴三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也各率兵马沿海岸而逃。结果，步骑兵互相践踏，不战自乱，弓箭、盔甲丢得遍地都是，又遭清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和部分残兵，先后溃入杏山。李辅明逃至宁远，不几天，王朴、吴三桂也奔入宁远。张若麒、马绍愉得一渔船，与诸监军逃回宁远，向朝庭奏报说“洪承畴失计”。洪承畴急令曹变蛟、王廷臣从乳峰山西侧撤入松山城内，命三分之二兵力决围冲阵，途中遭到清兵的阻击，移屯海岸又被正在涨潮的海水淹死，仅200余人脱险生还。这样，就只剩下总督洪承畴，总兵曹变

蛟、王廷臣，巡抚丘民仰以及 1 万多名残兵固守松山城。眼看突围无望，洪承畴派人东走小凌河，绕道漠南蒙古，向朝廷“请兵解救”。皇太极对松山采取围而不攻之策，一面等待城中弹尽粮绝之后不攻自破，一面加紧招抚活动，期盼明军将士不攻自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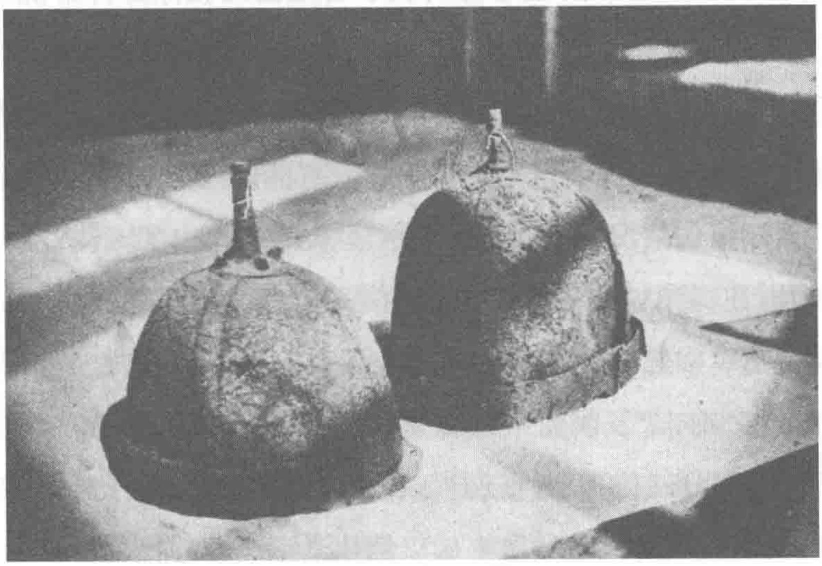
明思宗得知数万大军溃于一旦，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困守松山的消息，极为震惊和忧虑，询问兵部尚书陈新甲有何良谋善策。陈新甲避罪犹恐不及，哪里还能提出什么良谋善策。九月初二日，明思宗下达圣谕，令洪承畴“极力死守”；同时命调刘应国水师 8000 人，扬帆松山、杏山海口，或乘夜暗渡松山，以壮声威；并责成吴三桂与白广恩、李辅明收拾残兵，联络杏山、塔山，以图再进。圣谕下达后，根本无人行动，迟迟未发一兵。任凭明思宗怎样催促，也无济于事。

困守松山城中的洪承畴，曾组织力量突围，几次都未成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他只能紧闭城门坚守，准备与松山共存亡。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 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派其子赴清营作为人质，约定于十八日夜配合清军攻城。次日黎明，夏承德率部捉拿洪承畴及诸将领，献与清军。清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松山。

已返回沈阳的皇太极得到消息，下令将洪承畴及祖大寿之弟祖大乐解往沈阳，其余拒绝投降的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及其部属 200 多人，连同所部 3000 余人全部处斩，只有夏承德的部下和家属获免。松山城则被夷为平地。接着，清兵利用祖大乐招降锦州守将祖大寿，再挟连胜之余勇，于当年四月用西洋大炮攻破塔山，城内



明广宁中屯卫松山千户所城城墙遗址旧照



明代铁盔

官属兵丁7000人悉数被杀，接着迫降杏山，将其夷为平地。历时两年的松锦战役宣告结束。明军此战的失败，不仅精锐的边兵丧失殆尽，而且丢失宁远以北的大片土地，从而大大加速了其覆亡的进程；清军此战的胜利，得到宁远以北的大片土地，进一步逼近山海关，从而为其入关争夺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奠定了基础。

作为明朝重臣、蓟辽总督的洪承畴在松山被俘并押解沈阳后，曾绝食7日而求死不得，后经皇太极和一些降清汉官的劝降，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五月四日同意剃发，正式降清。但是，由于战局混乱，消息不灵，明廷上下都误以为洪承畴已经“殉节”。兵部报告战况的文书塘报说，据从锦州逃出的人讲，清军把洪承畴押往锦州城北无极王营盘内杀死，“洪总督临砍时，只求速死”。从乱军中逃回北京的洪承畴家人，向朝廷报告时，也肯定洪承畴已经“殉难”。明思宗因此认定洪承畴“节烈弥笃”，痛哭流涕，下令在朝天宫前设置祭坛，以极高的规格祭悼洪承畴等阵亡将士，寻又命在城外建造祠堂，用以祭悼洪承畴与丘民仰，从而演出一幕将活人当做烈士祭奠的闹剧。

第三节 明清议和的失败与陈新甲被杀

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年）十一月，辽东上空下起了一场茫茫大雪，地上积雪深达丈余。正在围困松山的清军，粮草用尽，想撤围东返，又怕明军尾随追击，便通过蒙古降丁入关表达了与明朝议和的意向。

兵部尚书陈新甲因主张速战速决而导致数万大军的溃败和洪承畴的被困，不断遭到言官的抨击，心想如能真正议和，既可减少明军的损失，又可集中兵力对付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不说是立个大功，至少也可将功补罪吧。于是，便听信张若麒的意见，表示同意。与此同时，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也探知清军有议和的意向，他写信询问清军守将，回答说："此吾国素志也。"石凤台将此事密奏了朝廷。明思宗正为松山被围而发愁，得到奏报，勃然大怒，立即以"私遣辱国"的罪名将石凤台逮入刑部大狱。尽管如此，陈新甲仍然认为议和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并将此意私下告诉前任兵部尚书傅宗龙。傅宗龙又转告内阁大学士谢陞。到了年底，松山、锦州的形势更加严峻，谢陞对其他辅臣说，我军已经精疲力竭，同清兵议和，可以腾出手来剿灭流寇，石凤台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辅臣都表示赞同，决定让陈新甲委婉地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日，明思宗在御殿接受群臣的朝贺，又召见内阁大学士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谢陞、魏炤乘、陈演等，以拜师之礼，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做了个长揖。礼毕，接下来举行御前会议。陈新甲见明思宗心情不错，便抓住时机，按照事先与几位辅臣的约定，委婉地对皇上奏道，现今锦州、松山两城遭到清兵长期的围困，无法抽调足够的兵力前去支援，非"用间"不可。所谓"用间"，本意是使用离间之计，但这里的"用间"是"款建虏"的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款"即议和，"建虏"是明朝人对建州女真的蔑称。所谓"款建虏"，也就是和清朝议和。陈新甲唯恐触怒皇上，不敢直言"款建虏"，只好用"用间"一词来代

替了。明思宗这次倒是没有发怒，因为他深知，松锦之战失败后，明廷已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与清军再战，更严重的是内地农民军蓬勃发展，已成为明廷的最大威胁。如果真能与清朝议和，暂停辽西的战事，则可把主要的战略方向转向西线，集中主要兵力镇压农民起义军，从而萌生东和西战的战略意图。因此，他平心静气地问道，城池被围已近半载，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有何间可乘？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说完，他问辅臣有什么意见。周延儒等辅臣没摸清皇上的用意，沉默不语，只有谢陞回答道："彼果许款，款亦可恃。"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与清议和之事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明思宗遂谕令陈新甲负责操办此事，并反复叮嘱，千万不要让外廷知晓，以免受到言官的干扰。陈新甲推荐赞划军务主事马绍愉执行谈判任务，明思宗批准他以兵部职方郎中身份赐二品官衔，作为谈判使节，与清方进行秘密谈判。

正月初七日，马绍愉带着参将李御兰、周维墉驰往宁远，立即与清将济尔哈朗进行接洽。清将要求提供明朝皇帝同意议和的敕书，作为谈判的凭信。马绍愉急忙请命于朝廷，一来一往耗费不少时间，直到三月中旬才收到明思宗一道"谕兵部陈新甲"的敕书。此时松山、锦州都已失陷，马绍愉忙把敕书交给清方，再转递沈阳，交给皇太极。皇太极一看敕书是写给明朝兵部尚书，而不是直接写给他的，觉得是对自己的蔑视，心里老大不高兴。再看敕书的内容，竟然是以对兵部尚书训谕的形式，间接地表示愿意接受对方的请求进行和议谈判："据卿部（兵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

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通篇充斥天朝大国君主居高临下的倨傲之气。皇太极看后，非常生气。再看敕书的格式，却又感到纳闷疑惑。按照惯例，明朝皇帝给大臣的敕书，是不必盖印的，这道敕书却盖有“皇帝之宝”的大印，类似天朝上国颁给属国的敕谕；而历代天朝上国的敕书，使用的都是龙边黄色笺，可是这道敕书的用笺却是中横一龙；往时盖的是正方形的大印，上刻“敕命之宝”，而此笺之印却是长方形的，上刻“皇帝之宝”。他怀疑这是明朝边吏伪作的，特请洪承畴鉴别。洪承畴仔细辨认之后，一口咬定“此宝札果真”，并回顾了明朝历次议和的过程，对皇太极说:“此次请和，决非虚语。”皇太极这才解除了疑心。于是，他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间接地对明朝作出答复，说大清本无意起兵，全系明廷逼迫所致，相信“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之理，愿意修好。他将这道敕谕交付阿济格等人，令其传示明朝来使。马绍愉接到敕谕，立即奏报朝廷。

明思宗得到马绍愉的奏报时，杏山、塔山危在旦夕。他再次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并差兵部司务朱济赍敕同马绍愉前往沈阳谈判。马绍愉这时正在塔山等候朝命，不料四月底清军袭击塔山，他遣使让清军停止进攻。清军不听，但在城破之前派兵护送他安全出城。五月，马绍愉同朱济等人前往沈阳。皇太极当时不在沈阳，派诸臣到20里以外迎接，设宴招待，并宣布清兵暂停对宁远的进攻，后撤30里。

马绍愉等谈判代表在沈阳空等了十几多天，待皇太极从外地回到沈阳，谈判才正式开始。清方的谈判代表首先发言，追述了后金及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明廷之后，再谈其起兵以来统一女真、蒙古，征服朝鲜，建立清朝以及屡入明境破城陷阵的胜势，然后表示与明议和以全亿兆的愿望，提出具体的议和条件。之后，双方就议和的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比如，清方开始向明朝索要金银，每年要黄金 30 万两、白银 200 万两，后来经过谈判，答应减少至每年黄金 1 万两、白银 100 万两，后来又反悔，坚持要每年黄金 10 万两、白银 200 万两，并威胁说:“如不从，即发兵，尔家所失，岂止此数?”经过几轮激烈的争吵，终于就主要条件达成了协议。最后，由皇太极写成国书，开列议和的条件，交马绍愉带回。皇太极国书开列的几个具体条件是:“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白银）百万；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在今辽宁兴城东北）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今辽宁锦西）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如我国人有越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查，按律处分。或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土岭，沿海至黄城岛（即今山东长岛县南、北皇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界枉行者，亦俱察出处死。”最后表示，如果明朝答应上述条件，则应从速遣使携国书和誓书前来，他也将遣使携国书和誓书前去。“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

致书，其亿兆死亡之孽，于予无与矣！”并威胁说，“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谈判的最后期限定在九月，如果到九月还不能达成和议，他就要出动大军，发动进攻。

马绍愉返回宁远后，立即派人返京向陈新甲报告谈判的结果，并呈交皇太极国书的副本。陈新甲赶快向明思宗禀报。六月初三日，明思宗召见内阁首辅周延儒，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周延儒是知道与清进行秘密议和活动的少数几位重臣之一，当初谢陞和陈新甲提起此事时，他并无异议，但是，待到即将作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时刻，老奸巨猾的周延儒却怕承担责任，拒不表态，经再三追问，就是一言不发。明思宗深感失望，愤然而起，拂袖而去。他准备找其他重臣商议，再行拍板。不意，议和的消息却不慎泄露，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次议和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的几位重臣知道。《明史·陈新甲传》载："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谈判在沈阳秘密举行，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此事而无法得到确证。但是，议和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稍有不慎，有毫末的消息泄露，就会迅速传播开来，引发诸多的议论。马绍愉一行尚未从沈阳返回，有一天上朝之前，有个言官在朝房遇见辅臣谢陞，谈到当前局势，谢陞偷偷告诉他："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这话很快传开，言官纷纷上疏弹劾谢陞妄言。明思宗只好将谢陞革职以平息舆论，和议风波也因为缺乏实证而渐趋沉寂。不料，有一天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禀报议和谈判的密疏，看过之后放在几案上，就匆匆入宫上朝视事，其仆人打扫书房时以为是一份普

通的塘报稿，随手交给塘报官传抄，发表在官府的新闻公报（即邸报）上。一时，舆论哗然，认为是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给事中方士亮首先上疏弹劾陈新甲。明思宗非常恼火，将奏疏压下不发。但是，弹劾的奏疏仍如雪片似地飞来，舆论鼎沸。一向刚愎自用的明思宗，不是果断地站出来承担责任，陈述议和的理由和东和西战的战略意图，而是屈服于舆论的压力，下严旨切责陈新甲，令其自陈其过。陈新甲自以为是按照明思宗"可款则款"的指示行事的，谈判代表也是由皇上加官赐服任命的，不仅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他写了一份自辩书，细谈议和的过程，并多次援引明思宗的圣谕，暗示议和谈判是奉命行事，而非擅作主张，想借此推卸责任，诿过于皇上。一向死要面子的明思宗更加恼怒，于七月二十九日下令将陈新甲逮入狱中。陈新甲在狱中上疏皇上，请求宽宥，明思宗不允。陈新甲这才感到大祸临头，急忙嘱咐家人拿出自己历年受贿所积存的金银财宝，去贿赂主张必杀的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光时亨、倪仁祯。这四位言官的腔调因此大变，纷纷去找刑部署事侍郎徐石麒，亟言陈新甲必不可杀。

徐石麒深知，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条铁定的法则。他根本不顾廖国遴等人的游说，而是迎合明思宗的旨意，上疏历数陈新甲的罪状，认为非杀不可。他引经据典地说，嘉靖年间俺答阑入，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敢战，事后伏诛；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兵部尚书石星指使沈惟敬同意日本封贡，事败后被处以极刑，国法严明，人无敢犯。后来纪纲陵夷，开原、沈阳陷落，辽阳、广宁倾覆，只诛杀一二督抚应付了事，兵部尚书却未曾

受到惩处。陈新甲之所以反复强调有例可循，原因即在于此。《春秋》之义，大臣无境外之交，战与和二策，古来通用，但从未有身在朝廷、不禀告君父就专擅行事的，辱国自侮，莫此为甚！不过，徐石麒的马屁没有拍到点子上，陈新甲的议和是依照明思宗之命行事的，给他加上"专擅议款"实在冤枉。明思宗在徐石麒的奏疏上批示："陈新甲失事重大，法无可宽，但引律尚属未确，可另行复拟即奏。"徐石麒心领神会，马上再上一疏，指责陈新甲自担任兵部尚书以来，由于指挥失当，导致4座边城失陷、72座内地城池被蹂躏、7名藩王惨遭屠戮，是从来未有的奇祸，当按照"失误军机"罪处斩。首辅周延儒和次辅陈演都向明思宗求情，周延儒说，依照国法，敌兵不逼近京师城下，不杀兵部尚书。明思宗铁了心要杀陈新甲，反驳道，陈新甲担任中枢一职，一筹莫展，致令流贼猖獗，戮辱我7名亲藩，不更甚于敌兵薄城吗？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押赴西市斩首。

议和失败后，明思宗不得不放弃东和西战的战略意图，他在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皇太极的防御。在辽西四城失陷之后，明思宗下令在关内、关外并设两总督，关外总督加督师头衔，地望尤为尊崇，又在昌平、保定设置二督，还在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6处设置巡抚，在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8处设置总兵，可谓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松锦决战中逃跑，明思宗将他连降三级，命其仍守宁远，选将练兵，加强防御，阻止清兵向山海关逼近。吴三桂受命之后，收集松锦战败后的零散队伍，并抽

调骨干训练辽民，很快又组织起一支拥有精兵 4 万、夷丁突骑数千的精锐部队，还有七八万经过训练、善耐搏战的辽民。吴三桂还不时巡视宁远中右所（在今辽宁绥中东北）、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前屯卫（在今辽宁绥中西南）、中前所（在今山海关东北）等宁西四城，督促当地军民加固防御工事。宁远等城的军民逐渐走出松锦战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决心坚守宁远及宁西四城。

皇太极有言在先，“约九月不至则治兵”。但是，在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 年）四月，汉官张存仁建议皇太极对吴三桂进行招抚。他说，现在松锦既破，明朝总督洪承畴就擒，镇臣祖大寿归降，明朝的将帅谁不惶恐不安，只有吴三桂还在观望。皇上应该向宁远城中颁发一道御札，详示逆者必杀、顺者必生之理，城中守将就会动心。皇太极于是决定暂不出动大军，而向吴三桂发动招降攻势，以图不战而取宁远及宁西四城。他令手下的几名汉官联名给吴三桂写劝降信，又令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致书劝降，甚至遣使赍敕对吴三桂进行诱降，但吴三桂不为所动，继续效忠明王朝。

对吴三桂的诱降失败后，皇太极决定再诉诸武力。他见宁远一线吴三桂的防御比较坚固，决定再次迂回入边，继续袭扰明朝内地。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 年）十月，命贝勒阿贝泰和内大臣图尔格率满洲和蒙古八旗兵十几余万人，乘松锦战胜之锐气大举征明。

当时，明廷在关内、关外千里之地设置 4 位总督、6 位巡抚、8 位总兵，防兵虽众，但事权不一。明思宗接受言官的建议，召回昏庸无能的蓟辽总督张福臻，撤销蓟辽总督的建置，令辽东总督

范志完兼理关内，移驻关门。范志完推辞不允，想退休也不准，上书请求仍设蓟辽总督。明思宗只得命赵光抃赴任。就在诸将互相推诿之时，清兵于十一月初分兵两路，分别从墙子岭、青山口越过长城入犯，京师再度戒严。明思宗命勋臣分守九门，由宦官王承恩督察城守，并征调各镇入援。不久，两路清军在蓟州会师，沿京师郊区南下。各路援军观望不战，从辽东入援的范志完更是胆怯，未敢一战。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分趋真定、河间，再从河间东向山东，攻克临清、兖州。鲁王朱寿镛被俘自杀。尔后分兵连下山东州县，直抵苏北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赣榆、沭阳、丰、沛所在将吏，多望风而逃，或献金帛迎降。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 年）四月初，清兵转道畿内，经宝坻，准备北返。明思宗召见周延儒等辅臣，表示要亲自出征，周延儒这才请求到前线督师。但他到达通州后，整天就是和幕下宾客宴饮娱乐，听任清兵从容退去。

清军此次入边征战，历时 8 个月，攻克 3 府、18 州、67 县，计 88 座城镇，俘掠人口 26.9 万人、牲畜 32.1 万头、黄金 1.2 万余两、白银 22.5 万余两、珍珠 0.444 千两、彩缎 5.223 万匹。清军入犯内地，在给予明朝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兵科给事中李永茂战后奉命出京到畿南地区勘查，他途经庆都（在今河北唐县东）、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只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其中，平乡受祸最惨，城里仅余焦赤的残垣及堆积的瓦砾！

皇太极派兵入犯明朝腹地后，还在寻求打通宁远、山海关通道的良策。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 年）正月，清军尚在山东、苏北一带征战，祖大寿就向皇太极建议，“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谙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固守宁远也？”他主张立即发兵攻占山海关等五城，使宁远成为一座孤城，迫使吴三桂投降。皇太极采纳他的部分建议，准备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扫除入关的最后一道障碍。但是未及取得进展，他就在当年八月病故于沈阳清宁宫。之后经过激烈的皇位之争，皇太极年仅 6 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由皇叔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称“摄政王”。多尔衮掌控实权，沿用皇太极的计策，武力进攻与劝降游说并举，但吴三桂仍拒绝投降，继续坚守宁远。清兵虽一度击溃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的明军，但始终无法攻破吴三桂坚守的宁远，只得撤军。

第九章
起义高潮的再起与明王朝的覆灭

第一节　起义高潮的再起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许多农民起义首领纷纷接受朝臣的招抚，不肯受抚的少数起义首领也连遭挫折，躲进深山老林，起义暂时趋于沉寂。主持抚局的五省总理熊文灿是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推荐的，杨嗣昌便以知人善任而得意扬扬，喜形于色。满朝公卿都认为困扰多年的“流寇”问题已经解决，“天下无贼”，从此太平。正是基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崇祯十一年冬，明思宗因清兵入塞，急调洪承畴、孙传庭率部入卫京师，清兵出塞之后也未将他们遣回原地。

但是，社会矛盾却在继续激化。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提出对付农民军的“十面张网”的征剿方略，请求征派“剿饷”280多万两。在廷臣讨论此事时，杨嗣昌也承认，当时社会经济已经十分残破，百姓生活实在困苦，说：“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西七八千里，止有州县城池尚在，其余村落残破难堪。臣昨从湖广荆州、襄阳二府，河南、开封二府过来，亲见地方数百里无一茎青草，人民相食，至不忍言。”但是，明思宗还是在闰四月批准了他的请求，说是“暂累吾民一年”，即仅征收1年。不过，到了第二年，又以“勉从廷议”为幌子，继续征收剿饷，此后剿饷就成为固定的税收项目。崇祯十一年冬，因清兵入塞，京师戒严，一些大臣建议多练边兵。第二年，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又作出抽练各镇精兵73万多名的决定。接着，根据总兵杨德政的建议，

又决定在各地训练民兵，每府1000名，每州700名，每县500名，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尔后推行于全国各地。为了练兵，就得增加饷银，于是又决定增派“练饷”730多万两。明思宗照样批准执行。加上崇祯三年十二月为对付清兵的进攻，在原来每亩加征辽饷9厘的基础上增派3厘，于翌年开征，使辽饷总额增至667.9万多两。辽饷、剿饷、练饷三项摊派共计1670多万两，超过常年国家财政收入一倍以上。百姓因此怨声载道，称呼崇祯为“重征”。广大农民负担不起，弃田逃亡的现象与日俱增，“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崇祯十二年、十三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又接连发生旱灾、蝗灾，赤地千里，流民遍野，饿殍载道，更把贫苦农民逼入绝地。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为农民起义高潮的再起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熊文灿对农民起义军展开招抚攻势的时候，不仅李自成和革左五营的起义首领拒不投降，而且就是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和罗汝才等起义首领，也只是把“受抚”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暗中做着再度起义的准备。在谷城受抚的张献忠，不仅拒不解散队伍，也不服从熊文灿的调遣，而且置造战船，买马制器，用屯田和征税的办法筹集粮饷，还招揽生员潘独鳌、徐以显，举人王秉真等下层知识分子，充当军师，教授《孙子兵法》，操练团营方阵及左右营诸法。他还暗中联络李自成、罗汝才，拨出部分步骑兵及衣食、鞍马支援李自成。罗汝才在房县受抚后，不愿受官领饷，也不解散队伍，而是将部众分插于上庸（今湖北竹山）、房县、竹溪、保康等地，带刀以耕，屯粮积草。很显然，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将重举义旗，

造官府的反。

不少明朝官员看出张献忠、罗汝才的受抚是伪降，必欲除之而后快。崇祯十二年（1639年）春，湖广巡抚余应桂上书熊文灿，声言“献忠必反”，建议“可先未发图之”。书信被张献忠的巡逻哨兵截获，张献忠将其誊抄，发给郧阳巡抚戴东旻转告熊文灿。熊文灿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余应桂被逮捕遣戍。这个事件使张献忠更加警惕，同时也促使杨嗣昌加快了进剿张献忠的步伐。当年三月，清军北撤出塞后，杨嗣昌就将目光投向张献忠。四月初，他和熊文灿都上书明思宗，指出张献忠必反。四月下旬，杨嗣昌经与熊文灿密谋后，决定趁北方边境暂时安静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企图一举歼灭张献忠的农民军。他一面派人刺探张献忠营内兵力的数量、强弱以及人心的向背；一面檄调随洪承畴入援的甘肃总兵柴时华、原任宁夏总兵祖大弼所率的部队前往湖广，归熊文灿指挥，但柴时华和祖大弼皆以各种借口不肯就道。杨嗣昌又奏请明思宗下令，命陕西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向郧阳、襄阳移动，四川巡抚傅宗龙统川兵入郧，配合熊文灿麾下的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分路并进，包围谷城，准备出其不意地偷袭张献忠。张献忠密切注意官军的动向，决定先发制人，重新举起义旗。

五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部重新起义，轻而易举地占领谷城县城，打开仓库，释放囚犯。谷城知县阮之钿饮药自杀。张献忠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宣布“自己之叛，总理使然”，并公布熊文灿及其他官员索贿的数量、日期，既揭露明朝官场的黑暗，也申述自

己重新起义的正义性。张献忠随即西进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于五月下旬攻克房县。均州一带“受抚”的农民军除王光恩外，也群起响应，但他们后来又投降了官军。

张献忠、罗汝才的再度起义，宣告了明廷的招抚与偷袭的失败。熊文灿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向朝廷密疏自辩，遭到言官的弹劾。明思宗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所有的官职，令其立功自赎。熊文灿接到皇上的圣旨，不及审时度势，就强令总兵左良玉带兵进剿张献忠。左良玉认为房县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不应匆忙前去追击。熊文灿为了赎罪，仍坚持要他进兵。左良玉只得以河南副将罗岱为前军，自己率军继进。走了两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只得以野果、树叶，甚至杀掉军马充饥。张献忠、罗汝才以逸待劳，在房县西 80 里的罗猴山（又名“罗猴山”“罗睺山”）埋下伏兵，故意先佯败二阵，诱敌深入，待官军进入埋伏圈，即奋起冲杀，一举毙敌数万余人，俘斩了罗岱。左良玉带着 100 多名士卒突围逃出，军符印信尽失。明思宗闻讯，异常恼怒，下诏逮捕熊文灿治罪，令左良玉降三级，随军戴罪立功。

杨嗣昌是熊文灿的举荐人，熊文灿遭皇上治罪，使他感到惶恐不安。崇祯十二年（1639 年）八月，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抵京，杨嗣昌移交部务后，上疏请罪。明思宗批示，着杨嗣昌“回阁佐理”，即让他留任内阁大学士。杨嗣昌再次上疏请罪，尽管疏中并未自请督师，但明思宗却命他以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赐尚方剑，节制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进剿农民军。九月初四日，明思宗特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有关

进剿的各种问题。御前会议结束，众大臣退去后，明思宗独留杨嗣昌进行密谈，特别交代："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随后赐给杨嗣昌精美黄金 100 锭、大红纻丝衣料 4 套、斗牛服 1 袭、赏功银 4 万两、银牌 1500 副。过了两天，杨嗣昌入宫向明思宗辞行。明思宗还特地设宴为之饯行，并赐给他亲书题诗一首，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为调味之品，用以比喻整治国政，古诗文中常用以指宰相或职位相当于宰相的人。此诗把杨嗣昌比作平定八王之乱、拯救汉朝王室的大将周亚夫，期望他马到成功，除却自己的一块心病。

杨嗣昌感激涕零，便于九月初六日离京，二十九日到达襄阳，进入熊文灿行营。不久，熊文灿被逮捕并押解入京，坐以大辟。十月初一日，杨嗣昌召集诸路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分析湖广形势，研究作战方略。当时，李自成隐匿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山区，比较活跃的农民军主要有张献忠部、罗汝才部和革左五营，而以张献忠部的势力最大。杨嗣昌根据明思宗的密谕，决定首先围剿张献忠部，而对包括罗汝才在内的其他各部尽可能采取招抚政策。他意识到，为集中兵力打垮张献忠部，必须改变过去进止不一的战法。考虑到自己尽管位高势重，但毕竟是文官，为了防止武将跋扈，不听调遣，需要有一位实力强劲的将领来充当自己的助手。于是，他在十月初五日上疏，请求任命左良玉为大将，挂平贼将军印，赋予指挥其他参与进剿农民军的各镇总兵的权力，得到明思宗的批准。崇祯十三年（1640 年）闰正月，杨嗣昌命令诸道进兵，并

派人到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广贴榜文，悬赏通缉张献忠，许诺“能擒张献忠赏万金，爵通侯”。张献忠针锋相对，命人散发传单，上写“有斩阁部来者，赏银三钱”。

罗猴山大捷后，张献忠、罗汝才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分别行动。张献忠由湖广西进，转入陕川交界地区。杨嗣昌估计实行追剿后，张献忠会折入陕西，因而命左良玉以主力进驻陕西兴安（今陕西安康）、平利，而遣偏师3000人入蜀参加追剿，并命陕西总督郑崇俭率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安从汉中入川追剿，但左良玉不同意这个部署，认为只让自己遣偏师参与追剿，未必能够奏效，而张献忠未必北上陕西，万一向西进入成都平原，就难以控制。因此，他拒绝执行杨嗣昌的命令，而于崇祯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率部入川，初七日与郑崇俭部合兵，在太平（今四川万源）玛瑙山同张献忠展开一场大战。张献忠失利，损失3500多名战士，妻妾7人和军师潘独鳌等被俘。杨嗣昌飞章报捷，明思宗大喜，颁发白银5万两（后又追加内帑银1万两）、锦帛1000匹犒赏三军，并加左良玉太子少保衔。三月初五日，明思宗还给杨嗣昌发去一份亲笔手谕，说：“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备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赐给斗牛服1袭、鞍马2副，“以为介胄驰驱之资”。

张献忠败走玛瑙山之后，左良玉紧追不舍。张献忠派亲信马元利携带礼物去见左良玉，对他说，杨阁部所以见重于公，是因为有张献忠在。公一向听任部下恣意杀掠，引起杨阁部的猜疑，如果张

献忠不在，公之死期也就不远了！此前，杨嗣昌因左良玉不听从自己的部署，对他大为不满，曾写信与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要用陕西总兵贺人龙取代他挂平贼将军印。陈新甲上报后，得到明思宗的同意。朝命下达后，杨嗣昌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以免影响双方的关系，结果既得罪左良玉，又得罪贺人龙，失去这两个将领的信赖。这件事在左良玉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现在听马元利一说，不觉心动，便佯称有病在身，在竹山一带按兵不动，听任张献忠率残部逃逸。杨嗣昌被逼无奈，不得不去信好言相劝，并谎称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系出自兵部的主意，是他出面加以制止的。但贺人龙因未挂上平贼将军印，深恨杨嗣昌出尔反尔，早已把事实真相告诉左良玉。因此，不管杨嗣昌如何催促，左良玉就是在竹山一带安卧不动。

张献忠在玛瑙山败退后，又接连失利，遂折返湖广兴山、房县山中休整。罗汝才与张献忠分手后，曾在崇祯十二年（1639 年）十一至十二月在兴山香油坪，联合李自成部，围楚将杨世恩、罗安邦部，斩杀杨、罗二将。杨嗣昌派人招抚，遭到拒绝。罗汝才随后转战川东，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但自己也损失严重，又于崇祯十三年（1640 年）七月出川，返回兴山、房县，与张献忠重新会合。两部会合后，有众数千人，于是决定再度入川，当月就到达巴雾河。

八月，四川巡抚邵捷春调兵防守巫山一带的险要，控扼张献忠、罗汝才的入川之路。与此同时，监军万元吉调陕西将领贺人龙、李国奇，左良玉手下的总兵张应元、汪云凤和四川将领张奏凯，令他们各率所部合击农民军。但是，此时不仅左良玉、贺人龙

对征剿持消极观望态度，各省的督抚总兵也不肯积极用命，甚至想从围剿中抽身。陕西总督郑崇俭在围堵入川农民军之前，竟在川北太平称病，不久干脆由太平退回陕西。张应元、汪云凤自达州到夔州，在土地岭扎营，而贺人龙、李国奇到达开县后，却借口缺粮按兵不动。张应元、汪云凤虽是京营总兵，但所率的部卒都是从湖广招募的新兵，既未经严格训练，又无实战经验。张献忠指挥农民军，对张应元、汪云凤部发起强攻，从早晨战至傍晚，全歼官军 5000 余人，击毙副将潘应奎。张应元负伤突围，汪云凤死于逃跑路上。

杨嗣昌见张献忠、罗汝才复入四川，楚地稍靖，于崇祯十三年（1640 年）九月赶往巫山。张、罗率部采取“以走致敌”的战术，在攻破巫山东北的观音岩及上、中、下马渡，击败邵捷春部将邵仲光后，绕过大昌（在今重庆巫山北），奔向开县。官军只是跟在农民军后面尾追，不敢截击。杨嗣昌因失观音岩斩杀邵仲光。农民军自开县又西走达州，杨嗣昌又下令逮捕川督邵捷春，由廖大亨接替其职务，罢免陕督郑崇俭，令贺人龙、李国奇等“戴罪讨贼”。

张献忠仍然采取“以走致敌”的战术，与杨嗣昌周旋。从崇祯十三年（1640 年）八月在夔门击败张应元、汪云凤起，在半年之内，几乎跑遍大半个四川，北抵广元、昭化，南到泸州、南溪，东到巫山、夔门，西逼成都。杨嗣昌本是一介书生，对行军打仗完全外行，主张采用尾随战术。监军万元吉见左良玉、贺人龙与杨嗣昌有隙，互相掣肘，主张稳扎稳打，对杨嗣昌说，军心不一，未可轻战，应令前军跟踪农民军，后军继后，再用中军抄小道控扼

农民军的归路，但杨嗣昌认为这是分兵示弱的战法，不予采纳。不仅如此，杨嗣昌对所辖部队的进退都要亲自决断。战场瞬息万变，待到命令下达，往往错失战机。更可笑的是，他还将《南华经》当作克敌的法宝，不光自己念诵，还让地方官员如法炮制。朝中大臣感慨地说："文弱（杨嗣昌的号）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哉？"结果，他指挥官兵跟在农民军后面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往往被农民军落下3天的路程。张献忠有次在营中饮酒，就挖苦杨嗣昌说："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张献忠、罗汝才的再起，拖住官军的主力，为其他农民军的再起创造了条件。李自成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里，往来活动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十三年夏，明廷调动大批官军向这个地区集中，李自成便在六七月间，由湖广房县地区取道陕西平利、洵阳（今陕西旬阳），到商州的商洛地区，十一月再进入河南，游哨突至淅川。杨嗣昌对此极为忧虑，对郧阳抚治袁继咸说："闯贼若出中原，定奔合于左革，而襄阳、南阳降人所在抢夺勾引，二俱可忧。"杨嗣昌命左良玉堵截。李自成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破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进入淅川、内乡；十二月从南阳地区北上，攻破宜阳，再克永宁，杀万安王朱采𫓹；尔后又迭克新安、偃师、宝丰等地。河南土地原本就高度集中，此时旱蝗灾害又特别严重，加之不堪辽饷、剿饷、练饷的重负，民间藏蓄罄尽，以人为食，流亡载道，骴骨盈野，小股农民起义蜂起。李自成一进入河南，大批饥民前来投奔，一些小股起义

军也纷纷加入李自成队伍，李自成的部众从初入豫时的不足千人很快就发展到几十万人。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如宝丰举人牛金星、以算命占卜为业的江湖术士宋献策等，也都加入起义队伍，他们劝李自成收拾民心，严明军纪，延揽人才，以取天下。李自成用为谋主，让他们为之出谋划策。李自成的队伍因此越战越强，名声大振，李自成便把自己的诨号“闯将”改为“闯王”。

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李自成率部兵临洛阳城下。洛阳是豫西重镇，福王的藩封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明神宗原拟立他为太子，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封为福王。就藩之时，明神宗赐给他大量财物和庄田。此人嗜财如命，就藩之后又大肆搜刮民财，其就藩时间虽比其他亲王要晚，拥有的财富却比其他亲王要多。当地人说:“先帝（指明神宗）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指皇宫)!”福王又特别吝啬，河南大旱，出现人食人的现象，他就是不肯拿出一个铜板去赈济灾民。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周围县城，侨居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给福王写信，建议他敦促河南巡抚李凤仙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防守，要求他出钱助饷，他就是不肯。正月十九日，农民军开始攻城，守城的士兵知道王府的金银财物堆积如山，而自己却整天饿着肚子，都不肯卖命。二十日晚，总兵王绍禹的部卒在城头起义，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第二天凌晨，农民军占领全城，活捉福王朱常洵。福王世子朱由崧脱逃，他就是后来在南京登极的弘光皇帝。李自成亲自审讯福王，将他枭首示众，并没收王府的一切财产，打开仓库，赈济灾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就在李自成攻打洛阳的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乘四川东路官军防务空虚之机，率军从陆路疾驰出川，奔袭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二月初，张献忠、罗汝才兵临襄阳城下，拦截督师衙门的差官，用 28 名骑兵伪装成官军，拿着差官的调兵军符，骗过守门官军，进入城里。四月初四日夜半，他们放火焚烧承天寺和襄王府等处。城中顿时大乱，负责守城的监军佥事被杀。天明，张献忠所部大队人马赶到，里应外合，一举攻克襄阳城。农民军随即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张献忠妻妾和军师潘独鳌等人；收降守城官军数千人，缴获杨嗣昌所积存的五省饷银及大批弓刀、火药；活捉襄王朱翊铭及其子贵阳王朱常法。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上，张献忠递给他一杯酒说："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随即将襄王和贵阳王一并斩首。张献忠还下令没收王府全部财产，并打开王府取出 15 万两白银救济饥民。

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洛阳、襄阳相继被农民军攻陷，福王、襄王被杀，明思宗闻讯，悲恸欲绝，拊几叹道："朕为天下讨贼，半月之间，两王皆以国死（殉国），是天厌我家，而翦弃子孙也。不然，贼何以至此！"

杨嗣昌在四川听说张献忠出川东下，也拖着重病之躯由水路沿江而下。他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 年）底到十四年初，即已患上绝症。到正月初六日，病情已很严重。初八日他向皇上报告军情时，就顺便提到自己的身体，忧心忡忡地说："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

襄库罄尽，心益忧煎，不知死所。”二月十八日，赶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得知襄阳失陷，襄王被杀，更是惊悸异常，上疏请死。接着来到荆州沙市之徐家园，接到洛阳在此前已被李自成攻克、福王被杀的消息，原本病重的杨嗣昌更加忧惧，遂不进饮食，卧床不起，把所有军政事务都交给监军佥事万元吉代理，并派人叫其家属前来会面。万元吉问他，为何不将病情报告皇上。他回答说，不敢。这位显赫一时的阁部，这时已经完全绝望，心如死灰，正如他写给广东巡抚宋一鹤的信中所吐露的：“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法矣。”三月初一日，他在徐家园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54岁，宣告他围剿农民军战略计划的彻底破产。

明思宗接到万元吉呈报的讣闻，对杨嗣昌又恨又怜，对身边的大臣叹道：“督师功虽不成，志也堪悯，宜用辅臣礼归葬。”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祭文。此后，他对诸臣提及此事，连声哀叹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不过，杨嗣昌毕竟负有失职之罪，如果不加追究，明思宗以后恐难驾驭群臣。因此，在隆重祭葬杨嗣昌的同时，明思宗也不得不颁发诏旨：“嗣昌二载辛勤，一朝尽瘁，虽有玛瑙山功，不能掩其闯、献鸱张，两藩罹祸之罪。”令有关部门会勘议罪上报。有关部门的官员知道明思宗偏爱杨嗣昌的态度，便根据传统法律中对勋臣的“议功”（即将功抵罪）原则，为之解脱罪责，免于惩处。许多大臣深为不满，纷纷上疏要求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刑部主事雷缜祚弹劾他有六大可斩之罪，要求严加惩处；礼部侍郎蒋德璟甚至要求用嘉靖中期处罚仇鸾之例，对其剖棺戮尸。明思宗一概不予理睬，

后来还在乾清宫召见六部、九卿、科道等官，训斥说："杨嗣昌系朕特简，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谕尔等知之。"才将舆论平息下去。

第二节　频换主帅，难挽狂澜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杨嗣昌死后，明思宗一时找不出合适的督师人选，四月经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推荐，只得任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杨嗣昌总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大江南北诸军，仍兼陕西三边总督，照样赐给尚方剑和督师印。丁启睿，河南归德府永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举进士，崇祯初年开始涉足政坛，初为文职官员，崇祯十一年（1638年）代孙传庭任陕西巡抚，两年后因杨嗣昌之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丁启睿原本是个庸才，担任督抚期间，凡事小心谨慎，既无过亦无功，对升任总督节制五省及大江南北军务，对付李自成农民军，更是手足无措，莫知为计。

李自成攻入河南后，在几位谋士的帮助下，针对当地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赋役苛重的状况，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所谓"均田"，就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包含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不过，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贵族官僚和地主或被杀、或逃亡，荒废的土地较多，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耕垦，农民军没有采

取过具体的土地分配举措。所谓“免粮”，就是减免税粮，实行“不催科”“三年免征”的政策。当时的民谣唱道：“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农民军还针对官府对城镇商人的横征暴敛，提出“平买平卖”的政策。这些口号和政策的颁布，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李自成的队伍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攻占洛阳后，李自成得知开封城守副将陈永福率兵前来支援洛阳守军，开封防御力量因此大为削弱，遂于崇祯十四年（1641 年）二月间率部南下，佯攻汝州（今河南临汝），然后掉头向东北方向挺进，准备袭取开封。开封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正如当时的汜水知县周腾蛟所指出的：“汴城（开封，五代梁、晋、汉、周与北宋皆定都东京开封府，此地隋、唐时为汴州，故又称为‘汴京’）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李自成农民军于十二日抵达开封城下，立即大举攻城。河南巡抚高名衡急忙调动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上城固守。开封城在金代经海陵王的重新整修，城高墙厚，墙基深入地下数尺，特别坚固，农民军连续攻城七昼夜未克。李自成又在观察形势时被敌箭射中左眼，而往救洛阳的陈永福又已回师开封，农民军只得撤围，转移到密县、登封、嵩县一带。

七月，因与张献忠发生意见分歧，罗汝才率部到达河南淅川，与李自成部会合。史载：“自成之兵长于攻，汝才之兵长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李、罗的联合，使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农民军力量大增，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最大的威胁。

奉命督师的丁启睿出潼关后，得知李自成正围攻开封，有众数十万，不敢往救。又听说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一带活动，力量较弱，遂传檄左良玉对其发动进攻，与张献忠激战于麻城。此时开封告急，明思宗催其往援。丁启睿回答说，我正同张献忠作战，无法分身赴援！明思宗无奈，只得接受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在崇祯十四年（1641 年）五月将关在狱中的傅宗龙释放出狱，命为陕西三边总督，专力征剿李自成农民军。

傅宗龙，字宗纶，云南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成进士。天启年间，因在贵州参与平定安邦彦叛乱而威名大震。崇祯三年（1630 年）因孙承宗之荐，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后因小过被夺官。崇祯十年被重新起用，入川征剿农民军。两年后，因杨嗣昌之荐，召为兵部尚书。他生性耿直，陛见时滔滔不绝地力言民穷财尽，惹得明思宗不高兴。杨嗣昌出任督师后，傅宗龙又批评他“徒耗敝国家，不能报效，以气凌廷臣”。不久，明思宗即以戏视封疆大臣的罪名将其逮捕下狱，在狱中关了两年。

崇祯十四年（1641 年）六月，傅宗龙到达陕西，与陕西巡抚汪乔年共谋“平贼”之计，决定尽括关中兵饷，但属县皆遭旱蝗之灾，已无法提供所需之兵饷。九月四日，傅宗龙只得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所部陕兵两万出关，与保定总督杨文岳率虎大威所部保兵两万，在新蔡会师。次日渡过洪河到达龙口，准备北上项城。此时李自成与罗汝才在洪河上游，拟渡河西攻汝宁（今河南汝南），侦知官军的动向，即将精锐埋伏于孟家庄附近的树林里，

而以部分兵力架桥佯渡诱敌。傅宗龙令全军奋力追击，行至孟家庄，解甲觅食，被李自成的伏兵打个措手不及。贺人龙、虎大威、杨文岳纷纷卷甲逃窜。傅宗龙打了一阵，也在九月十八日夜半突围而逃。次日中午，他尚未逃到项城（今河南沈丘）即被农民军追及俘杀。

项城之战后，李自成、罗汝才转向西北，于十月攻破叶县，杀死叛徒刘国能，又攻舞阳，在北舞渡杀死叛徒李国庆。十一月，包围南阳，击杀守将猛如虎，俘杀唐王朱聿模。十二月，乘胜挥师北上，迭克开封属县十几座城镇，第二次进围开封。农民军见城墙坚固难攻，采取挖地洞用地雷爆破的方法，想炸开城墙，但未获成功，反使自己的一些骑兵受到意外损伤。听说左良玉正率部赶来驰援，李自成、罗汝才乃于崇祯十五年（1642 年）正月十五日撤离开封，回师迎击左良玉，将其包围于偃城（今河南漯河偃城区），但因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来援，农民军未能攻破偃城。

汪乔年，字岁星，浙江遂安（1959 年没入新安江水库）人。天启二年（1622 年）成进士，自负才武。崇祯十四年（1641 年）出任陕西巡抚，曾奉诏掘毁李自成的祖坟。傅宗龙死后，明思宗命其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火速出关，与左良玉夹剿李自成。当时关中精锐已尽没于项城，他收散亡、集边卒，勉强凑集马步卒 3 万人。崇祯十五年正月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出潼关，二月到达洛阳。汪乔年认为，农民军锐气正盛，如果直赴郾城，难与争锋，不如直扑农民军的后方基地襄城（今河南襄城县），

李自成势必回救，郾城之围可解。于是，他将步兵和火器留在洛阳，亲率两万骑兵，于二月十二日进占襄城，命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各为一路，进驻城东 40 里处，以声援左良玉。李自成因汪乔年掘其祖坟而恨之入骨，得知其进占襄城，即亲率主力数十万人前往，准备与之决一死战。汪乔年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总兵不及接火就掉头逃窜，左良玉在郾州解围后也不派兵来援。汪乔年仅率千余步卒守城，兵败城陷，被农民军割去舌头，寸磔而死。

李自成攻占襄城两天后，拔营东向，连克豫东大批城镇，三月又克睢州（今河南睢县）、归德（今河南虞城）。四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部同河南一支起义军以袁时中为首的小袁营会合，于十六日占领杞县，从而扫清了开封的外围。五月初二日，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开封，次日大部队到达。他们吸取前两次攻城受挫的教训，没有贸然攻城，而是采取围而不攻、长围久困之战法。

明思宗得知农民军再围开封，斥责督师丁启睿，令其从速赴救。丁启睿乃于五月中旬，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领 18 万官军，号称 40 万，救援开封，到达朱仙镇（在今河南开封西南）以东的水波集。李自成撤开封之围，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迎击。为了截断官军的退路，农民军先在朱仙镇东南要道上挖掘一条深广各两寻（1 寻为 8 尺）的长堑，然后与官军展开激战。丁启睿辖下的四镇兵马矛盾重重，他命诸路军发起攻击。左良玉以农民军士气正盛不可击。五月二十二日，农民军筑起 3 座土山，据高用大炮轰击左良玉阵地。左良玉急忙率部拔

营撤退，狂奔80里，来到长堑之前，弃马过堑，被农民军追至掩杀。左良玉仅以身免，逃往襄阳。丁启睿、杨文岳在总兵杨德政、虎大威的护卫下，逃往汝宁（今河南汝南）。农民军追击400里，俘获数万官军、7000匹马骡。丁启睿的督师敕书、官印和尚方剑全部丢失。明思宗得报，非常愤怒，下令将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革职候代。三总兵中，左良玉率先逃跑，但因兵多势大，未受惩处，虎大威后中炮死而免诛，只有总兵杨德政被处斩。

明思宗眼看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披靡，剩下周王的封藩之地孤零零地处于农民军的包围之中，心中十分着急。回顾官军的表现，不禁感到十分失望与愤恨。几年来，许多武将拥兵自重，不听调动，一遇劲敌便率先逃命。其中，尤以屯驻河南、湖北的左良玉部和统率陕兵的援剿总兵贺人龙，最为骄横跋扈。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继任督师的丁启睿对他更是一筹莫展。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以周延儒为首的大臣廷议，认为被关在狱中的原户部尚书侯恂曾有恩于左良玉，建议将侯恂释放出狱，用为督师，令督左良玉再援开封。明思宗于是特旨释放侯恂，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军，进行南北夹击，以解开封之围。但是，左良玉对侯恂仍然阳奉阴违，侯恂的援汴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就在令侯恂督师的同时，明思宗还命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迅速出关，救援开封。孙传庭是明廷的一员悍将，在陕西巡抚任上，曾残酷镇压陕西多支农民军，并设伏俘获高迎祥。崇祯十一年十月，与洪承畴一起奉诏入卫京师。翌年清

兵出塞后，明思宗令洪承畴率陕西精锐之师驻守蓟辽边境，他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遂以耳聋为由辞去保定总督之职，因而被逮捕下狱。崇祯十五年正月，见李自成、罗汝才雄视河洛，无人能够抵挡，明思宗不禁又想起孙传庭，便将他释放出狱，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并在文华殿召见，询以“剿贼安民”之策，问他需要多少兵马才能“破贼”。孙传庭蹲了3年的班房，根本不了解外面的变化，以为农民军的力量还同当年一样，信口答道，有5000精兵就已足矣。明思宗非常高兴，命他率禁军往援开封。但未等他出关，开封之围已解，汪乔年在襄城兵败身死，明思宗遂命孙传庭代为陕西三边总督。

孙传庭就任陕西三边总督后，明思宗即密令他处斩援剿总兵贺人龙。贺人龙比左良玉更加跋扈，崇祯九年（1636年）随洪承畴入川追剿农民军，翌年“谍归”陕西。后来两次随陕西三边总督出关皆不战而逃，致使傅宗龙、汪乔年皆被农民军俘杀。崇祯十五年四月，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斩首示众，将其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降将、副总兵高杰为总兵，以稳定军心。

就任陕西三边总督后，孙传庭这才觉察到时局的巨大变化，于六月间上疏说：“非练兵二万、饷百万不可。”明思宗认为他出尔反尔，在奏疏上批示道：“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随着开封形势的日趋危急，明思宗又下诏以巡按御史苏京监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兵，催促孙传庭出关。孙传庭推说“兵新募，不堪用”，但明思宗不听，孙传庭只得于九月以

总兵高杰为中军，另调总兵左勷、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等部东出潼关。

崇祯十五年（1642 年）九月，河南巡抚高名衡眼看开封被围 3 个多月，外援断绝，粮饷罄尽，遂下令搜刮居民的粮食，以供军饷，结果弄得十室九空，出现人食人现象，白昼行人断绝，鼠雀全无。有人向高名衡提出“决河灌城”的建议，声称决开黄河，可以水淹灌黄河故道上的农民军老营，解围城之急。高名衡与推官黄澍和巡按御史严云京经过商议，决定付诸实施。九月十五日夜，命士卒凿开了朱家寨口大堤企图水淹农民军，同时募民筑羊马墙，以挡水保城。李自成闻讯，立即将部队转移到高地。此时正值大雨连绵，河水暴涨。第二天，河水漫过堤岸，淹没了整个开封城。周王朱恭枵及其家眷、侍卫，巡抚、巡按、总兵等官员，以及城中豪绅皆以乘船逃出，数十万百姓被淹死，农民军也有万余人溺水而亡。李自成只得率部西走，准备入关夺取关中。

明思宗得到开封被淹的消息，下旨慰劳巡抚高名衡，让他回乡养病。过了 1 个多月，明思宗召见推官黄澍，了解水淹开封的真相。黄澍竟谎称决河灌城之事是农民军干的，还吹嘘自己有守御之功。明思宗信以为真，命他携带 10 万银子返回河南，3 万两赏赐周王，其余 7 万两赈济宗室、兵民，但黄澍竟将 2.7 万两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孙传庭东出潼关后，得知开封已遭水淹的消息，转兵南下，向南阳进发。十月初进至郏县，侦知李自成正领兵西进，令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分别埋下伏兵，由牛成虎领兵作战。李自成率部到

达后，牛成虎一交战即佯装败退，引诱农民军进入埋伏地点加以截杀。农民军损失千余人，李自成随即下令撤退，至郏县东北30里的冢头，故意将一批军资器械丢弃道旁。官军追到此地，纷纷争抢，乱作一团。农民军回师反击，罗汝才恰好也率后续部队赶到，一起夹击，大获全胜，歼敌数千。孙传庭率残兵败卒经巩县逃回陕西，明思宗责其“图功自赎”。此战进行之时，因天降大雨，官府运送粮饷的车队无法按期到达，官军士卒既冻又饿，只得采摘青柿充饥，此战也因此被称为“柿园之役”。

当年十一月，清兵再度入塞，京师告急。明思宗不得不调兵遣将去对付清兵，再也无力进攻农民军。李自成农民军在郏县战后，再破当阳，尔后驻屯上蔡、舞阳一带。十一月末到闰十一月初，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玉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为首的革左五营来到河南，与李自成、罗汝才部会合，农民军的势力更加壮大。

李自成原拟进入潼关，攻取西安，通过郏县之战，知道孙传庭尚有一定实力，遂准备南下先取襄阳，消灭左良玉，但有部下建议:“杨督（杨文岳）以真（定）、保（定）之兵在汝宁，若蹑吾后，非良策也。良玉新败，必不敢救汝（宁），盍先取之?”李自成、罗汝才与革左五营于是联军围攻汝宁。杨文岳因援汴不力而戴罪防守汝守，他令监军佥事孔贞会所率川兵屯守城东，自己所率的保兵屯守城西，企图东西呼应，背城死战。李自成在闰十一月十三日率军进抵汝宁附近，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先集中力量攻城东，击溃孔贞会的川兵，再转攻城西，用大炮猛轰，击毙总兵虎大威、守备蔡

浩父子等人。杨文岳退守城中，企图负隅顽抗。农民军将汝宁城紧紧包围起来，四面环攻，破城而入，全歼守敌，生擒杨文岳及崇王朱由樻。杨文岳拒不投降，被农民军用大炮轰毙。

通过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等五大战役，李自成农民军斩杀明将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击败明将丁启睿、左良玉、孙传庭，杀死及收降官军十几万人，据有河南全境。在汝宁之战后，李自成便率军西向，直趋湖广重镇襄阳。左良玉在朱仙镇大败后，撤退到襄阳，招兵买马，拼凑起一支 20 万人的部队，号称 30 万，但朝廷只按他的编制供给 2.5 万人的军饷，其余军饷全靠自行搜刮和掳掠解决，从而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和怨恨。他自知无法抵挡李自成的攻势，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大造战舰，准备沿汉水而下逃跑。舰船被当地百姓烧毁，他又抢劫商船备用。十二月初二日，农民军抵达樊城。左良玉即顺江水而下，先逃至承天（今湖北钟祥），又经武昌再逃至九江。十二月初四日，农民军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之下，占领了襄阳，接着分兵四出，攻下枣阳、宜城、谷城、光化、均州、荆门等地。十二月十六日，又进到荆州，擒杀湘阴王朱俨铘父子祖孙 5 人。十二月底又至承天，攻打显陵卫，放火焚烧了兴献陵（明世宗生父兴献王陵墓）的享殿。崇祯十六年（1643 年）正月初二日攻克承天，湖广巡抚宋一鹤畏罪自缢。到崇祯十六年正月，农民军已南跨长江，到达松滋、枝江（在今湖北枝江西南）至澧州（今湖南澧县），北滨黄河，东有归德、汝宁、德安（今湖北安陆），西至潼关、远安，据有黄河以南和湖广的广大地区。

随着农民军在豫、鄂的不断取得胜利，除张献忠以外，各支起义队伍纷纷与李自成部联合作战，这一方面壮大了李自成的实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与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革左五营的马守应和贺一龙虽然都听从李自成的军令，但却不愿归属李自成，希望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官军的将帅又利用农民军内部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终于导致了农民军内部的火并。三月初七日，李自成杀贺一龙，次日晨又杀了罗汝才。罗汝才的部将有的倒向孙传庭，有的降于左良玉，与罗汝才关系较好的马守应则不再听从李自成的号令而独立行动，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春病死于夷陵（今湖北宜昌）。罗汝才、贺一龙的被杀，使李自成农民军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有利于其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并最后推翻明朝的统治。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和占领区的日益扩大，李自成开始从流动作战转入守土不流的阶段，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崇祯十五年（1642 年）冬，李自成开始在占领地区部署诸将镇守，并派官治理。第二年春，他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各级农民政权。在中央，建立奉天倡义大元帅府，简称“倡义府”，李自成以“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的名义充当最高掌权者，设丞相一人，由牛金星担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置侍郎一名，分理政务；在地方，设府、州、县，分别设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为此，李自成在占领区实行开科取士，选拔一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在设立行政机构的同时，李自成还对统辖的百万军队进行整顿，统一军制。他将军队分为两大部分：中央直属部队，主要负责机动作战，分为标营（中权亲军）和左、右、前、后五大营，标营下辖五营，其他四大

营各下辖二营，营下辖队；地方部队沿袭明朝卫的名称，负责镇守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各级将领皆授予正式职称。在大元帅之下，五大营分别设立22将，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其中，以田见秀、刘宗敏两位权将军职权最重，田负责提督诸营事，刘负责指挥中权亲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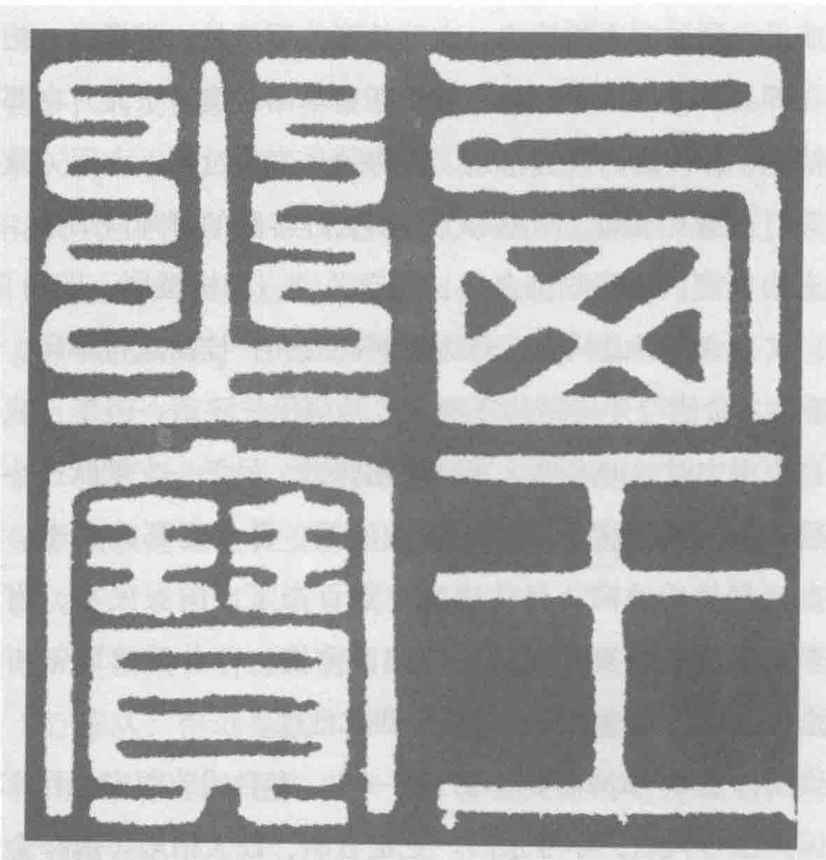
承天兴献陵的失守，令明思宗痛心疾首，他声泪俱下地说："朕不德，忧及陵寝！"决定让内阁大学士前往湖广督师。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上旬，明思宗召见廷臣，对内阁大学士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向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三月十日，正式命吴甡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携带尚方剑，前往湖广督师。吴甡提出先往南京，用精兵挟制骄横跋扈的左良玉，促之西入湖广，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东出潼关，对农民军东西夹剿，明思宗没有同意。吴甡又提请皇上拨给3万精兵，明思宗请兵部速议发兵，兵部尚书张国维同意调给1万军队，但就是这1万军队也迟迟未能调来，吴甡也就迟迟不肯出京。明思宗遂于当年五月罢撤吴甡的督师之职，后下令将其逮捕治罪。

孙传庭自郏县惨败之后，退到陕西大肆扩充军队，并制造两万辆所谓新式武器"火车"，车上装备火炮、弓弩、粮食，谓进可用来冲击骑兵，退可构造环形屏障。在罢撤吴甡督师之职时，明思宗任命他以兵部尚书衔佩戴七省督师之印，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以及江南、江北军务，赐尚方剑，全权指挥中原战事。兵部侍郎张凤翔对此持有异议，向明思宗指出："孙传庭所有

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但明思宗已顾不了许多，决定孤注一掷，一再催促他从速出关。孙传庭只得统率10万大军，于八月东出潼关，向李自成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主动从潼关至郏县一带撤退，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地区，并派轻骑切断官军的粮道，于九月在郏县大败孙传庭，孙传庭的九边精锐、良将劲兵丧失过半。大臣一致要求固守关门，急复秦疆。明思宗下旨削去孙传庭的督师尚书衔，仍以秦督充为事官，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不久，又下令提升总兵白广恩为援剿副总兵，挂荡寇将军印，拨给3万精兵，命他与孙传庭共守潼关，希望保住陕西，但李自成在官军喘息未定之时，即亲率大军自洛阳西进，另派一支部队抄小道攀越山险，前后夹击，于十月间攻破潼关。孙传庭部将高杰、白广恩、高汝利纷纷逃窜，孙传庭亲率数百亲丁冲向农民军，当阵死亡。李自成乘胜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全境，并分兵攻取银川、兰州、张掖、西宁等地，拥有了整个西北地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元月初一日，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更定官制，设天佑殿，以牛金星为大学士平章军国大事，宋献策为军国大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仍称“六政府”，襄阳时期只设侍郎各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地方机构增设省一级，设节度使掌之。封授功臣以五等爵。明末农民战争从此进入了推翻明朝统治的关键时期。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罗汝才攻克襄阳后，因对西据郧阳、兴安一带的左良玉部还有顾忌，便越过汉水向东转



“西王之宝”印文



大顺通宝



“西王赏功”钱

移，活动于河南、湖广交界一带。明廷急调左良玉回师征剿。七月间，张献忠乘虚攻克郧西。罗汝才留在河南，改同李自成联合作战。张献忠的力量顿显单薄，八月间在信阳被左良玉打败，遂转战安徽，再返回湖广，于崇祯十六年五月攻占武昌，擒获楚王朱华奎，投之江中，没收楚王府的财产，赈济饥民。他改武昌为天授府，自称“大西王”，建立农民政权，在中央设立六部、五军都督府，在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机构，在地方设巡抚、守道、巡道、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并开科取士。然后带兵南下，攻占湖广大部分地区。当年冬，张献忠得知李自成攻占陕西全境，判断明朝统治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为避免同李自成发生摩擦，决定向明朝兵力较为薄弱的西南地区发展，遂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率部由荆州西攻夔州，进入四川。

第三节　李建泰代帝出征与调吴三桂入晋之议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六日潼关失守的消息，直到十一月初八日才由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报告给明思宗，但具体细节不明。明思宗急令“秦、晋、蜀、淮、扬等处均宜毖备，在廷大小臣工，凡可强兵足饷，用人灭贼者，各抒所见以闻”，并命从速查明孙传庭、白广恩的下落。十一月初，明思宗任命新任兵部右侍郎余应桂接替孙传庭为陕西三边总督。余应桂以无兵无饷，向皇上哭诉了一场。明思宗也只能派给京军千人护行，并发给内帑银1万两作为军前犒赏之用。余应桂出京之后日夜忧伤惶惑，一到山西便发现

当地有不少大顺农民政权委派的官员，逡巡不前。

十二月十二日，吏部尚书李遇知上疏，报告陕西方面派人传话，潼关确已在十月初六日失守，孙传庭下落不明，又传华阴、华州（今陕西华县）、渭南、临潼俱已失守，而临潼距省城西安只有60里之遥，一马可至，西安恐难守住。奏疏认为："为今之计，怨天尤人总属无济，惟有急复秦督，急补秦将，急发堪战之兵，急措接济之饷。四事之外，别无良策。"明思宗接到这个奏疏，得知陕西形势危急，又接连向余应桂发出谕旨，再拨给内帑银1万两，催促他"作速驰往，不得稽迟"，但谕旨发出之后，陕西全境早已落入李自成大顺军之手。

在得知李自成大顺军攻破潼关的消息后，廷臣对李自成的下一步行动议论纷纷。首辅陈演认为："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虎入陷阱。"吏部尚书李遇知则认为："三秦砺山带水，四塞称险，屯兵函谷，可以号召天下，从来劲兵大将咸出其中。蜀、黔转赋，实以秦为咽喉地，贼垂涎久，欲据此为家。"他们都低估了这位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他不仅不恋子女玉帛而入陷阱，而且也不只是要据三秦以为家，而是要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

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标志着大顺与明廷双方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末农民战争已进入彻底推翻明朝统治的关键时期。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之后，李自成即派遣先头部队于十八日渡过黄河，攻占山西荣河（在今山西万荣西南）等县，为大军的东征作准备。同时，派人

向山西各地散发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发布的檄文，宣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李自成），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在大顺农民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招抚下，一些州县不战而降。

转眼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 年）年底除旧更新的日子，这是个家家欢乐、户户热闹的日子。按照惯例，每年的这个节日，宫廷里都要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但今年却有些异常，整个宫廷笼罩着一片阴郁、晦暗、沉闷的气氛。正为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的明思宗，怎么也提不起兴致。礼部大臣问皇上需要做些什么，他想到由于连年战争，民穷财尽，国库亏空，军饷难筹，不能再像往昔过年时那样大讲排场，奢靡浪费，于是便向礼部发去一道谕旨:“朕于冬至、正旦、寿节、端阳、中秋及遇诸大典，升殿行礼，方许作乐，其余皆免。至浣衣减膳已有谕旨。今用铜锡木器，以仿古风。其金银各器，关系典礼者留用，余尽贮库，以备赏赉。内外文武诸臣，俱宜省约，专力办贼。……其官绅擅用黄蓝绸盖，士子擅用红紫衣履，并青绢盖者，庶民男女僭用锦绣纻绮及金玉珠翠衣饰者，俱以违制论。”但是，此谕却引起一些臣子的议论，说是“今以玉食万方之王，而降为污尊坏饮之事，是貉道也，何以能久?”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初一日，正当西安城欢天喜地庆祝大顺建国之时，北京却刮起了一场沙尘暴，震屋扬沙，天空晦暗，咫尺不见。迷信的官员占了一卦，说是“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

破”，预示着将有一场不祥之灾，更使人感到惶恐不安。

明思宗照例在当天早朝时举行接受群臣朝贺的仪式。他一大早来到皇极殿，上朝的钟声响过后，却迟迟未见一名朝臣到来。一名值班的官员说，因为大风扬沙，群臣或许未听见钟鼓之声，以为圣驾未出，所以姗姗来迟。请皇上再下令鸣钟，打开东西长安门，这样远近的大臣都听得见，自然都会急速赶来。明思宗只得下令再度鸣钟，不准停歇，并打开东西长安门，不许关闭。等了一阵，还是不见人来。明思宗提出先谒太庙，再接受朝贺。侍候的太监呼唤“驾銮舆”，又不见驾舆马与立杖马，只好将长安门外朝官所乘马匹悉数赶入端门以顶替之。但司礼太监担心这些马匹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容易出事，明思宗只得改变主意，决定先受朝贺再谒太庙。又等了些时候，廷臣才陆续到来。当时京城的文臣都住在西城，上朝时列于东班；武臣都住在东城，上朝时都列于西班。由于迟到，见皇上正在大殿上注视着殿下大臣的行动，他们都不敢过中门。文臣直入武班，从螭头下伛偻而入东班；武臣也直入文班，从螭头下蹲俯而入西班。接受朝贺之后，六品以下官员不参加陪祭太庙的活动，由于所乘的马匹受惊，只得步行回家。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不祥的预兆。

在大年初一出现大风扬沙，再加上上述种种异样的景象，使明思宗惶恐不安。草草行过朝贺礼，与阁臣议论几句国事之后，便请道士前来扶乩，占卜王朝的命运。他沐浴焚香，向上天跪拜默祷：“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天仙”通过道士之手，写下如下的乩语：“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

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明思宗见到此诗，自觉没趣，默然不悦。

种种不祥的预兆，固然使明思宗心中不快，但是作为一国之君，他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危局，考虑应付的对策。正月初三日，他在德政殿召见其所信任的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急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走到皇上跟前，小声地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其实，明思宗心中早有此意。早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明思宗就曾同他秘密商议过南迁之事，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对外泄漏。明思宗的兄嫂、明熹宗的皇后张氏，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个消息，找到明思宗的皇后周氏，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是周延儒在误导皇叔（指明思宗），宗庙陵寝都在北京，往哪里迁？周皇后将这话转告明思宗，明思宗大怒，令宦官追查消息来源。但张皇后守口如瓶，就是不说，因此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不过，明思宗仍未放弃南迁的念头。他先前曾命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为南迁做准备。崇祯十六年（1643 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说道路梗阻，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他即密谕冯元飏调集海船 200 艘，在直沽口待命，以备南迁之用。明思宗一听李明睿说到南迁，连忙阻止道，此事关系重大，不能随便乱说。过了一会儿，又用手指了指天，说，不知天意如何。李明睿说，天命神秘难测，此事还得由皇上圣心决断，否则将后悔莫及！明思宗四顾无人，这才轻声细语地道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这事朕早就想办，但没有大臣站出来支持，帮助朕操办，所以拖到

现在。卿意与朕相合，但外边的大臣都表示反对，又有什么办法呢？此系大事，爱卿一定要保密，否则朕将治卿之罪。接着，明思宗又问起如果南迁，该怎么走，途中如何接应。李明睿对此早有考虑，回答说，不如四路设兵，东走山东，或西走河南，这是陆路；也可从登、莱上海船，或从通州走运河，这是水路。但皇上还是须走小路，轻车南行，20日可抵淮上，距离南京也就不远了。明思宗点头称是。李明睿见皇上同意他的意见，又请求皇上当机立断，说："臣谋不敢泄，但求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

午间，明思宗命近侍在文昭阁宴请李明睿，然后又在内殿与之商议一些政事，包括军饷的筹措问题。李明睿指出："兵饷缺乏，民穷财尽，惟发内帑，足济燃眉。"明思宗却说："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李明睿不相信，说："祖宗三百年蓄积，度不至是。"明思宗还是说："其实无有。"到晚上，再次在内殿召见李明睿，商议南迁之事。明思宗问道，所奏南迁之事，即使施行，谁可接济，途中派什么官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回答说，济宁、淮安都是冲要之地，不能不设官驻守，必须先派重臣领兵设防。明思宗又问，派什么官衔的重臣驻守。李明睿答曰，必须派户、兵两部的堂上官（第一把手，即尚书）。明思宗又问及沿途兵将的派遣问题，说此时精兵驻守关门，大将都在各个边镇，调遣甚为不易，怎么办。李明睿答曰，兵员比较好办，可在近京八府招募，但皇上此行，京师须留人料理，关门之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也不可轻易调动，途中领兵驻防的重臣可以考虑从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中择才任用。明思

宗点头称是。李明睿又重申下午曾经谈及的拨发内帑的问题，说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花销）之外，其余的积银应该拿出来犒军。如果南迁途中粮饷不足，筹措起来就十分困难。这些银子，留在宫中不过是一堆朽物，先时出，一钱可顶二钱之用；到危急之时再拿出来，万钱不抵一钱之用。明思宗觉得言之有理，但还是强调，户部亦该设法筹措。李明睿指出，现今是国穷民也穷，户部很难筹措，皇上应该为宗庙社稷考虑，果断决策。明思宗知道李明睿说的是实话，也只能点头表示赞同。这次密谈，直至二更时分才告结束，明思宗颇感满意。

应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南迁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当初明太祖肇建明朝，就把南京定为全国的首都。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仍然保留着陪都的政治地位，保存着一套形式上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任职的官员多为虚衔，握有实权的只有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号称数十万的军队，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南京要比北京安全得多。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财赋之区，遭受战争的破坏也较少。如果退守南方，即使丢失了北方，也可划江而治，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相抗衡，最后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但是，将政治中心的都城南迁，涉及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正统末年，明英宗亲征被俘，瓦剌兵临京师，有人主张南迁，即遭到万人的唾骂。这就需要位居权位顶端、手握乾纲的皇帝做出决断，敢于独断专行。明思宗虽刚愎自用，但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又怕承

担责任，想等大臣出面陈请，然后再付诸实施，结果此事便暂时搁置下来了。

李自成派先头部队渡河东征时，就已决定分兵两路，对明王朝采取南北两面包抄的钳形作战方略：北路为主力，由李自成和权将军刘宗敏率领，渡河进入山西，占领平阳后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宣府、居庸关等战略要地，歼敌重兵，断绝京师的援军，最后攻占北京；南路为偏师，由制将军刘芳亮统率，渡河后沿黄河北岸东进，进入京畿南部，防止明思宗南逃，阻击南来援军，而后北上，助攻北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从西安出发，开始向北京进军。

正月初九日，兵部收到李自成亲率大军东征之前派人送来的通牒，上书大顺永昌的年号，约定与官军展开决战，说大军将于三月十日抵达京师。明思宗得报，寝食难安，几天里粒米未进，忧愤交加，疲惫不堪。正月十一日上朝，当着阁部、九卿、科道等官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罢痛哭流涕。他责问众大臣说："贼势如此，阃外（指统兵在外）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卿等能无为朕分忧哉？"一听这话，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说愿代皇上出征。明思宗说他是南方人，不了解北方的山川形势，无法承担此任。次辅蒋德璟、魏藻德、方岳贡、范景文、丘瑜等也都纷纷请求代帝出征，均未获批准。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道入阁的大学士李建泰跪奏道："主忧如此，臣敢不尽驽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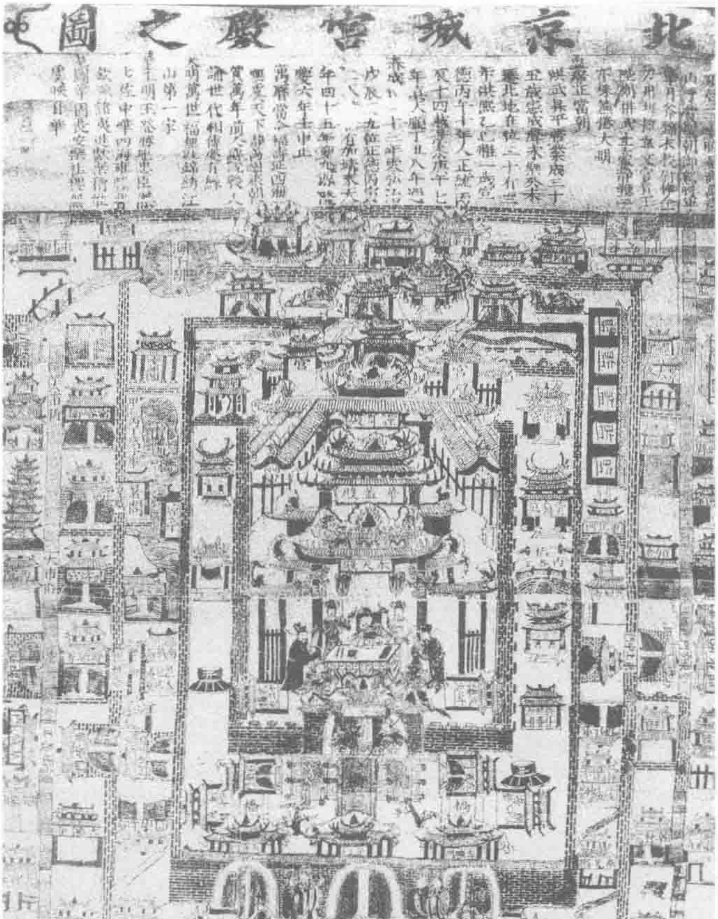
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明思宗一听，脸露笑容，欣然表示同意。因为在缺兵少饷的困境下，这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山西大富翁愿意破家纾国难，可以不费国库一两银。他立刻表示，卿若西行，朕将亲自在郊野隆重饯行。正月二十日，明思宗正式决定让李建泰以督师辅臣的身份，“代朕亲征”。正月二十六日，举行特别隆重的遣将礼：先由驸马都尉万炜祭告太庙，再在大殿举行典礼，赐予龙节及尚方剑；尔后在正阳门城楼上大排宴席，皇上亲自用金杯斟满三杯酒，赐予李建泰，对他说：“卿即朕，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发后闻。”并当场颁赐敕书，规定“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饯行之后，李建泰率领3000京营禁军出宣武门，向涿州进发。

李建泰离京后，经涿州取道保定南下。行前，明思宗和左右的大臣认为，在大同、宣府一带朝廷派有重兵把守，大顺军如想攻取京师，必然会避开重兵把守之处，故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但是，他们既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没料到大顺军竟会实施南北两面包抄的作战方略，结果完全陷入了被动。

李建泰一出北京，立即就感到举步维艰。他走到畿辅的一个县城，跟随人员饿了，出去找食物。县里人问，你是大明的官员，还是大顺的官员。这名跟随人员谎称是大顺的，县里的人便拿来一大堆食品，让他饱餐而去。没想到距离京师咫尺之遥，人心的变化竟如此之大。李建泰领着禁军继续前行，到达距离京城200里的河北定兴县，地方官竟不让他这个督师大学士进城，他发兵攻打后才得以入城，将那名地方官狠狠地揍了一顿。往南走到邯郸，听说大顺



太和殿宝座



《明代北京城宫殿图》

军左营刘芳亮部正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的消息，感到非常害怕，即刻掉头北窜，队伍溃散，肆行抢劫杀戮。走到广宗县，知县李弘基率县民登城设守，拒绝他入城。李建泰又下令攻城，城破后乡绅王佐责问他说，阁部受命南征“逆闯”，现今贼寇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以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靡，避战北遁？恼羞成怒的李建泰下令将他处斩，然后纵兵将官库民舍抢劫一空，继续北逃。后来，听说他的家乡曲沃被农民军攻占，财产尽没，李建泰更是像泄了气的皮球，吓出一场大病，逗留在畿南不敢前进。

二月初九日，明思宗得知李建泰家乡被大顺军攻占并逗留不前的消息，又给他发去一道亲笔敕谕，既为之打气鼓劲，也为之出谋划策：“今卿代朕亲征，鼓励中勇，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当以尚方剑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剿则歼渠宥胁，抚则解散投戈，早荡妖氛，旋师奏凯，封侯晋爵，勒铭鼎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谓“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委以重任的督师大学士！李建泰根本未把这道谕旨放在心上，继续徘徊观望。他手下的士卒仍继续逃亡，最后只剩下几百名亲兵簇拥着饷银，跟随他逃到保定。二月下旬，刘芳亮统率的大顺军从南路攻到保定，李建泰派中军郭中杰出城投降，皇上赐给的敕书、剑、印都被付之一炬。一场代帝亲征的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在大顺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晋豫守军的败报与求救奏疏，如雪片似地纷纷传到京师。自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精锐覆没之后，李建泰督师出征又带走3000京营禁军，明思宗手里已经没有多少

兵力，除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之外，再也无兵可调了。因此，在命阁臣李建泰督师出征之后，他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召对大臣时，表示了抽调吴三桂入关前往山西助剿的意向，但又不愿承担决策的责任，要大臣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大臣当然知道，吴三桂的5000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官军根本不是满洲八旗的对手，这等于是将山海关外的土地和辽民送给了满洲贵族，谁也不愿出来承担“弃地”的罪名而给自己招来千古骂名与杀身之祸，故意拖延不决。过了两天，明思宗又给陈演等阁臣发去一道谕旨，强调应抽调吴三桂的兵马入关，关外余兵尚多，可以支撑局面，并要求就此事应否实行主动承担责任，不可推诿延缓误事。阁臣推脱不掉，首辅陈演只好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说锦州告急，宁远之兵不可调。兵部尚书张缙彦干脆把话挑明，说吴三桂调不调，要看宁远弃不弃，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这是把皮球踢回给皇上，要他亲自决断。明思宗无法推卸责任，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说:“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认为让吴三桂退入关内，能守住山海关，又可收到助剿农民军的功效，虽属下策，但也是不得已的一个办法，谕令陈演等阁臣代为拟旨施行。陈演为了推脱责任，再次召集大臣会议，通过之后，又与督、抚、镇进行协商，拖了1个多月，也未能将调吴三桂入关之议付诸施行。调吴三桂入晋助剿的计划，也就彻底流产了。

第四节　“大数已终”，魂断煤山

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平阳，明知府张璘然投降。二月初八日攻占太原，然后北上，经过两天的激战，于二月二十二日攻占宁武，俘杀明总兵周遇吉。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军也于二月从蒲坂（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渡河，沿黄河北岸东进，进入河南怀庆地区。农民军的攻势如涨潮的怒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迅猛地向畿辅地区逼近。官军兵败如山倒，明思宗如热锅上的蚂蚁，被弄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他不甘心明帝国的大厦在自己的手里崩塌，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首先，诏天下兵马勤王，增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防御力量。明朝在建立之初，就确立重京师、守冲要、实边防的国防思想，京师的防御是其防务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军政败坏，武备废弛，到崇祯末年，京师的防务已是七零八落，百孔千疮。一方面是在崇祯之前京师长期未曾发生战事，戈矛等武器装备长久不用，朽蚀严重，破损不堪；另一方面是兵员严重不足，京营禁军有相当部分被派往南方镇压农民起义未归，留在京师的又多系羸弱之兵。其中，稍为强壮一些的京营禁军只有5万，驻扎在城外；老弱残兵五六万，登上城墙负责防御。北京的城墙共有15.4万个城堞，一人要看守好几个城堞，根本照管不过来。有人建议签发民兵，以弥补兵员之不足，但又担心他们不可靠，万一有人逃跑，会引起连锁反

应，后果不堪设想。二月二十八日，明思宗只得下诏“征天下兵勤王”，包括征调吴三桂入卫京师。但以陈演为首的阁臣仍然反对调吴三桂入关。三月初一日，昌平守军哗变，宣府也在告急，京师形势更加危急。三月初四日，明思宗便诏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加山东总兵刘泽清秩一级（不久补封为平东伯）。三月初六日，又决定放弃宁远，令吴三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京，同时征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吴三桂远在宁远，直到三月上旬才带领5000士卒和50万宁远汉民启程，十三日入山海关。未等他赶到京师，京城已被大顺军攻破了。刘泽清则拒不奉诏，大掠临清南下，远避至江淮一带，只有唐通在三月初七日率8000人到达京师，后被派到居庸关驻防，但不几天就投降了大顺军。

其次，派遣宦官监视各镇。二三月间，在大顺军的凌厉攻势之下，各地的文官武将纷纷投降，京城人心惶惶，进一步加重了明思宗的猜忌心理。于是，他再次派遣亲信的太监分赴各镇，担任监督防范之责。二月中旬，他一次就派出10名宦官，其中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总监顺德、彰德（治今河南安阳），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蓟镇西协。兵部尚书张缙彦提出异议，认为“若一时再添内臣十员，不惟物力不继，有失体统，抑且事权分掣，大误疆场”，明思宗就是不听。三月初，又派太监杜之秩出守居庸关。但是，派出的这些太监，后来绝大部分都投降了



吴三桂像



历代帝王庙

大顺军。

再次，下诏罪己，以图挽回人心。为了收拾人心，明思宗在二月十三日发布《罪己诏》，检讨自己继承帝位 17 年来的种种过失，承认“胡（指满洲贵族）寇（指农民起义军）并急”，“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承认“使民罹锋镝、蹈水火”，“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使民室如悬罄，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皆“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诏书表示将“痛加创艾，深省夙衍”，今后将采取措施“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纷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但诏书仍为加派辩解，声称“用兵征饷，原非得已”，各省直抚按官，要“亟饬有司，多方劝谕”，让百姓照数征缴，只有“擅加羡耗，朦胧私征，及滥罚淫刑，民不堪命者”，才“立行拿问”。并宣布：“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便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准令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通侯之赏。”整篇诏书除了一堆空话套话之外，并没有任何救民于水火的实质措施，因此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明末史学家谈迁曾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当其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他认为“倘即减今岁田租之半，躬阅内府，尽出其所有金币珠玉等，尺寸毋少靳，明示吏民以充禄饷，诛一二掊克之吏，锐意更始，而吏民不为感动者，未之有也”。

三月初六日，明思宗又发布一个《罪己诏》，继续检讨自己在

位 17 年来“年年征战，加派日多”,“贪官污吏，乘机巧取”,“将懦兵骄，莫肯用命”,“任用非人，养毒致溃”的罪过。并宣布与民相约:“钱粮剿饷，已行蠲免，负买悉行停止。”诏书还宣布:“除自成罪在不赦外，余伪官伪将有斩渠献城之功，即授侯爵，分别世荫赏赉，愿官者一体充用，不愿官者安插宁家。”此时，全国的民心已彻底倒向农民军一边，明思宗想用纸上的甜言蜜语来扭转人心显然为时已晚，正如谈迁所说的:“此诏视诸二月壬申（十三日）（诏书)，益加切矣，使移于昨冬，则远近闻之，或为感动。今剥床以肤，祸临俄顷，出都城一步，感怀疑易虑，其畴（通俦，即谁）为信之!”

明思宗心里明白，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根本无法阻挡大顺军的凌厉攻势，况且吴三桂的军队调入关内护卫京师，关外的清兵乘虚而入，北京也同样难保。南迁之念又不时在心中涌起。正月中旬，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南迁。他同李明睿关系密切，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推荐者之一。此前，他曾同李明睿面议过南迁之事。他问，皇上南迁与太子南下监国，哪种做法可取。李明睿认为，太子少不更事，如果让他到南京监国，事事都按皇上的诏旨办，就没有什么威信；自己独断专行，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因此，不如皇上自己南迁为妥。但李邦华还是认为让太子南下监国为妥，他在密疏中建议皇上坚守北京以卫九庙，而仿效明成祖让仁宗监国的故事，派遣太子监国陪都南京。“我国家并建两京，原以供时巡，备居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在召见首辅陈演时，明思宗拿出李邦华的奏

疏，对他说："宪臣言是。"陈演反对南迁，出宫后故意向外透露，引起了言官的竞相抨击。

南迁之议既然公开，李明睿便上疏阐明自己的主张。为掩人耳目，奏疏将南迁称为"亲征"，说："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征。……日逐一日，优柔不断，天下大事尚可为哉？""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之与议，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明思宗将他的奏疏交给廷臣详议。光时亨立即上疏，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声称"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上疏申辩，说臣劝皇上亲征，并非臆说，而是历代圣帝明王面临危局时不得已而采取的做法。况且今日臣之进言是为亲征，而诸臣妄意为南迁；就算是让皇上发策南迁，这也是救时之急着。唐时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 150 年。如果唐宋不迁，哪来的灵武（今宁夏青铜峡东北）、武林（杭州之别称，以武林山而得名）之恢复？明思宗览疏默然，召见光时亨，当面训斥他攻击李明睿是朋党，"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并下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二月二十五日，驸马都尉巩永固（明光宗乐安公主之夫）入朝，明思宗向他征询救时之策。巩永固极力劝皇上南迁，称愿"请卫驭以从，力可召募义兵数万，寇乱不难定也！"两天后，明思宗又在文华殿召见大臣议论战守之事。李邦华与李明睿再次提起太子监抚南京及皇上南迁两个方案。李明睿力主皇上亲自南迁，不妨先以凤阳为行在，麾召齐鲁之师，两路夹进，再图中兴。众臣皆噤不作声，他又慷慨陈言："《易》云'利用为依迁国'，《尚书·盘庚》皆

言迁事。唐以再迁而再复，宋以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讳言迁乎？”廷臣们仍不吭声，只有少詹事项煜表示支持李邦华的意见。明思宗原本也是支持李邦华的，后来几经琢磨，觉得由太子去南京监国，自己还是难以逃命，况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之议为妥。明思宗想南迁，但又怕承担责任。他希望廷臣，特别是首辅能出面陈请或支持南迁，然后施行。第二天，明思宗专门召见内阁辅臣，面带愠色地说：“宪臣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随即将李邦华的密疏递给辅臣，要他们当场表态。辅臣阅后却回奏，说昨天已议过此事，只有两位大臣持有此议——意思是大多数廷臣没有同意。明思宗遂赌气地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表示他将坚守京师。他说这一番气话，实际是想让阁臣转而支持李明睿的南迁之议，但大臣却担心皇上南迁而让他们辅佐太子留守北京，成为替死鬼；就算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之策而代人受过。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劝谏：“太子监国，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明思宗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做得甚事！”

首辅陈演公开反对南迁，明思宗这次召见内阁辅臣便故意撇开了他，他只得在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职。明思宗在这前一天就指责

他说："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因此便批准了他的辞职。继任为首辅的魏藻德，对南迁之议则始终一言不发，令明思宗感到无可奈何。

三月初三日，督师大学士李建泰自保定递上奏疏，乞请明思宗南迁，表示愿护太子先行。翌日，明思宗召对平台，谕阁臣曰："李建泰奏请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又站出来反对，说："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谓"唐肃宗灵武故事"，是指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宦官挟持太子李亨逃往灵武，拥立为帝，是为唐肃宗，尊奉玄宗为太上皇。光时亨引用此典，意在指斥主张奉太子南下的大臣有拥立太子、架空明思宗之嫌。范景文等大臣一听，都吓得脸色煞白，不敢吭气。明思宗又问诸臣有何战守之策，但众臣还未缓过气来，噤若寒蝉，默不作声。明思宗摇头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拂袖而去。南迁之事，终因明思宗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而不了了之了。

李自成统率的北路大顺军，在二月二十二日攻占宁武后，乘胜北上，于三月初一日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开门迎降。接着，进抵阳和，兵备道于重华郊迎 10 里，具牛酒迎降。初六日，抵达宣府，镇守太监杜勋出城 30 里迎降。十五日至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向大顺军敞开了大门。大顺军顺利入关，向昌平挺进。刘芳亮所率的南路大顺军，在二月从河南的怀庆向东挺进，经彰德、磁州（今河北磁县），

畿辅的广平、顺德、河间，于三月下旬到达保定。督师大学士李建泰所率几百名士兵向大顺军投降。保定城破之后，刘芳亮留下部分兵力镇守，自己带领军队向京师挺进。

与此同时，明思宗也在部署京城的防守，决意作最后的挣扎。三月初二日，命太监及各官分守京师九门，令襄城伯李国祯提督城守。城内实行宵禁，昼夜巡逻，严缉奸细。除朝廷派出的官员，其余官员及家属一律禁止出城。接着，以外饷不至、太仓久虚，下令各官捐资助饷，规定凡是关押在盗狱的官员如曾缨、董象恒、侯恂、王志举、王永祚、陈睿谟、郑二阳 7 人，皆充饷赎罪；百官助饷，按所捐数额升爵，捐银 1 万两者，可建牌坊表彰。还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改按官员籍贯，规定各省仕京官员捐助数额，如江南 8000，江北 4000，浙江 6000，湖广 5000，陕西 4000，山东 4000，等等。但是，宦官、勋戚和文武百官见内帑堆满金银，大臣请求发内帑以充军饷时，明思宗却表示：“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意思是内帑没有多少钱，不肯拿出来。因此，他们也都装穷，不愿往外拿钱。勋戚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捐出 2 万两银子，被晋封为侯爵。嘉定伯周奎是周皇后之父，明思宗派宦官徐高劝他捐助 12 万两，给其他臣工作个榜样。周奎却说：“老臣安得多金？”气得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畜多产何益！”他这才答应捐助 1 万两。明思宗嫌少，说至少得捐 2 万两。周奎派人求助于女儿周皇后。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 5000 两，他扣下 2000 两，只捐出 3000 两。宦官中只有曹化淳、王永祚捐至 35 万两。太监王之心是京城有名的大富翁，据说家中仅藏银一项就多达 30 万

两，明思宗让他慷慨多捐一些，他说“连年家计消乏”，只捐出1万两。其他太监大多装穷，有的在门上贴出“此房急卖”“此房绝兑”的条子，有的则把家中的古玩、杂物，拿到市场上出售，装出一副破家纾国难的样子。有的太监甚至在壁上题诗，声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戴罪守城的曹化淳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明思宗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但曹化淳并未领情，在大顺军攻城时，竟与兵部尚书张缙彦领衔在一份公约迎接大顺军的传单上签名。文武百官中，辅臣魏藻德仅捐500两，其他官员捐助几十两、几百两不等。首辅陈演已被罢官，但未离开京城，明思宗要他捐资，他说自己一向清廉，未曾向户、兵二部伸过手，无银可捐。据史籍记载，这次大搞捐助，总共只得银20万两而已，根本解决不了缺饷的问题。后来大顺军攻下北京，大搞追赃助饷，王之心就吐出银子15万两，周奎被抄出现银53万两，陈演也献银4万两，总计追赃所得共有白银70多万两，而大顺军从大内40多个地窖中搜出的金银竟多达“几千百万”两。具体的数目字，史籍记载不一。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当时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张正声《二素纪事》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杨士聪《甲申核真录》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谈迁《国榷》说，李自成撤出北京时，“尽运金宝以入秦，驱骡马千计。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制军罗戴恩以万骑护之而西。初，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藏黄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有学者认为，比较可信

的说法是白银3700万两，黄金150万两。不论是哪一种说法准确可靠，其数量都是相当庞大的。无怪乎赵士聪会感慨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明朝的君臣，爱钱财胜过国家社稷，这样的朝廷哪有不亡之理！

三月十六日，明思宗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对策，大臣皆相顾不发一言。同一天，明思宗又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及筹措军饷问题，挨次召对。召对尚未结束，内侍递进密封文书。明思宗一看，立即大惊失色，仓皇退入后宫。原来，这是一份报告昌平已于当天凌晨失守的塘报，它预示着大顺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了。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自昌平进抵北京城下。襄城伯李国祯所统的京兵三大营屯扎城外，农民军一到立即溃降，火器等器械转手成为农民军攻城的利器。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明思宗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他仓皇召对群臣，群臣个个战栗无策，噤不发声。被赶上城墙上守堞的士卒，饥不得食，也无心守御。明思宗命驸马都尉巩永固，以家丁护太子南下。巩永固说，皇亲按规定不许藏有武器，我岂敢拥有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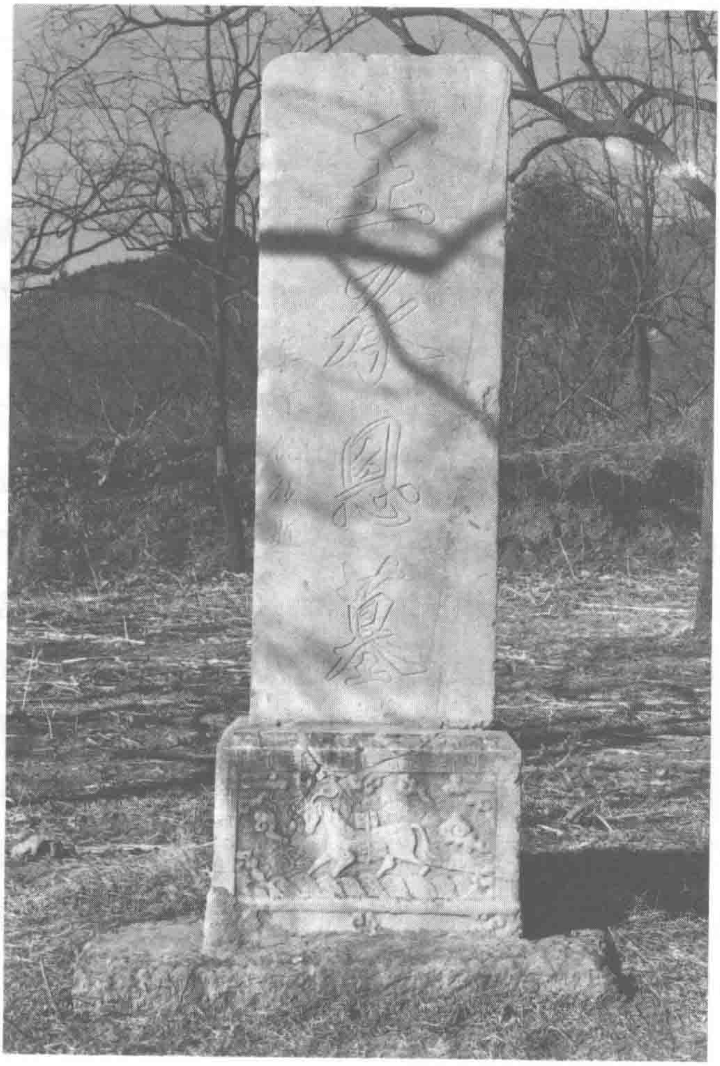
在大顺军围攻北京的时候，李自成在沙河巩华城设立临时总部，由大将刘宗敏担任前线总指挥，攻取北京。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架飞梯猛攻西直、平则（今阜成）、彰义（今广安）三门，同时为减少攻城的阻力和城里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派在宣府投降的太

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太监申之秀入城与明思宗谈判，要求他主动逊位。明思宗在活命与死社稷之间犹豫不定，拖延不决。大顺军忍无可忍，在夜间攀城而入，占领了外城。明思宗徘徊殿廷，计无所出。太监张殷跑上前来，对他说："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明思宗忙问何策。答说："贼若果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明思宗大怒，挥剑刺死了张殷。尔后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四处瞭望，见城外烽火连天，知大势已去，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后事。他命人将 16 岁的太子、12 岁的定王、10 岁的永王送往勋戚周奎、田弘遇处。接着，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随即与之对饮十几杯。周皇后返回坤宁宫自缢而亡。明思宗又拔剑砍伤长女长乐公主，说："女何为生我家！"长乐公主被斩断一条手臂，当即昏厥过去。他又挥剑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和几个嫔妃。然后换上普通百姓的便装，混在宦官中间，出了东华门，走到齐化门（今朝阳门），想混出城外，没有成功。又到安定门，同样碰壁而归。十九日，天刚破晓，大顺军已攻入内城。明思宗走投无路，与太监王承恩来到煤山，在衣袖上写下两行字，一行是"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然后与王承恩面对面一起在皇寿亭畔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而亡。两天后，人们在煤山发现明思宗的尸体。四月初，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葬入昌平田贵妃的墓穴，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明思宗之死，标志着统治长达 277 年的明王朝的覆灭。

清代官修《明史》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太祖创建的高度强化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按照其《祖训》的规定，



明思宗自缢处



王承恩墓碑

"一字不可改易"，即一成不变地运转了 200 多年，到明中后期已是弊端百出，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都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幸赖张居正的改革，才使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又把明王朝的统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不过，明王朝毕竟未亡于明神宗之时，而是亡于明思宗之手。明思宗多次声称，"朕非亡国之君"，"内外诸臣误我"，把明亡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身上。毫无疑问，崇祯朝的许多大臣如温体仁、周延儒之流，对明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手握军国大政最后决策大权、"沉机独断"的专制君主，则应负主要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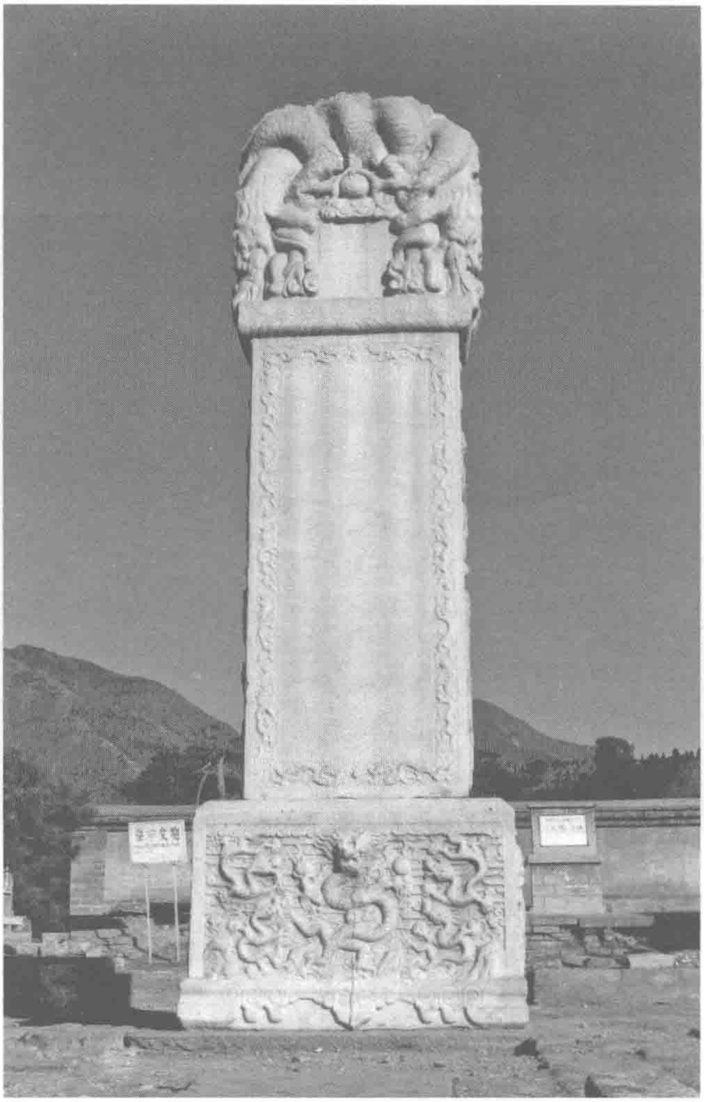
明思宗的确怀抱中兴之梦，在继位之初有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之功，而且一生励精图治、勤于理政、生活俭朴、不近声色，并引进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因而不乏赞誉。但是，他对宦官势力的斗争却有其始而无其终。清除魏忠贤阉党集团不久，他又重新起用身边亲信的太监，培植效忠自己的宦官势力，导致政局的混乱。而勤于理政，崇尚俭仆，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要说挽救危局了。在封建社会，要想治理好国家，特别是挽救濒临危亡的局势，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必须具备深远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果断的魄力和高超的治国能力，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制订出长远的治国方略，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但明思宗虽有中兴之志，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没有认识到明末深刻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找到解救危局的办法。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明朝的各种社会

矛盾日积月累，到明后期呈现纵横交错、急剧激化的状态。在东北地区，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但就关内的广大地区而言，则是阶级矛盾占据主要地位。而阶级矛盾之所以激化，则是肇源于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僵化腐朽，官吏的贪污腐败，土地的高度集中，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富贫差距的过度扩大，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只有果断地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从而促使起义农民放下武器，回到田地上从事耕作。这样，明廷才有可能免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抵御满洲贵族的进攻，进而寻求解决民族矛盾的对策，并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应对农民起义和后金的进攻引起的）。明思宗见不及此，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落实其即位诏中宣布的“吏治民生，求宜于变通”的诺言，大力解决导致起义频发的民生问题，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主义行动，满洲贵族打来了，就派兵抵挡，农民军崛起了，又出兵征剿，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四处用兵，需要巨额的军饷，但国库空虚，又不肯动用内帑，于是有辽饷的增派，剿饷的加派。兵力不足，又要加练精兵，于是又有练饷的加派。这种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做法，彻底剥夺了广大农民起码的生存条件，结果只能导致农民的大量逃亡或起义，使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而满洲贵族也就趁机加紧对明朝的进攻，使明廷更加难以应付。不仅如此，明思宗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宫里长大，养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

薄寡恩的性格弱点，又往往导致他对许多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亡，而明思宗也就以有别于自古以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思陵



思陵谕祭碑

第十章

尾声：清军入关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李自成进京与清军入关

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将近寅时（相当于现今的3至5时）之际，北京的天空阴云四合，忽然下起霏霏细雨，不久又飘起微小的雪花。大顺军乘机加紧对几座城门的进攻。驻守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眼看抵挡不住，打开城门迎降。刘宗敏率领大顺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内城。接着，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驻守平则门的成国公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大顺军占领了北京内城。李自成得到捷报，从巩华城来到北京，中午时分头戴毡笠，身着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刘宗敏和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臣的陪伴下，威风凛凛地从德胜门进入京城，从承天门（今天安门）进驻皇宫。京城百姓纷纷书写“顺民”两字，贴在门上，并摆设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之类的标语，热烈欢迎大顺军。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立即张贴告示，要求市民照常营业，罢市者斩。并严肃军纪，宣布“大师（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有两个士兵抢掠前门店铺的绸缎，即被磔杀，砍下手足钉在左栅栏上示众。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商民开张店铺，嬉笑自若。

李自成进京后，立即接管和清理明廷的各个衙门，并进一步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大顺军入京时，明朝在京的官员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20多人自杀，其余大多数躲藏起来。三月十九日，大顺

政权发布命令:“文武各官，于次日投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二十日，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到指定地点投递职名。大顺政权先后从中擢用了百来人，担任大顺政权的官职。录用的这些官员都是四品以下的降官，三品降官只录用侯恂一人，因为他曾被明思宗关进监狱，大顺军认为这种人比较可靠。三品以上的降官，一概不用。接着，又由牛金星等主持，举行一场科举考试，以“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为试题，从 70 多名参加考试的举人中选取 50 多名，量材授职。明朝的宦官，悉数扫地出门，逐出京城。东厂和锦衣卫被彻底废除，厂卫头目一律严加惩办。

大顺军还接管了明朝在黄河流域的地方政权，另行派官治理。据记载，大顺政权设官的地方,“东至淮，西至蜀”，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以及豫东、苏北等地。此外，李自成进京后，还先后派遣部分兵力沿运河南下：任命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升为权将军，率数千人南下山东济南、兖州；任命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董学礼为权将军，率领 1500 名士卒，到达江苏宿迁；命大顺军将领刘暴，携带李自成的敕书，随董学礼南下，前往招抚南明弘光政权的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等。

李自成进京后的这些举措，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对民心的安定、局势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袖都出身于贫苦农民，没有什么文化，目光较为短浅，只看到农民军所向披靡、节节胜利的一面，没有看到被推翻敌人的复辟阴谋

与满洲贵族逐鹿中原的勃勃野心。进京之后，便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轻敌的思想，认为大功已经告成，江南可传檄而下，山海关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靴尖就可以踢倒。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筹备李自成的登极大典，制定《永昌仪注》，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和各种官制、补服、朝见仪节等。李自成还召集明朝降官，探讨登极的有关事宜，有关官员也忙于演习登极礼仪，并按传统惯例每逢三、六、九日上表“劝进”。他们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军事部署和施行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很快便陷入被动地位，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祸根。

首先，未能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李自成农民军所建立的大顺政权是个农民政权，它在河南发布的“均田免粮”口号和实行的“不当差、不纳粮”“不催科”政策，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军饷和农民政权的开支，农民军除了没收明朝官府和宗藩的财产之外，又曾在南阳、襄阳等地实行屯田，攻占西安后还宣布征收赋税，但屯田和征赋都未曾大规模推广，也没有长期坚持，所得数量有限。于是，又实行追赃助饷。农民军认为，“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衣冠所畜皆赃耳”，攻占西安后，便用严刑拷打的办法，强迫明朝官绅交出财物助饷。后来，随着大顺军的东进，这一政策便在关中、山西、河南等地推行开来。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农民政权的反封建性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自然也引起明朝官僚和缙绅地主的恐慌和仇恨。攻占北京之后，如想进一步统一全国，确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就必须以轻徭薄赋政策来取代追赃助饷，并将没收财产的范围局限在明朝的内

帑和宗室、勋戚、太监以及持敌对态度的明朝官绅内，使大顺政权获得更广泛的阶层包括地主阶级阶的支持。但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追赃助饷推向高潮。三月二十七日宣布，所有在京的明朝官员，不论是否被大顺政权录用，一律都得纳银助饷。被录用者数额较少，自动交纳；不被录用者数额较大，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助饷的数额按职衔的高低摊派，内阁大学士 10 万两，巡抚、在京中央机构的长官、锦衣卫官 7 万两或 5 万、3 万两，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吏部官员 5 万、3 万两，翰林 3 万、2 万、1 万两，部属以下官员则各以千计。勋戚之家，没有固定的数额，搞到人财两尽而后已。南下山东、苏北的大顺军，在当地也大搞追赃助饷。大顺军占领的部分地区，还出现剥夺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田产的行动。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即载，山东诸城县的大顺官员，“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远，许业主认耕”，当地农民于是群起夺占官绅富豪的“百年之宅，千金之产”，“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直到四月初八日，由于各方的反应相当强烈，李自成才下令停止北京的追赃助饷，但地方上的追赃助饷仍在雷厉风行地进行。结果，使大批明朝官员和缙绅地主倒向了清王朝或南明朝廷一边。

其次，未能对知识分子政策作出调整。李自成揭竿起义后，很长时间未曾吸收过一名知识分子。直到攻入河南后，才有几个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被留在李自成身边充当谋士、顾问，为之出谋划策，推动了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层次都

较低，如牛金星只是个举人，宋献策则是个江湖术士，他们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统兵打仗、理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也较侠窄，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国的形势及其走向，贡献的计策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如，“均田”的绝对平均主义口号，虽然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诉求，但它毕竟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不可能真正实现；实行“免粮”，没有了赋税，国家机器就失去立足的经济基础。后来，随着农民政权的建立，需要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李自成开始推行科举，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强迫应试的办法，对不应试的诸生处以极刑，引起了一些士子的极大反感。此外，牛金星等人还招募一些进士等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中央机构担任尚书、侍郎等重要职位，但却没有一人受到李自成的充分信任，被他留在身边担任谋士、顾问。攻占北京后，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仍未觉察到这种知识分子政策的弊端与危害，做出必要的调整。当时在京城迎降的明朝官员多达两三千人，其中不乏对全国形势具有清醒的认识、富于治国治军经验的进士出身的干才，但大顺政权只择用四品以下的官员，四品以上者只起用被明思宗关过监狱的侯恂，其他大多数摒弃不用。这些被弃用者，后来有的投靠清朝，被任为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抗清武装，确立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最后，未能对军事部署进行适当的调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后，农民阶级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成为关内的主要社会矛盾，以清政权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广大汉

族的民族矛盾则是关外的主要社会矛盾。此前，李自成农民军直接面对的是明王朝的官军，从未同清兵发生接触，没有认识到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必将面对一场与清兵的殊死搏斗。李自成身边的谋士顾问，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未能看清全国形势的走向，帮助李自成制定应对的战略措施。西安建国之前，大顺军拥有百万大军，但在平定西北后，却留下过多的部队驻守于要冲之地。此后，东征途中又在山西、河南、湖广、畿辅、山东等地留下不少军队，以致兵力过于分散，到达北京时仅只剩下大约 10 万人。对畿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当，在大同、真定分别留下大将张天琳、马重僖驻守，但在京东山海关一带却未派重兵镇守，仅派人去招降撤入关内的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和山海关总兵高第，根本没有预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结果，吴三桂降而复叛，勾引清军入关。大顺军被打个措手不及，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地位。

吴三桂是当年三月初春奉明思宗之命，与黎玉田一道率领约 4 万精兵入关“勤王”的。十六日抵达山海关，与高第统辖的约 1 万队伍会合，驻守于山海关到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李自成派遣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守将唐通率本部兵马 8000 人，携带犒赏的银两和财物前去招抚。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家属都在北京，他与黎玉田、高第都决定投降。大顺政权令唐通接管山海关防务，命黎玉田为四川节度使，与降附的总兵马科领兵前去收取四川，吴三桂则率部入京朝见新主。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玉田，听说其父吴襄被拘捕追赃，家产全被抄没，田弘遇转赠给他的名姬陈圆圆也被刘

宗敏所夺，遂掉头折返，突袭唐通，于二十七日占领山海关。李自成闻讯，决定推迟登极的时间，亲自率兵征讨。四月十三日，他留下 1 万老弱士卒镇守北京，自己与刘宗敏、李过等将领率领不到 10 万的大顺军东行，并携带明思宗的三个儿子（即太子和永王、定王）及吴三桂父亲吴襄，想利用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吴三桂叛变后，关、宁两镇兵力合计只有 5 万人，自知敌不过大顺军，遂抛弃民族大义，派遣使者带信向多尔衮求援，以“裂地以酬”为条件，请求多尔衮“速选精兵”，与他联合共同消灭农民军。

清廷早有利用明朝内部的阶级大搏斗实现其进窥中原的谋划。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摄政王多尔衮等人侦知大顺军攻占陕西，就派人给大顺政权捎信，要求双方“协谋共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大顺政权的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此信，派人转告已渡河东征的李自成。李自成坚持民族大义，不予理睬。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四月初四日，谋士范文程上疏多尔衮，指出在大顺军的打击下，明亡在即，“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主张实行战略转移，将打击的目标指向大顺军，“直趋燕京”，夺占中原。多尔衮即于四月初九日亲率满、蒙、汉八旗兵七八万人出发，准备从蓟州、密云地区突破长城，杀向中原。十五日，行至翁后（在今辽宁阜新境内），收到吴三桂使者带来的求援信，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行进，并致信吴三桂，以“晋为藩王”为条件，要他“率众来归”（即投降）。二十日，清军到达连山（在今辽宁锦西），吴三桂再派使者赶赴清营，表示接受清方的条件，向清朝投降。多尔衮于是下令兼程行进，于二十一日晚

到达山海关外的欢喜岭驻营。

李自成走到三河县遇到吴三桂的使者，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投降，请求缓师。李自成信以为真，即派投降的明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头衔去山海关与吴三桂谈判，并放慢了行军速度。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到达山海关西边的石河一带，始知王则尧已被吴三桂扣押，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李自成发兵开始攻打山海关。经一昼夜的激战，吴三桂眼看支撑不住，于二十二日率领部分兵力冲出关门，至清营面见多尔衮，按其要求剃发称臣，求其急速出兵。多尔衮命吴三桂先回山海关，随后令清兵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入关。多尔衮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成一字长蛇阵，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突破的战术，令清兵向海对准大顺军阵尾鳞次布列。他先以吴三桂的部卒为前锋，从右翼出击，而令清兵隐伏于左翼，待大顺军的实力受到损耗之后，再突然发起冲击。吴三桂出击后，陷入大顺军的重重包围，数次突围未成，几不能支。太阳偏西之时，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咫尺莫辨，清军乘机杀出。大顺军阵势大乱，刘宗敏负伤，在高岗立马指挥的李自成急忙下令撤军。战斗结束后，清摄政王多尔衮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李自成率残部退至永平西 20 里的范家庄，下令杀死吴襄，返京后又杀其家属 34 口。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他原拟固守北京，后见山海关战败后，京城讹言四起，暗藏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自己一时也难以在北京周围调集一支足以固守待缓的兵力，决定弃京西撤。临撤退前，李自成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举行登极大典，以示大顺政权

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权，现今暂时撤走，来日还要回来。当天晚上，大顺军放火焚烧明朝宫殿和九门城楼，带着追赃助饷和没收的明皇家内帑金银，出阜成门向西撤退。

多尔衮命清将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追击大顺军，自己率领一部分满洲八旗直趋北京。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到达北京，随即发布文告，宣布他此行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誓灭农民军，“一贼不灭，誓不返撤”，要求所过州县“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否则“大兵一到，尽行屠戮”。为了笼络人心，还令官民人等为明思宗服丧三日，并命投降的明朝官员李明睿为礼部侍部，负责为明思宗追谥与殡葬。接着，又发布文告，“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还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同时，宣布将被起义农民夺占的田产“归还本主”，废除明末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五月二十日，下令停止执行入关后推行的剃发令，宣布“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清兵深入内地大肆烧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那些保护归降的明朝文官武将和豪绅地主的政令，更是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欢迎。他们纷纷投向清廷的怀抱。清廷在畿辅及附近地区，迅速地站稳了脚跟。

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撤离北京后，经涿州、保定、定州、真定等地，于五月初由井陉退入山西。士卒饥疲交困，加上清军一路追击，损失惨重。晋、冀、鲁、豫等地原明朝的官绅，又纷纷发动叛乱，倒向清朝一边，使大顺政权很快丢失了山东、河北及晋北、豫

东的大片土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五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防务作了一些具体部署，分别命令诸将镇守太原、晋东南、临汾及河南卫辉一带，并派兵镇压平定、榆次、太谷和定襄等地明朝官绅的叛乱，自己则于六月间返回西安。随后，下令“通行免追比”，全面停止追赃助饷，改行按田亩征收赋税的政策，以稳定后方。

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率领的清兵，追击李自成至山西后，也因马困人疲，不能远逐，加上需要巩固对京师及畿辅地区的占领，于五月十二日撤回北京。六月，清军已基本巩固其在畿辅地区的统治，多尔衮派固山额真叶臣等将领率兵攻打山西。七月，又令进攻山东的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西进，与叶臣会合，加强进攻山西的兵力。十月初，清军以西洋火炮攻破太原，随后分兵南下，攻占长治地区。李自成防守山西的计划遂告失败。

九月，多尔衮将清世祖福临接到北京，十月举行定鼎即位典礼。随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偕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等会同边外蒙古兵，自大同进攻陕西榆林、延安，然后南下攻取西安；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偕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南下，攻打五月在南京成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十月，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发动反攻，迭克济源、孟县。多尔衮又令多铎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与阿济格会攻西安。多铎率兵抵达怀庆后，大顺军主动撤退，多铎遂从孟津渡河，杀向潼关。李自成原先听说清兵拟攻陕北，将兵力不断北调，并亲自北上，增援陕北的守军。后得知多铎正进兵潼关，又和刘宗敏统率大顺军南下，增援潼关。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顺军与清军在潼关展开激战，接连失利。第二年正月十三日，潼关

落入清军之手，李自成撤往西安。就在潼关之战打响之前，阿济格所率清军已由山西保德渡河进入陕北，攻占李自成故乡米脂，然后南下向西安推进。李自成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于永昌二年（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主动撤出西安，率领13万大顺军取道蓝田、商洛向河南转移，再进入湖广，拟夺取弘光政权控制的江南地区，利用那里雄厚的人力、物力继续展开抗清斗争。

李自成撤离西安之后，西安落入清军之手。多尔衮命多铎按原计划移师进攻南明弘光政权，留下阿济格继续追击李自成。阿济格在河南内乡追上李自成。李自成南下湖广襄阳，将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7万部队调集随营，合共20万众，于三月下旬到达武昌。阿济格尾随而来，大顺军出战失利，只好弃武昌东下，四月下旬撤至江西九江。清兵紧追不舍，在距九江40里处攻入大顺军老营，俘杀刘宗敏，宋献策受俘投降。在这前后，大顺政权的丞相牛金星及其子牛佺也投降了清朝。由于九江战败，大顺军东下之路已被切断，而此时多铎率领的清兵也已经过豫、皖，直趋南京。李自成看到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决计向西转移。五月初，行至湖广与江西交界的通山县，李自成率义子张鼐和28名战士至九宫山（今属湖北）勘察地形，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28名战士先后被击杀，李自成也在搏斗中壮烈牺牲于小月山的牛脊岭，终年40岁。大顺政权至此覆灭。

李自成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农民领袖，领导广大农民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又率领大顺军独立承担起抗清的重任，揭开了此后20年抗清斗争的序幕。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后人景仰。



李自成墓碑



李自成陵园

第二节 弘光朝廷“联虏平寇”酿恶果

大顺军攻占北京和明思宗自缢后，明政府尚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明朝的陪都南京还在，那里还保存着一套形式上同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明朝掌控地区的文官武将，自然都热切地期盼能在那里重组政权，实现他们的中兴之梦。

由于时局瞬息万变，信息不畅，北京事变的消息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九日才传至苏北淮安，但人们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消息得到证实，并很快传至南京。四月十七日，从北京逃出的原内阁大学士魏炤乘到达南京，再次证实这个消息。南京当局和在籍的文武大臣便紧张地忙碌起来，准备拥立新君，重新组建统治南方半壁江山的明朝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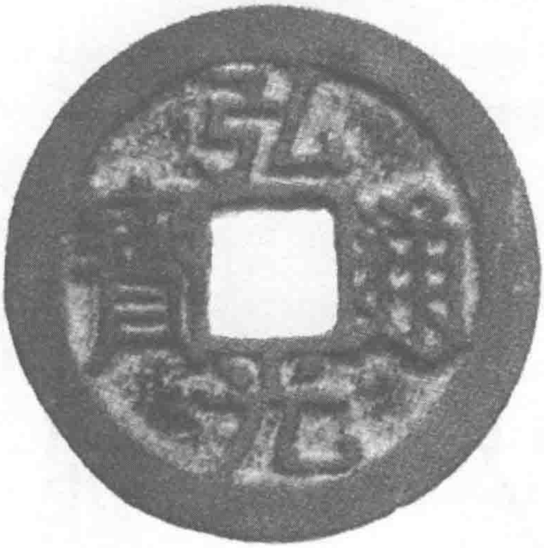
但是，在这个政权重建之前，南京的文臣武将仍然沿袭明末门户之争的恶习，为选择新君而展开激烈的争斗。明思宗自缢后，他的3个儿子被大顺军俘虏，没有直系后裔可以继位，只能从众多的藩王中物色继位的人选。其中，以明神宗的子孙福、瑞、惠、桂四王和明神宗的堂兄潞王同明思宗的血缘关系最近，是最有资格继位的人选。当时，福王和潞王均已逃到淮安，距离南京不远，而福王朱由崧又是最年长者，按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他来继承皇位（这是“兄终弟及”的一种变通办法，即弟终兄及）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淮安巡抚路振飞，给事中李清、张正宸，进士

郑元勋等人都持这种主张。但是，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东林党人却坚决反对，因为朱由崧的祖母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明神宗因宠幸郑贵妃拟立其子朱常洵为太子，遭到东林党的反对而未逞，并由此引发妖书、梃击、移宫等案的纷争。他们担心，如果朱由崧被立为新君，将来一旦重算旧账，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势。因此，他们便说，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论序当立，但他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大毛病，不适合继承皇位。潞王朱常淓是明神宗的侄子，贤明能干，才是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实权派人物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对此感到左右为难。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拥戴福王自然心存疑忌，但又担心拥立潞王会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于是，他暗中邀约掌握实际兵权的总督凤阳、庐州等处军务的马士英，到浦口密商。经过反复商议，两人一致认为，既然大臣对拥立福王或潞王存在意见分歧，瑞王已被张献忠俘杀，惠王又热衷信佛，不谙世事，不如拥立桂王，“以亲以贤，惟桂乃可”。史可法随即将这个折中方案写信告诉南京的大臣，这些大臣也都认可这个主张。但当马士英返回凤阳时，却得知在万历末年侍奉过老福王朱常洵的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朱由崧。高、黄、刘三总兵，原本是受凤庐总督节制的，现在倒向福王一边。马士英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不顾与史可法的约定，赶忙对福王表示效忠，并与高、黄、刘、卢等人在皇陵前共同立誓拥戴福王继位。接着，便以凤庐总督和三镇总兵的名义，致书南京守备

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并派兵将福王迎至仪征，连营长江之北。史可法眼看生米即将煮成熟饭，只得违心地表示同意。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十五日正式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廷，虽然控制着淮河以南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而且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拥有大约百万的军队，寄托着南方士民的“中兴”热望，但它是以江南最为腐朽的官僚地主为基础，联合南逃的军阀势力建立起来的政权，不仅全盘继承了崇祯朝的各种政策，而且内部的纷争、政治的腐败更加严重，这就注定了其迅速覆亡的命运。

弘光政权从成立之时起，各派势力便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纷争不已。福王就任监国后，依照廷推，任命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为内阁首辅；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一并入阁办事。不久，又以姜曰广为礼部尚书，与前礼部尚书王铎同为东阁大学士，一并入阁办事。马士英虽然也被任为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但仍督凤阳等处军务。朝中大权为史可法所掌握。权力欲极强的马士英，自恃有定策之功，不愿落人之下。五月初八日，他动用1200艘船只满载士兵，从淮至江，在长江岸边上书劝进，请朱由崧登基称帝，并将此前商议拥立时史可法写给他的称福王有“七不可”之语的信件上呈朱由崧。史可法惶恐不安，只得于五月十二日向朱由崧自请到江北督师。朱由崧称帝后，史可法于五月十八日辞朝而出，让出内阁首辅的职位，离开南京。马士英便如其所愿，留朝辅政，成为内阁首辅，掌控朝中的大权。



弘光通宝



史可法像

马士英辅政后，六月间向弘光帝推荐其名列逆案的好友阮大铖，说他知兵，请皇上赦其罪，任为兵部右侍郎。这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陈子龙、左光斗之弟左光先等东林、复社人士，异口同声地称阮大铖是“逆案巨魁”，必不可召，并攻击马士英推荐阮大铖是为阉党翻逆案。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阮大铖的起用问题便被暂时搁置下来。但弘光帝听马士英在推荐时说过，当初在浦口与诸臣商议拥立，阮大铖曾致书坚决反对拥立潞王，主张拥立福王，因此对他存有好感。八月三十日，弘光帝再次接到安远侯柳祚昌的推荐奏章，不经廷议，便直接下旨，传升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又命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再转为兵部左侍郎，翌年二月进为兵部尚书，执掌弘光朝廷的军事大权。

东林、复社人士将马士英、阮大铖视作阉党势力，并没有多少根据。马士英是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任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崇祯初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他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东林、复社的，同东林、复社人士多有往来，是复社首领张溥的好朋友。他之所以举荐阮大铖，是为了报答阮大铖的知遇之恩。马士英是在万历四十四年与阮大铖同中会试的，后来他在巡抚宣府时，檄取公帑馈遗朝中权贵，遭到镇守太监王坤的揭发而被削职遣戍，流寓南京。崇祯十一年（1638 年）阮大铖也因“留都防乱公揭”之出而迁居南京郊外，遂与马士英同病相怜，结为密友。崇祯十五年九月，复社人士以重金贿赂司礼太监，再次召周延儒入京为首辅。阮大铖

闻讯，赶到扬州长江岸边迎接周延儒，送上大笔钱财，请求允其复出为官。周延儒收下钱财，但顾忌阮大铖名列逆案，未敢贸然起用，让他从久废的官员中推荐一名有才可用而又相知的人顶替。阮大铖推荐了马士英，马士英因此由戍籍忽起而出任凤庐总督。马士英出任弘光朝廷的首辅之后，推荐阮大铖就是对他此举的报答，并非因为阮是阉党分子，更不是为了掀翻逆案。弘光朝廷除起用个别名列逆案的废斥官员外，也没有掀翻逆案的举措。

阮大铖“本清流”，原属东林一派，后虽有巴结逢迎阉党的行为，但没有干过多少坏事。被列入钦定逆案的名单后，他借寓南京，编剧演戏，结交朋友，以声乐自娱。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人士又搞了一场“留都防乱公揭”的签名运动，弄得他有口难辩，名誉扫地。但是，当复社人士凑钱运动周延儒的复出时，他为求自己的复出，还是奉送了一大笔钱财。尽管阮大铖算不上一个志节之士，但给他戴上“逆案巨魁”的大帽子，显然是太过分了。

当时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对立各方都面临着争取人才、壮大自己势力的问题。清军占领北京后，不仅留用大批投降过大顺军的官员，而且还礼聘名列逆案的原明内阁大学士冯铨。弘光朝廷的东林、复社人士却以“门户”“声气”作为用人的标准，这种作茧自缚而又为渊驱鱼的做法，实不可取。更有甚者，当他们看到马士英、阮大铖受到弘光帝的信任而难以扳倒之后，吏部左侍郎的吕大器，内阁辅臣姜曰广、高弘图，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竟纷纷要求辞职。尽管弘光帝一再苦苦挽留，他们仍然拂袖而去。即便如此，弘光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仍在继续，直

至清兵攻占南京方告结束。这种门户之争，极大地消耗了弘光政权的力量。

弘光君臣大多极其腐败。弘光帝性格懦弱，又不思进取，即位之初还较关心朝政，一再召对阁臣，先后无虚日，或一日再召，过了一个月便召对渐稀。九月至十月，大学士姜曰广、高弘图相继辞职。书读得少、无法亲裁章奏的弘光帝便委政于马士英，自己拱手听之，自此不复与闻政事。其时国用匮乏，弘光帝却不念时艰，大肆挥霍。即位之后，不仅宴享毫无节制，还耗费巨资修建兴宁宫。八月底，兴宁宫落成，命大学士王铎为内殿书写一对楹联，曰“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他便搬进去住，尽其举杯邀月、观赏乐伎之雅兴。当月，找到在洛阳逃跑时走散的太后，又限户、兵、工等部官员 3 日内筹足 3 万金，以备赏赐，并令工部修建慈宁殿供太后居住。安置好太后，又忙于筹办自己的婚事。为此，弘光帝派遣宦官在南京、苏州、嘉兴、杭州等地挑选美貌的宫嫔，弄得闾井骚然。南京城中，家有年轻未嫁的女子，都急忙找个人家嫁出去，不择配而过门。嘉兴也是全城恐慌，不论贫富、良贱、妍丑、年龄大小，只要双方同意，即把女儿嫁出去。于是，不论白天夜晚，满长街净是嫁娶的人流，以致行路挤塞。后来，宦官从各地选来 150 名年轻的淑女，弘光帝从中挑选了 3 人。但未及完婚，清军已逼近南京，弘光帝只得将这 3 名淑女放回娘家，自己则逃离了南京。弘光帝好酒贪杯，还喜欢观看传奇剧。八月，他召调教坊乐伎 64 名入宫，后嫌人数太少，又下令扩充。阮大铖、杨文骢、冯可宗等又从外地购进一批女伶充

数，在大内演出《麒麟阁》等传奇剧。弘光帝经常夜以继日地饮酒观剧，有时兴起，便拉起女伶去发泄性欲。他身体肥胖魁梧，有时竟一日淫死童女两人。由于沉溺声色，弘光帝也喜好春方媚药。朝天宫道士袁楹进献春方，被任为太常少卿。江湖郎中郑三山为之制作媚药，也得宠幸。制作春方、媚药的雀脑、蟾酥一夕踊贵。乞丐手捧一虫一介，帖黄书上供，人莫敢犯。民间因此戏称弘光帝为“蛤蟆天子”。

以马士英为首的文臣武将，生活都极其腐朽，任人唯亲。马士英之子马锡由白衣擢为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阮大铖的外甥张秉贞，也由四川按察副使升任浙江巡抚。他们还卖官鬻爵，贪污受贿。马士英推行纳员制，规定童生交上足够的银两，不经考试即可取得生员的资格；后又推行纳助工例，公开标价出卖中书、待诏、监纪、职方等官衔。规定武英殿中书900两，文华殿中书1500两，内阁中书1000两，待诏3000两，拔贡1000两，推知1000两，监纪、职方成千上万不等。所得钱款，名义上是用来资助军饷，实际上都装入了马士英的腰包。当时的民谚讽刺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阮大铖也公开卖官鬻爵，门庭若市。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某人求监纪，初馈金五百，不纳，再赠千金，亦不纳，直至两千。”有了钱财，他们便大肆挥霍，尽情享乐。马士英整天待在家里，同利根和尚谈禅，斗蟋蟀，人称“蟋蟀相公”。总兵官刘泽清，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王宫的连云甲第和豪华庭园。整个南京的官绅，也都沉浸在声色犬马、寻欢作乐之中，一

片醉生梦死的景象。崇祯朝的经筵讲官余煌，在当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道："尤可疑者，国难初闻，宴衎不彻；哭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

吴三桂降清与清兵入关，使社会矛盾由关内原先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和辽东地区的满汉民族对抗向全国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局势发展。弘光君臣出于阶级的本能，仍把农民起义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弘光帝在《登极诏》中即指斥李自成大顺军使"燕畿扫地以蒙尘，龙驭宾天而上陟"，激起"三灵共愤，万姓同仇"，号召臣民"戮力勋剿，助予敌忾"。据此，弘光朝廷制定了"联虏平寇"（又称"借虏平寇"）的基本国策，幻想借助清军的力量消灭农民起义军，与清朝分疆而治，以图偏安一隅。正是基于这个国策，弘光朝廷建立之后，就对清军采取步步退让的态度，根本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大顺军离京西撤后的两三个月内，畿辅南部和山东、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绅纷纷发动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使这一带地区处于归属未定的无主状态。弘光朝廷却未曾举兵北伐，去收复这些失地。相反，史可法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出任督师，奏请弘光帝册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分别驻守于南畿的瓜洲（在今江苏扬州附近）、寿州（今安徽寿县）、淮安、真州（今江苏仪征），组成江北四镇；同时，为驻守武昌的宁南伯左良玉加封侯爵，与江北

四镇共同组成一道江淮防线，以防大顺军的南下，却置京畿南部和鲁、豫等地于不顾。

为了实现“联虏平寇”的计策，弘光朝廷于六月间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马绍愉、总兵陈洪范作为使者，携带白银 10 万两、黄金 1000 两、缎绢 1 万匹，作为酬谢清廷出兵的礼物。另携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犒赏银 1 万两的诰命，前往北京与清廷进行谈判。使臣出发前，弘光帝交代，谈判的起点是割让山海关土地，实行南北互市，但给清岁币不得超过 10 万两。

清廷刚入关占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之初，因兵力有限，实行的是“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之策。六月间，摄政王多尔衮曾在文告中申明清兵入关“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并不反对南方的汉族官绅“辅立贤藩”“共保江左”，但须与清朝“通和讲好”，以“惇睦邻之义”。降清的明朝官僚有不少是南方人，他们担心南北分治，将使自己与家乡的亲属骨肉分离，竭力怂恿清廷决策南征。清廷看到弘光政权建立后一直据守江淮以南，未曾出兵进占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畿辅南部及山东、河南等地，毫无进取之志，软弱可欺，于是决心举兵消灭之，用武力征服全国。十月，左懋第等人抵达北京，清廷无意同他们谈判，指责江南的明臣“突立皇帝”，不承认弘光政权的合法地位，宣称“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十月底，多尔衮派 300 名清兵，将三名弘光使臣押送南返，传递“我要发兵南下”的消息。

北使议和失败后，弘光朝廷仍未改变政策，继续对清兵步步退让。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 年）十月，清廷命阿济格率兵攻

打陕西大顺军，多铎率兵南下攻打弘光政权，后因大顺军在怀庆发动反击，复命多铎西进，与阿济格共同夹击大顺军。当年十二月，御史沈宸荃看出清兵以为“尔朝复君父之分”之名，进占燕、齐之地，背后蕴藏着征服全国的野心，上疏指出，“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自东沈失事三十年来，兵财耗尽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朝廷的军事部署应该“节节皆为防虏计”，“以防虏为实着者也”。此时，弘光帝也已意识到清廷征服全国的野心，对沈宸荃的建议表示赞同，命“兵部饬行”，由全力讨“贼”转为“防虏为急”，将抗清作为首要的急务。但是，擅权的马士英却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

弘光元年（顺治元年，1644 年）正月，清兵会聚陕西，史可法策划了一个“北征计划”。但这次的北征，并不是攻打清军，收复失地，而是帮助清军去攻打大顺军。史可法给弘光帝的奏疏清楚地道出了此举的意图：“请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北、山西、河南总督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帖防邳、宿。”就是说，高杰带兵北上到达开封后，将西向攻取荥阳、洛阳，配合清兵在陕西攻打大顺军的行动。高杰在出师之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说明他此次出兵是“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闯贼之首”。但清廷早已定下消灭弘光政权的决心，豪格因此对他“合兵剿闯”的建议未予理会，反而乘机进行劝降。高杰没有应允，一到河南睢州，暗中降清的总兵许定国遂设计将其谋杀，然后叛降清军。史可法急往睢州安抚高杰部众，但却未派兵追

讨叛将许定国。幕僚阎尔梅劝他渡河收复山东，遭到拒绝；又劝他西征收复河南，还是不听；再劝他稍留徐州一段时间，以慰河北义士之望，他仍然坚持退保扬州，使两河的抗清义士大失所望。

弘光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多铎率清军由西安东行，准备按原计划南下消灭弘光政权。三月下旬，他率部攻取河南全省，然后向东攻破徐、砀，又破亳、泗，大举向南方挺进。正当清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主动撤离西安的大顺军主力，由李自成率领自豫西进入湖广襄阳地区。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自度无力抵挡大顺军，便打出“清君侧”的旗号，顺长江而下，声称讨伐马士英、阮大铖。行至江西九江，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自称副元帅，继续率师东进。面对西、北交急的形势，四月初，史可法认为“上游（指左良玉部）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指清兵）一至，则宗社可虞”，并致书马士英，恳请选将添兵，以抵御清军的进攻，但马士英没有回应。四月十九日，弘光帝召对群臣，商议对策。大理寺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提出：“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颍、寿。”弘光帝同意这种意见，说：“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马士英却坚持以防御左良玉为首要急务之策，他对姚思孝等人破口大骂：“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并说：“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四月初七日，他公然命靖南侯黄得功从防御清兵的江北南撤，驻师于江南铜陵之荻港（在今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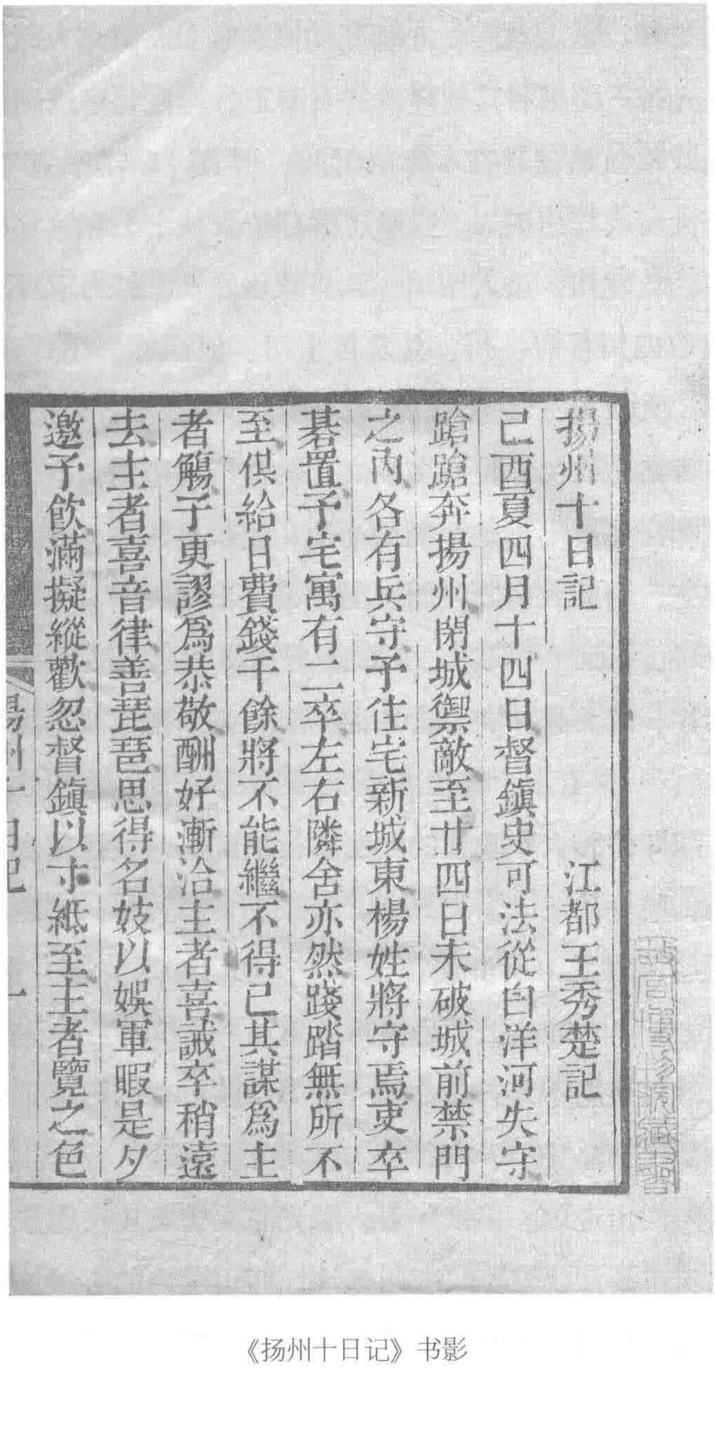
徽铜陵东北)，以扼左良玉军，又将兵部侍郎朱大典擢为尚书，与阮大铖巡防上江。清军因此得以顺利南下，于四月十八日进逼扬州城下。扬州城内守御力量十分单薄，史可法组织城中军民分地据守。二十四日夜间，清兵用西洋大炮轰塌城墙。第二天，攻入城内。史可法自刎未死，后被清兵俘获，坚贞不屈，拒不投降而被杀，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清军屠城十日，杀死数十万人，扬州变成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失守前后，弘光政权江北守军未发一矢便纷纷投降。五月初九日，清军渡江，在金山（在今江苏镇江市区西北隅）击败弘光的江防水师郑鸿逵，占领镇江。初十日凌晨，弘光帝与马士英仓皇逃离南京，但因在溧水遭到当地士兵的抢劫而走散。弘光帝在勇卫营的护卫下逃到芜湖黄得功的兵营，意图组织指挥身边的大臣和部队向杭州作战略转移；马士英则护送皇太后逃到杭州。十五日，多铎率兵抵达南京，京营总督、忻城伯赵之龙率文武百官跪迎。几天后，黄得功的部将田雄叛变，谋杀黄得功，将弘光帝交给清兵。为期一年的弘光朝廷，至此覆亡。

六月初八日，马士英借皇太后懿旨，在杭州拥立潞王朱常淓监国。第二天，潞王即按照马士英的主意，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议和。清兵置之不理，继续向浙江挺进。此前陈洪范在出使北京返回途中，已写信向多尔衮投降。清军令陈洪范返回杭州，劝降潞王。马士英、阮大铖弃城而逃。潞王在陈洪范的劝说下，于六月三十日率领群臣投降。七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得知江浙一带已不战而定，任命洪承畴为江南总督，会同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接管



“褒慰忠魂”拓片



揚州十日記　　　江都王秀楚記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閉城禦敵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棊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其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誡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

揚州十日記　一

《扬州十日记》书影

江南各地，令多铎班师回朝。多铎返京时，将弘光帝、潞王和在南京投降的王铎、钱谦益等弘光朝廷的高级官员一并带往北京。翌年五月，弘光帝、潞王和其他降清的明藩王，均在北京遭到杀害。

弘光政权虽然仅存在 1 年的时间，但其“联虏平寇”的政策，却加速了大西政权的覆灭。张献忠率部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由荆州西攻夔州，进入四川，六月攻占重庆，八月又下成都，然后分兵攻取四川各府、州、县及各土司。他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开始仍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定年号为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张献忠出身贫苦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他所倚重的负有总决诸事之责的左丞相汪兆龄不过是个桐城诸生，也就是秀才，并不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因此大西政权制定的政策也出现许多偏差与失误。如对知识分子，一面开科取士，一面又严加防范，规定科举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会造谣生事，必须携家属入城居住，并“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又如经济上，入川之初宣布免赋 3 年，随即仿照大顺政权的办法实行追赃罚饷，拷掠宗藩贵戚及大贾富民，勒令输饷，多则万金，少亦千金。另外，大西政权还严令搜捕原明仕官及卫所世袭官员，一律加以诛杀。这一系列举措，引起四川士子、官绅的极大恐惧与不满。

弘光政权建立不久，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旧辅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湘、云、贵地方。这两人皆为川籍人，即分头率兵向四川进攻。第二年春，弘光总兵曾英攻占重庆，其他弘光部队也攻占綦江、黎雅、叙州等地。四川境内的官绅、地主乘机发动反对大西政权的叛乱，杀害大西官员。张献忠激愤异常，认为

蜀民与他作对，加紧进行军事扫荡。他看到四川官绅、地主是反对大西政权的主要势力，而生员又多出身于这个阶层，便于大顺二年(弘光二年，1645 年) 十一月，下令举行“特科”考试，将各府县生员一律起送成都大慈寺，计 5000 余人，然后带到濯锦桥全部杀掉。当月，他还发出“除城尽剿”之令，派兵到所辖州县搜杀蜀民，连成都城内的居民也一律杀绝。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就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困境。

清军摧毁大顺政权后，多次派人招抚张献忠，遭到张献忠的坚决拒绝。顺治三年（大顺三年，1646 年）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征剿四川。大约在十月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忠叛投清方，接引清军入川。张献忠放弃成都，率部出走北川。翌年初，在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兵，张献忠被射杀，将士牺牲数万人。余部在张献忠的四大将领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奇能等的率领下，经重庆、遵义转战贵州。

第三节　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永昌二年，弘光二年，1645 年）五月，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杀害，弘光帝也被清兵俘获，清朝的两大对手已被彻底打垮。执掌清朝最高统治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自认为兵强马壮，天下无敌，即刻暴露出征服者的凶残面目。进军途中，稍遇抵抗便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继“扬州十日”之后又演出“嘉定三屠”，以及在无锡、宜兴、常熟、湖州、绍兴等地进行一系列野蛮屠戮。就

连一些投降的军民，也往往被杀戮一空。

清朝入关之后，陆续施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三大恶政。攻占西安和南京之后，三大恶政愈演愈烈，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清朝的圈地始行于顺治元年（1644 年）十二月，宣布圈占“近京各州县人民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的田地。实际上，不仅无主的荒地，就连有主的熟地都被圈占，而且土地一被圈占，地上的房屋和财产也都一概被夺占。这些圈占的土地，统称为“旗地”，除皇帝设立的皇庄，其余分配给宗室、王公、官员和八旗兵丁。第二年十月，又进行第二次圈地，将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县。顺治四年第三次圈地，再将范围进一步扩到顺天、保定、易县、永平等 42 个州县。后来，随着八旗兵被派到各地驻防，圈地也扩大到山东济南、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太原、潞安、平阳、蒲州等地。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廷颁布“嗣后不许圈”的谕旨，圈地方告结束。

在实行圈地的地区，许多汉族农民丧失土地和产业，而占有土地的满洲贵族和八旗兵丁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于是又打出“为贫民衣食开生路”的幌子，于顺治二年（1645 年）四月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让失去土地的汉民投入旗下充当奴仆，为之耕种土地。投充起初还是自愿的，而且仅限于贫民，后来许多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往往凭借权势，强迫附近的汉民带地投充，发展到“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的地步。投充之后，这些汉民就沦为农奴，

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子孙也得世代为奴。直到乾隆四年（1739 年）发布“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的命令，这种强迫性的投充方告停止。

明朝末年，清兵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山西等地的几次战役中，除掳掠大批财物，还俘获大量汉民，分赏给八旗官兵充当奴仆，总数至少在百万以上。不少人因忍受不了残酷的奴役和虐待，纷纷逃亡。入关之后，清军又在征战中俘获大批人口，加上圈地和投充，被抑为奴的汉民数量剧增，逃亡现象也愈演愈烈。清廷于是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顺治三年（1646 年）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里各鞭一百，流徙边远。此后，又设立兵部督捕衙门，专职缉捕逃人和“盗贼”。后来，逃人法屡经修订，但都贯穿着薄惩逃奴、严惩窝主之原则。逃人的缉捕，给汉族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个逃奴的缉获，往往牵连到一二十家甚至五六十人，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奸恶无赖、贪官污吏又往往乘机陷害无辜，借以图财害命，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除了三大恶政，剃发令的施行，更是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兵在辽东地区曾推行强迫汉人剃发改制的命令，强迫当地汉人按照满族的风俗习惯剃发易服。山海关战后，多尔衮又下令沿途各州县的官民都须剃发留辫。进入北京后，此举便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朝的汉族官员少有遵命剃发的，不少官员甚至冒着性命危险护发南逃，畿辅百姓则常揭竿抗拒。为了稳定人心，多尔衮不得不在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二十日发布谕旨：“自兹以后，天

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到次年五月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他认为天下大定，便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行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又谕礼部："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本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地方官府的文告，甚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规定。七月，清廷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即改穿满族的服装。剃发令一颁布，立即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南直隶的江阴、嘉定、昆山、吴淞，鄂豫皖交界的英霍山区，皖南和陕西各地百姓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民族矛盾急剧激化，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社会矛盾。

就在江南地区抗清风起云涌之际，南方的汉族官绅、地主又相继拥立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分别于弘光元年（1644 年）闰六月、七月，在福建福州、浙江绍兴建立隆武政权、鲁监国政权，树起抗清的大旗。

鲁监国朱以海自小在王宫长大，过惯腐朽荒淫的生活。就任监国后，不顾敌临门庭，仍然耽于逸乐，整日调弄声色，君臣嬉戏。他重用皇亲国戚，未能协调浙东各支抗清队伍之间的关系，又忙于与隆武政权互争正统，不能有效地阻挡清军的攻势。鲁监国就位不到 1 年，绍兴即被清军攻占。自己则在部将张名振等人的护卫下，逃亡海上。

隆武政权是第一个举起抗清旗帜的南明政权。隆武帝朱聿键在崇祯九年（1636 年）清兵内犯时，曾以唐王身份亲率南阳唐王府的

护卫军北上勤王，违背明廷不许藩王擅离封地的规定，被明思宗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的宗室监狱，直到弘光帝在南京登基才被释放出狱，受命徙驻广西平乐府。翌年五月，弘光政权垮台，朱聿键行至杭州，遇到自京口中撤来的靖虏伯郑鸿逵和一批文官武将，请他入闽筹办监国。闰六月初六日，南安伯郑芝龙等护送他进入福州。次日，他正式就任监国。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从七月初一日起改元隆武。在南明诸帝中，隆武帝是少有的一位想有所作为并有一定政治眼光的人物，他以中兴明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抗清斗争。即位10天后，他下令诛杀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并敕谕群臣："朕今痛念祖陵，痛念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表达了坚决抗清的决心。隆武政权的建立，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南明官员的承认。

但是，朱聿键毕竟是以远藩子孙入继大统，而且1年之前还是个被囚的"唐庶人"，既缺乏自己的班底，也没有足够的名气，号召力极为有限，因此，不得不依靠倡先拥立的福建实权派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郑芝龙原是海盗商人（即所谓"海寇"），崇祯年间接受明廷的招抚，后借为明廷征剿"海寇"之机，逐步清除自己的海上对手，垄断闽、粤一带的对外贸易，积累起大量财富。隆武政权建立后，隆武帝因其拥立之功，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靖虏侯，并封其族戚猛将十余人为侯伯。内外大权，于是尽归郑芝龙。郑芝龙之所以拥立隆武帝，不过是想借助隆武朝廷的名义来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的独尊地位，根本没有为朝廷谋恢复、助中兴之

志。他凭着自己手中的雄厚财力，骄横跋扈，不仅不愿统兵出闽与清军作战，而且极力阻挠隆武帝的亲征。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见郑芝龙无经略志，上疏自请出征。郑芝龙拒不拨给精兵，也不发给足够的粮饷，结果导致黄道周在徽州、婺源的失败被俘，被解送南京，遭洪承畴杀害。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 年）八月，清兵占领浙东后，向福建杀来。郑芝龙决意降清，令其部将撤回驻守仙霞岭的部队，使清兵得以从容过关，进入福建。隆武帝闻知仙霞岭失守，自延平（今福建南平）出奔，于八月二十八日在汀州（今福建长汀）被清军俘杀。隆武政权至此覆灭。九月，清军占领福州，派人到南安安平招降郑芝龙。郑芝龙不顾其子郑成功的反对，带着 500 名士卒到福州向清军投降。郑成功遂于十二月率陈辉、张进等 90 余人入海，定盟于烈屿（小金门），旋走南澳招募 300 人，移住鼓浪屿训练，奉隆武正朔，组织起一支海上抗清武装。

隆武政权除在福建展开抗清斗争，隆武帝任命的地方官员何腾蛟、堵胤锡还联合大顺军余部，在湖广地区共同抗清。永昌元年（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广通山县九宫山牺牲后，他所率大顺军主力之余部，由田见秀等部将带领，南下湖广平江、浏阳地区，与隆武政权任命的湖广总督何腾蛟达成“合营”抗清的协议。但何腾蛟仍对农民军怀有强烈的敌意和猜忌心理，他拉拢原大顺军地位较低的郝摇旗、王进才，而排斥、歧视原大顺军中地位较高的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刘体纯、吴汝义等将领，最终迫使田见秀等人率部北上，至荆州地区与另一支大顺军余部会合。另一支大顺军余部来自陕北与宁、甘、青地区，他们在西安失守后，由

李自成之侄李锦（原名李过）、妻弟高一功率领，经汉中南下，到达湖广荆州一带，与田见秀等部会合。这时，隆武政权任命的湖广巡抚堵胤锡见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意识到唯有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实现中兴的希望。他亲自前往荆州与李锦、高一功谈判，达成共同抗清的协议，将其部队改编为“忠贞营”。堵胤锡随即与忠贞营一起对荆州发动进攻，并请求何腾蛟率部由岳州（今湖南岳阳）北上，会师武昌。驻鄂清军力量比较薄弱，驻守南京的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急忙率兵溯江西上，于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 年）正月到达武昌，然后派出一支部队南下岳州阻击何腾蛟的部队，迫其退回长沙，自己亲率主力直趋荆州，于二月初分兵两路直冲忠贞营营垒。李锦等猝不及防，大败西撤，退入川鄂交界的三峡山区，后转至鄂西北的夔东。

隆武政权覆灭后，南方的明朝官绅又在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 年）十月和十一月，分别在肇庆、广州拥立桂王朱由榔，隆武帝之弟、续封唐王朱聿𨮁为监国。为争正统地位，朱聿𨮁抢先在十一月初五日称帝，建立绍武政权。朱由榔闻讯，也于十八日称帝，建立永历政权。此后，全国抗清斗争的中心就由东南沿海转移到中南和西南一带。

在广东并立的两个南明政权，虽然都以抗清为旗帜，却彼此互争正统，又水火不容、互相攻杀。明降将李成栋趁机带领一支清军从福建经江西杀向广州。十二月，清军占领广州，绍武帝朱聿𨮁被俘自缢，建立仅 1 个多月的绍武政权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灭亡了。

清军占领广州后，随即西向进逼肇庆，追击永历帝朱由榔，迫



永历通宝

使他几次辗转迁徙，从肇庆逃至桂林、全州，再逃至湖广武冈，依附于军阀刘承胤。明降将孔有德等率领的清军，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 年）春入湘进剿南明诸部。已被永历帝授为大学士兼督师的何腾蛟对南明诸将节制无能，一溃千里。八月，清军进攻武冈，刘承胤企图挟持永历帝降清。永历帝连夜仓皇出逃，由间道走广西柳州。何腾蛟、郝摇旗等部退入广西。永历帝应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之请，重新回到桂林。永历二年二月，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部由湖广经广西全州向桂林推进，永历帝不顾瞿式耜的反对，于三月初十日带着几名大臣逃往南宁。

就在永历帝步步南撤、形势危急之时，一些降清的明将纷纷反清归明，使永历朝的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先是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为清廷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后，因清廷坚持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而轻入关新附人员之策，仅被授为总兵、副总兵之职，受制于清廷派来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心中感到愤愤不平，遂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 年）正月反正于南昌，攻占了九江。广东的李成栋率清军迭克福建、两广之地，自认为战功卓著，却只得到一个两广提督的头衔，而和他一道由闽入粤的汉军总兵佟养甲，尽管手下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因出身于辽东世家，系辽东旧人，被授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之职，处处对李成栋进行监视。李成栋因此十分不满，也在永历二年四月反正于广州。在此前的三月间，北方又发生了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的反清起义；八月发生了刘泽清、李化鲸的反正抗清与榆园军的反清斗争；十月山西的姜瓖又在大同起兵反正；第二年二月王永强等也在陕北起兵反清。江

西、广东两省的反正归明，迫使深入湘、桂的孔有德等部清军作出战略上的撤退。堵胤锡、王进才、何腾蛟、郝摇旗纷纷率部出击，堵胤锡还亲至夔东请回忠贞营入湘作战。他们分头作战，相继收复了大片失地。抗清形势逐渐好转，永历帝也回到了肇庆。

但是，永历政权并没有趁此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清斗争，进一步扩大战果，相反，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何腾蛟也于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 年）在湘潭为清军所俘杀。永历政权的抗清斗争之所以会屡起屡伏，主要原因是朝廷腐败，内部矛盾重重，缺乏一个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坚强领导核心。永历君臣或是纵情声色、荒淫无度，或是分党分派、争权夺利。在广东李成栋反正之前，是大学士瞿式耜等人同广西南浔军阀、庆国公陈邦傅之间的矛盾；李成栋反正之后，起初是未曾降清的扈从之臣（即所谓“西勋”）同反正来归的广东文官武将（即所谓“东勋”）之间的矛盾，后来又逐渐演变为所谓的吴楚党争。楚党的主要人物有都御史袁彭年、副都御史刘湘客、给事中金堡及丁楚魁、蒙正发等，他们外联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瞿式耜，内恃反正功臣李成栋，因为出头露面的丁、蒙、袁都是湖广籍，故被称为楚党。所谓“吴党”，是楚党对反对自己独揽朝政者的诬称，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吴党主要人物有大学士朱天麟、王化澄、户部尚书吴贞毓等，他们外结督师大学士堵胤锡、庆国公陈邦傅，内结掌锦衣卫事的左都督马吉翔及宦官势力。两派为争夺朝廷的权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后来又衍生出关于如何对待原来的农民军问题的意见分歧。以何腾蛟为代表的部分南明官绅，对执行联明抗清的原农民军采取歧视和

排斥的态度，妄图依靠残明的文武官员来实现中兴；以朱天麟、王化澄、堵胤锡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只有联合农民军余部，才有复兴的希望。

由于永历朝廷的指挥无能，加上激烈的党争，南明军队在战场上不断遭受挫折。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清军攻占南雄，打开广东门户，永历帝逃往梧州。到十一月，广东已基本落入清军之手，桂林也被攻占。瞿式耜被俘，于闰十一月不屈就义。在清军的步步进逼之下，永历帝屡屡后撤，从梧州经浔州（今广西桂平），逃至南宁。退入广西的忠贞营处处受到排挤，李锦病死于南宁。高一功与李锦之养子李来亨遂率忠贞营主力北上，辗转返回夔州，与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继续进行抗清。永历五年二月，清兵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入据云贵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派人率劲旅将永历君臣接到贵州安隆千户所，并将安隆改名为“安龙府”，予以安置。

大西军余部是在张献忠牺牲后，由其四大将领孙可望等率领南撤云贵的。在南撤途中，他们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一是停止滥杀无辜的残暴政策；二是改反明为拥明，联明以抗清。进入云南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全滇进行治理和建设，使云南成为联明抗清的后方基地。大西军余部的四大将领中，孙可望年岁稍大，又读书识字，地位和威信也较高，被推为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眼看全国的抗清形势不断恶化，孙可望等人决定出滇抗清。出兵之前，孙可望派华英殿学士杨畏知等人于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赴广东肇庆，请求永历朝廷加封他为秦王。一些大臣坚持明朝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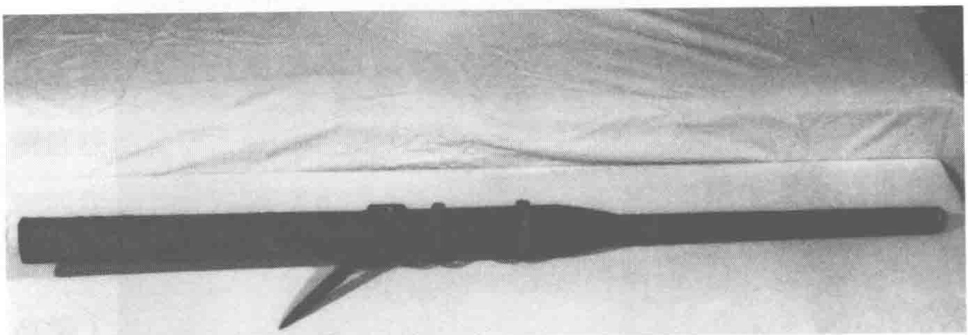
有异姓封王的先例，加以拒绝。后在堵胤锡的坚请之下，才册封孙可望为二字王平辽王（明制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低亲王一等）。但未等杨畏知带回平辽王的敕书，孙可望却早已得到秦王的敕书。原来，驻守浔州的陈邦傅因担心驻扎在附近的忠贞营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想借助大西军余部来对抗忠贞营，便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敕，填上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文字，派人送到云南。直到杨畏知返回云南，孙可望才知道上当受骗，感到无比的愤怒。

孙可望尽管对永历朝廷十分不满，但仍决定出滇抗清。当时的云南与清朝占领区之间，是南明军阀控制的川、贵等地。只有先控制这些地区，大西军才能抵达抗清前线。永历三年（1649 年）八月和四年八月，孙可望派白文选两次进入贵阳。接着，李定国也来到贵阳。后来，孙可望又亲统大军进入贵阳，从而控制贵州全境，并改编了当地军阀的武装。永历五年，孙可望再派刘文秀分兵两路入川，收编四川南部的军阀部队，并与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武装建立联系。尔后，对黔、川大力加以整顿，从而扩大了抗清基地。

永历五年（1651 年）二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从南宁迎入贵州。三月，永历帝被迫承认陈邦傅矫诏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孙可望是个政治野心家，他之所以迎驾，是为了将永历帝控制在自己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由自己来接管永历朝廷的权力，充当抗清斗争的领导核心。在派人迎驾的同时，孙可望正式自称“国主”，在贵阳设立行营六部。迎来永历帝后，便将他安置在偏僻的安龙府，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尽管如此，但永历帝正式承认册封孙



瞿式耜像



李定国抗清铁炮

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和驻跸贵州安龙府，毕竟使永历朝廷实现大换血，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南明的抗清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 年）九月，清廷命吴三桂和固山额真李国翰统兵入川；第二年二月，又命孔有德率部从广西杀向贵州。孙可望决定分兵两路展开反攻。一路由刘文秀率领，进攻四川。刘文秀率四五万人入川，攻克叙州和重庆，收复四川大部分地区，但由于轻敌麻痹，在保宁（今四川阆中）被吴三桂打败。另一路由李定国率领，进攻湘桂，连续收复武冈、靖州（今湖南靖县）、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地，并先后在广西全州和桂林大败孔有德。孔有德畏罪自杀。清廷急令谨亲王尼堪率 10 万大军来攻李定国，却被李定国设伏击败于衡州。尼堪在衡州城下当场毙命。但是，野心膨胀而又心胸狭窄的孙可望，却害怕李定国功劳过大，会威胁到自己的国主地位，密令准备与李定国夹击、攻取衡州的冯双礼退师宝庆。李定国在击败尼堪后，只得收兵撤退。接着，孙可望又密谋以召开军事会议之名拘捕李定国。李定国得到密报，于永历七年二月率领部众退回广西。

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等在西南掀起抗清高潮之时，鲁监国、郑成功也在东海沿海坚持抗清活动。鲁监国在绍兴失陷后，由部将张名振护送，渡海到达舟山群岛。后被永胜伯郑彩接到福建中左所（今福建厦门），再次长垣，又重振雄风。后返回浙江，入居舟山，驻兵舟山群岛与温州的三盘，并与宁波府的四明山寨义兵相联络，不仅对清廷在江浙的统治构成重大的威胁，而且牵制了清军

的主力，从而为郑成功势力在东南沿海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但至鲁监国六年（顺治八年，1651 年），舟山城破，他只得在张名振与监军张煌言的护送下，再次逃往郑成功控制的中左所，后移至金门。鲁监国七年三月，他主动放弃鲁监国名号，接受永历朝廷节制，与郑成功合作抗清。

郑成功起兵后，最初活动于闽南沿海地区，并改奉永历为正朔。永历四年（1650 年）七月，他登陆厦门，逐步统一郑芝龙的旧部，并继承和发挥郑氏家族的传统，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以所得利润充作抗清的经费。随后，即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大力扩充军队，并发挥其长于海战、精于奔袭的特长，多次击败清军。清廷以郑芝龙为筹码，多次招抚郑成功。郑成功便借和谈之机派部将往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漳州等地征粮征饷，将队伍扩充至十几万人，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支抗清武装。

鉴于以往各支抗清队伍各自为雄、易于被清军各个击破的弊端，南明势力秘密策划于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 年）发动两大战役。第一个战役是由李定国策划，经与郑成功联络之后定下的，计划由李定国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闽、赣、浙、苏之地。第二个战役是由清朝辖区内隐蔽的复明分子钱谦益（钱降后仍秘密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秘密策划，经东西联络后，由孙可望决策形成的，计划由东南沿海的水师进入长江，刘文秀率西南明军主力东下，合击长江流域的清军，收复江南地区。但广东之役因郑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盘，不肯真心实意同李定国会师，长江之役又因刘文秀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

变，未能挥师入楚，从而错失了良机。自此，明清战局发生逆转，南明再无复兴之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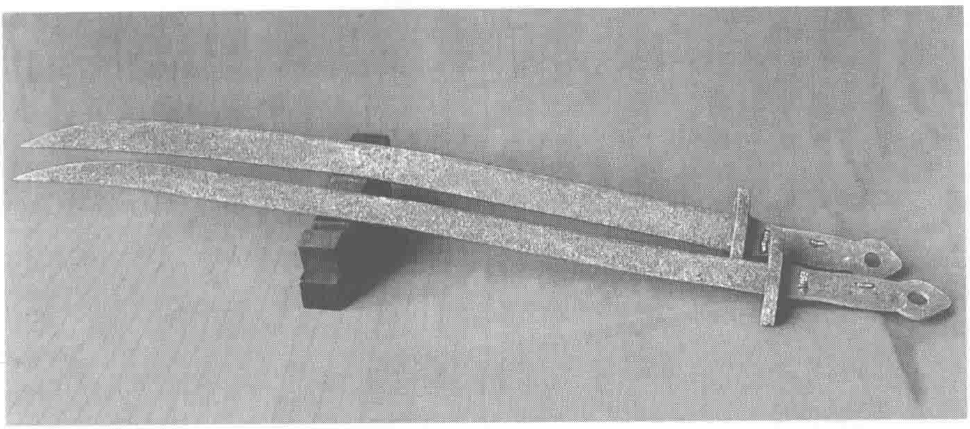
孙可望的政治野心，随着原大西军余部力量的发展而不断膨胀，秘密策划了一个逼迫永历帝“禅让”的阴谋。永历帝为了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急忙密敕李定国前来安龙府救驾。孙可望察觉后，下令逮捕永历帝身边的首辅吴贞毓等 18 人，或凌迟、处斩，或勒令自杀。李定国自广东败回广西后，遂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 年）将永历帝迁至昆明，并派人劝说孙可望摒弃前嫌，共图复兴。但孙可望毫无悔改之意，竟于永历十一年秋亲率 14 万大军向云南发动进攻，兵败之后又逃回贵阳，偕妻子至长沙向洪承畴投降。清廷因此尽知云贵内部的虚实，于次年春季分兵三路，从湖广、四川、广西向贵州发动进攻。南明军队顽强抵抗，但仍无法抵挡清军的攻势，主动撤出贵州。永历帝率文武百官撤向滇西，后来在清兵的追击下，又逃入缅甸。永历十五年秋，吴三桂率 10 万大军入缅，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押回云南。翌年四月，将永历帝处死，南明最后一个朝廷至此灭亡。李定国闻讯，大病不起，病逝于云南景线。一代英豪终于赍志以殁，原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至此结束。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同时，也在东南沿海地区加紧对郑成功的征剿。郑成功乃于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 年）二月，率师渡海东征，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作为抗清基地，以图再起。

康熙三年（1664 年），清军攻破奉永历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基地。



郑成功像



郑成功军用过的大刀

延续 20 年之久的南明抗清势力，因内部的重重矛盾，力量分散，钩心斗角，互相削弱，终被人数不多而又彪悍的满洲贵族勾结汉族官绅、地主各个击破而告灭亡。作为大明王朝余脉的南明朝廷及其遗响，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2012 年 7 月 1 日开笔

2013 年 8 月 18 日完稿

2014 年 12 月 25 日改定

附录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一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思宗朱由检根据其兄明熹宗朱由校的遗诏入继大统。面对朝政腐败、国库空虚、军事败坏、灾荒频发、内忧外患并生的危局，他锐意求治，在《即位诏》中宣布："朕以冲人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谐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懋新猷。"表示在遵守祖制的前提之下，将针对现实的状况，对"吏治民艰"问题实行改革，以求实现"光昭旧绪，愈懋新猷"的"中兴"之治。继位后，他一改明神宗、熹宗长期怠政的恶习，夜以继日地勤理政务，从不懈怠；也以明神宗的穷奢极欲为戒，崇尚俭朴，不迩声色，积极支持引进西方的天文历法和火炮技术，并以潜移默化的手段，一举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显露出些许中兴的曙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在追求明朝中兴的过程中，

他却日渐陷入心余力绌的困境，不仅“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的诺言未能兑现，而且出现了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朝廷内外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关外之地几乎尽失于清军之手，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烧到了北京城下，自己最终也落个魂断煤山（今北京景山）的下场。

一向自视甚高的明思宗，对这场中兴之梦的破灭，始终感到难以理解。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归咎于手下的文臣武将。崇祯八年（1635年），明思宗因凤阳皇陵被焚而下《罪己诏》，在“罪己”的同时，还不忘诘难文武诸臣，指责他们“夸诈得人，实功罕靓”，“诸臣失算”。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他更是指责臣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矣！”到三月，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他自缢前，还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

明朝灭亡后，史学界对明思宗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些论者对他表示同情，甚至为他开脱、辩解，赞同其“非亡国之君”说。清代官修的《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并从明清易代为历史必然的宿命论观点出发，说明思宗“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凶四告，流寇漫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近年更有学者援引明清史学家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的论断，进而推论是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思宗及其同情者的这种种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先说明思宗的“诸臣误朕”之说。明思宗不像明英宗、明神宗的幼年继位，军国大政由辅臣决断，他继位时虽说虚岁 17，实龄不足 16，但却“太阿独操”,“沉机独断”，不论大小政务，人事变动，生杀予夺，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明朝之亡，周延儒、温体仁、熊文灿等大臣固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作为掌握实权的最高君主，不是更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吗？再说《明史》的“明实亡于神宗”之论。毫无疑问，明神宗亲政之后，对辅臣张居正进行清算，使改革风气荡然无存，除一条鞭法之外，改革成果尽付东流。由此引发的翻案风，又开启官僚队伍的门户之争，导致统治阶级力量的分散与削弱。而明神宗酒、色、财、气的极度膨胀，又导致其长期怠政，造成政局的混乱，边防的废弛；他大量赏赐诸王、公主田地，又加剧了土地的兼并；他大肆挥霍，传索帑金，聚敛财货，掏空国库，刮尽民脂，更导致民变与兵变的频发，为后金（崇祯九年改国号为清）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所有这一切，无不埋下明亡的祸根。不过，明朝毕竟没有亡于明神宗之手，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再看孟森的论断。他明确表示，明思宗“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并无否认他是崇祯朝的亡国之君的意思。而说明思宗如“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不过是种假设。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万历以前和天启以后的历史环境、时代诉求大不相同，谁也无法预料明思宗如

果在万历以前当权，会有怎样的作为。再说“气数使然”，也就是历史使崇祯皇帝演出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问题。所谓“气数”，指的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确实与朝代兴衰密切关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毫无作为，否则岂不等于认同了宿命论？须知，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人的努力虽然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却可以起到延缓或加速的作用。明朝末期，朱明王朝的统治确已病入膏肓，正在滑向灭亡的末路，但是它究竟在何时灭亡，则视其最高君主的所作所为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其实，明思宗受人赞誉的勤于政务、崇尚俭朴的品质，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要说挽救危局了。明思宗在即位之初，虽然诛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而备受好评，但他却有始无终，不久又重新起用身边亲信的太监，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导致政局的混乱。这恰好说明，他是个空有中兴之志而缺乏中兴之才的另一类昏庸君主。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王朝的最高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特别是挽救濒临危亡的局势，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必须具备深远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治国能力，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制订出长远的治国方略，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但是，明思宗虽然锐意求治，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没有认识到明末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找到解救危局的办法。除了在《即位诏》

中提出“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这个笼统抽象的治政构想之外，他始终没能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治国方略。他的治国理政也就缺乏长远的战略筹划，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他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宫里长大，养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往往导致其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覆亡，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二

那么，明思宗究竟在哪些军国大事上决策失误、措置失当呢？首先，目光短浅，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即阶级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而是“刻于理财”，促使其进一步激化，导致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终致不可收拾。

明思宗即位之时，面临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三大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东北地区而言，以后金（清）为代表的女真（崇祯八年改族名为“满洲”）贵族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汉族人民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地的主要矛盾。关内的广大地区，则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正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决定着整个政局的走向和明王朝的命运。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设法缓解，才有望使刚刚爆发的农民起义得以平息，从而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国的力量对付后金（清）的进攻，并进而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应对农

民起义和后金的进攻而引起的），实现中兴之治，但目光短浅的明思宗见不及此，并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

明末阶级矛盾的急剧激化，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腐朽、官场贪风的强烈炽盛、土地的高度集中、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造成的。广大农民因而陷于极端贫穷的困境，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只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其中的许多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痼疾，不是一纸诏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但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却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缓解的。但明思宗刻于理财，其《即位诏》虽然表示对“民艰”将“求宜于通变”，随后开列 50 款大赦新政（其中的第八款规定免各省逋欠夏税秋粮及杂项课税一年，南直隶、浙江等 13 省免天启元年（1621 年）分，北直隶免天启二年分；内宫物料则南直隶、浙江等 13 省免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分，北直隶真、保、顺、河、广、大 6 府免万历四十七年分，顺天、永平两府免天启二年分，以后年分照常征解。第九款规定免天启元年分以前拖欠加派钱粮；免拖欠万历四十八年以前金花银。第十款规定免天启元年以前各地永折及因灾折收银两；第十一款规定将清查民间丁口，蠲免无丁而被迫缴丁粮者。第十二款规定禁有司不得于征收赋税中加重科罚。第十六款规定解官、解户解到绢布式样不合格者酌量从宽验收。第四十七款规定蠲免浙江、福建、苏、松、常、镇、徽、宁、扬、广等处拖欠万历四十八年以前岁造段匹。第四十八款规定蠲免各地拖欠天启元年以前解四司物料），但这些蠲免的多是拖欠多年而无法征收的税课。至于夏秋

两税这两项赋税中的主要税种，最多只免至天启二年，有的地方则只能免到万历四十七年以前的欠额，这就意味着有些地区拖欠了8年之久的税课仍将继续追缴；至于近5年的正税，一毫一厘都不得减免。口惠而实不至，等于画饼充饥。

继位之后，明思宗虽然“切念民艰”，一再表示：“孜孜民力艰苦，思与休息。”“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但他在位17年，仅有以下寥寥可数的几次停止织造、蠲免逋赋、禁止私派的举措，即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停苏杭织造”，四月“禁有司私派”；九年三月“蠲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五月“免畿内五年以前逋赋”，十一月“蠲山东以前逋赋”；十二年八月“免唐县等四十州县去年田租之半”；十三年三月“免河北三省逋赋”；十五年正月“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赋”。与此同时，明思宗又不顾百姓的死活，加重赋税的征派。崇祯三年九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以“兵食不足”为由，请求增派田赋。经户部尚书的策划，乃于万历末年每亩加征9厘辽饷的基础上再加征3厘，从崇祯四年开始征派，计征银6679208两，加上该年辽饷中增派的杂项、盐课、关税等项银两，该年辽饷总数高达10299602两。崇祯十年，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加派剿饷，“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明思宗批准这一建议，假惺惺地表示：“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实际上1年后又下令再征，直至崇祯十三年才停止征收。崇祯十二年，又以“抽练各镇精兵”缺乏饷银为由，“复加征练饷”，于六月开始征收，总数为730万两。上述辽饷、剿饷、练

饷三项加派，从田赋中加征的饷银总计多达 1670 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的一倍以上，难怪当时的百姓怨声鼎沸，“呼崇祯为重征”。

不仅如此，明思宗还严责各级官吏，必须将规定的税额征收上缴，并将征税的数额与职位的升降、俸禄的增减直接挂钩。史载，“上（指明思宗）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官员凡是反对加派的，明思宗就感到厌烦，甚至严加惩处。如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耿直朴忠的傅宗龙出任兵部尚书，入见皇上，“谆谆以民穷财尽为言，云饷不可加，兵不可增”。明思宗开始还言不由衷地表示：“卿言是。”傅宗龙“指天画地，言俞力”，明思宗便拉下脸来，说：“卿但当料理寇敌耳！”待傅宗龙告退后，他又对阁臣说：“宗龙所言，半言官唾余，何也？”从此，“兵部诸疏无一俞者，未几下狱”。相反，凡是支持加派重征的，明思宗就感到高兴，甚至大加提拔。如崇祯十一年四月，他在中左门考选诸臣，征询足兵足食之计，知县曾就义说：“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未为不可。”明思宗当即“拔第一”。

明思宗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派，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广大农民进一步陷于破产，大批逃亡。官府又穷凶极恶地追讨钱粮，甚至勒逼未逃的农户赔纳已逃农户应交的钱粮，逼使更多的农户逃亡。“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弃田逃亡的现象与日俱增。如河南彰德府的武安（今属河北省），据知县窦维辂在崇祯十四年的奏疏报告：“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

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加上政治腐败，水利年久失修，自崇祯十二年起，连续3年不断发生雨雹、旱蝗等自然灾害，贫苦农民无以为生，转死沟壑。中州平原更是赤地千里，“流亡满道，骴骨盈野。阴风惨骨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明思宗之所以一再实行加派，借口是“帑部匮绌”，国库空虚，无法支付日益增加的军费。当时，国库固然匮乏，但内府（即皇帝的私库）并不缺钱。明朝初年，米、麦等实物的征收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户部所设的内府十库既是中央政府的国库，也是皇帝的私库，公私不分，混同开支。进入明中期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大量实物形式的财政收入转化为货币收入。明廷于是对财政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正统七年（1442年）在北京设立太仓库，用以贮银。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户部设立银库。此外，还有京、通两仓，贮存由运河漕运来的米、粟，以供京城贵族、百官和京边卫军之食用。太仓银库设立后，便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而内府则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政府的财政收支与皇室财政收支基本分开。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土木繁兴，加以“南倭北虏”交相进犯，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太仓入不敷出，到隆庆初年曾出现财政危机。但一待边事停息，再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危机便得到了缓解。到万历四年，“京、通储粟足支八年”，“府

库充溢，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明神宗亲政后，不停地“传索帑金”，加上宗禄的大量增加、万历三大征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得动用累年的储积，弄得国库空空如洗。但是明神宗通过“传索帑金”，加上派遣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却使“内帑之充牣”达到“亘古未有”的程度，内府金银山积。明神宗死后，明光宗在位仅1个多月，明熹宗在位也仅7年，短短几年时间，内府的储蓄并没有花光。但明思宗也同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就是不肯往外拿，有时还对群臣大叹穷经，说“目今帑藏空虚”。后来，李自成大顺军入京，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另有记载说:“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明思宗死死捂住的这一大笔金银财宝，最终都成了大顺军的战利品。

明思宗的刻于理财，竭泽而渔，只能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为农民起义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三饷的加派，更是直接促成起义高潮的到来。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到京就任兵部尚书，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并在加派辽饷之外再加派剿饷，加强对农民军的征剿，将大部分起义军剿杀殆尽，迫使张献忠与罗汝才受“抚”，李自成被迫率领残部退入陕鄂川交界的商洛山中，革左五营也遁入英霍山中，起义暂时进入了低潮。但是，辽饷与剿饷的加派、自然灾害的频发，把百姓逼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加上杨嗣昌密谋对张献忠发动突然袭击，张献忠遂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在谷城重举义旗。明廷又于当年加派练饷，更把广大贫苦农民推向绝路。李自成遂于崇祯十三年六七月间，率残部从房县山区出发，取道陕西，攻入赤地千里、流民遍野、“土寇”

蜂起的河南，并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不催科”、“不当差，不纳粮”的政策，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百万人，明末农民起义进入了高潮阶段。后来，正是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三

明思宗的又一重大决策失误、举措失当，是不辨忠奸，屡逐直臣，滥杀良将，而重用奸佞之臣与宦官，导致政局的混乱。

要实现中兴之治，必须起用大批忠于国家社稷的直臣与良将，但明思宗却缺乏识人之明，只凭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才。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刻薄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刚愎自用、虚荣心强，他要求臣僚完全顺从自己的旨意，听不得逆耳之言。“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之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言语率直，切中时弊者，率皆摧折而去。”如东林党人刘宗周在天启年间因抨击魏忠贤和客氏而遭削籍，崇祯初年被重新起用，任为顺天府尹。他刚入京就职，就上疏批评明思宗“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己巳之变”起，枢辅诸臣多被明思宗作为替罪羊逮捕下狱，刘宗周又批评皇上说：“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因而“忤帝意”，乃以疾辞官。崇祯八年（1635年），吏部奉旨推举刘宗周等3人入阁，他推辞不允，于翌年

正月入京，又批评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也。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明思宗大不高兴，改命其为工部左侍郎。过了 1 个月，他又上疏批评明思宗“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明思宗极为恼怒，先后 4 次命阁臣拟严旨惩处。阁臣每次呈上拟旨，他都反复阅视刘宗周的奏疏，“起行数周”。后来怒气消解，仍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当年十月，刘宗周再次上疏批评明思宗的弊政，连带批评首辅温体仁。明思宗大怒，温体仁又上章力诋，遂下旨将其革职为民。

由于求治太急、猜忌多疑，明思宗还专横地贬斥甚至屠戮一批屡立战功的良将。袁崇焕在天启年间镇守辽东，着力构筑宁锦防线并取得了宁远大捷，只因不肯巴结魏忠贤，遭其党羽的弹劾而辞官。明思宗继位后，重新起用他为蓟、辽、登、莱、天津总督。在明思宗召见时，他轻率地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经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的提醒，他又提出“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明思宗一一允准。两天后，他又上疏说明：“辽事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明思宗批示说，“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令“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

事”。袁崇焕随即赴关就职，着手调整关内外防务，修补明蒙联盟。接着，依据“悉听便宜从事”的谕旨，诛杀不听节制的东江守将毛文龙，以统一事权。己巳之变起，绕道内蒙古入塞的皇太极兵临京师。袁崇焕急率辽军勤王，副总兵周文郁劝阻他：“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否？”他回答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延儒、温体仁等辅臣勾结阉党余孽，合力诬陷袁崇焕“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皇太极又借被俘的杨太监行反间计。对袁崇焕未经奏请而诛毛文龙、率领辽军入援京师心存疑虑的明思宗，竟下令将其斩于西市。“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早在崇祯二年（1629 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唐开远就批评说，明思宗“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追，几乎刑乱国用重典矣”。事实正是如此。据统计，明思宗在位 17 年，计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河南巡抚李仙风被逮自缢，尚不计在内）”。就连“贵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两人被杀，“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由于不断地罢黜和诛杀，官员的更替十分频繁，如蓟镇总督“半载更五人”。整个崇祯朝 17 年，“易中枢（兵部尚书）十四人”，“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内阁辅臣更是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17 年间任命的大学士多达五十余人，其中先后充当首辅者即达十余人。这种做法，不仅使朝廷失去许多能干的文臣武将，也使在职的官员胆战心惊，畏缩不前，丧失进取心和积极性，办事效率极度低下。

对于自己喜欢、信任的官员，明思宗则百般呵护，甚至有罪不罚或者轻罚。崇祯九年（1636年）秋，清兵再度绕道内蒙古突入长城，侵扰京畿。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督师，御敌无方，畏罪日服大黄药，清兵退后于九月初一日死去。明思宗“顾廷臣无可任用者”，起用在家守丧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嗣昌通籍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辩。”翌年三月抵京，“帝与语，大信爱之”。张凤翼作风柔靡，“兵事无所区画”，杨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明思宗每次召见，都同他深谈移时，凡有奏请，无不应许，说：“恨用卿晚！”杨嗣昌于是提出征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建策，推举熊文灿具体负责执行这个战略计划，并建议加派剿饷，以便增加围剿的兵力。明思宗一一照准。杨嗣昌立下军令状，以崇祯十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到崇祯十一年三月，因未能完成“灭贼”的许诺，他只得上疏引罪。明思宗不许，“命察行间功罪”。杨嗣昌于是借机诿过于洪承畴、曹变蛟、朱大典、左光先、祖大弼、史可法诸将，来为自己开脱。六月，明思宗改命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部事。当年九月，清兵再度进逼京师，先后攻陷七十余城，明思宗没有惩罚既为阁臣又掌兵事的杨嗣昌，反而令其议文武大臣失事之罪，从巡抚、总兵官至州县官共36人，同日弃市。言官纷起弹劾杨嗣昌，一时舆论大哗。明思宗只得令其落职冠带视事，旋又叙功复其官。崇祯十四年三月，农民起义军横扫大河上下，福王、襄王相继被杀，杨嗣昌畏罪自杀。许多大臣上疏弹劾，要求追究其罪责。明思宗训斥说：“杨嗣昌系朕特简，用兵不效，朕自裁鉴，况尚

有才可取。”不仅未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而赠其为太子太保。

一些奸佞之臣看准明思宗的性格特点，便千方百计讨其欢心，博取高官厚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旨”。崇祯元年（1628年）冬，锦州守军因缺饷哗变，督师袁崇焕请给饷。明思宗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明思宗嗜财如命，舍不得从皇家库藏中往外掏钱，并且怀疑有边将故意煽动边兵哗变相要挟。周延儒摸透皇上心思，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认为饷虽然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明思宗连连点头，降旨切责众大臣。事后，他又对明思宗作了说明，认为“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耶？”这话切中明思宗的心意，明思宗“由此属意延儒”。当时吏部会推内阁辅臣，但列出的候选名单有东林党人、礼部侍郎钱谦益，却没有周延儒的名字。一心想挤进内阁的周延儒，即暗中散布流言，称“此番枚卜，皆钱谦益党把持”，明思宗“遂入其说”。也想挤进内阁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他揣测皇上对这份候选名单必然生疑，便上疏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所谓“关节受贿”，是指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主持浙江会试时，金保元与徐时敏两个奸人策划的一场科场舞弊案。案发后，查明士子钱千秋因买通关节而中举，钱千秋与金保元、徐时敏3人“俱依律遣戍”。钱谦益并不知情，以“失于觉察”被“罚俸三个月”。明思宗看了温体仁的奏疏，在文华殿召集大臣，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面对质，结果证明关节受贿案7年之前早已结案。明思宗又问温体仁，所谓“神奸结党”指的

是谁。温体仁先是回答:“钱谦益之党甚多，不敢尽言。”后又指责主持会推的吏部官员、科道官与钱谦益“结党”，继而说替钱谦益辩护的辅臣也是钱谦益的“同党”。周延儒又从旁煽动说，会推“只是一两个人把持住了，谁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了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祸随”。温体仁遂以“孤立”为由，请求辞官归里。所谓“孤立”，即无党无派之意。明思宗自然欣赏，因而“益向之”，忙加慰留，并宣布将钱谦益革职听勘，钱千秋重新提审（时金保元与徐时敏已死)。钱千秋虽经重刑，供词与原先的供状一致，证明温体仁诬告不实，但明思宗还是将钱谦益夺官闲住，并于崇祯二年十二月和三年六月，将周延儒、温体仁先后擢为大学士，入阁辅政。

入阁之后，周延儒与温体仁联手，攻倒首辅成基命，由周延儒于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继为首辅。接着，温体仁一面对明思宗“务为柔佞”，使“帝意渐向之”；一面加紧拉帮结派，抓住周延儒的小辫子，唆使其亲信上疏弹劾。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六月引疾乞归，温体仁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首辅。自此，温体仁出任首辅4年，而居辅臣之位则长达8年，为崇祯朝担任辅臣时间最长的一位,“恩礼优渥无与比”。但他从不把心思放在国家社稷的安危上面，“惟日与善类为仇”，排挤、打击东林党人与正直的官员,“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才，苟以充位”。内阁辅臣中受到他信任的，只有碌碌无为的吴宗达和刚愎自用的王应熊，时人讽之曰:“内阁翻成妓馆，乌归（指乌程籍的归安人温体仁)、王巴（指四川巴县人王应熊)、篾片（指无所作为的吴宗达)，总是遭瘟!”京师还有民谣唱道:“崇祯皇帝遭温（瘟）了!”

由于明思宗“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委政柄者非庸即佞”,“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而去”，觉得无人可用，于是又转而重用身边的家奴、宫中的宦官。在他心目中，宦官依附于皇权而存在，与自己朝夕相处，比文武百官可靠；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不服管束，一纸圣旨，即可加以清除。正如时人谈迁所说:“(明思宗) 直谓三尺 (法律) 在我，此曹亦何能为!”即位之初，在清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时，明思宗曾下令尽撤各地的镇守太监，说“宦官观兵，古来有戒”。仅过半年，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重新赋予宦官监军之大权。崇祯元年 (1628 年) 五月，他即“以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右少监宋尚志提督正阳等九门、永定等七门及皇城等四门，巡城点军”。第二年冬，后金军队再次南下，京师戒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九月，明思宗更是大规模起用宦官，“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文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又“命太监监军，王应朝往关宁，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中协，邵希诏西协”；十一月,“以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吴直监视登岛兵饷”。后来，由于文武大臣的一再劝谏，明思宗只好在崇祯八年八月下诏，撤回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及监视各道的太监。但仅隔一年，又再次大规模起用宦官，不仅赋予监军之权，有的还授予总督、分守之职，直接指挥军队。崇祯十三年三月，再次撤回各镇宦官，仅隔半年又再度派遣宦官监制各镇，直至明亡为止。明思宗派

出的这些宦官多为市井庸愚，妄自尊大，又根本不懂军事。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不仅如此，宦官的派出，还侵犯了文官武将的职权，严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一副催化剂。

四

明思宗的另一重大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是不辨是非，亲自介入门户之争，致使党争不断，分散、削弱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

明思宗继位之初，想从魏忠贤阉党集团手里夺回朝政大权，依靠的是与阉党没有瓜葛的正直官员，特别是与阉党对立的东林党人。在处死了魏忠贤之后，崇祯元年（1628 年）的上半年，正是在内阁大学士刘鸿训的帮助下，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阉党骨干先后被斥，“人情大快”。当年三月，新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上疏请求重新审定阉党炮制的《三朝要典》。四月，翰林院侍讲倪元璐更上疏请求销毁《三朝要典》。明思宗批准了这个请求，为清查阉党集团扫清了一大障碍。尔后，东林党人韩爌和李标、钱龙锡等内阁辅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人拟出《钦定逆案》的名单，由明思宗于崇祯二年三月正式颁布，给予阉党集团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一大批遭到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得到平反昭雪，重新受到任用。阉党与东林党两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东林党的力量远远超

过阉党，并于崇祯元年十二月组成以韩爌为首的东林内阁。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明思宗颁布《钦定逆案》后，即在一道谕旨中表示："分门别户，已非治征。"要求臣僚停止门户之争，"化异为同"、"天下为公"，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中兴之治。《钦定逆案》颁布后10天，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弹劾蓟镇巡抚王应豸"克饷激变"，疏中有王应豸系"魏珰私人"之语。明思宗非常反感，当即训斥说："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私！"不过，《钦定逆案》并未将阉党集团一网打尽，有的阉党分子仍然逍遥法外，有的甚至还在官府继续任职。如右庶子杨世芳就是一个阉党分子，他是韩爌的姻亲，得其庇护而未遭清算。还有"素附珰，仇东林"的吏部尚书王永光以及御史曹思诚、袁弘勋、史范土、高捷等，也都是漏网的阉党分子。被列名逆案的阉党分子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未被列名逆案的漏网阉党更是力求保住自己的官职，他们都力图掀翻逆案。吃尽阉党迫害之苦的东林党人，自然是希望继续清查阉党余孽。这显然不是一道谕旨就能禁止的。但明思宗见不及此，未能抓住引发党争的症结，正确地加以引导和解决，反而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刚愎自用，亲自介入门户之争，不辨是非、不别贤否，支持并重用奸佞之徒，为党争的再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因会推阁臣引起一场纷争，明思宗不仅亲自介入，而且站在周延儒、温体仁一边，将东林党人钱谦益夺官闲住。不久又将周、温擢为大学士，入阁辅政。周延儒早年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同乡，"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袁崇焕下狱前后，他

"前后五疏，力请杀焕"。后来，袁崇焕被冤杀，他还得意地致书其弟曰："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袁崇焕不是东林党，但同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他的座主是东林领袖之一韩爌，他本人是由东林党人侯恂举荐而被擢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由东林党人孙承宗的支持而筑守宁远，被东林党视为抵御后金之长城。温体仁"当日亟谋入相，所忌韩爌、钱龙锡二辅臣"，自然也就深恨东林党人。阉党分子在《钦定逆案》颁布后，不敢公开跳出来为逆案翻案，便纷纷投靠周、温等奸佞之臣。两者同气相求，一拍即合，随即携手合作，形成新的邪恶集团，共同打击东林党人。

温体仁、周延儒与王永先等人经过密谋策划，首先把矛头指向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钱龙锡曾与韩爌、李标等共同主持钦定逆案的工作，"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崇祯二年（1629 年）冬袁崇焕下狱后，温体仁决计"借崇焕以挤去（韩爌、钱龙锡）二人"。他在密疏中攻击袁崇焕"阴与华亭辅（钱龙锡）、临邑罪枢（兵部尚书王洽）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王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他唆使高捷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史范土又疏言："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明思宗遂于崇祯三年十二月将钱龙锡逮下诏狱，后遣戍定海卫。同年正月，内阁首辅韩爌因遭阉党分子原抱奇的弹劾而三疏辞职。三月，阁臣李标也五疏乞休。九月，成基命又三疏去职。东林内阁仅存在 1 年的时间，就这样解体了。

随着参与定逆案的辅臣相继离职，阉党分子纷纷跳出来为自己

翻案。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吏部尚书王永光首先释放一个试探信号。他借会推天津巡抚之机，将列入逆案名单的王之臣排在6个候选人名单的首位，心里盘算着“倘得点用，则可渐次为翻案之计”。明思宗自然不会允许推翻自己钦定的逆案，点用排在候选名单第四位的翟凤翀为天津巡抚。王永光此计虽未得逞，但却给了其他阉党分子以翻案的勇气。被列入逆案第七等（即“结交近侍又次等”而“坐徒三年，纳赎为民”）的原兵部尚书吕纯如，就公然上疏为自己鸣冤叫屈，说他“未尝归美厂臣，不当列于逆案之内”。当时的言官皆慑于王永光的威势，不敢吭气。五月，东林党人左谕德文震孟挺身而出，上疏猛烈抨击“平生无耻惨杀诸贤之吕纯如，且籍奥援而思辨雪”，“吏部尚书王永光假窃威柄，横行私臆”的行为。明思宗命其就所揭露的吕、王罪状指实再奏。文震孟又再上一疏，逐一列举具体事实。疏出，王永光窘甚，上疏狡辩，并密请大太监王永祚出面帮其渡过难关。于是，“永光辩疏得温旨”，文震孟反而被明思宗责为“任情牵诋”。十二月，袁崇焕被杀后，阉党分子更是蠢蠢欲动。“御史田唯嘉疏荐杨维垣、贾继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荐吕纯如、霍维华、徐扬光、傅櫆、虞廷陛、叶天陛六人。”这几个被推荐者，都是名列逆案的阉党分子。明思宗未予批准，“有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荐用，成何政体？’”

树欲静而风不止，为阉党翻案的风潮并未因此而平息。温体仁入阁辅政的第二年，吏部尚书王永光因其党羽纳贿事发，遭言官弹劾而罢去。他用同乡闵洪学代之，“又用御史史范土、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使张捷等为腹心”。在扳倒周延儒而代为首辅之后，

温体仁继续攻击东林，重翻逆案。为了不牵连自己，他不亲自出面，而是暗中指使自己的心腹到前面去打头阵。先是在崇祯七年（1634 年）八月因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人，明思宗召集群臣会推时，张捷按温体仁的授意“独举吕纯如、唐世济”。明思宗问:“吕纯如是钦案有名的，张捷如何举他?”他回答说:“吕纯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在场的给事中、御史纷纷加以批驳。“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仍荐谢升、唐世济为之。”接着，在崇祯九年，唐世济又以边才举荐列名逆案的原兵部尚书霍维华，明思宗谓“逆案概不举用，世济欺蒙，削籍下刑部”。“维华之荐，亦体仁主之也。体仁自是不敢讼言用逆案，而愈侧目诸不附己者。”

在明朝后期的门户之争中，江南地区出现了由众多社团联合组成的复社。复社继承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其领袖张溥公开声明:“吾以嗣东林也。”官府中同东林党有瓜葛的官员，一般都支持复社；与阉党有瓜葛的官员，一般都与复社作对。温体仁也极力打击复社。崇祯六年（1633 年），温体仁之弟温育仁要求参加复社遭拒，便雇人撰写《绿牡丹传奇》，在浙江各地演出，用以影射张溥等复社名士。崇祯十年，温体仁还暗中“募人劾溥”。他的同乡陆文声因请求入社遭到拒绝，诣阙上疏，极言“风俗之弊，皆源于士子。溥、(张）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即命南直隶提学御史倪元珙查核，但倪元珙及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皆言复社无可罪，结果 3 人都遭到温体仁的贬斥。闽人周之夔曾任苏州推官，坐事罢去，他怀疑为张溥捣鬼，听说陆文声弹劾张溥，也伏阙疏劾“溥等把持计典”及“复社恣横状”，但经巡抚张国维查核，

“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行谯让”。当年六月，温体仁致仕，继任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执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此案仍迟迟未能了结。

复社人士从这一系列事件中逐渐认识到，朝中大臣，特别是担任首辅的大学士，如果不支持复社，复社孤立无助，必定难有作为。复社首领决定物色支持本社的官员出任首辅，他们看中了被温体仁挤出内阁的周延儒。因为他是张溥的座主，早年“颇从东林游”，当首辅时虽站在东林的对立面，下台后有悔恨之意。张溥便出面找周延儒谈判，约定“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以为然”。张溥于是联络吏部侍郎吴昌时、侯恂等人，积极展开活动，并筹资重贿司礼太监。崇祯十四年（1641 年）二月，明思宗终于发出起复周延儒的诏书。“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周延儒入朝后，“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诖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从之”。他起用了一些东林党人士或其他正直之士，如郑三俊、刘宗周、倪元璐、黄道周等，但“延儒实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对清军的步步紧逼和农民起义军的蓬勃发展，仍然“一无所谋画”，到崇祯十六年四月被罢官。不久，其门生、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兼任蓟辽冒通等处总督的范志完懦弱怯战、纵兵掳掠、克扣军饷、贪污行贿，其亲信吴昌时窃权附势、纳贿行私，遭到弹劾。周延儒受到牵连，终被明思宗勒令自尽。明王朝的

政治不仅毫无起色，反而在明思宗亲自介入的门户之争中进一步分散、削弱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加快了灭亡的步伐。

五

明思宗的再一个重大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是极好虚荣，缺乏担当精神，患得患失，屡屡错失延缓败亡的时机。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陈新甲议和泄密被杀，二是南迁之议久拖未决。

先说陈新甲议和泄密被杀事件。后金（清）自宁锦之战失败后，一时难以突破明朝的宁锦防线，改从内蒙古迂回入塞，先后 4 次侵扰明朝内地，大肆烧杀掳掠，劫夺大量财物和人口，既用以充实自己，也消耗明朝的有生力量，为突破宁锦防线创造条件。接着，便屯兵义州，逐步向锦州推进，于崇祯十四年（1641 年）三月包围了锦州。明廷急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 13 万大军驰援锦州。洪承畴主张“必守而兼战”，即一边防守，一边进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起初兵部同意这个计划，明思宗也予以肯定。但当农民起义由暂时的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明思宗又希望尽快结束辽西的战争，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农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于是提出四路进兵、合击围攻锦州清军的方案，明思宗密敕洪承畴克期进兵。洪承畴只得将粮饷留在宁远、杏山与塔山西北的笔架山，自率 6 万大军于七月底挺进塔山。皇太极“悉索沈中人丁”，倾国而出，并亲至松山督战。明军先胜后败，洪承畴被困于松山。总兵祖大寿被围于锦州，屡次突围而不得出。陈新甲与清议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进行的。

为了挽救被围的洪承畴与祖大寿，陈新甲主政的兵部在崇祯十四年（1641 年）十月提出了“息兵”之策。十一月，辽东大雪，“达虏粮刍俱尽，将解围而归，虑我军蹑之，俾西虏（漠南蒙古）入关求和”。当时在宁远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获悉清军有意议和，致书清军将领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得到“此吾国素志也”的答复，即上报辽东巡抚叶廷桂。叶廷桂又上奏朝廷。明思宗内心同意议和，但他虚荣心强，过去曾多次拒绝与清议和，现今大败后主动求和，觉得有失面子，斥责叶廷桂是“漫任道臣辱国妄举”，将石凤台逮捕下狱。到年底，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中原大地，清军更是将松山围得水泄不通。内阁大学士谢升便与内阁同僚商量，决定由陈新甲奏请与清和议。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明思宗召对时，陈新甲婉转地提出：“（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明思宗明白他“用间”一词的真正含义，爽快地回答说：“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不防便宜行事。”陈新甲随即推荐兵事赞画主事马绍愉作为议和使节，明思宗即予允准，“加绍愉职方郎中，赐二品服”。但是，他还是觉得战败求和有失中原天子的颜面，因此特地“谕新甲密图之”，要求绝对保密。

马绍愉于是衔命出关，前往宁远，与清方接洽。清方请以敕书为信。明思宗仍大摆中原大国对待边疆属夷的架子，以一纸“谕兵部陈新甲”的敕谕代之。皇太极极为不满，也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要求更换敕书。马绍愉只得奏报朝廷，耽误了很多时

间。在这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已先后被清军攻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降清。

明思宗得到奏报，仍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并差兵部司务朱济賫敕，同马绍愉前往沈阳与清方谈判。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并“约九月不至，则治兵”。马绍愉返回宁远，立即派人向陈新甲禀报和谈的结果。但此前和议的消息却被谢升无意间泄露，引起言官的慷慨陈词：“堂堂天朝，何至讲款！”明思宗只得将谢升革职，以平息舆论。不料，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禀报议和结果的密疏，阅后置于几案之上即去上朝。打扫书房的仆人误以为是份塘报稿，交塘报官抄传。一时舆论大哗，言官交章弹劾。与清议和，原是遵照明思宗“可款则款”的谕旨推行的，谈判使节也是由他加官赐服任命的，如果明思宗勇于担当责任，以君主之尊站出来说明议和的理由，舆论不难平息，但他却患得患失，只顾自己的颜面，下严旨切责陈新甲，令其自陈其过。陈新甲不服，上疏自辩。明思宗遂于七月底将陈新甲逮捕入狱，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将他押赴西市斩首。议和失败后，皇太极诱降宁远总兵吴三桂未成，即于当年十月下令第五次入侵明朝腹地。十一月，清兵分两路从墙子岭、青山口突入长城，历时 8 个月，攻破 3 府 18 州 67 县 88 座城池，掠走 27 万口人及大量财物，再次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

再说南迁（即迁都南京）之议久拖未决的问题。崇祯十六年

(1643年)四月，清兵第五次入塞侵掠行将撤退之时，明思宗见各路明军不是胆怯不战便是望风而逃，召见周延儒等大臣，表示要亲自出征。周延儒只得请求代替皇上前往前线督师。临出都门之前，明思宗以内外交困，曾同他“议南迁，命无洩”。明思宗的兄嫂懿安皇后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此事，对明思宗的皇后周氏说：“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明思宗大怒，派太监追查消息的来源，“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只好不了了之。不过，明思宗还是在暗中做着南迁的准备。先是命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继而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谓道路将梗，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为来日南迁作准备。明思宗即“俞之”，冯元飏“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备缓急”。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地区歼灭明军主力，北上占领荆襄之后，亲率大军自洛阳西进，直趋潼关，攻占西安，并派遣一支先头部队于十二月十八日渡过黄河，攻占山西荣河等县，为东征作准备。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大顺国。初三日，忧心忡忡的明思宗在德政殿召见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之策。李明睿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明思宗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答道：“上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若筑室道旁，后悔何及。”明思宗四顾无人，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议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

和留守诸事。

在当时形势下，南迁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当初明太祖肇建明王朝，就把南京定为全国的首都。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仍然保留着陪都的政治地位，保存着一套形式上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任职的官员多为虚衔。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号称数十万的军队，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南京要比北京安全得多。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财赋之区，遭受战争的破坏也较小。如果退守南方，即使丢掉了北方，也可划江而治，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抗衡，最后鹿死谁手还难以预料。但是，将政治中心都城南迁，涉及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正统末年，明英宗亲征被俘，瓦剌兵临京师，有人主张南迁，即遭到万人的唾骂。这就需要手握乾纲的君主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作出决断。明思宗刚愎自用却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却又怕担责任，虽对李明睿表示“朕志决矣”，却耻于亲自决策南迁，想待群臣力劝而后行之，此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形势瞬息万变，时间不等人。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向北京进军。京城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越发浓重。左都御史李邦华为李明睿同乡，也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举荐人之一。他支持李明睿的南迁主张，曾私下问过李明睿：“上亲行与东宫孰便？”李明睿回答：“东宫年少，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上亲行为便。”李邦华担心南迁之议为朝论所阻，就提出由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监国作为一种过渡，

具疏请下明诏,“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监国故事，急遣皇太子监国南京”。越数日，又“请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以壮藩翰。正月十八日，明思宗密谕首辅陈演:“宪臣言是。”陈演反对南迁，将消息向外透露，从而引起群臣的议论。李明睿于是公开上疏，阐明自己的主张:“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征……夫亲征之举，不必皇上自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疏入，明思宗命下部速议。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斥为“邪说”，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再次上疏辩驳，谓:“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明思宗召见光时亨，斥之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又曰:“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二月初七日，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主力攻占太原，然后经宁武、大同，于三月初占领宣府，拟从居庸入关进逼京师。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的另一支大顺军，也于二月间从蒲坂渡河，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北京面临着大顺军的南北夹击，形势越来越危急。二月二十七日，明思宗召集群臣，议战守之策。少詹事项煜表示支持李邦华的建议，由太子监国南京。明思宗原本是支持此议的，但后来几经琢磨，觉得让太子往南京监国，自己还是难以逃命，况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的皇帝南迁之议为妥。第二天，他又召集阁臣，把李邦华的奏稿递给阁臣，要大家表态。阁臣回奏:“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

此议。”明思宗大为恼火，即赌气地表示，他将坚守京师，“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他说这番气话，实际是让阁臣转而支持李明睿之议，劝皇上南迁。但阁臣担心，皇上南迁会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成为替死鬼；就算随驾南迁，一旦京城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而代人受过，因此，他们还是一个劲地劝谏道：“太子监国，古人尝有，亦是万世之计。”明思宗反驳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

三月初三日，代帝出征的督师大学士李建泰疏请南迁，表示“愿奉太子先行”。次日，明思宗再次召对，对辅臣说：“李建泰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实际上是再次试探大臣的态度。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奉太子监国江南，在正月底升任右庶子的李明睿也放弃前议，附和此议。光时亨大声驳斥：“诸臣欲为灵武故事乎？”范景文等大臣遂不敢言声。明思宗复问战守之事，诸臣仍沉默不语。明思宗喟然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拂袖而去。过了 3 天，南路大顺军已抵达直隶真定，南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明思宗便只有“死社稷”一条路可走了。

六

事实十分清楚，明思宗虽有中兴之志，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但志大才疏，缺乏深远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治国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深刻社会

危机的根源所在，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始终未能制定一个明确具体的治国方略。他的治国理政缺乏长远的战略筹划，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他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往往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他目光短浅、没有认识到阶级矛盾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而是刻于理财，竭泽而渔，导致其进一步激化，使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不辨忠奸，只凭个人的好恶取舍人才，屡逐直臣，滥杀良将，重用奸佞之臣与宦官，致使局势越搞越糟。他不辨是非，亲自介入门户之争，致使党争持续不断，分散削弱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他极为虚荣，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尊严，缺乏担当精神，患得患失，屡屡错失延缓败亡的时机。所有这些重大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最终酿成了历史的悲剧，导致明王朝的灭亡。因此，明思宗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后 记

2011年秋冬之际，故宫出版社的杨付红女士邀我参加一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明代诸帝传记的写作。本人多年从事明太祖朱元璋的研究，积累了一批研究成果，就提出撰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朱元璋传》。不意她说此传已有人捷足先登，让我另写其他皇帝的传记。我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教学，虽然对明代诸帝的生平活动多少有所了解，但除明太祖之外，于其他帝王却缺少深入的研究，便婉言谢绝。她却不松口，要我无论如何得为她们出版社撰写一部明朝皇帝的传记，至于写哪个皇帝，由我自己定。盛情难却，我考虑再三，觉得自己过去对明末农民战争作过一些研究，此前还写过一部《晚明悲歌》，对明末的史料比较熟悉，就答应撰写一部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的传记。后来，待写完手中的其他书稿，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写出本书初稿。再经多次删改、增补，终于完成了这项写作任务。

这部《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以明思宗在位17年的

政治活动为轴线，展现崇祯一朝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此伏彼起、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以及明帝国大厦的崩解过程，揭示这位自称为“非亡国之君”的君主对明朝灭亡应负的责任。明思宗的确怀抱中兴之梦，在即位之初有清除阉党集团之功，而且一生励精图治、勤于理政、生活俭朴、不近声色，从而赢得不少人的赞赏。但是，勤于政务、崇尚俭朴不过是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仅仅具备这些素质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要说挽救危局。他在即位之初，虽然清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但却有其始而无其终，不久又重新起用身边亲信的太监，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导致政局的混乱。在封建社会，任何王朝的最高君主，要治理好国家，特别是挽救濒临危亡的局势，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必须具备深远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治国能力，从而制订出长远的治国方略，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明思宗虽然锐意求治，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未能认识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未能针对当时的民族矛盾特别是尖锐的阶级矛盾，提出切实可行的正确对策，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主义行动。加上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弱点，导致许多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所有这一切，终于导致明帝国大厦的倾覆，明思宗也就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残暴、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明思宗自缢煤山，李自成进入北京，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作为一部明思宗传记，写到这里本来即可结束，但考虑到读者可能还

想了解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的最后结局以及清王朝进京后南明可歌可泣的抗清活动，因此本书在明思宗自缢之后还加了个尾声，扼要记述清军入关和南明的抗清斗争。

全书正文后面附录的学术论文《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草就于本书写成之后。文中运用确凿的史料，阐述作为明朝的末代君主明思宗如何因其种种决策失误，将明帝国的航船引向覆亡的深渊，驳斥了史学界某种认为明思宗是“非亡国之君”、明朝的覆亡是“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的观点，希望读者通过此文，能加深对明思宗其人其事的了解，并从其败亡的历史反思中获得有益的启迪。这正是作者撰写此文此著的目的所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实录、政书、正史、方志、档案、文集和野史、笔记，并参考许多当代学者的有关论著，力求史事论述的准确可靠、真实可信，但是，作为大众读物，文笔则力求形象生动、简洁流畅，尽可能把云谲波诡、风雷激荡的历史场景和性格各异的历史人物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融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引起读者的兴趣，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故宫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冯印淙女士和副主任兼责编王志伟先生和邓曼兰女士做了大量工作，书中的图片即是由他们查找挑选的，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梧桐

2014年12月25日于北京

民族大学西路墙外楼

故宫出版

ISBN 978-7-5134-0961-2
9 787513 409612 >
定价：46.00 元